

三联
耳关

生活®

2016.7.4
2016年第27期
www.lifeweek.com.cn

周刊

英国脱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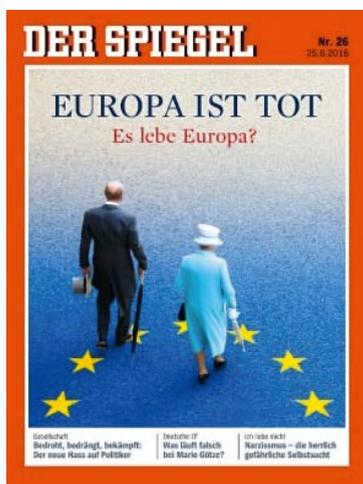
全球化由此逆转



893



生活·读者·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 元



《明镜》2016.6.25

欧盟已死，欧洲何以长存？

德国媒体《明镜》是“英国留欧”最坚持的捍卫者之一。自公投显示“脱欧”的那一刻，英国与欧盟就将共同迎来未来无法想象的暴风雨，双方的关系也就此进入冰点期。严峻的就业形势、过山车似的货币和经济走势、尚不明晰的共同市场局面等都是英国迫在眉睫的问题。“脱欧”，真的好吗？



1 / 《新闻周刊》2016.7.1

华盛顿的安全

巴黎恐袭发生后，“伊斯兰国”扬言他们还将袭击美国首府华盛顿。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已投入数十亿美元在规划并建立各种机制以应对包括生化袭击在内的各式可能出现的恐怖袭击，华盛顿更是不敢松懈。只是应对机制本身尚存在漏洞，而不可控因素也必然存在，此次奥兰多枪击案中的“独狼”式袭击法更是令人防不胜防。

2 / 《旁观者》2016.6.25

不列颠分歧

英国政府在应对“脱欧”公投结果及其影响的同时，应比以往更重视社会阶层之间存在严峻分歧的现实。数据显示，大部分精英阶层选民支持“留欧”，而大部分低阶层民众支持“脱欧”。全球化和大量移民的涌入冲击着困于住房短缺、失业和医疗等问题的底层民众。“脱欧”选择的背后有政府没解决好的社会问题。

3 / 《纽约杂志》2016.6.26

喜剧演员的自我修养

路易斯·C.K. 是近年美国大热的脱口秀表演者和喜剧演员，由他担任主演和制作人的喜剧《路易不易》已播出到第六季，仍热度不减。今年夏天，他将给动画电影《宠物的隐秘生活》配音。虽然早已是喜剧领域的“老炮儿”，但在路易斯看来，“喜剧”的谜题是他一生都难以解开的。在政治方面，路易斯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4 / 《新科学家》2016.6.25

如果机器统治世界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言，到2030年，在机器的协助下，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可能缩短至15小时。但是事实上，大多数人比百年前的工作量更繁重。现如今，机器可以取代人工进行制造业生产，人工智能可以解决超越重复劳动的多种问题。如果机器揽下了世界上更多工作，人类将何去何从？



P28 封面故事
全球化由此逆转
英国脱欧

- 32 断裂的“环”，英国与欧洲
- 46 一场公投狂欢，走向封闭的情感
- 50 又一个雷曼时刻
- 54 “白天鹅”与“黑天鹅”
- 58 英国移民问题的近忧远虑
- 62 戴维·卡梅伦，中庸者
- 68 鲍里斯·约翰逊，权变者
- 72 欧洲：一个幻想中的共同体
- 82 帝国·超国·碎片：欧洲联盟的内在悖论
- 86 恐慌的时尚产业
- 90 英国，精英主义与实用精神的结合



P102 人物：郑钧：这热爱，挺美好

社会

城市：城市声音：被忽略的听觉风景	92
人物：郑钧：这热爱，挺美好	102
手工艺：陈子福：用夏布做折扇	108
乡土中国：到西河去：乡愁与愁乡	114

经济

收藏：美丽银器	124
---------	-----

文化

艺术：乔尔乔内与威尼斯画派	132
人物：英国演员萨莎·拜伦·科恩	137
人物：秦昊：快乐拍电影	140
电影：《独立日2：卷土重来》：艾默里奇的“灾难”魔咒	146
设计：数字时代的粉红设计师	150
时尚：胶片里的世界会比显示屏里的更好么	154

思想：如何变得更聪明？	162
-------------	-----

专栏

张斌：脱离舍	160
宋晓军：朝鲜想用导弹试射让时间“倒流”？	161
朱伟：李陀：文学的地平线 (2)	164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66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19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0
天下	10	好东西	24
理财与消费	16	个人问题	168
好消息·坏消息	18		

2016年第27期，总第893期，2016年7月4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名誉主编 Honorary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王星 Wang Xing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蒲实 Pu Shi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程磊 Cheng Lei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聃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赵潇 Zhao Xiao 苗千 Miao Qian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非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王霄 Wang Xiao

发行物流 Issue Logistics

王荻 Wang Di

发行库管 Release Library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总监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内容编辑 Editor

薛凡 Xue Pe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徐睿洽 Xu Ruihan

美术设计 Artistic Design

张莉 Zhang Li

技术支持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手机产品 MB Product

辛军 Xin Jun

平板产品 Tablet Product

连子君 Lian Zijun

活动事业部 Ev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庄山 Zhuang Shan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文案 Official Documents and Letters

邢宇 Xing Yu 孙名梓 Sun Mingzi

活动专员 Event Executive

周宇飞 Zhou Yufei

视频事业部 Video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吴冰川 Wu Bingchuan 孙明楷 Sun Mingkai

节气刊事业部 Solar Term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创新产品中心 Innovative Products Center

松果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阿润 A Run 赵雯璐 Zhao Wenju 李骁楠 Li Xiaonan 赵夫宏 Zhao Fuhong

孙正之 Sun Zhengzhi 刘小荻 Liu Xiaodi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孟佳 Meng Jia 赵卓 Zhao Zhuo 夏青 Xia Qing 尤帆 You Fan 奚牧凉 Xi Muliang

行政 Administration

叶秋菊 Ye Qiuju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吴泓林 Wu Honglin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不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 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沧海书店 (0791) 8592810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二~扉1 · 甘肃省旅游局
3 · 力度形象
31 · 周刊征订
71 · 河狸家
81 · 和菜头
127 · 周刊 20 年
128~129 · 盖特唯软文
130~131 · 野生救援
159 · 三联新知广告
167 · 书店广告
封三 · WWF
封底 · 霞公府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鼠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五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Vtpower
VITALPOWER MEDIA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教师的角色

放下事业，陪孩子赴美留学三年，其中艰辛尤其亲情缺失之苦，不足为外人道。遇朋友向我取经，总是直言：曾经多次想过，若国内有更多选择，能上一所好学校，让孩子的个性自由发展，真不想孑然长居他国。这次回国探亲，恰逢贵刊谈论教育，瞬间就抓住了我，作为一个为孩子的教育抛舍太多的母亲，我急于从中找到支撑自己的力量。阅读中惊喜地发现，国内果然已有实验学校在摸索中前行，其教育理念与我在国外的认知已经很接近，教育手段上也与我感受到的很接近。我想，中国教育水平的提升，一定不是靠留学海外实现的，真正的改变应该发生在内部，感谢贵刊提供了这样的案例。

北京 黄梅子

不得不说的话

一年一度的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结果公示了，自然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这些年我除了一再斟酌完善自己的申请书之外，就是不断地向各类申获者和评委们请益。随着自己对有关国家社科基金申报与评审流程的逐渐了解，对其中存在的各种乱象和问题也越来越清楚。

我们院系近5年里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约有15项左右。据我的了解，这15个项目的申请者中，至少有10人在公示结果之前几个星期就已经被评委告知“中奖”。和我同专业的一个同事甚至告诉我，我们领域的一名大佬明确对他讲：当年若不是他在会评现场，我那同事肯定中不了。另外，学院前几年曾在外校引进一位特聘教授，是国家社科基金的通讯评委，但与我的专业方向不同。我向他请教通讯评审的流程，他的坦率回答让我吃惊不小。每年他的电子邮箱都会收到国家社科规划办打包发来的二三十份申请书，收到之后，他便转发给自己的博士生，让学生将每一份申请书上列明的前期成果中的论文上期刊网查出申请人姓名、单位。拿到学生列出的名单后，他首先挑出事前打过招呼的申请者，如果按照规定的通过比例还有多余指标，就给其中熟识的人打电话，在一通半玩笑半认真的调侃之后，这份人情也就收入囊中。而更恶劣的是，他说一些评审专家面对那些陌生的申请者时，如果对方的选题与自己的研究方向一致或相近的话，申请书写得越漂亮、前期成果越好的，越会被毙掉，因为这类申请者对评委自己的学术地位是一种威胁。而按照相关规定，通讯评审有5位匿名专家，只要其中一位否决，其他4位哪怕都给你满分，你也无法通过。

再说说提前打招呼。我的导师说，

前几年他还不是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但每到通讯评审时节，他都能收到不少请托邮件，其中有些人甚至还是本专业领域有名的教授、博导。不过，也有一种情况是请托打招呼者难以预料到的，那就是社科规划办在寄送申请书给通讯评审专家时的乱点鸳鸯谱。今年认识的一位宗教学专业的评审专家，本是做民间信仰与道教研究的，却接到了几十份佛教方向的申请书。拿着这些烫手的山芋，他要请一位学佛教的副教授同事帮忙，但是不凑巧，那位副教授出差在外十多天无法回来。最终他只有勉强应付交差，其质量自然不难想象。

当然，我还是愿意相信国家社科基金的评审是有基本的公平与公正的，也愿意相信上述情况只是少数，但这一评审制度显然是有缺陷的。单就所谓的匿名评审制度而言，其中最大的问题恰恰就在于通讯评审与会评专家一直都是匿名。当然，我并不否认在通讯评审和会评的过程中双向匿名的必要性，尽管“前期成果”的设置令其有掩耳盗铃之嫌，但对评审专家在结果公示之时仍然匿名就显得画蛇添足了。原本设计匿名制度是为了避免人情因素，缩小权力寻租的空间，然而全程匿名恰恰让评审中的暗箱操作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因为其中的违规行为无从曝光，也就难被追责。我的意见是，通过终审的申请书（连同评审推荐意见）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都应接受学术界公开的检验和评判，同时设立开放式的合理申诉与追责的渠道。总之，就是要让评审专家真正对自己的评审、对自己的信誉负起责任来。

厦门 青果

如此学习

朋友大刘任职于县扶贫办，前

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学习扶贫经验，因需要去的兄弟县市比较多，大刘笑言自己不是在外地学习扶贫经验，就是奔波在去外地学习的路上。

扶贫说到底不就是把项目、资金给最需要帮助的贫困群众吗？这还需要去外地学习？毕竟对于乡镇这一熟人社会，谁家的经济条件好些，谁家困难些，应该不难识别，与其费力劳神到外地学习，还不如抽出点时间和村头拉家常的老人聊聊天更有效果，毕竟外出学习还需要经费保障，有这些钱还不如直接用于扶贫呢？面对疑惑，大刘有些不服气，他说扶贫工作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新闻上还天天树典型呢，怎么能不学习先进经验呢？看到大刘有些激动，大家连忙打趣说，大刘你不妨也给我们介绍下学习体会。听到这，大刘语气平缓了许多，他说最近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要求，随之而来，省市三天两头便要下来检查，这让大刘他们倍感压力，外出学习也是形势所迫。不过通过这一个多月的外出学习，的确也发现了自己平日工作中的不足。

大刘说很多扶贫工作做得好的县市，好就好在他们档案资料整理得好。大刘进一步介绍说，和他们相比，县里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就比较粗糙，现在很多先进县市都针对扶贫工作建立了专门的档案库，里面资料包括申请表、贫困户信息采集表、帮扶手册公示公告信息

等等，甚至还有专门的影像资料。有了这些资料，大刘说，再面对上级检查，便可以应对自如。听完大刘介绍，大家更疑惑了：这是去学习扶贫工作经验，还是去学习应对扶贫检查工作的经验呢？大刘则笑着解释说，其实各地扶贫工作开展得都差不多，无外乎是对贫困户进行项目扶持，实在不行就低保兜底，上级确定的扶贫任务应该都可以完成。但扶贫工作能完成，不见得就能应对好扶贫检查呀，有时候甚至只要扶贫检查应对工作做得好，即使扶贫工作有些不足，也无伤大雅，毕竟上级检查虽说力度越来越大，但最后还不是来看看资料。县里过去扶贫工作做得也比较实在，但就是因为档案资料整理得不齐备，老是挨批评，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没有学习这些“先进经验”，吃了亏呀。

不过，大刘说在基层应对上级检查本就是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从事扶贫工作以来，相比县里其他部门，自己好多年都没有出过差，这次能密集外出学习，某种程度上，大刘说自己也算脱贫了。

郑州 关晓海

呼唤“动物保护法”

前日我丈夫在自家店铺前乘凉，忽然听见狗叫，声音非常凄厉。当时正是上午8点多钟，路上行人不少，但并没看到狗狗。他觉得奇

怪，就顺着声音找了过去。没想到，在距离我家店铺50米远的一家干洗店前，一名30多岁的男子正在对一只一个月大的白色狗狗施暴。我丈夫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那么小的狗，叫声竟然传到50米外的地方，可见狗遭受了很大的痛苦。当时那男人正用脚去踩小狗的头部并狠踢狗腹，小狗的后腿明显已经折了。干洗店的几位女员工和两位环卫工人也都来劝阻，但碍于男人的凶悍，没有人敢拉他。

我丈夫知道，如果再晚一会儿，小狗可能就会一命呜呼。而路上行人已经越聚越多，更有孩子在其间，这种残暴行为影响实在太坏。于是他走上去，问男人为什么打狗。男人的回答令人气愤。他说狗是他的，他爱打就打，爱杀就杀，跟别人没关系。我丈夫压制不住，拉住他说，不管狗是谁的，你都不能这么打。动物也是生命，你要多少钱我给你，算我买的。男人不同意，说什么也不卖。我丈夫愤怒了，要去揍那名男子。就在这时，来了两位蹬三轮车的大哥，把我丈夫拉开。不是我丈夫不理智，马路对面就是交警队，警察就在里面坐着，我丈夫多想请警察帮忙，哪怕拨打一下“110”。但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权这么做，因为我们没有“动物保护法”。就算报警，警察又以何理由出

警？即便来了，又该以什么标准进行处罚或干预？

在我丈夫和众人的痛斥中，男人抱起狗狗顺着马路走了。我丈夫不放心，一直跟着他。他心虚，没走几步，就打车消失在街头。事后我丈夫跟朋友提起，竟然有人说，就在这事发生的前一天，他们看见此人在超市门口把狗抱起来往地上摔。朋友慨叹，说幸好是只大白熊的崽，一两个月大，但毕竟是大型犬的幼崽，这要是小型犬，恐怕已经被摔死了。当时他们就进行了制止，可事实上，第二天，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且被我丈夫看见。

事情虽然过去几天了，他的心仍旧不能平静。他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为什么不能再出台一部《动物保护法》？”我很赞同他的观点，现如今社会压力大，有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发泄情绪，动物弱小，且没有法律保护，因此就有人格扭曲者在小动物身上施暴。当我们在大街上目击这种事时，正常人都可能视若无睹，但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面对人群里孩子惊恐的目光和老人惋惜的眼神，我们觉得非常愧疚，因为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而且，一旦与这些虐待动物的人发生肢体冲突，我们又该如何保护自己？

辽宁凤城 邹金红

意大利 |

佛罗伦萨古典足球比赛

6月24日，意大利古典足球队La Santa Croce Azzuri的队员入场，准备参加在圣十字广场举行的佛罗伦萨古典足球决赛。佛罗伦萨古典足球赛可追溯到16世纪，是足球、英式橄榄球和摔跤的结合体。每支参赛队伍由27名队员组成，队员可以手脚并用，甚至运用击打、推挤、武术等技巧，设法将球带入对方底线，击球至场边搭建的网墙，可得一分，50分钟后得分多者获胜。







西班牙 | 圣胡安节

(上图) 6月23日, 西班牙最热闹的节日之一“圣胡安节”庆祝活动开启。西班牙梅诺卡地区巴利阿里岛的休达德亚 (Ciutadella) 镇的居民在街头上演精彩马术表演, 并按照当地习俗纷纷触及马的前胸, 以求获得好运。6月24日是西班牙的传统节日圣胡安仲夏节 (San Juan), 庆祝活动通常从23日开始举行。

澳大利亚 | 艺术展

(右图) 6月23日,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举行“德加: 新视野” (Degas: A New Vision) 媒体预展。预展期间, 一名来自澳大利亚芭蕾舞团的舞者在德加的代表作之一《舞者与花束》 (*Dancer with Bouquets*) 前摆芭蕾舞姿势留影。该展览从6月24日开始至9月18日结束。







加拿大 | 盖茨比花园派对

(左图) 6月25日,“盖茨比花园派对”在加拿大多伦多士巴丹拿博物馆举行。参加者身着20世纪20年代风格的服装,在派对上享受音乐、美食。

英国 | 同性恋大游行

(下图) 6月25日,英国同性恋大游行在伦敦市中心举行。这场年度欢庆游行进入第43年,游行队伍在途中停止一分钟为奥兰多同性恋酒吧枪击案的死者默哀。





尼日利亚货币“崩盘”

6月20日起，非洲最大产油国尼日利亚终止了维持16个月的固定汇率制，引发奈拉大幅贬值，首日贬值幅度达41.47%。为维持固定汇率，尼日利亚央行动用了2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原油暴跌，过度依赖石油出口，经济结构失衡的产油国每况愈下，暴恐袭击更导致尼日利亚原油生产骤停，雪上加霜。今年6月份尼日利亚外储已经大幅下降至267亿美元，不得不进行资本管制，限制外汇交易。

人民币“入篮”

新加坡将从6月起把其人民币金融投资纳入到官方外汇储备。截至5月底，新加坡金管局持有2445亿美元外汇储备，是全球第十一大外储拥有者，如果它将人民币的储备份额提高到5%，意味着122亿美元资金需向人民币资产配置。新加坡金管局的举措表明，人民币加入SDR篮子不只是象征意义。今年10月，IMF新篮子将生效，将有越来越多的央行参考SDR篮子在外储中增加持有人民币资产，促进人民币海外需求。

香港特区与新加坡

今年1~5月，香港交易所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为686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1214亿港元下跌43%；首次公开募股筹集的资金仅为342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579亿港元下滑41%。新加坡今年的并购额较去年同期下滑24%；平均每日成交额约为11.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跌6%。受中国经济放缓和金融业持续紧缩影响，中国香港特区与新加坡这两大亚洲金融中心发展受阻。具体表现是：银行利润难以提升，就业增长缓慢，证券交易陷入低潮。



新股融资额骤降

始于2016年的IPO新规改革了以往先缴款后申购的打新旧制，减弱了新股发行对二级市场的冲击。可截至6月17日，今年以来55家新股IPO募集资金267亿元人民币，数量和融资规模大降，融资额同比降幅超过80%。造成融资“跳崖”，既有二级市场低迷的原因，也受到证监会换帅、改革停滞的影响。目前，等候上市的正常审核状态企业数量为788家，较2015年底增加62家。普遍预计下半年IPO发行将提速，一个月平均有20家企业上市。



中国楼市，日本泡沫

1980～1990年，日本总人口增速从0.78%下滑至0.33%；2005～2015年，中国总人口增速则从0.59%降至0.41%。天价房、高杠杆、地王等新闻层出不穷，难免令人联想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楼市。野村就现在的中国和当时的日本进行了对比，并指出，尽管二者有相似之处，但在日本土地私有，政府无法通过控制土地买卖以调节供需，中国的情况则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可以通过这种途径避免地价的剧烈变动。另外，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55.9%，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水平仍然较低。

万科的“分母之争”

华润与万科的争夺高潮迭起。万科披露董事会决议称，董事会10人中有7人通过重组决议，达到三分之二的法定票数，因此万科与深圳地铁的重组获通过。独立董事张利平存在潜在的关联与利益冲突，特此回避表决。但华润却认为，董事会算上张利平应该是11人，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数应为8人。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分母之争”。有一种观点，张利平回避投票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独立董事不可以是关联方，回避投票的只能是董事，不能是独立董事。

欧洲“死亡循环”

从2008年至今，西欧银行业持有的本国主权债已经翻了一倍，从3550亿英镑增加到如今的7910亿英镑，南欧银行业的国债敞口从2720亿英镑攀升至7220亿英镑，中欧和东欧银行业的主权债敞口也逐渐增加到了1480亿英镑。欧洲银行购买国债的行为造成了所谓的“死亡循环”（doom loop），双方互相依赖，一损俱损。就如同希腊，当希腊政府债务违约，它曾试图支持的银行都遭受了沉重打击，因为那些银行都是国债持有者。



无人车的道德困境

无人驾驶汽车可以减少 90% 以上的交通事故，但在剩下的 10% 发生时，车上操控系统如何应对可能会成为一个道德两难。发表于《科学》上的调查结果显示，同样的人，身处车外时希望无人驾驶车在紧急状况下应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则，为更大的公共利益而不惜自我牺牲，但当将自己假想为购买者和乘客时，他们却会对这种无人驾驶车敬而远之。研究者指出，事实上，如何制造出有道德的自动机械才是当今人工智能领域最棘手的挑战。

好消息

清洁的家与城

发表于《美国科学院学报》上的一项最新研究使用数学模型评估了北京、天津和河北家庭低效率取暖和烹饪设备对区域空气污染的“贡献”后指出，通过技术手段有针对性地消除这部分排放，可令大气中 PM2.5 浓度分别减少 40%、43% 和 35%。

生活从退休开始

《年龄与衰老》杂志上的最新研究调查了 124 名平均 62 岁的澳大利亚老人后发现，退休并不意味着逃离自己不喜欢的枷锁羁绊而去多做自己喜欢的事，但它所带来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却可以让人们从习惯的活动中获取新的、更大的乐趣。



坏消息

月圆人不眠

瑞士巴塞尔大学的研究小组对 33 名志愿者的睡眠状况进行监控后发现，在满月之夜，参与者的总体睡眠时间平均减少了 20 分钟，深度睡眠的时长则降低了 30% 以上。发表于《当代生物学》上的论文指出，睡眠激素褪黑素的分泌也会因月相改变。

戒烟路漫漫

虽然江湖中关于“决心戒烟永不复吸”的传说比比皆是，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公共卫生研究小组跟踪调查了 1277 名烟民的戒烟史后发现，平均每个吸烟者要在尝试戒烟 30 次、持续近 10 年的挣扎后才能真正摆脱烟瘾。



你走吧，青春。看着你离去，我不会悲伤。曾经这么年轻也不见得有多好。年轻充满了混乱、朦胧、渴望、懵懂、虚幻的概念，甚至有更虚假的幻想、欲望和恐惧，使我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落后。

——马洛伊·山多尔，《草叶集》

灯塔不会在岛上四处奔跑寻找需要解救的船只，只是站在那里发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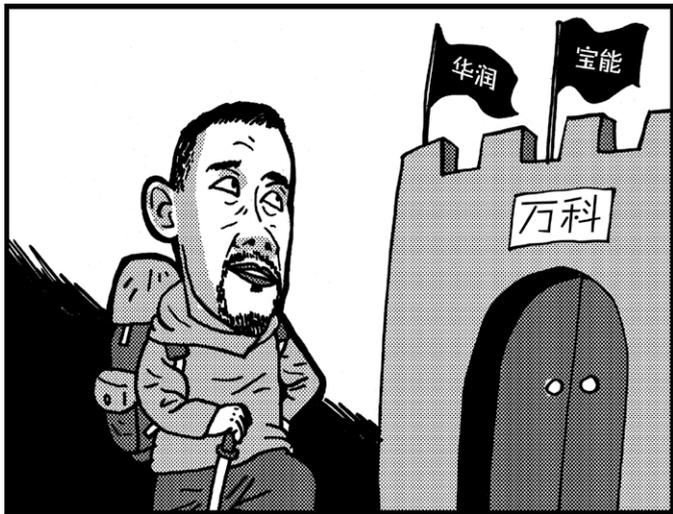
——美国作家安妮·拉莫特

我们要正确地看待这件事。英国只是投票决定离开欧盟；到11月，美国也许会投票决定离开现实。

——美国讽刺网站贝蒂·鲍尔斯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人的民族特征举世公认。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没了民族特征。他们被迫接受自己多种族、多文化的现实。他们被连续不断的立法搞迷糊了，几乎忘掉他们自己法律的基本原则——法律沉默，公民才自由。他们最珍视的制度一个接一个被蓄意地诋毁，不是被政治，就是被讽刺。

——英国作家简·莫里斯，《欧洲五十年：一卷印象集》



(插图 山羊哥)

有时，在极其孤独的境地中，你会创造出新的事物，那是你在其他处境中无法创造出来的。辨识你同类中的寄生虫和细菌，但别让他们将你带离你的中心。不要说你甘心默默无闻。如果非要说，那么请说你会默默地努力，把默默无闻变成一面盾牌，将你同周围的喧嚣和空洞隔开，不要让它变成累赘。

——奈保尔



+/-

数字

+ 32
年

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峰值计算速度达到12.54亿亿次/秒，这是全球首个突破10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持续计算速度达到9.3亿亿次/秒，它一分钟的计算能力相当于全球72亿人同时用计算器不间断计算32年。

11
厘米

一项利用卫星图像进行的新研究显示，过度抽取地下水导致北京的部分地区每年下沉11厘米，朝阳区下沉情况最显著。一些地区下沉的不均匀给建筑物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带来了危险。



77
公里

巴拿马运河历时9年的扩建工程终于大功告成，新航道6月26日正式通航，该航道总长77公里，能通过新一代吨位更大的集装箱货轮。巴拿马方面希望拓宽工程完成后巴拿马运河新航道可以带来更多通行收入。2015年，巴拿马运河通行总收入为26亿美元。

住在顶楼的女人

文 / 程燃

图 / 谢驭飞



小时候我家住在旧城区的一幢居民楼里，那是我爸单位分下来的一间小房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一起在那儿住了好几年。那时我正读小学，每天下午放学回家便跑到院子里和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我的父母总是比我晚回家，所以我也经常拥有一到两小时不受管束的时间，这令我身边的伙伴们羡慕不已。

我们喜欢在红色的砖楼顶上放风筝，也因为风筝，我们认识了王阿姨。那天我们的风筝在强劲的风力下吹到了对面顶楼的铁栏里，彼时人们喜欢在窗户外面安装铁丝网，我们站在楼顶用力地大叫着想要告诉房子的主人帮我们吧风筝拿出来。而后王阿姨推开窗户紧紧地盯着我们，像是很生气的样子。她是个三十出头的胖女人，或许实际年龄更大，拧着眉毛，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像是被人打扰了安宁的下午，接着便不由分说地将我们的风筝扔下了楼层。我们既生气又害怕，这样的阿姨之前从未遇见过，她刻薄得就像是门口的保安，让人觉得难受又压抑。

从那以后，我们私下都叫她胖女人，她让我们觉得讨厌。我们还曾几次偷偷地跟踪她，观察她上班和下班时骑着自行车笨拙地在小道上行进，有时我们也跑去菜市场看她满嘴唾沫地和贩子们讨价还价，总之我们非得抓出她的某件丑事不可。随后我们也终于发现了她悲哀的地方，那就是她老是孤独地圈禁在那栋顶楼里，只要下了

班便很少再出门，也不和邻居们聊天。她像是一个人活在一座宫殿里，像个沉静的老公主，之所以称她为老公主是因为我们偶然听到大人们关于她至今尚未结婚的谈资，我们就像发现了不为人知的秘密一样开心不已，我们开始暗地里称她为胖子老女人。那时候我们尚未对婚姻有任何印象，但我们已经从大人那里知道年龄大的女人还不结婚是件让人暗地耻笑的事情，于是她在我们心里的形象越来越差了，我们甚至幻想她就是一个巫婆，一个既神秘又固执的老女人。

但后来因为一件事情我对她的印象改观了不少，那是放学后家里没人的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在院子里游荡，她突然从后面塞给我两颗奶糖，很温和地邀请我去她家里坐坐。我不确信她认识我，但我还是颤颤巍巍地跟她上了楼。那是一间很宽敞很明亮的屋子，书架上摆了很多我看不懂但年代久远的书，阳光照射在顶楼的窗户上照亮了盆栽，她细心地打理着。她告诉我她是一名生物教师并向我展示了许多漂亮的动物标本，我看着她胖胖的身子伏在桌上耐心地给我讲解着标本就像好久没和旁人说话突然热情洋溢的样子。她真诚地望着我在笑，与之前完全判若两人。

此后，我很少再和她见面了，搬家后我就再没来过这个地方。但我永远记得那栋顶楼里的胖女人，她拥有一间别致有趣的屋子。▣

女巫季节

文 / 普尔曼

图 / 谢驭飞



我一向对于太过飘渺的事情缺乏热情和耐心，觉着那些虚无的东西太远，远在水云间里。可我家那谁的几位好友对星座这档事就有看上去的执著，尽管还没成为位列仙班到达他人难以企及高度的大神通，但就她们所掌握的知识来看依然能够唬人，掐着生辰日期没犹豫地就指出性格上的种种，有些甚至直切要害。被掐对象往往都会下意识缩缩脖子生怕真的会被看个通透，心里再不能藏住一丝私密。一直认为星座的神秘和那些心理测试题一样，当你勾选一些问题之后急于知道答案的同时，别人已经不动声色地掌握了你的全部，而告诉你的答案却非都真实可信。

后来据那谁说，女人聊星座就好比男人之于足球与时事，仅只是在某些场合下用以融洽气氛。而那谁口中一直称呼着“女巫”的许媛，作为一名资深的旅途上的独行客，粗看上去并不具备一些环境下的暖场能力。按她的话说在某处想把自己的身影融入到景色中，想找一路人甲帮下忙也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我一直弄不清许媛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谁总结了半天之后也只是喃喃地说该女巫命好。这话飘进耳朵，意识里就自觉地腾起些许的愧疚来。许媛家的那对父子多才多艺，不仅小家伙拉得一手好提琴，老家伙也弹得一手好“棉花”。更让那谁十分艳羡的是，女巫家的男人为她养了株常开不败的红玫瑰——一张某行金卡“随便花”。

外表散漫而内心无论有多谨慎，在卸下防备摘下面具时候也会露出攻击性极强的獠牙。譬如女巫常截屏过来分享朋友圈里一些有趣的评论，然后在电脑那端张牙舞爪地介绍说某条评论的发布者就是那个“初恋渣男”。据说她在读书时供养四年为其奉献了所有的男人到最后却跟别人跑了。女巫长相不差且身材尚可，可怜那谁和她做了大半辈子死党却一直都不敢问她到底输在何处。那谁以前和她说过，我曾躺在高低铺上与之煲过电话粥，估计如今心里在暗谢当年不娶之恩的那个人，我手头上没有她的任何联系资料。因此我笑女巫有些不利索，她却在那端冷笑，说她其实就是那个看着师父背女人过河的小和尚。

至于那谁常领进家门的一众狐朋狗友中，女巫算不上一恶客。但该女巫一直纠结户口本上的名字是此“园”非彼“媛”，对当初那位手滑的户籍警恨意难消。那谁却蹙眉不能理解，说老后在城郊买块地弄几畦菜地养三两只鸡鸭鹅猫狗兔，有篱笆围筑成的门楼，木匾上刻着“许园”两个字岂不是自然天成？农妇山泉有点田啊，春意盎然有清风徐来……被那帮女神仙无所戒备的不好感觉很快烟消云散。回头忍不住问那谁，我看上去是不是真的就是个很没野心的人？那谁左右偏着脑袋看了看后认真地说是。我想起一些女性眼中哪怕到老都还是偶像派的大众情人名男，很显然我也属于后者类别。☑

怕死

文 / 夜溪
图 / 谢驭飞



“死”这个字眼，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忌讳。从小我也很少听到家人说起“死”这个字，也很少去为我们解释什么。即使有人走了，家人也会告诉我他是去了另一个世界，那也就是说还是会存在，只是换了一种生存状态罢了。

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对这种感觉比较奇怪，为什么人会怕死呢。死了多好，什么也不用去考虑，可以一直躺在那里不用工作不用吃饭不用学习；可以去做一切自己想做却暂时没能力去做的事，在另一个世界里总没人强迫我去干干那了吧。

随着年岁渐长，不光是自己，身边的朋友也无端地变得怕死起来，走马路要看路，开车要看清路灯和指示牌，微信转发的全是养生或者关于安全的信息，即使知道有些可能是无效的；不去做年轻时做的一切对自己身体或安全可能造成威胁的事，类似通宵打电游、酗酒、抽烟之类的也尽可能地去避免，似乎每个人从某一个时间段开始都变得怕死起来。

后来慢慢明白了怕死的原因。

随着我们每个人的渐渐成熟，身上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重，或者说不是责任越来越重，而是我们逐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身上其实肩负着这么多的责任，要对年迈的父母负责、对朋友负责、对爱人负责、对小孩负责，如果自己不在了对他们的影响可能会是无可估量的。

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父亲在一场车祸中丧生，我仍记得那个黑暗的夏天和母亲哭泣的脸，这场事故直接导致了我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也造成了我的性格的巨变。总的来说，对我的负面影响是没有办法估量的。

随着生活阅历的逐渐丰富，你会舍不得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和朋友相撞啤酒瓶时溅出的泡沫，秋天窗外落下的第一片落叶，点燃香烟时跳动的火花和升腾的烟雾，早上5点半躲在云后的朝阳……这些年轻时不曾体会到的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慢慢地被你发现、被你爱上。你会舍不得离开这美好的世界。另一个世界存在吗？好玩吗？谁知道呢。可是眼前这些美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也是真真实实能去触碰的。我依旧记得当我第一次在山顶看到日出的时候，云后的太阳映红了半面天，早晨独有的潮湿空气的味道让我沉醉，那一刻我真的想永远留在那个地方。我真的怕死了，我真的开始害怕失去眼前的这些真实的美好。

“死”本身并不可怕。我也曾读过相对论和一些有关物理的书，当你去细想地球已经存活了46亿年时，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渺小，同时感受到一生的短暂。你会发觉人这一生就像小石子扔进了辽阔蔚蓝的大海，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

穿黑衣服的人

文 / 小荻
图 / 谢驭飞



我疲倦地推开了门，对面银行的灯灭了，一只胳膊搭在浅黄色沙发肩上，侧躺着一个熟睡的保安。我忘了我是怎么走进这间酒吧的，以至于当我坐下时，面前就已经多了一杯酒，在喝完一杯酒的时间里，我认真听完了一个故事。我是怎么认识陌生人L的呢？天知道当他拉住我说他故事的时候，我们也只是才刚刚认识几分钟而已。

我低头拉开我的那只大包，它能放很多东西，我总喜欢四处走，希望不管走到哪儿停住，都能拿出当时我需要的东西，比如一支笔或是一本书。我开始翻我的包，仰头向后靠在沙发里，L坐在我对面，眼里停了条冰冷的冻鱼，他动动嘴，没出声，我知道，他要开始说故事了。“我和你说话的时候，没有哄骗，虽然是轻声轻语，但是必说不可的。”他强调了一遍，我点点头。

巴黎的小阁楼里，L在伏案写作，窗外是4月，他的笔停在纸的最后一行。没人发现这位诗人是怎样仓皇冲出店门的，甚至忘记拿上店员已经包好的长棍面包。他追着那个黑色的影子直到街角才发现彻底跟丢。巴黎开始下雨，地上的井盖被雨水打湿变得异常黝黑，为什么是黑色的衣服呢？他不解，记忆里总是和橘色橙子一起出现的黑色，这次却黑得那么彻底，只有黑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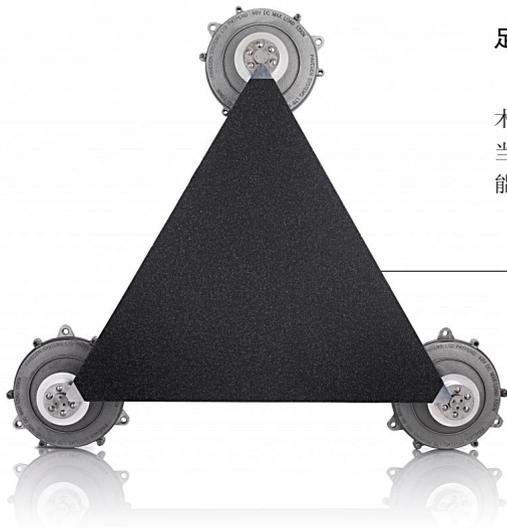
他提起家乡的小教堂，还有教堂后的那片麦

田。这世界上有很多适合穿黑衣服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只记得她的黑衣。他离乡，一年坐一次火车花上两天时间才能回那个村子，他知道她很爱干净，衣服经常洗，再熨得服服帖帖，很多件衣服，但都是黑色的。每次他要去，她总会为他装上满满一袋亲手做的橘子酱和面包。

他笑笑，抿了抿嘴，开始沉默，他说他不喜欢陌生人，在陌生人面前，他刚坐下就会想立刻站起来。他开始东张西望，我以为他有别的要等的人，他说没有。他说他只是害怕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待得太久。她教会他处理不安的最好办法就是远离不安。“我不会用色彩去描述颜色；我只会用一只脚趾头去踢一头大象。”L说。他喝了一口酒，晃了晃杯子，望向那个刚推门进来戴着黑帽子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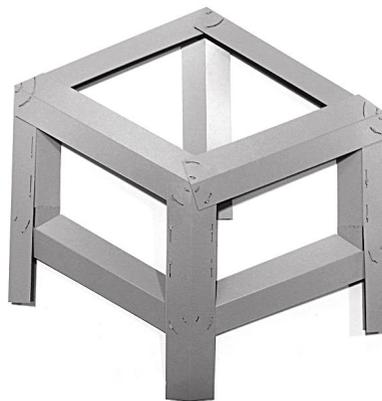
又灭了一盏灯，睡着的保安已经不在沙发上，L不愿再讲话，他索性转过头不再看我，又问酒保要了一杯酒。我低头看看手里的杯子，杯子里冰块已经融化了。我们说了太久的话，尽管大多数话都在重复同一件事，他在说他的母亲。▣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足底发电地砖

Pavegen 是一种能够利用人的脚步来发电的地板砖。这种技术采用了动能回收系统，主要依靠吸收人的足底能量来进行发电。当人踩上去的时候能够连续产生 5 瓦的电力。产品充分体现了节能环保的理念。



纸片板凳

设计师 Jongha Choi 设计了一套名为“de-dimension”的长椅矮凳系列，实现了平面二维视图和三维立体实物之间的自由切换。纸片板凳造型简约，色彩明亮，可以一秒钟折叠成一块超薄平板挂在墙上，不仅节省空间，还能用作美观的装饰品。



一体成型陶质外圈

Rolex 宇宙计型迪通拿不锈钢款腕表采用了高科技黑色陶质 Cerachrom 外圈，其硬度能有效防刮损、抗侵蚀，即使经紫外线照射也不会褪色。由于字圈一体成型，有助于让镜面固定于表壳，并确保防水性能。



超小高保真扬声器

无需像传统 Hi End 系统中那样附有多余的线材、功放、前级、解码器等庞然大物，带有无线连接功能的丹拿悠悦 2 扬声器为旗下体型最小的有源式扬声器。它能接受任何形式的音源进行连接播放，包括智能手机或电视机，传统的 CD 播放器甚至音乐流媒体播放器等。



拉风的电动自行车

与传统印象中笨拙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款造型拉风、极具现代艺术感的电动自行车仅有 70 斤，最高时速可达 50 公里 / 小时。动力由 48V 马达驱动提供，还配备了较长的悬挂和越野轮胎，保证其在危险地形中高速稳定地行驶。

凸点肥皂盒

这款带有凸点的肥皂盒 CleanSmile 是浙江大学学生的小创意。设计的亮点在于肥皂盒周围的凸点中央都有小孔，使用时不需要取出肥皂，只要在手中轻轻揉搓，肥皂液便会通过小孔自然流出，新颖而便捷。



咖啡香气闹钟

英国 Barisieur 公司新设计了一款咖啡叫醒闹钟。这款咖啡闹钟可以实现五种不同的感官刺激：听觉（煮水声）、视觉（煮沸及输送的过程）、嗅觉（咖啡的香味）、味觉（味蕾的唤醒）、触觉（产品按钮调拨）。只要在前一天晚上备好咖啡豆和水，第二天闹钟就会在设定好的时间点通过各种感官刺激把你叫醒。



“五十五”腕表

路易威登“五十五”系列 36 毫米玫瑰金腕表强调与 19 世纪旅行箱的关系，1892 年行李箱锁上有防损坏的专利牌，表壳两端的两个铆接装饰板就是引用了这一设计历史。



折叠办公桌

Kartell 品牌“Spoon 桌”是以轻盈和实用为特征的折叠办公桌，桌面的蜂窝铝板厚度只有 15 毫米，坚固美观的热塑性桌腿配有收起和锁定系统，简化了桌面的折叠方式。



麂皮花卉

意大利制造的 Chloe Drew 斜挎小背包，圆形轮廓结合方形包盖，多种色彩的麂皮拼接出错落有致花卉图案，与金色的金属配件形成对比。

香蕉纤维

“安德斯吊灯”的灵感来自高级时装，设计师采用伦敦一家女帽商的传统制作技艺，将香蕉纤维材质围绕着中心灯具，堆叠缝合出一件富有装饰感的吊灯。



几何形耳环

Coxon 的“得墨忒耳”系列玫瑰金珍珠耳环以代表丰饶和婚姻保护者的希腊女神名字命名，优雅的几何形式给人以力量感，淡水珍珠耳钉也可以单独佩戴。

蒂凡尼椅

英国家具设计师汤姆·福克纳手工制作的“蒂凡尼椅”，空心椅背具有弯曲的圆角，椅腿部分从上往下逐渐变细，突显出雕塑形状和优雅的外观。



银质伊甸园

Christofle 品牌“伊甸园”系列纯银镇纸和笔筒，表面蚀刻交织的藤蔓和花卉图案，镇纸上端的水晶苹果再次点明与圣经花园的联系。



英国脱欧

全球化由此逆转



**BRITAIN
STRONGER
IN
EUROPE**

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宣布后，唐宁街上仍驻留着“脱欧”和“留欧”两派支持者

文 / 刘怡

戴维·卡梅伦绝对想不到，一场原本只是走过场的全民公投，竟惹出了如此之大的风波。

当他在2013年1月承诺保守党内的反对派，将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这一问题举行全民公投时，对提案被否决的必然性是有充分信心的。的确，英国在货币和社会政策上向来独立于其他欧盟国家，有着漫长的“光荣孤立”历史，在外贸结构上对欧洲大陆也较少依赖。但它毕竟是凭借统一市场的加成才完成了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复兴，受欧洲难民问题的冲击也较小。即使是从70年代历经3次尝试才“入欧”成功的波折看，贸然放弃在布鲁塞尔的席位也显得太过鲁莽。

但这一切真的发生了。1741万票对1614万票，领先3.8%，脱欧派胜出。

影响公投结果的不是卡梅伦内阁在舆论上做出的引导，而是从2013年1月到2016年6月，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一切。欧盟以及美国无力阻止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并介入乌克兰局势，明白地显示了欧洲对自身影响力的一贯认知和实际效用之间的差距。希腊债务危机历经诸多波折方达成妥协案，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独立的英国，却使英国民众直观地感受到每年输入欧盟的巨额财政贡献正在被浪费。继希腊之后，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这四个国家的巨额赤字似乎也需要英国纳税人来贴补。叙

利亚难民问题造成的意见分裂，更是让欧盟的实际领导者德国与素来关系密切的东欧新入盟国家直接陷入准“冷战”状态。其间还夹杂着“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崛起和遍布全欧、层出不穷的暴力恐怖主义活动——《查理周刊》，巴黎、布鲁塞尔……一切都在唤起英国人对11年前伦敦“7·7”爆炸案以及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冲突的负面记忆。他们对欧盟及其象征的全球化的未来不再抱有信心，同时更倾向于将目前的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归咎于留欧；如此一来，公投结果自是不言而喻。

一场发生在欧洲一角的政策性投票，在一夜之间引发了全球舆论的关注和震惊，背后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始终未曾消散的全球普遍焦虑。俄罗斯自行其是的单边主义，美国的战略收缩倾向和极端保守派代言人特朗普的崛起，欧盟的虚弱和内部分裂，全球大国在应对叙利亚内战以及恐怖主义问题上的迟缓犹疑，都在加深一种印象：后“冷战”时代以加速全球化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在运转超过1/4个世纪之后，已经走到了总崩溃的边缘。壁垒正在重新竖起——这一点和1929年大萧条之后席卷全球的自利主义、孤立主义浪潮毫无二致——首先是在大洲和大洲之间，接着是在大洲内部，最后渐到国家本身。而人们被迫生活在这个碎片化的世界里，茫然无助。

我们可以用一万个理由来说服自己对此轻松置之：从公投结果出炉到英国实际脱欧之间还有整整两年的谈判时间，具体的技术问题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磋商和妥协。英国在欧盟内部历来较强的独立性意味着脱欧造成的实际冲击并没有那么不可忍受。已经有上百万选民在网络发出倡议，要求举行“二次公投”、修正此前的决议。有望接替卡梅伦出任下一任首相的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也为英国重回欧洲经济区，或组建独立的自贸区留出了口头上的回旋余地。

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打消这个事件的象征性意义。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传统强国、安理会五常之一和欧洲第二大经济体，英国诉诸脱欧的决定正在成为这个焦虑时代的风向标。自利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国际行动将变得越来越频繁，关于“世界是平的”、普遍繁荣和均质社会到来的愿景正在迅速消融。若干年之后，我们或许会意识到在2016年6月24日，英国脱欧推倒了全球化进程逆转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暴风雨就要来了。■



6月23日，在曼彻斯特展览中心的一个公投投票点，工作人员正在清点票数



绘画·阿梗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1972年5月9日，欧盟理事会主席在伦敦塔前升起欧盟会旗



断裂的“环”， 英国与欧洲

文 / 刘怡

三联生活周刊



1948年5月29日，保守党魁丘吉尔在发表关于英国须与西欧进一步密切关系的演讲之后，受到阁僚交口称赞

作为欧洲一体化概念最早的倡导者，英国政治家汲汲以求的松散型盟约和欧陆国家希望构建的联邦式共同体存在明显的歧义。跨大西洋特殊关系的存在，则为伦敦提供了重要的对冲选择。在过去70年里，英欧一体化似乎一直只是英国的“外交三环”中并非不可或缺的一环。

1948年秋天，20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史家之一、德国人路德维希·德约坐在马尔堡大学的断壁残垣中，伤感地写下了这段文字：“欧洲在这一次为击败霸权觊觎者而进行的斗争中所做的贡献，比它在以往历次危机中所做的都要小得多，它再也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重新站立起来了。”那时节，过去100年里全球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唯一中心——西欧刚刚在一场历时6年的大战中损失了25%的GNP和至少1000万人口，法德两国战死的军人和平民总数皆超过战前总人口的8%，德国还被迫交出战前国土面积近1/4的东部省份。法、德、意三个工业国家在1949年时的GNP之和不及美国的1/3，勉强超过苏联的一半；军费之和更是只有美国的13%！

万户萧疏、哀鸿遍野的气氛中，也有人表现出了反常的活跃。1948年1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在对下院的演讲中异常高调地宣称：英国和它在海峡对岸的友邦有必要建立某种“西欧同盟”，在政治和安全上形成一个整体。同年5月，英国代表出席了在荷兰海牙举行的欧洲统一化运动大会，并于一年后再度出现在欧洲委员会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就连在野的丘吉尔也在1946年的苏黎世演讲中喊出了“重建欧洲大家庭”的口号。

如此直白而富有预见性的表述，与随后70年间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若即若离的表现形成了巨大反差，和今天的断然脱欧之举更是南辕北辙。个中缘由何在？

单从字面意思出发，我们很难窥见英国政治家口中的“西欧同盟”与后来真正成为实体的欧洲联盟(EU)在内涵和构成方面的巨大差异。对德国和法国政治家来说，一个建立在联邦主义原则基础之上，以超国家共同体为最终目标的大欧洲是它们恢复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竞争力，并在美、苏两大强国掌控的世界秩序中维持独立性的唯一出路。而独立性对英国来说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英帝国—英联邦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长期影响使不列颠的国际地位远高过它的领土和人口规模，与美国在文化认同和战略利益一致基础上建立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也不具有显著的强制和义务色彩。相比之下，作为战后英国“外交三环”中最后一环的英欧关系从来都不是最具决定性的部分：英国的确期盼与欧陆诸国结盟，但他们希望建立的一种以共同利益和有限目标为导向的松散盟约，而不是具备极强控制性和义务束缚的实体化机构。英

国希望在“三环”之间保持行动自由，兼沾其利，而不是成为任何一环的俘虏。

多数评论家会用老生常谈的“光荣孤立”传统来解释英国脱欧的心理动因；这种过于简化的逻辑忽视了今日英国与19世纪的英帝国在经济规模、军事实力和全球利益方面的显著差异，未免过于陈腐。1946年之后的英国并不孤立，它在“三环”之间反复游走、身段柔软，从未脱离精明的战略算计。今天看似突然的脱欧决定，固然在形式上斩断了其中的一环，但前提仍是伦敦与布鲁塞尔在产业结构、移民输入偏好乃至外交布局方面已然出现的一系列分化。在公投后长达两年的脱欧操作谈判中，英国仍将努力确保自己与欧盟在贸易和资本、人才流动方面的互惠政策不被彻底颠覆。与此同时，“三环”中的另外两环也将继续为伦敦提供必要的对冲。英国已不再是昔日的世界霸主，但“外交三环”的战略弹性和冗余空间使得它不必将欧盟视为最后的依靠；这显然比一句简单的“光荣孤立”更能够解释伦敦的脱欧考虑。

“三环”最初的挫败

对1945年夏天的大部分西欧政治家来说，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安定或和平。他们必须为重建满目疮痍的国家殚精竭虑，还要担忧各自控制了半个欧洲的美国和苏联会为新的矛盾爆发冲突。唯有英国人自始至终以骄傲的胜利者自居——尽管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内阁在这年7月被工党所取代，但克莱门特·艾德礼同样把刚刚结束的战争看成是一次验证英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并对国际秩序进行良性“治疗”的体验。他希望挟新胜之利，对英国社会和帝国结构进行更平等、公允的改造，对普通民众为战争做出的牺牲提供补偿。换言之，当欧陆政治家为战争带来的动荡和破坏震惊不已、希望通过彼此间的联合来弥补已经犯下的错误时，英国人却认为胜利带来了推行内部改革的良机。双方在追求一体化的迫切程度上从一开始就相差甚远。

当然，艾德礼接手的毕竟是一个出口贸易额不到战前的40%、商船吨位损失过半，连面包也要实行配给制的国家。丘吉尔为了维持战时货币和物资的流通，把黄金储备和海外资产的50%出售给了美国，还欠下美国和各自治领总计35亿英镑的外债。这使得艾德礼不得不把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的32.97亿美元



从“欧洲一体化”这一概念诞生之初起，以法国为首的联邦派和以英国为首的盟约派就表现出了极其明显的分歧。

复兴基金悉数用于还债。但他的确推行了一系列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和改善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对英格兰银行实行国有化；通过《国民保险法》，为男性公民及其配偶提供养老金、疾病和失业保险以及殡葬费；创建国民保健署（NHS），建立覆盖全民的免费医疗网络；由国家财政出资解决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对体力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养老金进行改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口号正是在艾德礼任内第一次提出，并成为随后历届工党政府一以贯之的目标。英国甚至因此被诤称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君主国”。

1948年，艾德礼的外交大臣贝文率先提出了“三环外交”（Three Circles Diplomacy）这一概念，倡导在英帝国、英美合作以及英欧关系之间保持兼顾，不偏不倚。尽管在1947年和1948年被迫允许印度、缅甸、斯里兰卡以及以色列独立，但通过将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英帝国”改组为更平等的“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伦敦依旧维持了对昔日海外领土的政治影响。而在英美关系方面，英国早早表现出了鼓励美国介入和干预欧洲安全形势，以分担英国的财政压力的倾向。1947年，英国宣布放弃对希腊和土耳其的经济、军事援助，由美国接手，成为“冷战”的导火索。1948年，又是英国敦促美军对遭遇封锁的柏林实施空运补给，从而划定了“铁幕”的边界。1949年4月，美国最终同意牵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改变了其避免承担大陆义务的一贯传统，并在两年内为西欧各国提供了近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在对欧关系方面，英国从1948年起就试图将负责“马歇尔计划”援助分配的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CEEC）扩大为常设组织，并向北欧国家提议建立关税同盟。但当法德两国在1950年着手筹建煤钢共同体并向伦敦发出邀请时，英国副首相莫里森表示了断然拒绝。在他看来，这一提议在经济上无甚必要——英国的出口商品额超过德、法、意三国之和，工业原材料和粮食主要从殖民地进口——在政治上可能割裂伦敦与华盛顿以及英联邦之间的特殊关系。对厉行左翼路线的工党来说，在煤炭、钢铁生产这样关乎大量就业人口和工会支持度的问题上与外国政府合作也不符合其政治理念。最终，法国成为这个煤钢共同体的实际掌控者，英国则身处其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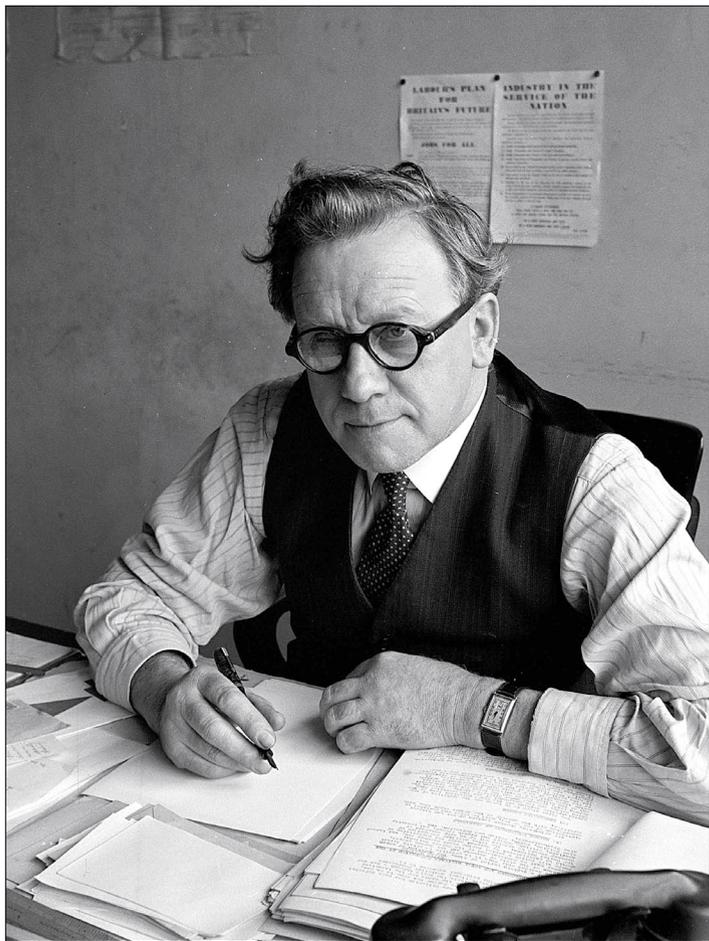
从“欧洲一体化”这一概念诞生之初起，以法国为首的联邦派和以英国为首的盟约派就表现出了极其明显的分歧。1948年，贝文告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伦敦不愿把自己置于一个决定权由“某位秘书长或某位主席”掌握的国际组织当中，“我们担心从那样的潘多拉盒子里会蹦出特洛伊木马来”。1950年，莫里森在拒绝煤钢共同体邀约的声明中更是公然声称：“一个仅限于西欧的政治联邦，与我国具备多重亲缘关系的英联邦、作为更广泛的大西洋成员国的义务以及世界性强国的利益是无法相容的。”挪威、丹麦和瑞典支持伦敦的主张，他们与中西欧各国的经济关联度较低，当然更欢迎一种目标小而明确、义务和约束力有限的盟约关系。

但同时推行对内高福利政策和对外安全义务的扩张需要以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为前提，这恰恰是实际的英国政府无能为力的。朝鲜战争爆发后，艾德礼为履行对美国的国际承诺，被迫将福利开支挪用做军费，导致内阁因意见分歧而解体。随后的1951年大选中，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自由国民党联盟以微弱优势胜出，开启了保守党在战后的第一个多年执政期（1951～1964），也是“三环外交”的第一波鼎盛期。尽管保守党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同样无法可想，但他们延缓了工党过于铺张的福利主义政策，以便将对外政策的重心调整到巩固联邦体制以及扮演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中介人”角色上：在丘吉尔心目中，这两“环”的重要性显然更加突出。

不幸的是，两项企图无一不以惨败告终。伦敦在1949年组建英联邦，本意是通过将过去的东南亚、非洲、西印度群岛和大洋洲殖民地升格为自主权更大的自治领，来维持上述地区对英国本土的向心力。但在战后席卷全球的非殖民地化浪潮中，各自治领领导人很快厌倦了伦敦的家长式“指导”以及包含政治企图的白人移民迁入政策。1957年，黄金海岸（加纳）成为西非第一个宣布独立的英联邦国家；3年后，尼日利亚获准完全独立；1961年底，获得自治权仅19个月的坦噶尼喀（坦桑尼亚）也变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尽管大部分自治领在正式独立之后依然选择留在英联邦架构之内，但他们的初衷是从优惠的贸易政策中获利，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满足伦敦的予取予求。保守党领袖麦克米伦不禁感慨：“变革的风一起，我们就被吹走了。”

更重要的是，保守党在英美关系问题上发生了重大误判。作为唯一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依然领导着一个西方大国的战时领袖，丘吉尔在面对美国领导人时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心理优势。他认定华盛顿在欧洲安全问题上需要英国的中介作用，更揣测美国在中东



1. 拒绝“入欧”邀约的英国保守党内阁副首相赫伯特·莫里森 (1888~1965)

2. 英国“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 (1925~2013)

3. 1967年1月24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右)在爱丽舍宫会见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10个月后，戴高乐第二次否决了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

和亚洲对抗苏联的压力时需要英国的支持。但对已经在欧洲大陆驻扎有数十万武装部队并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约”与西欧各国建立起密切的经济、政治联系的美国来说，一个多余的中介人反而成了累赘。某种意义上，伦敦要强化自己在华盛顿心目中的位置，恰恰需要通过融入西欧一体化、巩固对德、法等国的影响力来实现，但莫里森在1950年的回绝已经切断了这种可能。

更重要的是，1954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宣布实施对苏“大规模报复”核战略之后，西欧盟国的安全政策开始直接影响到美苏爆发核战争的概率。华盛顿固然愿意在苏联入侵西欧时为“北约”成员国提供核保护伞，却也担心盟国的自行其是会将美国拖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在这方面，对虚幻的“全球利益”期待过高、摩拳擦掌不断的英国恰恰是头号嫌疑人：后

者在非洲和中东的一系列强硬表现表面上是在分担美国的义务，实际上却是希望华盛顿为伦敦的利益火中取栗，为英国的行动自由做担保。1954年，当丘吉尔的继任者艾登决心以武力回应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举动，和法国、以色列一起对埃及动武之后，英美之间的分歧终于彻底公开化。

从10月29日到11月6日，英、法、以三国联军顺利完成了占领运河区和西奈半岛、为全面入侵埃及做好准备的任务。但当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6日凌晨发出“将以核武器保卫埃及”的恫吓之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给艾登首相打去了电话，告知后者：全球美军已进入戒备状态，但倘若英军不立即终止在埃及的军事行动，美国不会为最坏的后果负责。7日凌晨，塞得港方向的英军停止了前进，随后开始安排撤军。这是“二战”结束以来英国政府受到的最严重



3

的外交羞辱，它不仅导致了艾登引咎辞职，也使“三环”中最重要的一环陷入了危机。艾登的继任者麦克米伦在那一年的日记里写道：“过去的努力正化为乌有，我们的内外政策已陷入危机。”

“特洛伊木马”

哈罗德·麦克米伦并不是一位大刀阔斧的革命家，但他比两位前任更能认清现实：英国的经济总量在50年代中期已经被西德超越，它的全球义务和它对西欧的心理优势已经与它掌握的资源完全不成比例。纵然心怀不甘，也必须壮士断腕。1957年，麦克米伦内阁发表国防白皮书《不列颠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贡献》，宣布英国武装力量总人数将由此前的68万人大幅削减至40万人，其中优先裁撤常驻海外的部队，代之

以周期性巡航的舰队；包括航母在内的一系列军备采购项目也被向后推迟。该“白皮书”同时还确认：以后除去出于道义，或被邀请，或为了确保英联邦框架之内的安全义务，否则英国将不会越过“北约”单独进行任何形式的战争行动。

也是在麦克米伦任内，不列颠完成了它和昔日帝国光荣的最后告别：从1960到1971年，英军先后撤出塞浦路斯、也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曼和阿联酋，将维护地中海、波斯湾和西印度洋航行自由的任务完全转交给了美国第五、第六舰队。东南亚方面，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均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独立使英国真正与东方脱离，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西方”国家。它从经济规模和利益分布上都更像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强国了。

但这项转型还缺少最后一项步骤，那便是与主要

由法国领导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展开正式合作谈判。但伦敦想要的依然只是一个有助于复兴英国经济的工业自由贸易区，对政治义务和超国家共同体兴趣索然。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试图继续玩弄古老的均势战略（Balance of Power），首先将一部分贸易国聚集在自己周围，随后以此为筹码，与巴黎和波恩讨价还价。而英方仰仗的资本便是在1960年组建的欧洲自由贸易组织（EFTA）。

成立于斯德哥尔摩的EFTA是伦敦希望实现的那种一体化类型：简单，明确，除贸易政策外再无其他附加义务。加入这个组织的包括奥地利、瑞士、丹麦、瑞典、挪威和葡萄牙，后来又加上了爱尔兰、冰岛和芬兰。与主导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法德两国相比，这些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工业规模相对较小，不容易享受到共同体在西欧一隅改善彼此间交通和贸易条件带来的便利。但它们几乎都是小而高效的农业生产国，产品主要销往国际市场，对法、德等国推出的共同农业政策相当感兴趣。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来说，EFTA国家的加入也会是有益的补充。但英国并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用心：对致力于输出工业制成品的英国企业来说，单靠EFTA的那些北欧和阿尔卑斯国家根本消化不了英国的出口份额，这一切只能靠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才能实现。

1961年7月，麦克米伦内阁第一次向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总部提出了入会申请，紧随其后的还有丹麦、挪威、爱尔兰三个EFTA国家。但他们碰上了一个足够强硬的对手——3年前重返政坛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后者与莫内、舒曼等欧洲一体化的早期缔造者不同，对超国家共同体的可能性心存疑虑。但戴高乐试图使欧洲共同体真正保持在美苏两极之间的不偏不倚，并成为法国重回世界舞台的倚仗。而一个带有显著亲美色彩的英国率领一群小国加入，无疑会使欧洲在外交政策上的偏好向美国倾斜；更何况此际英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法德两国的一半，伦敦对巴黎的需要程度远大过能给后者带来的好处。于是，戴高乐用13年前贝文评价欧洲一体化构想的那句话回敬了英国人——“他们就是美国塞进欧洲的那只特洛伊木马！”

偏偏英国人一直在以实际行动为这句话提供注脚。1962年12月，主要是出于财政考虑，麦克米伦在巴哈马的拿骚与美国总统肯尼迪签署双边协议，决定放弃研制国产海基核导弹，改为采购美国的“海神”型；在此之前，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已经在使用美军提供的MK-5型原子弹。《拿骚协议》虽然不会使英国的核武器完全落入华盛顿控制之下，但“海神”导

弹的零部件供给和火控系统维护完全由美国操纵，英国政府须对使用该导弹的情况提前向美方做出说明，还要向美军核潜艇开放苏格兰的基地。对历来主张欧洲核武库独立、避免为美苏所左右的戴高乐来说，这简直是一种公开挑衅。1963年1月，他在盛怒之下否决了英国加入经济共同体的申请。伦敦的回应则是在同年8月与美苏两国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针对法国的意味昭然。

第一次入盟申请被驳回之后一年半，保守党在1964年大选中以微弱劣势不敌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开启了战后工党的第二个执政周期。从那时起到1979年，除去保守党人爱德华·希思执政的一届任期（1970～1974）外，工党一直以奇迹般的微弱多数优势维持着对下院的控制，并继续那项在13年前夭折的福利国家试验。事实证明，这是一项完全失败的尝试：重新启动的国有化进程导致大企业生产效率下降、浪费增加；不适当的高福利政策使政府的公共开支增加到每年140亿英镑；但为了实践“科学革命”和“工业现代化”的竞选诺言，威尔逊内阁又严格控制工资增长幅度，引发了1966年的海员大罢工，使英国的外贸出口额在那一年骤降了36%。由于和英联邦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下降，又无法进入欧洲共同市场，英国的国际贸易收支从1963年起连续出现入超，到1968年已经造成了37.78亿英镑的累计赤字；而英国的内外债务到1969年为止已经分别膨胀至308.4亿和99.35亿英镑，状况岌岌可危。

身处风口浪尖之上，威尔逊再度把加入共同市场当成了挽救经济困境的良方。1967年5月，英国第二次借EFTA三国提出了“入欧”申请。此时欧洲煤钢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已经合并，统称为欧洲共同体（EC），巴黎负责政策、波恩掌握财权的结构基本成型，戴高乐当然更不愿接受一个处于衰退状态的英国。当年11月，他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了威尔逊：“英国刚刚因为国际收支危机宣布英镑贬值，弱势英镑会给欧共体的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倒霉的哈罗德·威尔逊！他现在要面对的是在欧共体国家完全不曾出现的反常现象：雄心勃勃的国有化政策把交通、医疗、教育和通信事业都变成了政府的义务，后者却无法为其提供清晰的指导性政策或加以有效管理。1970年英国有47%的GNP贡献来自国有经济，年均经济增长率却降到了2.9%。高福利政策导致开支剧增，却不是用于生产性投资；国有化政策使得私营企业的税负显著加重，工商界信心不足，货币



英国汽车公司在牛津郡的组装车间（摄于1965年）

接连贬值。政府大力振兴服务业一度使全国失业率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但立足于满足本地需求的低端服务性行业不可能创造任何外汇收入。

仅从汽车工业一项，就可以窥见此际英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政府一度寄望由国家牵头的英国汽车公司（BMC）能像德国的“大众”（Volkswagen）那样成为畅销全球的平民汽车品牌；但在德国汽车工业尚

未复苏的10年间，急于出口创汇的英国汽车已经因为忽视质量控制和售后服务而在海外臭名昭著。到了BMC发展到一定规模、急需升级技术设备的时候，囊中羞涩的政府又无法像法国或意大利那样给予它足够的支持。更有甚者，标榜均衡发展的工党内阁为了安抚在乡村和基层工会中的支持者，把BMC的生产工作分散到了60家不同的中小工厂，直接抬高了制造成本，



左图：1964年5月7日，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在日内瓦举行第六轮谈判，史称“肯尼迪回合”

右图：1974年2月28日，时任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在伦敦西德卡普选区和民众打招呼。在当天举行的提前大选中，保守党以4席的微弱劣势不敌工党，丧失了执政权

最终导致整个汽车工业陷入慢性死亡。而整个BMC内部居然有246个工会！

某种意义上，工党政府是牺牲了英国经济转型的15年时间，来换取长期执政的机会，并把肆意布施的社会福利当作是酬赏工会的佣金。威尔逊有一句高论：“对政治来说，一星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使得他缺乏长远的眼光和创新意识。到了1970年，即使是最愚钝的国民也不打算再让他多待一个星期了。从那时起到1974年，英国迎来了一个保守党“窗口”期。

英国重返欧陆

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20世纪70年代是与一连串夹杂着希望和恐惧的复杂事件共同到来的。一位出身平民背景、关心国际事务的保守党人爱德华·希思成为新任首相，他试图修改威尔逊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英国舰队的决策，并和欧洲共同体发生更积极的联

系。英国石油公司（BP）在北海西部发现了储量喜人的油气田，不仅缓解了英国的能源供给焦虑，也为政府开辟了新的财源。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保守党内阁在1972年6月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来自外汇市场的抛售致使英镑持续疲软。北爱尔兰的对抗持续升级，1972年1月30日“流血星期日”冲突中，英军开枪打死14名平民，暴力活动开始层出不穷。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任教育与科学大臣，她宣布取消全国小学和幼儿园的免费牛奶供应，因此被称为“偷奶贼”。

与此同时，英吉利海峡对岸也在发生着一系列意味深长的变化。1967年，“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被迫接受美国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对苏“大规模报复”核战略修改为“灵活反应”战略，同时打消了由“北约”独立控制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的可能。对巴黎和波恩来说，这无疑令人沮丧的消息：在过去，一旦苏联常规力量开始向西挺进、入侵法国领土，美国就将对苏联本土重要目标实施核打击；此举将把冲突主

要限制在美苏两国之间，降低常规地面战争对欧洲经济造成的破坏。但在“灵活反应”战略下，西欧国家完全无法预估美国在何种条件下才会对苏联使用核武器，在反应等级升格为核报复之前，所有的破坏和牺牲都将由欧洲一力承担。

更重要的是，在戴高乐这位欧洲孤立主义者于1969年引退之后，欧共体主要国家现在在外交和贸易政策上与美国产生了一系列分歧：法德两国反对美军继续留在越南，并且接受了两德将长期分裂的现实，开始着手与苏联修复关系。西德总理勃兰特的“东方政策”进展极其迅速，甚至令奉行现实主义战略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都感到惊讶。贸易政策方面，欧共体在1964~1967年的关贸总协定（GATT）第6轮谈判中作为一个单一集团参加，最终争取到了大部分工业品50%以上的关税降低额度。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先是提高了欧洲商品的进口税率，接着又要求欧共体修改其农业保护政策。德法两国领导人现在担心他们可能被美苏联手出卖——对已经决定从中南半岛撤军并丧失了对国际货币体系实际控制权的美国来说，与苏联在西欧重划势力范围似乎并不是一种荒谬的选择。何况莫斯科正在表现得日益富有扩张性。

这种情况下，当希思在1971年5月向法国总统蓬皮杜提出加入欧洲共同体的第三次申请时，双方仅用12个小时的谈话就达成了基本一致。对欧共体来说，尽管英国经济正处于低谷，但依然是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英镑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它的制造业和出口贸易份额，乃至它和欧洲之间既有的紧密经济纽带，都是欧共体无法忽视的。更何况对担心遭遇美苏联手出卖的法德轴心来说，英国重返欧陆具有强烈的政治示范效应——这个安理会五常之一、世界第三大海空军的保有者以及“北约”第二大军事力量与西欧结成更紧密的关系，对平衡美国战略收缩带来的恐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973年1月1日，英国、爱尔兰和丹麦正式宣告“入欧”。

作为加入共同体的约束措施，英国同意在5年之内逐步取消存在于英联邦内部的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向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CAP）妥协；作为回报，欧共体同意暂时不考虑将英镑纳入共同货币计划。但“入欧”带来的经济利好并没有那么立竿见影：1973年10月，中东石油危机使全球货币市场和欧美经济普遍遭遇重创，为了降低能耗，英国一度不得不实行每周3天的工作制；希思内阁则由于试图关闭一批长期亏损的国营煤矿，再度和工会陷入了对立状态。为

了巩固支持率，这位首相决定在1974年2月提前举行大选，但以微弱优势意外不敌工党。欧洲怀疑主义者威尔逊再度入主唐宁街10号，并把工党的执政地位继续维持到了1979年。

在威尔逊看来，“入欧”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多么突出：为了配合共同农业政策，英国被迫放弃过去在帝国特惠制下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农产品享受的优惠；与此同时，早已元气大伤的制造业市场却被迫向西德和法国企业开放，颓势更加显著。为了度量前任的这项决定的理智性，1975年6月，工党内阁发起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维持“入欧”状态，结果选民中有67.2%的人表示赞成（投票率64.6%）。看上去，普通国民比他们的首相更清楚英国经济的实际状况——





1975年5月31日，一对母女为即将举行的是否维持“入欧”状态公投进行街头宣传，呼吁英国留在欧共体

1976年9月，深陷巨额赤字、高达25%的失业率和高通胀率之中的工党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23亿美元的贷款，以便阻止财政破产。而IMF开出的附加条件包括削减25亿英镑的公共支出、将英国石油公司私有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等，对伦敦是一项巨大的侮辱。这是1945年以来第一次有发达国家向IMF提出借贷，也是“英国病”的缩影。

与1964~1970年的那个任期相比，威尔逊及其继任者卡拉汉唯一的调整措施是试图利用北海油气田开发带来的收入。1975年6月，第一批北海原油开始精炼，威尔逊指望石油危机带来的油价“牛市”能解决英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的确，由政府占股51%的英国石油公司很快实现了高额盈利，但英镑也被带动出现异常升值，反过来摧毁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英国的经济增长率在1979年初一度回升至4.3%，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落到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后面。卡拉汉首相在这一年讲了一个精彩的冷笑话：“早上刮胡子时，我会对自己说：假如我是个年轻小伙子，一定会移民海外。但等到坐下来吃早饭时，我只能问自己：你又有哪儿可去呢？”

经历了150万人联合罢工、公共服务彻底瘫痪的“不满之冬”以后，工党在1979年5月的大选中以50席劣势惨败于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从而开启了长达11年的战后保守党“第二王朝”。6个月后，“铁娘子”在都柏林会议上向欧共体领导人公然发难：鉴于共同农业政策和低关税使得英国从对欧贸易中获得的收益远低于它为欧共体承担的预算份额，“现在我们要拿回自己的钱！”看上去，刚刚进入第七年的“入欧”之行正处在新一轮危机的边缘。

“跨大西洋”的诱惑

然而，撒切尔夫人最终被证明虽是一位不列颠民族主义者，却不是一位孤立主义者。她要求欧共体在英国的付出与收获上平等对待，却也清楚地认识到利用共同市场复兴英国经济的必要性。在共同体内部实现英国的利益最大化，与发展英美“跨大西洋特殊关系”、经济私有化、紧缩货币政策以及福利和工会制度改革一起，成为著名的“撒切尔主义”的构成要件。

和工党时代温情脉脉但缺乏效率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撒切尔主义的基调是冷峻果断的。在第一任期内，她就宣布裁减10亿英镑的公共预算，并以平均每年1.5万人的速度减少政府雇员岗位，后一项措施

到1987年为止又创造了相当于10亿英镑投入的刺激作用。到1990年她离任时，公共支出占全英GDP的比例已经由1975财年的49.7%下降到39.2%，恢复到了60年代初的水平。作为对冲，政府自1983年起启动全面减税政策，将公司所得税税率由1979年时的52%一路调整至1987年时的35%；高收入者的税率由工党时代的83%降到40%，普通收入者由33%降到25%。对企业和个人来说，这都是一项减轻负担之举，为创新创造了外部条件。

作为对耗资巨大但缺乏效率的国有化政策的革命，撒切尔内阁从1979年起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将公共服务项目以公开投标的方式交由私人企业承办，同时陆续将英国石油（BP）、英国宇航（BAe）、大东电报（CW）、英国煤气（BG）、英国钢铁（BSC）、英国电信（BT）等垄断国企50%以上的股份进行公开出售，优先满足公民购买者。这项非常举措与1984年通过的《工会法》形成呼应，使工会成员占产业工人总数的比例由1979年时的51%下降到1997年时的18%，同时工会持股比例由1979年时的6%上升到1997年时的29%。工会更多地作为经营实体发挥作用，不仅改变了威尔逊时代企业生产频繁被政府和工会之间的博弈打断的局面，连带也使在野的工党的政治倾向发生了逆转——1997年，工党正式删除了党纲中的国有化口号，开始“向右转”。

私有化的长期效果见仁见智，但它在短期内为实现产业转型创造了可能——不具备盈利能力的旧式煤矿、钢铁厂、纺织厂和造船厂大批倒闭，大型传统企业中尚有活力的部分则重新投入了市场竞争。传统企业倒闭造成的失业人数到1985年为止一度累积至325万，但因为政府削减了其他领域的公共开支，留出了支付失业救济金的财政空间，社会虽陷入短时期动荡，却未发生足以颠覆内阁的大冲突。而在传统制造业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之后，撒切尔选择了放宽金融监管、将伦敦建设为全球金融中心，作为英国经济的新动力。美林证券、大通曼哈顿等美国投资银行相继获准收购英国证券交易商，在撒切尔内阁的鼓励下，伦敦很快战胜巴黎和波恩，成为美国资本在欧洲的桥头堡。尽管泡沫接踵而来，但依靠美国和之后的亚太资本发展金融业意味着英国不必像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欧陆国家那样依赖共同市场，也为脱欧埋下了伏笔。

在从经济上强化与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关系的同时，厉行外交保守主义的撒切尔夫人也与美国总统里根在对苏“冷战”政策上找到了共鸣。1982年福克兰



1985年3月，在英国肯特郡多佛尔附近的提尔曼斯通煤矿，罢工工人与警察发生争执。到1985年底，肯特郡所有的煤矿都被关闭

战争期间美国给予英国的外交和情报支持，以及撒切尔在“星球大战”计划上对里根的支持，都使“外交三环”中长期不温不火的英美关系得到了显著改善。以此为后盾，撒切尔在1984年6月的欧共体枫丹白露会议上向法德两国领导人发难，要求将英国向欧共体缴纳的预算总额与所得回报之间差额的75%作为回扣返还给英国，最终取得了66%这一比例，此前因争议而冻结的10.57亿英镑回扣也被交还给伦敦。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第一次展现出了它对欧共体的对冲作用，获益者则是英国自己。

枫丹白露会议之后，英欧关系进入了一个长达3年的蜜月期。前英国贸易大臣科克菲尔德男爵参与了1986年通过的《单一欧洲法令》文本的起草，要求在

1992年底之前把欧共体建设成一个货物、人员、资本、服务自由流通的统一大市场；撒切尔内阁还破天荒地同意在共同体内部表决中引入多数表决制，只在重大问题上行使一票否决权。由于保守党在英欧融合问题上表现得极为积极，甚至一度被称为“欧洲党”。但英国在反对建立超国家共同体的问题上态度依然强硬——在撒切尔夫人看来，欧洲联邦主义者关于一个高福利、超民族的“大欧洲”的构想不过是工党在英国进行过的那场福利主义试验的扩大，既无效率，又无前途，反而会拖累英国。

1988年9月，“铁娘子”在欧共体布鲁日会议上发表了迄今为止英国领导人关于欧洲一体化方案的最完整阐述：（1）独立主权国家间自愿、积极的合作是

欧共同体建设的最佳途径；(2) 欧共同体必须以具备现实可行性的办法解决现实问题，特别是调整共同农业政策；(3) 应当鼓励自由经济的发展，减少中央计划和国家控制；(4) 欧共同体不应当实施贸易保守主义；(5) 欧洲必须继续借助“北约”来维持安全环境的稳定。这一强硬表态在保守党内部造成了分裂：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以及英国驻欧共同体委员会委员科克菲尔德相继挂冠而去，暗示了联邦主义与同盟主义之间的斗争从未在伦敦的对欧政策中远去。

1990年10月30日，在因内阁僚的压力被迫同意加入欧洲汇率体制(ERM)之后，撒切尔夫人在欧洲货币联盟罗马首脑会议上发表了四个“不”字的宣言，公开质疑建立超国家共同体的意义。此举招来了保守党内部的不信任投票，未能获得多数的“铁娘子”被迫于11月22日辞职，由财政大臣约翰·梅杰继任。后者在“入欧”派汲汲以求的货币问题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谈判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但在短短两年之后，一场大危机彻底颠覆了前一项政策。

1992年2月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欧洲货币的最终统一设定了路线图：第一步，强化已经存在的欧洲汇率机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第二步，建立欧洲货币机构，负责协调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第三步，发行可以与美元相抗衡的统一欧洲货币，并将欧洲货币机构升级为欧洲中央银行，为各成员国制订一致的货币政策。其中在第一阶段，各国货币不再盯住黄金或美元，而是相互盯住；每种货币只允许在一定汇率范围内浮动，一旦超出规定的浮动范围，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有责任通过买卖本国货币进行市场干预；在规定的浮动范围内，各成员国货币可以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的货币进行自由浮动，但基准汇率需要以德国马克为核心。

但在1992年时，英德两国的经济和财政目标并不统一。刚刚实现统一、需要在东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德国正在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德国央行频繁调高利率，试图控制通胀；另一方面，急于刺激出口的英国希望使英镑贬值，但这一举动在ERM体制下不受许可。为了稳住英镑汇率(1英镑兑换2.95马克)，英格兰银行被迫紧随德国提高利率，造成英镑被严重高估。国际炒家索罗斯乘机在1992年9月初发起了针对英镑的狙击，在市场上抛出价值70亿美元的英镑，同时购进价值6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并获得其他投资者的跟进。英格兰银行对此始料未及，未能筹集起

足够的资金加以反击，导致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在9月15日这个“黑色星期三”下跌至2.80，已处在ERM规定的最边缘。英国财政部紧急请求德国央行降低利率，但被柏林方面拒绝，一天之内两次加息的刺激举动也未能收获任何成效。到当天傍晚，英镑对马克的汇率跌落至2.778，超出ERM规定的边界，英国被迫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加上梅杰内阁在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声明不接受其中关于社会政策条目的约束，英欧关系已经出现了疏离。

实际上，梅杰内阁能促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下院通过，本身已经借助了最极端的信任投票方式。从1994年起，英国议会几乎每一年都要为欧盟预算的摊派问题展开论战，并不因1997年工党卷土重来而稍有更易。而保守党内的欧洲怀疑论在过去十几年也是愈演愈烈。而英国以金融替代制造业作为经济优势的产业转型，实际上意味着其资本流动的灵活性远远超过欧盟各国，也远不止以欧洲资本作为投资渠道来源，这意味着英欧经济关系的纽带正在被削弱。

另一方面，工党在1997~2010年的“第三王朝”不仅延续了对欧关系上的实用主义政策，而且将英美之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上升到了一个新水平。英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步调高度一致，尽管遭到法、德领导人的诟病，却使两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认同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英美特殊关系这一环重新成为对冲英欧疏离的可取之道，来自亚太地区的资本输入则可替代英联邦的作用，充当第三环。在本身不必就汇率问题和签证政策对布鲁塞尔亦步亦趋的背景下，替代项的存在无疑为英国的脱欧抉择提供了心理安慰。

事实上，即使是在脱欧之后，英国也可继续祭出联盟主义传统，重新作为EFTA的盟主与欧盟展开谈判，在不涉及社会和财政政策的前提下进入欧洲经济区(EEA)，同时卸脱每年高达200亿欧元的财政摊派负担。而对那些投票支持脱欧的65岁以上老人(支持脱欧的比例高达58%)来说，一切不过是回到了他们在年轻时代已然经历过的状态：政府在“外交三环”之间反复游走和试探，时而多一“环”，时而少一“环”。■

(参考资料：Geir Lundestad, *East, West, North, South: Major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ince 1945*; 《战后欧洲史》，[美] 托尼·朱特著；《大国的兴衰》，[美] 保罗·肯尼迪著；《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述评》，谢峰著，等)



2015年1月7日，英国首相卡梅伦陪同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参观伦敦大英博物馆。在此次出访期间，两国领导人讨论了欧洲经济和欧盟改革的问题



一场公投狂欢，走向封闭的情感

文 / 蒲实

法国政治家于贝尔·韦德里纳说，欧盟“唯一真正的沟壑在精英与民众之间。这是危险的，需要把它填平”。欧洲建设前几十年的专制主义、专家主义论调和支撑欧盟的理想宣言，都不足以满足期待。在专业化累积起巨大“民主赤字”的欧盟问题上，公众的政治情感往往由事件触发，而不是理性驱动。德国，以及欧盟，需要对这种情绪做出回应。

2014年，卡梅伦提起“英国人民是时候选择是否脱离欧盟”时，他的议题主要还不是移民问题。他的议题是，英国不会支付因欧盟会计准则改变和英国经济增长势头超过预期而需要补交的21亿欧元的补充预算费用。在欧盟这会计准则的调整方案中，法国和德国将分别获得大约10亿欧元和8亿欧元“摊派”退款，这让英国更难忍受。它在欧盟中被边缘化的角色，酝酿着部分精英的退欧情绪。但事实上，因为英国没有加入欧元区，保留了货币政策的主权，英国的付出还是适度的。2011年，欧债危机蔓延，欧盟希望通过修改欧盟条约、深入一体化来应对债务危机。但在欧盟峰会上，英国否决了修改条约的提议。最后，除英国以外的所有欧盟国家开始向财政联

盟的方向迈进，英国自我孤立的状态更加突出。

随着时间推移，至距离英国脱欧公投不足一个月的时间，焦点的议题却转向了移民问题。英国保守党内，也是“脱欧派”阵营里两位重要人物——伦敦前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和英国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要求首相卡梅伦控制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进入英国。他们表示，英国只有脱离欧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移民问题，因为目前对移民问题的控制权不掌握在英国政府手中，而是由欧盟决定。2015年，英国净移民人数增至33.3万，创下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位，其中来自欧盟国家的移民人数为18.4万。这一数字公布后，大大鼓励了英国民众的脱欧情绪。英式疑欧主义，延伸到了移民议题上。

德国总理默克尔对移民议题的原则非常明确。2014年11月，默克尔在会见卡梅伦时曾警告英国，她不会支持任何限制欧盟移民在英国居留和工作自由的提案。倘若英国卡梅伦坚持这一立场，并以退出欧盟作为要挟，她将宁愿英国退欧，也要捍卫移民政策。欧盟的《罗马条约》作为奠定欧盟的基础条约，其核心精神之一就是“迁徙自由”，保障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可以在欧盟任何一个成员国内迁徙、生活和工作的自由。但由于受到国内右翼保守党派和反欧盟党派的压力，卡梅伦不断表态可能会推进一些限制欧盟内自由移民的措施。2015年初，



1.2015年9月10日，两位来自叙利亚的年轻难民在德国爱尔福特市向路人献上玫瑰花，感谢德国接纳他们

2.2016年1月16日，几位叙利亚难民在科隆举行集会，宣誓与跨年夜性侵害案的制造者划清界限。在不久前的跨年夜狂欢中，数位当地妇女在中央车站前被疑似叙利亚难民的嫌疑犯抢劫并强暴

默克尔出访英国。尽管官方的说法称，她此行是为今年6月在德国召开的“G7峰会”预热，但不少分析认为，她访问的重点在于，在可能导致英国“脱欧”的移民问题上与卡梅伦达成共识。英国大选在即，执政党保守党的支持率却一路下滑，迫于压力卡梅伦不得不在此时放手一搏，并借此机会向默克尔阐述有关欧盟的改革提案。但默克尔能和卡梅伦达成的共识相当有限。从那时起，柏林就已经开始考虑英国退出欧盟的可能性，德国不允许有人触及欧盟内部自由移民的基本原则。

但如果不是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移民可能还不会成为主导公众情绪的议题，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2015年夏天，叙利亚战争促使成千上万的中东难民，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地中海，涌入欧洲。面对自“二战”结束后欧洲的最大难民潮，默克尔没有下令勒紧边境管控，而是宣布接受80万难民，是2014年接收人数的4倍。但这时，她依据的还是一个法治国家的法律依据。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6a条“受政治迫害的人享有难民权”。而且，成为难民的前提是本国存在着政治迫害的威胁，如果一旦威胁解除，即原籍国家成为“安全的第三国”，接收难民的国家有权利把难民送回本国。根据《移民法》的规定，凡是通过“安全第三国”来到德国的人都不再有权申请避难，而德国的九个邻国按照法律都是“安全第三国”，这些“安全第三国”作为“难民缓冲区”使得德国在难民潮之前基本与难民绝缘。更重要的是《都柏林协议》的规定。“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内战以来，前往欧盟的各国难民人数急剧上升，首

当其冲的希腊和意大利多次请求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出力出钱一起帮助解决接收难民的问题，默克尔的态度一直比较低调，都是按都柏林精神办。按照《都柏林协议》，难民在进入欧盟的第一个国家进行难民申请登记，该成员国负责对于难民身份的核实和甄别，难民没有权利选择自己想去的欧盟国家；德国警察只要搞清难民是从哪国入的欧盟，就可以将难民遣返回最初入境国。这意味着，德国周边邻居国家是抵挡北非和中东战乱难民潮流入德国的“天然屏障”。能合法入境欧盟申请避难的人数很少，绝大多数难民是属于“非法”入境。同时，在欧盟层面上，欧盟法律和《申根条约》并未禁止成员国关闭边境，在公共安全受到威胁时，成员国有权恢复本国的边境管制。

然而，2015年的8月24日，默克尔政府做出了此次危机中最重要的决定：宣布不再按照《都柏林规则》把入境的叙利亚籍避难申请者遣送至他们进入的第一个欧盟国家。此外，德国还撤销了所有驱逐叙利亚难民的决定。转折点与震惊世界的公众事件相关：一位三岁的叙利亚小难民死在海滩的照片铺天盖地地全世界传播。默克尔对难民的态度发生急转，敞开大门欢迎。瞬间，本来“非法”入境的难民变成了“合法”入境，在欧盟无异于一场安全地震。

两大因素驱动着默克尔对待难民的态度。第一个层面是情感的。过去70年间，包括默克尔在内的德国人，得到过很多陌生人施与的援手。“二战”后，德国昔日的敌国和美国等国，为德国重建贡献了大量财力物力。默克尔生长在东德，柏林墙轰然倒塌那年，西德邻居不

计前嫌，接纳她们一家。她理解逃离战乱的难民感受，具有强烈的情感和道德动机。第二个动机才是理性的：对于制造业工业大国德国来说，接纳掌握技术、受过教育的难民，有利于拉动德国经济。分析者们认为，默克尔包容难民，与德国的人口、经济现状、德国历史和民族构成都有关系。德国出生率不足，到2080年，德国人口将从现在的8200万下降到6540万，而德国大企业则需要更多劳动力。根据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的统计，身处希腊的叙利亚难民，有高达40%的人受过大学教育，他们中有很多人会说英语；这些历尽苦难踏上欧洲大陆的叙利亚难民，也有过人的勇气和适应能力。相信“美国梦”的默克尔认为，德国将给予这些“新来者”新生。

但这个决定引起了长远的政治后果，使欧洲分化出矛盾。前总理施罗德曾有一次评价默克尔：“有心，但是没有计划。”在需要把握和回应公众情绪的决策上，默克尔有时有一种不计后果的果断决策力。德国政治向来理性，程序也很繁复，但往往是一些非理性的情感因素主宰着它的关键历史时刻。柏林墙的倒塌、福岛事件后关闭所有德国核电站，都是这样的“情绪”时刻。面对移民危机，英国这时的表现也逐渐积极。随着对英国保守态度的立场批评声音越来越多，原本强硬的卡梅伦也开始松动，有意向愿意再接收几千名难民。不管是官员还是平民，当时整个欧洲的风向都在变。欧洲各地涌现出大量志愿者组织，向难民提供食宿。官方被民众捐来大量食物、水、衣物、尿布所“淹没”，一些重要的火车站不得不告诉公众别再送东西。

2015年9月，默克尔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周刊总编辑吉布斯写道：“默克尔比多数政治人物敢于向她的国家提出要求，她善用权宜之计，并在欠缺道德领导的形势中不断展现此种领导。”吉布斯指出，默克尔自2005上台领导德国，但外界一直低估了她的领导能力；欧洲面对三大危机，包括希腊债务、协助乌克兰抗衡俄罗斯及应付叙利亚难民潮，默克尔都站了出来，促成希腊同意接受严苛的救助贷款协议、德国接收难民，及在海外部署军队打击伊斯兰国。《时代》形容默克尔彰显人性、慷慨及宽容的价值观，展现德国可将强大国力用于拯救而非毁灭。

但是，事情慢慢地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开放与包容一方面使默克尔成为欧洲人道主义精神的象征，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欧洲极右派和民族主义者的反弹。2015年，进入德国的难民越来越多，达到了110万。政府要为每位成年难民每月发放几百欧元的补贴，还要为他们提供临时居所，这些都需要花钱。更深层次的是文化融合问题，这些难民大多有伊斯兰宗教信仰，如果涌入更多的伊斯

兰文化背景的难民，未来欧洲社会可能会出现分裂。

默克尔自己的执政联盟首先出现了分化。在是否设置难民数目上限上，巴伐利亚州州长、执政联盟成员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泽霍费尔就严厉批评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甚至以向宪法法院起诉为威胁，要求默克尔取消其“难民友好”政策。基社盟执政理念向来与基民盟高度一致，但泽霍费尔在难民问题上态度强硬，因为巴伐利亚与奥地利接壤，是难民逃难的“终点站”，所以这里承担了最大的压力。从2015年9月1日到10月3日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有22.5万难民涌入巴伐利亚州。泽霍费尔表示，不能再任由非法难民随意进入德国而坐视不管，过度的一味欢迎难民的行为已经不可取。如果说泽霍费尔只是执政联盟的“友军”，那么默克尔的内政部长、基民盟的德迈齐埃的一系列言论，则更暴露出了基民盟内部各方势力的四分五裂和蠢蠢欲动。德迈齐埃曾公开宣布德国政府准备恢复《都柏林协议》，按照该协议抵达德国的难民将会被送回到最初抵达的欧盟国家。但第二天总理府却表示“并不知道，也未参与”恢复《都柏林协议》的决定，一时间德国舆论大哗，讽刺基民盟“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财政部长朔依布勒也与默克尔唱起了对台戏，公开形容难民潮是“一场雪崩”。随着热情的消退和实际生活中与难民相处的摩擦，公众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不满情绪也在上升。自2015年8月以来，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CDU/CSU）的支持率出现下滑，从8月的43%左右下降到10月份的38%。与此相反的是，德国的一个右翼小党，“德国选择党”（AfD）的支持率从3%快速上升到了7%。默克尔倒是意外得到了自己的左翼反对党的支持，这些左翼向来热衷政治正确，标榜“欢迎难民”的普世人权立场，他们赞颂默克尔捍卫了“开放民主制”的价值。

最难处理的突发事件，就是巴黎恐怖袭击和其之后的欧洲安全局势。就在那场恐怖袭击前，默克尔正在德国电视二台的一档政治脱口秀中回应政府内部的可能分歧，乐观声称“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节目播出不到90分钟，巴黎恐袭就发生了。恐怖阴云很快就笼罩在德国上空。尽管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防控力量，但是德国政府承认，“完全防御”未来的恐怖袭击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巴黎暴恐成为“一个更为严峻时代的开端”，欧洲人必须做好未来还会发生更多恐怖袭击的心理准备。原本还只是“难民伪装成恐怖分子混入欧洲”一夜间就突然变成了现实，默克尔的口号“我们搞得定！”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如何帮助新入境的110万难民融入德国社会，成了摆在德国各界面前的一大难题。

2016新年，德国科隆等多地爆发大规模性侵犯事



在这次的英国脱欧运动中，“留欧派”和“脱欧派”的主张和指责都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考虑，双方打的都是感情牌。

件，震惊了德国社会。科隆市警察局长因此在8日被解职。德国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晚的罪案大幅度增加至516起，其中40%涉及性暴力。德国联邦司法部长马斯表示，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上千名“醉酒和有攻击性”的青年男子参与犯罪，当地媒体引述警方资料说，已经有71人被确认身份，他们多数是抵达德国不久的难民申请者。仇外团体“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PEGIDA）9日在科隆示威，1700名示威者高喊“默克尔下台”，手持“不欢迎色狼难民”等标语，并同警察发生冲突。默克尔取消了参加冬季达沃斯论坛的行程，在政坛的反对声浪中，今年1月30日，被逐步孤立的她在难民问题上做出让步，要求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争冲突结束之后，现居德国的难民必须返回自己的国家。她说：“我们需要告诉人们，这个居留状态是临时的。当叙利亚重新恢复和平，当‘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落败，我们希望你们带着你们学到的知识，返回你们的祖国。”

科隆并非孤立事件，汉堡、法兰克福、苏黎世、赫尔辛基等其他欧洲城市，也发生了移民性骚扰当地妇女和抢劫的问题。这让默克尔政府计划在欧盟范围内整体安置中东难民的构思，遭遇了更大的阻力。在科隆事件之前，东欧的一些国家已经表明不接受默克尔的移民安排。以斯洛伐克为代表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均拒绝接受穆斯林移民。就算在相对开放的丹麦、芬兰和瑞典，其政府也正面对日益强大的反移民政治压力。默克尔不得不转向土耳其，通过向土耳其提供资金和签证，让土耳其安置难民。默克尔政府原本希望欧盟各国能以公平合理原则，接受特定数量的难民，共同承担“二战”后最大的人道义务，但欧洲各国对默克尔政府所代表的多元主义意识形态持保留甚至反对立场，科隆事件让它们的反对显得更具有正当性。与此同时，欧洲的难民应对机制也在面对危机事件时，显露出支离破碎与不堪重负。自难民危机以来，在欧洲边境的匈牙利，每天，超过2000名难民从塞尔维亚越境进入匈牙利，然后进入不需签证即可自由通行的申根国家。2015年，超过15万名难民取道匈牙利入欧。匈牙利政府称，欧洲的对策已经完全失败，“区分不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真难民和经济移民混杂在一起，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场难民危机，而是一场移民危机。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难民涌到这里，完全让人无法接受，原先不法的移民方式如今却成了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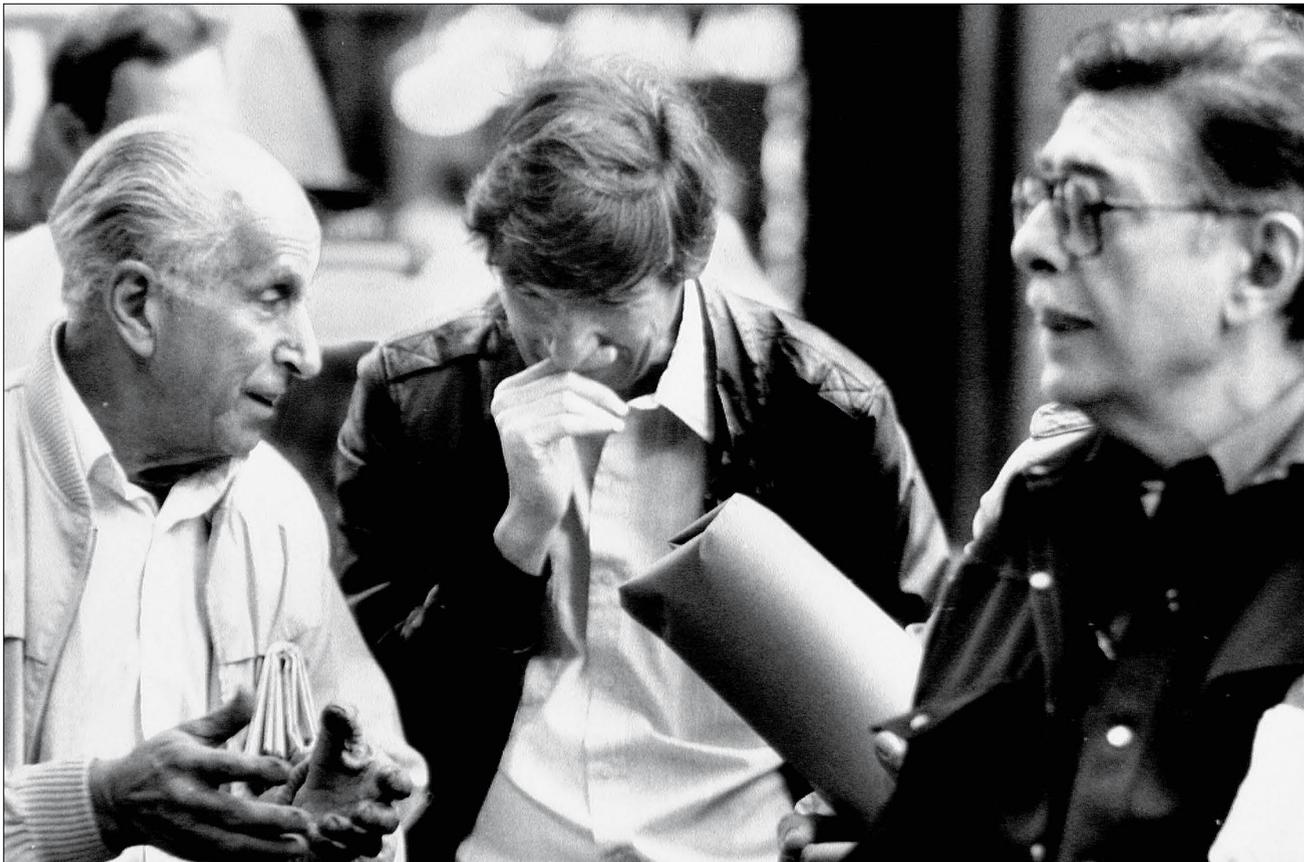
外来移民对民众的情感冲击是非常直接的。在这一次的英国脱欧运动中，“留欧派”和“脱欧派”的主张和指责都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考虑，双方打的都是感情牌。留欧派引述了几十位专家和精英的言论，警告“英

国脱欧”将意味着一场经济灾难：英镑大幅贬值、税收会被推高、经济会紧缩、人们会失业。脱欧派则警告说，留在欧洲将带来无法控制移民、犯罪和恐怖主义，会有一大批人从土耳其跑到英国来——土耳其国内有7700万穆斯林，它和伊拉克以及叙利亚都接壤，而且还希望加入欧盟。

过去两年中，反对欧元、反对移民的政党不断在初选中吸引大量的选票。法国由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领导的国民阵线甚至可能进入总统选举的第二轮。她宣称，如果赢得大选，也会在法国举行脱欧公投，因为法国“比英国离开的理由要多1000条”。和英国相比，法国还是欧元区 and 申根成员，而这两个超国家的创造物，近几年都因危机而处在巨大压力下。你很难理解构成欧元区欧洲央行和货币政策的无数细节，但你很容易理解勒庞的话。她说，这些危机证明“欧盟正在腐朽，到处都是它的碎片”，布鲁塞尔已经成了“极权主义”，应该将历史扭转向“由民族国家构成的欧洲”。公众只有理解，才能被打动。遗憾的是，今天的那些脱欧派，反过来却成了空想家。就如英国保守党成员丹尼尔·汉纳在一篇退欧文章里所说，英国退出欧洲，可以“将英国从一个由布鲁塞尔官僚运行的不民主超国家组织中解放出来，尽情享受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好处”，这是容易被理解的。难以被理解的是，构建自由贸易区的无数条款和触发及修改这些条款的漫长程序。

在斯特拉斯堡的欧盟理事会大楼里，默克尔曾针对欧盟危机发表过一次重要的谈话。在准备谈话时，她思考，如何将欧洲的情感概括进去？是什么把欧洲团结在一起？怎样才能感受到欧洲？她最终将答案概括为三个词：多元、自由、包容。她进而提出，是什么精神，让人看出多元化的好处，并在多元化的整体中有责任感的享受个人自由？她的答案是：“欧洲的灵魂是包容。”但英国公投的结果，证明了英国，以及欧陆一些公众的情感，正在走向封闭。

公投结束后，默克尔说：“今天是欧洲的转折点，也是欧洲统一进程的转折点。德国确保欧洲统一的‘特殊责任’。”她害怕西欧的法国和荷兰会陷入反欧盟的情绪旋涡中，让几十年的整合努力付诸流水；安全、外交政策和边境管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难民和恐怖袭击问题已经被放到了民意的显微镜下。随着英国开始离开，围绕在她身边的政治同盟会分化削弱，德国也必须在欧盟内部更多地发号施令，必然也更易受到“霸权”的指责。但如果德国因为害怕权力过大而保持沉默，填补政治真空的恐怕会是法国或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者，而不再是包容的灵魂。☑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当天，三位投资者在曼哈顿证券交易所紧盯行情图

又一个雷曼时刻

主笔 / 谢九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之后，全球金融市场大乱，英镑兑美元的最大跌幅达到了11%，日本股市大跌8%，日经225指数期货一度触发了熔断机制，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开盘的欧洲股市毫无悬念地暴跌，英国、法国、德国等股市的开盘跌幅基本上都接近10%。英国脱欧是否意味着全球再度迎来一个雷曼时刻？毫无疑问！

又一个雷曼时刻

至少从全球金融市场的第一时间反应来看，英国脱欧引发的震动甚至超过了当年的雷曼时刻。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正式破产，当天美国和欧洲股市的跌幅大概在4%左右，随后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海啸，从英国脱欧引发的金融市场反应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跌幅远超当年雷曼时刻。美联储格林斯潘想到了更为遥远的年代，在他看来，英国脱欧带来的影响将超过1987年的股灾。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指数当日暴跌23%。

无论是当年的雷曼时刻，还是今天的英国脱欧，

全球金融市场之所以引发巨震，很大部分原因在于投资者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产生巨大的恐慌。由于雷曼兄弟这样规模的金融机构都被政府放弃，投资者担心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雷曼，在这样恐慌心态之下，市场交易者都开始对自己的交易对手产生戒心，银行不愿意轻易放贷，机构投资者不愿意出借债券，整个市场的流动性陷入枯竭。投资者纷纷逃避风险资产，拥抱美国国债和黄金，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下降，黄金价格大涨。

今天的英国退欧也同样如此，全球风险资产大跌，美国国债和黄金成为避风港，市场震动之大甚至远超当年的雷曼时刻，投资者之所以如惊弓之鸟，其实和当年雷曼时刻的心态有几分相似，都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产生了巨大的恐慌。当年投资者担心雷曼兄弟破产或许只是开始，高盛、大摩、“两房”等任何机构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雷曼，从而导致市场流动性枯竭，风险资产暴跌。而今天英国退欧，投资者也有同样的担心，如果英国退欧只是开始，全球金融市场将会怎样应对？

很多时候，人们在重要时刻做出的选择，很有可能并没有完全充分意识到可能产生的后果，精英人士如此，普通民众更甚。当年美国政府允许雷曼兄弟破产，一方面是因为短时间确实很难找到合适的买家，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低估了这一事件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否则，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美国政府肯定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从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回忆录《抉择时刻》，以及时任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的回忆录《峭壁边缘》中，都可以看出当时的决策者大大低估了雷曼兄弟破产带来的冲击波，乔治·布什在《抉择时刻》中回忆起雷曼兄弟破产后的情景：“恐慌情绪在蔓延。投资者抛售股票，购买国债和黄金。客户撤出在投资银行的账户。信用市场紧缩，因为贷款人抓住手上的现金不放。以流动性作为润滑剂的金融系统这个传送装置停止了工作。”亨利·保尔森在回忆录中写道：“投资者渴望用政府债券来保障资产的安全，或者以此对冲他们的其他资产，但是根本购买不到，因为没有投资者愿意出借国债。投资者既无法用国债来对冲风险，也不愿意在信贷市场继续买入，整个信贷市场基本陷入停滞。”

如果说当年美国总统和财长都难以充分理解雷曼破产可能带来的后果，今天普通英国人做出的退欧选择，很有可能也同样低估了即将带来的连锁反应。据悉，在英国退欧公投结束之后，来自谷歌公司的统计

发现，“欧盟是什么”成为英国人搜索查询的热门话题，这说明在公投之前，很多普通英国人可能连英国和欧盟之间关系的基本常识都没有理解，直到事后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巨震，很多英国人才开始给自己补课。

当年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美国政府很快就意识到破产的严重后果，雷曼兄弟之后，再没有大型机构破产，AIG（美国国际集团）、“两房”等等都得到了政府的拯救。更重要的是，在次贷危机升级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史无前例地以量化宽松政策救市，直到去年才结束量化宽松。但是对于英国退欧而言，则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并没有当年雷曼危机后美国的纠错机制，更没有美国政府事后强大的救市力量，相反，英国首相卡梅伦在第一时间辞职，更增添了英国退欧后的混乱，短时间之内，无法指望一个强力政府出面拯救英国的乱局。

连锁冲击波

英国退欧产生的第一轮冲击波发生在外汇市场，当天英镑兑美元最大跌幅达到了11%，全天跌幅8%，不仅创下了史上最大单日跌幅，也使得英镑兑美元汇率创下了1985年来的新低。

不仅是英镑和美元，日元也成为全球外汇市场的主角。作为传统的避险货币，每当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之际，日元总是被投资者疯抢，很多时候日元甚至比美元表现更为强劲，这一次也不例外，日元对英镑大幅上涨了11%，日元对美元甚至都上涨了3.5%，这使得日元成为退欧风波中最强劲的货币。

英镑引发的全球外汇市场地震可能还只是开始。作为当年因为狙击英镑一战成名的投资大鳄，索罗斯可算是对英镑最有发言权的市场人士，在英国公投结束之后，英镑当天大跌8%，开始朝着索罗斯预言的方向发展。为了应对退欧对英国经济带来的拖累，英国银行有可能在8月份采取加息，甚至是启动量化宽松，这将进一步打压英镑，索罗斯对英镑走势的预言并非耸人听闻。

英国退欧带来的避险情绪，短时间内又会推升美元走势。每当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动荡，美元、日元、美国国债和黄金都成为国际投资传统的避风港。美元短期走强，对于新兴市场又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资本外流和负债成本上升，将成为很多新兴市场难以承受之重。

英国退欧在强化美元避险货币需求的同时，也对

美元带来另外的挑战，那就是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可能会减弱，这就使得市场对于美元的预期更加混乱。今年5月底，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哈佛大学的公开演讲中表示，如果经济数据改善，那么在未来数月加息将很可能是合适的。这是迄今为止耶伦在公开场合所做出的最鹰派的表态，也使得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骤然升温。但是随后美国劳工部公布的5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却大大低于预期，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按照美联储的时间安排，今年7月、9月、11月和12月各有一次议息会议，市场原本预期7月份可能会成为美联储加息的重要时机，但是英国脱欧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大乱，目前来看，7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大大降低，美联储加息的时间点可能还要推迟。在英国脱欧之后，日元成为最强劲的货币，脱欧当日日元兑美元甚至大涨3.5%，美联储加息预期推迟可能就是其中的原因。

除了外汇市场，全球股市也再度迎来了金融危机后最动荡的时刻。英国脱欧公投结束之后，随后两个小时开盘的欧洲股市基本上以8%左右的跌幅开盘，随着市场恐慌情绪逐渐释放，最终收盘时跌幅有所收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英国股市当天跌幅3.15%，远比想象中要小，但是其他欧洲国家的股市跌幅却远大于风暴眼中的英国，德国股市跌幅7%，法国跌幅8%，意大利和西班牙跌幅超过了12%，希腊股市跌幅超过了14%，这是否说明，在投资者看来，英国脱欧对于欧洲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远大于英国本身？或者说，欧盟对英国的需要确实远大于英国对于欧盟的需求？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股市的跌幅更是超过了10%，而这三个国家一直是欧债危机中的“问题学生”，现在英国离开欧盟，投资者担心欧债危机可能会重新抬头，相关问题国家能够得到的援助力量将更加单薄。

欧洲之外，日本股市是另外一个重灾区。由于英国脱欧导致日元大幅升值，成为本轮危机中最耀眼的货币，日元大幅升值将大大打击日本经济，日本股市当天大跌8%，日经225指数期货甚至一度触发了熔断。如果日元因为避险需求而持续升值，日本经济又将迎来一个艰难的时刻。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时，曾经提出著名的“三支箭”理论，希望通过货币刺激、财政刺激和结构性经济改革带领日本经济走出通缩，迎来复苏，但是实际并未奏效，日元通胀率依然处于零区间，距离2%的通胀目标遥遥无期。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考察了日本经济之后，希望安倍

能够把“三支箭”重射一遍，以此拉动日本经济复苏，但是英国脱欧引发日元大幅升值，即使日本政府真能够重射三支箭，预计也很难对日本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英国脱欧，日本经济可算是躺着中枪。

英国脱欧之后，最晚开盘的美国股市也迎来大跌，不过与欧洲和日本股市相比，跌幅相对较少，道-琼斯指数最终跌幅3.39%，考虑到美国股市一向表现稳健，虽然绝对跌幅不及欧洲，超过3%的跌幅在美国股市历史上已经算得上暴跌，当年雷曼兄弟破产，美国股市的跌幅也只有4%左右，基本上和这次英国脱欧的反应程度相当。

相比之下，中国股市对于英国脱欧的反应还算平静，沪深两市的跌幅略超1%。一是因为英国脱欧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相对不及欧美和日本，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中国股市早于欧美开盘，因此能够走出独立行情，不过在欧美股市暴跌之后，中国股市是否还能够独善其身，也需要等待时间的考验。

英国脱欧在大宗商品市场也同样掀起了巨浪，石油的反弹势头遭遇了当头一棒。今年1月份至今，国际原油跌破30美元之后，已经持续反弹了5个月之久，油价重回50美元之上，但是随着英国脱欧，国际油价当天暴跌5%，迅速跌破50美元。国际油价的反弹势头如果就此终止，俄罗斯、委内瑞拉等产油国的经济又将面临更大的麻烦。

当然，并非所有的资产都在下跌，危机来临时，黄金又开始熠熠生辉。大量避险资金涌入黄金市场，国际金价当日最高涨幅一度逼近8%，最终收涨4.43%，如果从去年底的最低价1046美元算起，半年时间内，黄金价格已经反弹了26%，乱世黄金的魅力再度显露无遗。



英国脱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慢慢显露出来，而一旦负面影响侵蚀到实体经济，可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会持续发酵。

实体经济后遗症

与金融市场的剧烈反应相比，英国脱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慢慢显露出来，而一旦负面影响侵蚀到实体经济，可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会持续发酵。

作为脱欧的直接当事方，英国和欧盟经济短期内都会呈现“双输”的局面，但从更长期而言，欧盟所受负面冲击可能更大。

大多数传统观点认为，英国脱欧将使得英国的对外贸易遭受重创，不过，这可能并非英国脱欧的最大

代价。从表面上看，英国脱欧之后，对外贸易将遭受较大冲击。由于离开欧盟意味着英国将不再是欧盟内部国家，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成本将大幅提升，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前也曾经警告英国，如果公投结果赞成离开欧盟，那么英国就要从头排队同美国重新签署贸易协议。欧盟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量大约占英国比重的50%，美国则是英国在欧盟之外的最大贸易伙伴，如果英国和欧盟以及美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大幅上升，英国的对外贸易短期内可能会遭受较大打击。

但事实可能并没有这么悲观。即使英国选择脱欧，也并不意味着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就此降为最普通的关系，还可以通过谈判重新确定二者的贸易模式，比如土耳其、挪威、瑞士等国家都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均和欧盟之间签署了自由化程度极高的贸易协议，以此来看，即使英国选择脱欧，未来和欧盟之间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也不会出现明显下降。而从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来看，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事先曾经对英国脱欧放出狠话，但这更多只不过是实现警告和施压，尽量打压英国的脱欧派，在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之后，奥巴马第一时间表示美英之间特殊关系经久不衰，预计英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并不会因为脱欧而受到实质性冲击。相反，英国脱欧之后导致英镑大跌，反而有可能增强英国的出口竞争力。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英国脱欧的选择对于英国人并无害处，英国脱欧真正的冲击并不在贸易，真正的考验在于脱欧使得英国政治和社会环境恶化，使得经济稳定发展失去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在英国脱欧公投结束之后，英国首相卡梅伦第一时间宣布辞职，苏格兰立即表达了脱欧入欧的愿望，数百万留欧派希望重新发起第二次公投，英国内部的裂痕已经越来越大，这些都预示着英国社会短期之内很难重回稳定，而这正是一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投资者也会选择回避和撤出英国，英国将不再是国际投资者的热土，包括英国本土的资本可能也会选择出逃，这可能才是英国脱欧面临的巨大挑战。另外，英国脱欧对于英国的金融服务业也将带来巨大冲击。作为仅次于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能会慢慢下降，如果大量欧盟金融机构出现转移，法兰克福有望取代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下降，也将对英国的经济带来较大冲击，英国的金融业是英国重要的支柱产业，贡献

了大约8%的GDP、4%左右的就业，以及10%左右的税收。

如果按照英国财政部今年5月做出的估算，英国退出欧盟将导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两年内下降3.6%~6%，失业率将增加1.6~2.4个百分点，失业人口少则增加52万，多则增加82万，英国的房价将下滑18%，人均收入将减少4%，英镑汇率将下跌15%。

对于欧盟而言，在失去了英国之后，复苏之路可能更加漫长。在欧洲内部，英国的经济状况一直保持领先，经济增速大概保持在2%，甚至强于德国，更遥遥领先于欧元区的平均水平。以GDP总量来看，英国经济在欧盟内部占比约为17%。

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经济一直麻烦不断，经历了多次衰退，债务累累、增长低迷、通货紧缩、失业高企，成为欧洲经济面临的四座大山，为了带领欧洲经济走出泥潭，欧元区已经实施了数轮大规模量化宽松，而且史无前例地采取了负利率，但这并没有起到明显成效。虽然并非欧元区国家，但是英国同样也能感受到其他欧洲国家的拖累，这成为英国脱欧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更为麻烦的是，除了股市暴跌，欧元区问题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开始明显上升，这将大幅提升相关国家的债务和融资成本，由于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从未真正远去，如果这些国家的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不排除会有下一场欧债危机爆发的可能。而一旦欧债危机再度来袭，则意味着英国脱欧的蝴蝶效应开始波及全球范围。

当年雷曼兄弟破产，美国次贷危机由此进入最高潮，美国开启数轮量化宽松救市，最终逐渐摆脱了次贷危机的影响，尤其是去年底美国开始加息，正式结束量化宽松，标志着美国经济已经进入后次贷危机时代。但是英国脱欧对于欧洲乃至全球产生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力才刚刚开始，美国用7年时间走出了次贷危机的影响，而英国脱欧带来的深刻影响，则有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内都会持续发酵。■

在英国脱欧这样的背景下，国际投资者也会选择回避和撤出英国，包括英国本土的资本可能也会选择出逃，这可能才是英国脱欧面临的巨大挑战。



“白天鹅”与“黑天鹅”

主笔 / 邢海洋

英国脱欧的“黑天鹅”引发了全球性恐慌，可对中国人，A股只是短暂地震惊了一下，“白天鹅”情绪便占了上风。英国脱欧，中国真的能够隔岸观火？甚至如乐观者所言，因为远离风暴中心，中国将是英国脱欧的获益者？

短期看，面对金融动荡，美联储加息步调只可能进一步放缓，新兴市场又获得了喘息机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欧洲分裂也给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谈判增加了砝码。可长期观察，英国脱欧开启了全球化遇阻的明确信号，作为全球化最大的获益国家，当这一历史性进程遭遇挫折，甚至反向而动，我们这个全球最大贸易国又将如何自处？

首先，买下了英国的中国人面临抉择。

欧盟虽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但欧盟27个国家中英国只是其中一分子，分解到英国，中英双边贸易只占中国总贸易额的2%。因为相对独立的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欧盟之内却孤悬于欧



左图：金丝雀码头是伦敦重要的金融、购物和商业区。该区的金融和服务机构每年能为英国创造 1900 亿英镑的产值，占全年经济产出总量的 11.8%。一旦英国正式脱欧，预计仅金丝雀码头区在 2020 年之前就将损失 10 万个工作岗位

右图：伦敦首要购物街牛津街每年均吸引全球数千万游客到此观光购物

元区之外的英国被中国人当作跨入欧洲的桥头堡，伦敦是除了香港外人民币最重要的离岸中心。和全世界的富豪一样，中国的富豪喜欢到伦敦置业；因为语言的缘故，中国学生更愿意去英国留学，而非陆地国家法国或德国。伦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时尚设计和金融之都，这座金钱与时尚交相辉映的城市汇集了全球最顶尖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外汇公司及其他相关金融公司，而正在经历着一波资金外流的中国资本也把伦敦作为“出海”首选予以抢滩。甚至在英镑暴跌之后，中国人第一个反应是冲入商场，买买买。故而对于中国的富有阶层和中产阶级，英国脱欧绝非可以淡然处之的事件，而是需要重新规划的大问题。

公投当天英镑、欧元对美元大跌 10% 和 4%，避险情绪推升黄金一度上涨 8%、日元升值 6%，美元指数一度上行 3.9%。这是预期突入逆转情况下市场表现出的极端情况，但情绪稳定后，随着动荡局势的延展，脱欧程序步入轨道，对经济的影响一步步展现出来，市场显然不会是一步到位式的突发事件般的反

应，而是需逐步调整消化到新的稳定态。公投前，金融巨鳄索罗斯警告，一旦英国脱离欧洲，英镑将下跌 15%~20%，英镑资产将遭抛售，甚至引发新一轮衰退。类似的预言比比皆是，英格兰银行总裁马克·卡尼就预测，英镑或将大跌 20%，而这一预测与汇丰银行不谋而合。

早在金融危机后，华人首富李嘉诚就开始抄底欧洲，先后收购英国电网、供水网络两大业务、天然气供应商 WWU。随着加速抛售香港和内地资产，李氏在英国的商业王国愈发膨胀，斥资 100 亿英镑买下拥有英国 2400 万客户的 O2 电信公司堪称投资英国的大手笔。李嘉诚在英国的投资额高达 520 亿美元，从药品连锁巨头屈臣氏到港口，他的投资触角几乎伸到英国的每一个领域内。几乎四分之一的英国家庭使用的天然气需要通过他所有的天然气管道。他所拥有的英国电力网络为超过 30% 的英国居民提供电力供应，其电力网络覆盖伦敦和英国东南部。长和集团 2015 年的年报也显示，公司近四成利润来自英国。李嘉诚对自

左图：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宣布后，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大跌

右图：2015年2月18日，中国农历羊年除夕夜，来伦敦唐人街中餐馆就餐的人们翻看门前陈列的菜单



己的脱港入英解释道：“虽然英国加入欧盟，但其货币英镑并没有加入欧元区，货币汇率比较稳定。”可惜，一次公投就把英镑的稳定打回原形。

岂止是香港富豪，从2000年开始，中国对英国的投资总额高达151亿英镑，占据中国对欧盟总量的25%。包括泰康人寿、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保险公司在英国也有数亿美元的地产项目。今年，随着资金外流加剧，截至公投前中企对英并购交易额36亿美元，已经超出2015年全年28亿美元的水平。许多中国企业选择在英国投资、创建公司，正是因为英国公司拥有不受限制的欧盟市场准入资格。去年，内地首富王健林财富超过了李嘉诚，夺取华人首富，截至2014年底，王健林在英国的投资就已经超过40亿英镑，其中包括斥资7亿英镑在伦敦核心区建设超五星级万达酒店。

富豪们财富缩水还不至于用汇率计量的财产，英镑贬值是最直接的影响，资产重估才是最大的麻烦。英国脱离欧盟后，它不再是单一市场的一员，英国资产于是被边缘化，失去了过去的桥梁作用。伦敦的金融城，全球知名的金融中心，其独特性在于它的国际化，虽然英国本土市场远比美国小，但伦敦依托的是整个欧洲。在金融服务贸易中，英国处于巨额盈余，近1/4的英国金融服务业务涉及单一市场，相当于

GDP的2%。当英国不再是欧盟成员，也就不要指望跨国企业将欧洲业务总部设在伦敦，随着这些企业在巴黎或者法兰克福开设办公室，它们伦敦部门的规模和影响力将会缩小。所有英国的相关资产，都不再有欧盟第一大都会的定价感召力。

中国人在英国的最主要投资是房地产。2015年底，中国首富王健林斥资8000万英镑，在英国伦敦素有“皇家街道”之称的肯辛顿宫花园大街，购置了一幢豪宅，仅印花税就交了950万英镑，创下英国历史上最多一笔房产交易税纪录。7年前，伦敦交易的豪宅数量还和香港和纽约处于一个水平，如今，这里绝尘而出，全世界无出其右，2014年伦敦售出500万英镑以上的豪宅比曼哈顿多出一倍有余。10年来，伦敦已经成为全世界顶级富豪的置业首选。之所以如此，除了这里全球首屈一指的营商环境，还因为这里“避税天堂”的声誉：根据英国法律，持有房产，尤其是因所有权转让而产生资金收益时，需缴纳各种税，但离岸公司持有的房产往往可以免税。

可对于中国的富豪们，脱欧也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随着全球经济繁荣不再，以及泡沫吹胀到无可附加的程度，伦敦黄金地段的房价2015年下跌了2%，豪宅的需求萎缩得厉害，原本支撑起高端市场近半边天的俄罗斯和亚洲买家几乎全线撤离。商品崩盘、本



币贬值，新兴市场富豪们自顾不暇，唯有中国投资者因人民币贬值预期而加紧转移资金。可现在，新的风险敞开了大门，人们不得不驻足等待一阵子了。实际上，在公投举行前，英国商业地产的投资量已经放缓，今年第一季度英国商业地产交易量下跌了31%，而伦敦地区的交易量减少了11%。作为英国房地产最大的海外购买群体之一的中国人，多推迟了购房计划。

既然脱了欧，英镑也贬值了，此前投资的人暂时栽了跟头，后来者却可能捡到便宜。对于金融政策制定者，有什么比让货币贬值、资产廉价更好的举措呢？安倍经济学的核心目标是令日元贬值，为此日本财政当局不惜一次次宽松货币，欧洲央行则不惜令欧元利率掉到零息之下。可英国资本市场的崩盘却不是财政与货币当局运作的结果，是有实在的困境需要克服与解决的，这一点与欧元区 and 日本的货币政策追求并无可比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5月发布的英国经济年度报告中就表示，如果英国公投结果是决定脱离欧盟，该国有可能陷入经济增长减弱以及房价和股价下跌的恶性循环之中。英国出口从脱欧后英镑大跌中得到的支撑有限，不足以抵消消费和投资的下滑。届时，商业地产及金融业等经济主要领域投资的突然下降，将使英国创纪录高位的经常账赤字恶化。

当然，从更宏观的角度，脱离了欧盟的英国的危

机可能转化为中国的机遇。脱离了欧盟的英国必然要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更多的可替代性资源，这一点也正是中国所需求的。双方互补性合作的空间扩大了，并不仅仅是英镑贬值带来的一点点旅游或其他便利。5月12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非立法性决议，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呼吁欧盟采取反倾销措施。目前，美欧正在寻求新的限制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方法，从光伏产品到钢材到通信设备，贸易摩擦呈加速升级态势。英国脱欧后有专家建议，这是中英加强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最佳时机。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我们与老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英国有着天然的互补性。中国的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和消费品能帮助英国人民以较低成本维持生活水准，而英国发达的金融业、服务业与高科技产品又恰是中国最需要加强的。与英国加强贸易合作，除了在欧洲的版图上为中国商品的自由进入打开大门，还在于示范作用。英国的脱欧开启了发达经济体离开欧盟的先例，来自中国的商品则有可能随着欧盟的分裂扩大自由贸易的版图。

问题是，脱欧展现的是保守、民粹的民意。这一轮全球化主要是从上世纪8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开始，中国同期改革开放，不仅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且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的GDP迅猛增长，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红利帮助中国经济迅速迈上工业化的台阶，与西方发达国家缩小了差距。可2008年金融危机后，当全球化带来的如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普通蓝领岗位丧失等“副产品”开始显现，全球化阻力也越来越大了，保护主义渐成国际贸易的主流。1990~2009年，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速的两倍，平均增速达5%。然而，自金融危机爆发后至2015年，全球贸易增速与经济增速却已经连续4年原地踏步。

出口曾经是“三驾马车”中最为强劲的一翼，尤其加入WTO以后，外贸高速增长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可自2012年，中国出口已经连续4年低于GDP增速，既未能拉动经济增长，更未能实现每年设定的目标。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中国贸易份额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有所提升，挤掉德国成为全球第一位的贸易国。

英国脱欧表面上是对移民说“不”，关闭的却是自由贸易的闸门。此时在这样一个保守主义盛行的大趋势下希望把“黑天鹅”解读为“白天鹅”，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英国移民问题的近忧远虑

文 / 张星云

“欧盟移民”与叙利亚难民，是英国脱欧与否辩论的焦点议题。当然，脱欧之后，居住在欧盟的英国移民，也将成为问题与挑战。

2月19日晚上6点在布鲁塞尔，英国首相卡梅伦与欧盟领导人的谈判已经持续了26个小时。参与谈判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自己跑出欧洲理事会大楼到边上的薯条店买了一纸盒薯条站在店旁独自吃着，附近的媒体都在聚精会神地关注着谈判进展，谁也没有注意到默克尔。一名市民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上传到网上，引来了大量转发。一切都像是对这个罗盘失灵的欧盟莫大的讽刺和隐喻。

将近30个小时的谈判是十分艰难的，拥有怨言的也不止英国一个国家。难民潮问题让诸多国家怨声载道。希腊总理阿莱克斯·齐普拉斯在谈判过程中就绷不住了，他大声地对在座的其他人表示，如果欧盟不能保证东欧和巴尔干国家关闭边境，防止更多的难民涌入希腊，那他就不会同意欧盟给予英国的“特殊地位”。会场沉默了，卡梅伦与欧盟的谈判牵扯了太多的因素，即使再经验老到的欧盟高管，也都不看好此次谈判。

然而转机还是来了，晚上10点30分，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用推特发了几个字：“完成了。”卡梅伦与欧盟成功签订了“特殊地位”协定。从18日下午5点峰会开始，到19日晚结束，各国领导人的幕僚和法律顾问们就不停地在写并且重写协议，从标点词到名词、形容词的选择，逐字逐句，即便如此，这纸协议的主要内容与峰会开始两周前的版本相比并没有多大改动。

卡梅伦想要的就是一种舞台效果，所有舞台上的国家领导人都要表现出此次谈判有多艰难。一切的环境都为卡梅伦营造了一种他最后克服艰难险阻得到“特殊地位”协议的景象。剧情进展顺利，在2天密集的会议间歇，卡梅伦会经常穿过欧洲理事会的大堂，进入巨大的新闻发布会大厅，面对100多名记者，不断重复他“还有很多工作在进行”。比利时首相夏尔·米歇尔也同样很努力，他很少见地两次直接接触记者，表示会全力保护自己国家的底线，并反复强调：“没有全面的共识就意味着没有共识。”

完成签字的卡梅伦准备带着“特殊地位”协议坐飞机回英国，进行他下一步为公投准备的宣传活动，他说道：“我不喜欢布鲁塞尔，但我爱英国。”听到此番话的图斯克很不开心，





2015年10月28日，在希腊莱斯沃斯岛的莫里亚难民营，一对阿富汗难民父子裹着毛毯取暖

立刻冲着卡梅伦反驳道：“我爱布鲁塞尔也爱英国。”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也不示弱：“我爱布鲁塞尔胜于其他欧洲地区。”

此次谈判中，有关移民和难民的议题本来只是应该在18日晚上的餐桌上进行的一个轻松话题，最后却延展成从午夜开始整整5个小时针锋相对的谈判。好在卡梅伦与欧盟获得共识，在布鲁塞尔签订的“特殊地位”协定核心便是允许英国限制对新移民的社会福利保障金的发放。新来到英国的移民在头4年只能非常缓慢地逐步获得社会保障金；而如果新移民家庭的孩子拥有原籍国的居住权，这一移民家庭也将很难获得社会保障福利。

波兰和捷克的领导人则在记者的摄像机前对英国缩紧社会福利保障的计划表示强烈担心，表示那些父母流亡到英国，但孩子们还留在波兰、捷克的家庭会因此遭到厄运，这些父母很可能会被迫回国。“目前在波兰有近10万名孩子是这样的情况。”一名波兰负责人说道。与他们不同，丹麦领导人则表示希望也能使用英国政府提出的机制，但他刚一说出口，便被东欧各国负责人的强烈反对声淹没。最终卡梅伦满意地带着“特殊地位”协议回到英国，希望这纸协议能够在当时国内即将开始的公投中助留欧派一臂之力。

经济和移民，分别曾是英国留欧派和脱欧派的最核心议题。留欧派认为英国离开欧盟经济体会导致英镑的崩塌，而脱欧派则认为只有离开欧盟，才有机会减少外来移民。

“欧盟移民”

在两派针对脱欧公投的辩论中，“移民”一词指的并不是叙利亚、土耳其或者巴勒斯坦难民，因为在英国，这些人的身份不会因为是否退出欧盟而改变。“移民”一词指的是凭借欧盟自由旅居条款而在英国生活的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故被称为“欧盟移民”，这些人通常来自东欧，在英国享受完善的医疗系统并领取比原籍国更高的薪水，以此方式改变自己的生活。

作为非申根国，英国接收欧盟移民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而这一话题最终也影响到了脱欧公投。仅去年，27万欧盟移民来到英国居住，从2004年开始，125万欧盟移民来到英国，人数比英国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人口还要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6年4月公布针对英国脱欧的警告报告中认为，欧盟国家人民可以在英国自由旅居，拥有职业技能的年轻移民越来越多地为英国的公共财政带来贡献。一方面，移民可以解决英国

一些行业特别工种的人员匮乏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另一方面，来到英国的移民都会携带家属，因此也会占用英国的教育资源和居住资源。脱欧后，英国会采取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伦敦地区受到的直接影响最大，伦敦的企业竞争力也会受到冲击。

似乎，伦敦成了移民问题争论的核心。公投前，前任和现任伦敦市长在这一问题上进行过激烈的电视辩论。支持脱欧的前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认为英国需要更进一步地控制移民，从原籍国到职业技能都需要具体鉴别；现任市长萨迪克·汗认为如果移民缴纳所有税收的同时应该享受所有应得的社会福利，从2001年至今移民已经为英国带来200亿英镑的收入。

而卡梅伦在2013年许诺脱欧公投的演讲上一句都没有提到“移民”。如今这一概念被约翰逊领导的脱欧派抓住，承诺如果离开欧盟，欧盟自由旅居条款就会失效，然而脱欧派也并没有阐述将来针对欧盟公民的签证政策。“很多选民认为退出欧盟是解决移民问题的最重要潜在手段。”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柯蒂斯(John Curtice)如此表示，他是英国民调研究最著名的专家之一。

早在2010年成为首相之初，卡梅伦就曾承诺将每年新移民数量减少到10万人，而当他2015年竞选连任的时候，当年33万新移民中有18.4万移民的国籍为欧盟成员国。这些数字此后一直被脱欧派作为证据用来宣传卡梅伦未能信守诺言。脱欧派还强调，正是这些来自波兰、罗马尼亚或者拉脱维亚的移民抢走了英国百姓的工作，或者至少拉低了工资。

尽管2月19日卡梅伦在布鲁塞尔拿到了“特殊地位”协议，想向众人展现，不离开欧盟，英国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特别条款以限制移民，但英国国内反对移民和欧盟自由旅居规定的民众呼声依然高涨。支持管制移民的研究组织“移民观察”在公投前还公布了一组数据，在接下来的20年中，移民每年可以使英国的人口数量增加25万，相当于南安普顿一座城市的人口，而其中60%的移民来自欧盟成员国。

叙利亚难民

2月底在布鲁塞尔的峰会刚刚结束，欧盟3月份又迎来了另一个重要峰会。3月18日，时任土耳其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与欧盟各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开会，一天的谈判进展顺利，入夜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台上达武特奥卢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一同发言，台下，比利时和法国代表们则在



脱欧后，英国会采取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伦敦地区受到的直接影响最大，伦敦的企业竞争力也会受到冲击。

焦急地翻看手机，当日曾经的巴黎恐袭主嫌犯萨拉赫·阿布德拉姆（Salah Abdelsam）在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被捕，恐怖袭击的阴影笼罩在欧盟头顶。

达武特奥卢贴近麦克的一次回答把所有人的注意力拉回到了新闻发布厅内。一名记者引述当天上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抨击欧洲对库尔德武装的宽容，达武特奥卢回答道：“3月13日安卡拉的恐怖袭击让所有土耳其人感到恐慌，我在比利时看到了同样的‘伊斯兰国’旗帜。”图斯克赶紧把话接下去：“我们今天签署协议就是因为欧洲是难民们的目的地，因为我们是全世界最宽容的大洲。”

随着“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伊拉克的战事不断发生，邻国土耳其成了叙利亚难民进入欧洲的起点。1997年生效的欧盟《都柏林协议》规定了难民只能向他所进入的第一个欧盟国家提出难民申请，如果在其他欧盟国家发现非法入境的难民，这些难民将被遣送回他入境欧盟的第一个国家。随着近几年难民潮越来越严重，这一规定让意大利、希腊这样的欧盟“前线国”承受着极大压力。巴尔干难民之路上压力最大的国家便是欧盟边境国匈牙利和他身后的奥地利，而自从巴尔干之路被逐渐关闭，叙利亚难民更是全都滞留在了土耳其。

于是有了3月18日欧盟与土耳其总理的这次重要谈判。当日，在默克尔和荷兰首相马克·吕特的支持下，达武特奥卢与欧盟28国签订协议：自3月20日开始，所有新近进入希腊的非法难民都可以被遣返回土耳其。虽然难民们可以向希腊政府申请避难，但希腊政府也可以土耳其为“第三国”身份而驳回避难申请，尤其针对叙利亚难民。这一“临时性紧急政策”，被视作“打击难民偷渡的最好手段之一”。协议同时规定，每有一名从欧洲被遣返回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就可以使一名身在土耳其难民营的叙利亚难民被送到欧洲。一送一回，匈牙利要求这样的人次上线为7.2万人次。

土耳其做出让步，“叙利亚人换叙利亚人”的特殊机制成型。而欧盟也赶紧拿出奖励措施，加快土耳其入欧盟的进度，开启第33章财政预算的谈判。此外欧盟还出资30亿欧元，再加上2015年承诺的另外30亿欧元，以帮助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同时，欧盟还承诺，如果土耳其能够遵守欧盟委员会规定的72条规定，便将逐步放宽土耳其人的签证申请，以期最终取消签证。

除了欧盟移民，近几年，涌入欧盟的叙利亚难民给英国带来巨大压力。尽管3月底欧盟与土耳其签订的新边境条约被很多人质疑是否会真正生效，但它的签署依然增加了英国百姓对来自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潮的恐惧。由于英国并非申根国家，因此这纸新边境条约并不会直接影响到英国，但欧盟与土耳其关系的缓和让英国

脱欧派甚为担心。支持管制移民的研究组织“移民观察”称每年还有10万土耳其人移民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也曾报道称英国大使公投前还在与安卡拉谈判，欲批准150万土耳其人免除签证直接进入英国。而英国国内的脱欧派在公投前一直强调，土耳其将会加入欧盟。

虽然卡梅伦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非常谨慎，但依然招致脱欧派的诸多指责。在去年9月份，卡梅伦承诺在接下来的5年内只接收2万难民，以限制难民数量。这些移民并非从欧洲境内选择，而是从约旦或者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营中挑选，按照卡梅伦的意思，这是为了不阻碍叙利亚在内战后获得重建的机会。

然而随着土耳其与邻国叙利亚、伊拉克的边境矛盾不断上升，英国的脱欧派一直将土耳其入盟作为辩论核心之一。留欧派认为英国在欧盟中拥有否决权，可以拒绝土耳其加入欧盟。而拥护脱欧的独立党则认为近10年欧盟逐渐东扩，英国政府并没有使用过一次否决权，因此否决权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诚然，土耳其的入盟进程可以说极其缓慢。土耳其政府早在1987年便申请加入欧盟，而它最终于1999年成为申请候选国，又过了6年后，正式的入盟谈判才得以展开。土耳其的入盟条件也非常苛刻，这些条件以及入盟后的福利和义务被欧盟分为35章分别与土耳其政府进行谈判，如今其中的15章已经展开谈判，只有关于科学研究的一章现在双方已经最终敲定通过。此外容克领导的欧盟委员会已经决定在接下来的5年禁止任何新国家入盟，也就意味着在2019年前土耳其是不可能加入欧盟的。但欧盟向被视为“穆斯林的特洛伊木马”的土耳其示好，也最终间接影响了英国脱欧公投的风向。

如今，英国脱欧派在公投中胜利了。“欧盟移民”和叙利亚移民尚且不知该如何变化，而脱离欧盟，意味着英国无法进入欧盟的单一市场，居住在其他欧盟国家的100万英国人也将面临失去在欧盟境内自由旅居的权利。

脱欧后，除了来自土耳其、东欧的远虑外，英国也存在着近忧。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的加来市历来是英国和法国非法移民的一笔烂账。横穿英吉利海峡连接英法欧洲之星高铁的海底隧道正是从加来通向英国，诸多非法移民都是在加来等待时机钻进驶过隧道的货运汽车，得以偷渡进入英国。加来的非法难民营在法国极其著名，法国也动用大批警力阻止他们偷渡。法国政府曾经一度威胁英国，法国经济部长伊曼纽尔·马克隆就曾表示，如果英国真的投票退出欧盟，英法之间关于边境控制的《勒图凯条约》就会随之破裂，法国警方不会再看管难民，难民营很可能从加来迁移到海底隧道另一端的英国多佛尔港。如今脱欧后的英国将面临一切的变化。■

戴维·卡梅伦，中庸者

文 / 张星云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



脱欧作为一枚政治棋子，以计算一党与个人之得失，卡梅伦最终输了。

2013年1月，当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承诺要举办全民公投决定是否留在欧盟的时候，他的想法很明确，通过这一政治行动，不仅可以平息他所在的保守党内部右翼反对欧盟的呼声，还可以为他尽可能笼络更多党外的右翼选票，打压当时刚刚兴起的独立党，继而获得连任。彼时的布鲁塞尔，欧盟机构对举办公投的决定深感震惊，匆忙中紧急与英国开展重新谈判。2015年英国大选，卡梅伦成功连任首相，并开始准备兑现脱欧公投承诺。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在2014年底卸任前曾找过卡梅伦，问他为什么在冒风险的情况下组织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卡梅伦答道：“我知道我肯定会赢，并且我成功让苏格兰问题在今后的20年不会再出现。对于欧盟，也是同样的情况。”

然而两年后，英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盟诸国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困境，欧债危机还在发酵，新的难民潮和“伊斯兰国”恐怖袭击使各国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卡梅伦发现事情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进展，尽管大部分党派和国家机构都支持他留欧的主张，反对党势力前所未有的薄弱，国内经济指数稳定良好，但脱欧派最终还是赢得了公投。

6月24日，他带着妻子从唐宁街10号走出来，站在公众前演讲。“我没有任何保留，我的立场很明确，英国在欧盟内将会更加强大、安全和繁荣。我也强调了这次公投跟任何政治人物的前途，包括我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英国民众已经做出了明确且不同的选择，因此我认为英国需要新的领导人来带领我们的国家向前。”卡梅伦宣布辞职，将在10月前从保守党中选出新的首相接替他的工作，而后者将开启脱欧正式法律程序。

卡梅伦演讲结束后，鲍里斯·约翰逊从自己的家中走出来，带着胜利者的表情。同样身为保守党牛津帮，约翰逊却在今年2月份宣布加入脱欧阵营，并最

终成为脱欧主力政治人物，如今他被视为最有可能接替卡梅伦成为新任首相的人选。他与卡梅伦两个人相互太熟悉了，约翰逊经常说的口头禅是“性格决定命运”。

卡梅伦领导保守党将近 11 年，此前只有斯坦利·鲍德温、撒切尔夫人以及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现代史里有过如此长的掌权时间。从 2010 年至今作为首相的 6 年时间里，卡梅伦中庸的性格让他看似总能在合适的时间选择恰当的立场，然而这种实用主义的执政风格最终导致了保守党内部的分裂。公投脱欧的结果似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卡梅伦最终成为英国脱离欧盟的始作俑者，将被世人铭记。

驶离南安普顿的列车

5 月底的英国乌云密布，6 月 23 日公投投票日晚上的那场雨还没有下来。彼时的卡梅伦正在进行为期数周的全国巡游为留欧拉票。那时没有人能料到一个月之后的公投结果，但脱欧派国会议员已经开始表示无论结果如何，都要求卡梅伦辞职。

周一早晨，《泰晤士报》记者珍妮·拉塞尔（Jenni Russell）如约来到南安普顿火车站，在 5 月底跟随卡梅伦进行几天的采访。卡梅伦坐在候车大厅的联排塑料椅子上等待火车到站，给了拉塞尔一杯咖啡，身边是他的幕僚和保安，他的助手递给他一个用纸包着的三明治，那就是他路上的午饭。当天早上对留欧派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当时最新民调显示留欧派正以微弱优势领先，坏消息是卡梅伦曾经的同党好友史蒂夫·希尔顿（Steve Hilton）高调宣布加入脱欧派，《每日邮报》在头版引用希尔顿的话说如果英国留在欧盟就“没法良好运行”。大家以为卡梅伦当天的心情会很差，但其实并没有，或者表面上没有。

火车到达南安普顿，驶回伦敦，由于这家火车公司不允许提前预订座位，因此他们要和百姓共同使用列车车厢。当卡梅伦一行人上了火车，发现车厢里一名乘客已经坐在了一个四人座位上，卡梅伦和他的随从人员都没有打扰这位乘客，他们另找了一个单独的双人座位，将首相专用的红色公文箱放在邻座，卡梅伦一路办公一路和拉塞尔聊天。

卡梅伦特别喜欢电视剧《权力的游戏》，虽然当时拉票宣讲活动很繁忙，但他每周日晚上都会准时看第六季最新的一集。“我很喜欢剧里故事的推进和战争场面，我想在君临城里打一场胜仗。”然而卡梅伦忘记了《权力的游戏》第六集中的兰尼斯特家族饱受

大麻雀领导的狂热宗教的腐蚀，君临城力量正在从内部瓦解。就像卡梅伦自己，正是他当初赋予国会议员自由选择公投阵营的权利，使得很多保守党党内成员加入脱欧阵营，成了反对他的主要力量。

“英国大选和全民公投不一样，大选的时候，你有不同的候选人，有国会议员，有席位，有媒体宣传，那是一整套体系。全民公投比大选要更重要，它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但我自己会觉得压力更小。”彼时的卡梅伦还在安慰自己，“我不认为人们会因政府政绩、经济情况或者我的执政政策而左右公投选择，全民公投是一件特别干净健康的事情。近几周的拉票活动中，民众向我的提问更多的是关于欧盟的，很少有关于保守党的问题。公投的结果是对欧盟的裁决，不是对我执政表现的裁决。”卡梅伦的回答理性、充满逻辑，在拉塞尔面前展现出平和的状态。但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化往往并不那么理性，他周围的人都很清楚，保守党内部右翼势力的脱欧之声便是来源于对卡梅伦的不满，后者曾经的手下们，前养老大臣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和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成了保守党内脱欧派的领导者，从国会议员到部长，都将反对卡梅伦的主张转化成脱欧主张。于是，在英国脱欧派不再是单独的反欧主义，而是也夹杂了所有对当前政府不满意的人。卡梅伦腹背受敌疲惫不堪，那时就已经有政治传闻称他将在公投后立刻辞职。

“欧盟政策是英国政治近 40 年来的核心议题，因此如今到了分歧如此胶着的地步，我一点也不吃惊。”卡梅伦对拉塞尔说，“但我觉得大家还没能认清的是，一个人可以是反欧派的同时主张留在欧盟。”“你就是这样的人吗？”拉塞尔问道。“没错，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是一个反欧主义者，但我认为进行改革并留在欧盟能让英国更强大。”卡梅伦回答道。

整个采访过程中，卡梅伦都故意避开了戈夫的名字。戈夫、希尔顿这些曾经的同党好友如今全都站出来反对他。“不，我不能因为曾经的朋友反对留在欧盟而伤心。我当然想让他们都支持我，但有时，我需要深吸几口气，抬头盯着天花板几分钟。我必须让步，让自己更理性地面对。”

“我不认为脱欧公投会让我失去朋友。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在我进入政治圈之前认识的。”就在当年卡梅伦夫妇搬进唐宁街 10 号的时候，托尼·布莱尔的妻子切丽·布莱尔曾告诉卡梅伦夫妻两人要非常小心谨慎，避免在离开唐宁街的时候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了。“这就发生在我和托尼身上。”切丽·布莱尔告诉卡梅伦，



卡梅伦曾表示：“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我不会永远只使用一种方式来取得。”

当时他们的朋友们或者面对媒体公开指责他们，或者私下里向他们索要某些他们无法给予的特权。

从南安普顿驶回伦敦的火车上，卡梅伦一切的回答都表明，当时他还认为自己可以在接下来几周内解决好所有问题，他觉得英国民众会像他一样冷静理性地去选择留在欧盟。“我不是个赌徒。苏格兰独立公投的时候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当时担心苏格兰民族党会自己组织非法公投。如果我当时不去公投，接下来很多年都会被众人所指责。我其实是个愿意避开风险的人，我不喜欢高空跳伞或者攀岩。”卡梅伦说道。

回到伦敦的卡梅伦第二天早上在参加完内阁会议后去会见了到访的乌拉圭总统，而后立马乘飞机飞往日本，参加5月26日在那里召开的G7峰会。一周之后，6月2日晚，他参加的Sky News电视直播座谈中，现场观众向他问道：“如果知道现在这种情况，当初您为什么要冒险将脱欧付诸公投？”卡梅伦在台上表情压抑、烦躁，他激动地答道：“退出欧盟，是一种自残行为。”彼时，卡梅伦面临的困难才刚刚开始，22天后，他承认公投脱欧派胜利，并宣布即将辞去首相职务。

现代的保守党人

11年前，当他击败诸多知名竞争对手刚成为保守党党魁时，他就曾表示：“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我不会永远只使用一种方式来取得。”保守党的“现代化改革”就此开始，他让世人看到一个完全崭新的保守党：年轻、思想自由、注重社交，总而言之，很现代。实用主义的中庸性格曾让他在执政时左右逢源，他与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领导的自由民主党组成“二战”后英国第一次联合政府，而后在此次的脱欧公投中又与最大反对党工党站在同一立场。这种政治态度让他在初期获益匪浅，但久而久之，最终引起了传统保守党人的质疑，酿成最后党内右翼势力抬头反对他的被动局面。

卡梅伦本身就不符合传统保守党人的标准。他优秀的家庭背景和童年经历让他在保守党内显得格格不入。大多数保守党人心目中的党领导人应该像撒切尔夫人和约翰·梅杰一样，是一位从文法学校毕业靠自己努力一步步登上顶峰的普通百姓，而卡梅伦出生在英国精英阶层家庭，并一直遵循着英国贵族最顶尖精英教育的方向发展。

1966年10月出生的卡梅伦在家里排行老三，他家境富裕，父亲是股票经纪人，母亲是治安法官，曾

祖父当过汇丰银行伦敦分行行长。他们家是英国国王威廉四世的直系后代，与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远亲。卡梅伦从小接受传统贵族式的精英教育，7岁时他去了希瑟当预科学校学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小儿子安德鲁王子曾在这里上学，二儿子爱德华王子则和卡梅伦同班，希瑟当小学的许多毕业生后来都成了英国政商界的重要人物。

卡梅伦随后遵循家庭传统，进入著名的伊顿公学。那时的卡梅伦骑着自行车满校园飞驰，随身听的耳机里大声放着鲍勃·迪伦、The Smiths、Radiohead和Pulp的摇滚乐。他的中考成绩并不理想，而在高考时分别在历史、艺术史和政治经济学上得到了A。他不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他的名字曾出现在伊顿公学校刊上，但原因只是他在学校组织去罗马的集体出游中因为吹风笛跳舞而扭伤了脚踝。在进入牛津大学之前，他利用间隔年为苏塞克斯郡的保守党国会议员蒂姆·拉斯波恩(Tim Rathbone)工作，随后又去中国香港，为一家海运公司工作了3个月后，坐火车通过欧亚铁路横穿苏联和东欧回到英国。

在牛津大学，他故意没有选择专修政治学，他学生时代的旧友史蒂夫·拉斯波恩(Steve Rathbone)解释说，那是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大学生活过得逍遥一点”。他成了布雷齐诺斯学院网球队队长，还加入以狂饮和行为放荡不羁而著称的“布林顿俱乐部”(Bullingdon Club)，和他同时期进入俱乐部的还有他的同学鲍里斯·约翰逊。布林顿俱乐部的经历和他大学期间是否抽过大麻一起成为卡梅伦至今都不愿提起的话题。

“逍遥”的生活并没有影响他的学业。大学期间卡梅伦专修哲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PPE)专业，获该专业一等荣誉学位。同学斯皮亚回忆：“当我们还在尽力掌握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时，戴维就已经远远抛开了我们。他将这些概念和英国国情融汇在一起。”他的导师伯格丹纳夸他为最有能力的学生之一，并认为他的政治观点属于“现代、理智的保守党”。

直到大学毕业时，他还不是很确定自己要做什么。当时他得到了一个咨询公司的会计职位，但他拒绝了，而记者梦也因被《经济学人》杂志拒绝而破灭。他看到广告，去应聘了保守党研究部门的职位。就在卡梅伦到保守党的中央办公室里接受工作面试当天早晨，保守党负责人接到一个从白金汉宫打来的电话，电话的另一头说：“我知道你接下来要面试的是戴维·卡梅伦，我用了所有方法想说服他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在政治上，但我失败了。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你，你即



左图：6月24日，脱欧派在公投中胜出后，支持留欧的人士在伦敦议会大厦前游行示威，呼吁政府继续维持宽松的移民政策

右图：卡梅伦曾经的资深顾问史蒂夫·希尔顿

将要见到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年轻人。”

20世纪90年代初，保守党还是执政党。卡梅伦曾为撒切尔夫人和梅杰两任保守党首相提供咨询、准备讲稿，显示出卓越的才华。也正是在那时，他认识了后来的政治密友、曾被自己任命为财政大臣的乔治·奥斯本。奥斯本比卡梅伦小5岁，同样从牛津毕业后想当记者，当年被《金融时报》拒绝后，进入了保守党的研究部门工作。

卡梅伦最喜欢的电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和《教父》，他始终有一个成为领袖的内心。2005年，卡梅伦竞选保守党领袖并获得了胜利，上台后他大刀阔斧地对保守党进行了“现代化改革”。保守党的选举体系变得青睐女性和少数族裔，发展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和环境保护都成为保守党政纲的重要部分。相比党内基层，卡梅伦的政治立场更中立，他推动保守党支持同性恋婚姻等社会问题，采用“一国保守主义”。2008年欧债危机到来后，欧洲的好时光不再。尽管此前的社会改革还在继续，但卡梅伦也改变执政方向，更加回归传统的保守党风格，在减少公共开支的情况下努力收支平衡。他的执政政策变得矛盾，他始终在

强调“用更少的东西做更多的事情”。正是从那时起，卡梅伦中庸的政治立场便开始不断左右摇摆。

一个希望留在欧盟的反欧派

时至今日，卡梅伦到底是亲欧派还是反欧派？依然是一个问题。

其实卡梅伦作为欧盟利益捍卫者的身份并没有多少可信用度。2005年，当托尼·布莱尔率领工党获胜之时，卡梅伦正在竞选成为反对党保守党党魁，布莱尔的前欧洲事务部长丹尼斯·麦克夏恩（Denis MacShane）劝卡梅伦与反欧团体彻底决裂，以保证保守党的健康，卡梅伦曾冷冷地回答道：“我的反欧倾向比你认为的要强烈很多。”

麦克夏恩在他2015年出版的《脱欧：英国将如何离开欧洲》（*Brexit: How Britain Will Leave Europe*）一书中印证了如今英国选民们的困惑：“卡梅伦展现出一种矛盾而又温和的反欧主义，因为支持欧盟从短期的政治战略中并无效果。”麦克夏恩把卡梅伦写成一个充满个人魅力和充沛精神的人，但既易

冲动又不坚定。卡梅伦的前战略主任史蒂夫·希尔顿在转投加入脱欧阵营后表示，“他一直都是反对欧盟的”。

一直以来，历任保守党党魁都有接近反欧主义的传统。作为反对党领袖时，卡梅伦就曾提出在2007年针对欧盟提出的《里斯本条约》进行全民公投，2010年他入主唐宁街成为首相后，便不再提此事，他的前任、工党首相戈登·布朗已经代表英国签署了《里斯本条约》。

保守党右翼反对卡梅伦势力的崛起源于卡梅伦2010年与自由民主党结盟组成联合政府。卡梅伦出任首相，成为英国近200年来最年轻的首相，而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尼克·克莱格是英国最有名的亲欧派之一。卡梅伦的保守党就此开始逐步分裂，为了拉拢党内的右翼势力，抵消英国极右势力独立党的崛起给他造成的压力，2010年卡梅伦指派党内反欧派的伊恩·邓肯·史密斯和迈克尔·戈夫成了政府大臣，更助长了反欧派的成长。

2011年，保守党内部右翼公开支持民众联署的脱欧公投提案。最终，卡梅伦下定决心在2013年公开承诺如果自己2015年连任首相，将会通过下届任期在2017年之前进行脱欧全民公投，以期拉拢保守党内部的右翼势力。这一承诺的直接好处是整个保守党在2015年5月英国大选中全力支持卡梅伦，同时他成功吸纳了不少极右党派独立党的票仓，在国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卡梅伦连任，独立党只获得一个下院席位。

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卡梅伦在第二任期开始全力筹备脱欧公投。他自认为，脱欧公投会像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一样，没有风险，还会为他带来不少好处。当年的公投不仅平息了苏格兰的独立声音，还让苏格兰民族党（SNP）获得充分发展，将卡梅伦的反对党工党彻底挤出当地政治舞台。

在欧盟面前，卡梅伦是一个脱欧派。他重新开启了与欧盟的新一轮谈判，希冀以脱欧公投为筹码，向德、法要求进一步减少英国的预算贡献份额，控制移民。当时的第一轮谈判在2015年12月17日的布鲁塞尔展开，面对其他27名成员国政府首脑，卡梅伦的表态很明确：在欧盟中不给我更好的特殊条件，我就向英国民众宣布我支持脱欧。最终在今年2月19日的欧盟峰会后，英国与欧盟达成“特殊地位”协议。

而在英国民众面前，卡梅伦又成了一个留欧派。6月22日，自信满满的卡梅伦拿着与欧盟谈好的优厚

条件飞回英国，在全场45分钟的节目上“舌战群儒”，呼吁民众留欧。有观众提到卡梅伦推动欧盟改革方案随时可能被“专制独裁”的欧盟推翻，与英、法1938年与纳粹德国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如出一辙，无法阻止对方毁约。卡梅伦回应称，当年英国与法国及波兰等并肩作战，没有因为困难“背对欧洲”，强调英国留欧才能推动欧盟改革。

卡梅伦本以为从欧盟获得的实际利益将会抚平党内右派的反对之声，公投中留欧派将以绝对的优势胜出，新一轮的政党洗牌将会更加巩固卡梅伦的地位，一切都像苏格兰独立公投一样。

然而此时，在保守党内的其他领导者眼中，卡梅伦左右逢源的政治倾向背叛了保守党，他们不希望失去这样的机会逼迫卡梅伦下台。卡梅伦曾经的手下们成了保守党内脱欧派的主力，而卡梅伦在牛津的同窗校友、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则成为党内脱欧的主要领导者。卡梅伦从没有公开将鲍里斯·约翰逊当作自己的朋友，他们也很少出现在同一个社交场合。即使是约翰逊在担任伦敦市长的时候，他们身边的人都不认为两人会有什么真正推心置腹的交流。而今年2月份约翰逊以“坚定的保守党”身份出现，主张脱离欧盟的独立经济体系，反对欧盟范围内人民的旅居自由。约翰逊成了唯一能够与卡梅伦分庭抗礼的人，他向外公开了执政党内针对脱欧决定的分歧。而尽量保持中立的卡梅伦则自始至终拒绝与约翰逊进行电视辩论，担心这样将更加分裂保守党。

最终在一场暴雨后，脱欧派获得了公投的胜利，卡梅伦成了众矢之的，即将知天命的他黯然宣布辞职，保守党的现代化风潮也许将就此结束。■



鲍里斯·约翰逊，权变者

文 / 朱可人

如何在被普通民众左右的直接民主中胜出？善变，是法则之一。

英国全民公投中，脱欧派出人意料地胜出，将反对卡梅伦的对立面、站在支持脱欧最前线的保守党人、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推向了风口浪尖。全民公投第二天，卡梅伦做出的辞职决定，更让约翰逊成为保守党内最有可能接任卡梅伦的党派领袖和最热门的首相候选人之一。

约翰逊何许人也？他不仅是靠口才赢得奇高曝光率的英国国会议员和把握英国经济命脉的前伦敦市长，也是观点激进的政治评论报社总编和专栏记者，同时还是文采斐然的畅销书作家、古典学和历史学者。当然，他更为人们记住的，是其诸多令人费解的矛盾特点和标志性的夸张言行。英国传记作者索尼娅·普内尔（Sonia Purnell）评价他说，他风格独特，“不属于任何传统的政治人物类型，超越关于领袖的刻板印象，完全是规则的对立面”。

的确，约翰逊的风格不仅与英国政坛传统背道而驰，也极难概括：从伊顿到牛津的“特权”教育背景并没有把他培养成一个儒雅的英国绅士；相反，让他最具辨识度的特征是一头稻草般的蓬乱金发，臃肿如洗衣篮的体态和洋相频出的笨拙，以及令人啼笑皆非却又难以抗拒的激进与幽默。约翰逊骑市内租用自行车每日穿梭于伦敦市内，在诸多场合经常迟到，又永远一副因奔忙而衣衫不整的邋遢模样。如果说政治是一场戏，那么与其他扮演成年人的刻板、做作政客相比，他更像是个冒着傻气的大男孩。当然，作为一个与政治共舞的演员，他更像是莎士比亚喜剧里的小丑，看似疯言疯语而口无遮拦，却经常妙语连珠而别有用心。尽管谩骂者有之，质疑者有之，他充满矛盾的跨界成长经历和职业背景，以及带有荒诞剧色彩的言行风格，在越发由注意力牵引的当今民主政治背景下，确实已成为格外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非典型的“贵族”的成长历程

在外人看来，约翰逊从伊顿公学到牛津大学就读的

成长经历，与卡梅伦惊人的相似。从传统贵族学校到更高贵族学府的经历，也给我们一种因特权而轻而易举成功的错觉，充斥着不近人情的优越感。然而他不修边幅、无所顾忌的举止乍一看则完全是得体贵族的反面。的确，约翰逊尽管教育背景良好，但其家庭背景比起有贵族血统且为金融世家的卡梅伦来说，却决非典型贵族。

约翰逊因为父亲去美国深造的原因出生于美国，而后在英国长大，这样的成长经历大概种下一颗非典型英国人的种子。他的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几代人都从牛津大学毕业，他从母亲身上继承了知书达理而博学多闻的自由主义传统。父辈的祖先是土耳其知名记者，政治观念保守，写作传家，父亲靠奖学金在牛津完成古典学学业，学习创意写作后改学农业经济，先后在英国外交部、世界银行和诸多机构供职，也因频繁调换工作而频频举家搬迁。动荡不安充斥了约翰逊的童年生活。在阶层分化明确的英国，家境不算殷实的他只属于高级中产阶级，生活勉强为继，从伊顿公学到牛津大学，都是靠着奖学金完成了学业。这解释了他与卡梅伦带有距离感的行事风格的大相径庭，其亲民的形象也消除了人们对来自伊顿的贵族政治家的偏见。一种反对规章制度、无拘无束的反弹制态度反而成为大批对社会不满的底层人士喜爱他的理由。

约翰逊的父亲在家经常强调热带雨林中的适者生存原则：如果不成为热带雨林里最高大的树木，就会因无法得到足够阳光而衰弱或死亡。争强好胜、追求卓越成为其家族的标志性特征，在他身上尤为明显，小时候兄妹间比学语言、比爬树、比猜字谜，在伊顿公学时为了与人一争高低而从头开始学习钢琴，也在英式橄榄球比赛中势不可挡，还成为学院的领导者；从伊顿到牛津一路斩获全额奖学金，在牛津第一年竞选校学生会主席未成功时第二年再战而胜，尽管聪明过人但精力过于分散于政治活动的他，毕业时因为没能拿到一等荣誉毕业而失眠许久。

英雄主义与政治野心

约翰逊从小沉浸于古希腊语、拉丁语，大学亦主修古典学，受其影响非常崇拜英雄主义，也崇尚贵族的价值体系和与英雄主义相挂钩的精英主义传统。他从小就野心勃勃，希望成为“世界之王”，并一路展现



6月22日，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在达勒姆郡的达灵顿为脱欧公投造势

出领导才能。进入牛津后，对好友发誓要“35岁进入内阁”。抱着早熟的实用主义心态，他先成家后立业，一进牛津就找到同届最漂亮的姑娘做女朋友，并于毕业时结婚。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学校的政治活动，并结交了校内外颇有影响力的朋友。

刚毕业时，他进入当时时髦而高薪的管理咨询行业，入职一周便因为工作极端无聊而坚决辞职，而后靠牛津时结下的关系而进入著名的《泰晤士报》做记者，因为在一篇稿件里以牛津一位历史学教授口吻编造充满戏谑的史实而被解雇，然而因其文采斐然、才华出众，很快又受雇于《每日电讯》，后被派往布鲁塞尔报道与欧盟有关的议题。他离经叛道的反对欧盟生涯就此拉开序幕。他尤其善于用各种比喻抓人眼球，用幽默而讽刺的笔调剖析欧盟体制的落后和制度的不合理。例如他针对欧盟对膨化食品和香肠的规定大发议论，将这两样作为英国人生活方式的食品作为文化象征，强调欧盟政策对英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威胁。他的作品与其他驻布鲁塞尔记者的陈词滥调相比让人大呼过瘾，

他也很快成为最知名的驻布鲁塞尔记者。此后，他的作品秉承这种风格，深得传统而保守的“中年、中产、生于英国中部”的读者的欢迎。

而他的政治野心绝不只于成为一个政治评论员和记者。在报社工作时，他几乎不与同事交际，而是与银行家和富人精英聚在一起，并从不用文章侵犯知名人物的名誉。加入保守党后，他与2001年被选为Henley地区的议员并任职于影子内阁，任文化交流和创意产业部长，之后又成为该区的高等教育部长。在此期间，他出色的口才得以发挥，频频亮相于电视节目，包括不少传统政客不齿的节目，知名度大大提升。他不仅作为一名激进的记者和政治评论员活跃于文坛，还先后出版了几本书，内容涵盖政治、罗马历史、丘吉尔自传。

2008年，约翰逊作为保守党候选人参加伦敦市长竞选，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以53%比47%赢得选举，赢得选举也成为当代英国政坛保守党人自1992年大选以来最重要的胜利，自然也成为他个人事业的里程碑。

他在伦敦担任市长期间赢得金融界的大力支持，获得连任，并于2012年成功监督完成了伦敦奥运会的举办，2015年卸任后，他借自己在各大媒体的影响力，成为英国“脱欧”的主导人物之一。

以喜剧人格为掩护的真假政治

他聪慧过人，博闻强识，10岁开始读《经济学人》杂志，精力极其充沛而工作效率极高，与他共事过的主编布鲁斯·安德森（Bruce Anderson）回忆道：“我们其实每周只见一分钟，而鲍里斯能在一分钟里把所有要点都涵盖；另外，他悟性极好，从来不需要向他费心解释任何事。”约翰逊同时承担了编辑和议员两份工作，之后更是兼任主编和伦敦市长两份重量级工作，一方面因为他工作效率高，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人格魅力。

当然，他真正受欢迎之处不仅于此，更在于他令人捧腹的荒诞言行。鲍里斯的不拘小节从他年轻时的轶事就可见一斑。23岁大学一毕业就结了婚，临近婚礼竟依然衣着不整，结婚时穿的是女方家里人的朋友比芬爵士的一身行头，两人刚交换完结婚戒指半小时，戒指就不知所踪，几天后夫人无论怎样寻觅都找不到两人的结婚证，而约翰逊并不以为意，后来还是比芬爵士在还回来的裤子口袋里找到了结婚证。其后，他更将这种不拘小节带来的笨拙与幽默发挥到极致，反而成就了他的喜剧人格和独特魅力。他担任伦敦市长期间，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来自他在伦敦奥运会期间乘坐高空缆车挥舞英国国旗庆祝之际，缆车戛然而止，而他被卡在空中动弹不得。对于任何严肃的政客，这样令人难堪的场景大概都是政治死刑，然而约翰逊一晒置之，而蓬松金发的中年胖大叔被困空中的照片则成为其经典形象。

他有英国保守党政客身上极其罕见的搞笑气场，看起来他完全摒弃了一本正经的虚伪，靠笑话赢得人心，为生活增添无限喜感。他的影响力波及原本对政治毫不感冒的人，甚至得到了诸多憎恶政治家的民众的大力支持。他的语言中充满各种调侃，尤其以各种与性相关的调侃出名。他说人生就是个性能力测试；自己二度离婚绯闻不断，被问到自己有多少个情人时，他说肯定没超过1000个，其戏谑外遇不断的人生被改编为多部喜剧，竟反而增添了他的知名度；最近更加引起大众哗然的言论，是他关于欧盟对统一的强调很快就要涉及“统一避孕套尺寸”（One-size-fit-all condom）的程度。这些调侃虽不登大雅之堂，却令人印象深刻，尤其能够抓住那些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却被这些段子吸引的普通民众。



人们因为他讲话的妙趣横生而享受他讲话的过程，以至于根本不在意他到底讲了什么，只有回过神来时才会反思言论确凿与否。

这些戏剧化的幽默后恰恰深藏着谎言与投机的政治立场。约翰逊很早就意识到政治家的虚伪和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的蛊惑人心，牛津学生会作为英国政治家摇篮，成为青年时期他的练兵场，在第一年竞选失利后，他于第二年成功当选，并于其后坦诚撰文，总结其成功的秘诀——学生会竞选成功的诀窍在于在各个学院找到为自己拉票的助手，而竞选者及其助选团队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口是心非和空头支票的基础上。与学生会绝大部分一望便知的拉票者伪君子相比，他显得妙趣横生，并有一种人格魅力用自己的胜利感染助选者，让助选者们心甘情愿地自我欺骗而为他效力。

这种欺骗与善变也体现在竞选过程中，早在牛津竞选时，他就否认自己的保守党属性，而迎合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发表相关演说，而正是后者的支持者的选票让他得以成为主席，然而竞选获胜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为保守的托利党人。在约翰逊之后当选牛津学生会主席的杰西卡·普雷回忆道：“鲍里斯当时的政治手腕极其高明，绝不会让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看到他的政治底牌。”而他隐藏其政治立场的最有效工具，就是他令人欲罢不能的幽默，“他身上好像有光环，让他极具辨识度。他无疑是同辈中最伟大的演员，只要他一开口，人们就开怀大笑”。

约翰逊从小就培养了一种让人们享受被领导过程的能力，人们因为他讲话的妙趣横生而享受他讲话的过程，以至于根本不在意他到底讲了什么，只有回过神来时才会反思言论确凿与否。其后在政治生涯中，一次又一次以笑料为掩护，为取胜而改变立场、迎合观点。

有评论指出，尽管本身也认同留欧阵营的大部分立场，深谙“脱欧”的诸多潜在弊端，但约翰逊反对卡梅伦、追求最高权力的目的，选择了在公投前大张旗鼓地主张退欧。很大程度上，他为丘吉尔作传的目的并非丘吉尔本身，而是为了显示自己有丘吉尔一般的领袖特质、对原则的坚守和对党派纪律的傲慢忽视。然而“脱欧”事成后，面对舆论的压力，他又虚弱地表态，说“脱欧”并不代表“完全切断金桥”，大概出于对局势逆转的措手不及。

义愤填膺者评价他，说他的个人特点可以用“假”（Phony）来概括，就连其标志性的金发“看起来也是假的”。而对于为胜利和权力可以改变一切的约翰逊来说，虚假和变化大概是唯一不变的东西。然而对于缺乏政治立场，易于被表象左右的民众来说，出人意料地也是政客魅力的来源之一，这大概解释了善变与喜剧人格的结合，如何在越发被普通民众左右的直接民主中成为胜出法则。■

手机
一键预约
上门美容 48元起

我的美容顾客Lisa喜欢在上班前享受Home Spa，所以我清晨6点已到达她家楼下。

Lisa说，她喜欢这种不用排队，在家也能享受的清晨时光。

——河狸家美容师 滋润



扫描二维码 · 体验上门服务

美甲 · 美容 · 美睫 · 造型 · 美发 · 健身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杭州 · 成都 · 广州 · 武汉 · 南京 · 天津 · 重庆

1折起，无附加费！

8天内免费上门修补 仅美甲、美睫

迟到退款50%

为您投保8.5万意外险



欧洲：一个幻想中的共同体

主笔 / 徐菁菁

三联生活周刊



3



2

1. 6月24日，脱欧公投结果宣布后，聚集在伦敦米尔班克大厦的脱欧支持者们欢呼庆祝
2. 以意大利政治家斯皮内利命名的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大厦
3. 6月24日，英国伦敦，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在得知脱欧支持率领先后欣喜若狂



欧洲共同体的构建，尤其欧洲认同之形成，道路漫漫。

缺位的欧洲人

“欧盟正在崩塌，正在死亡，我希望我们已经敲下了这堵墙的第一块砖。”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出来后，英国独立党领袖法拉奇这样宣布胜利。多年后，这将成为一句正确的预言吗？

在法国，极右党派国民阵线的玛丽·勒庞说，如果她在明年当选法国新一届总统，她将成为“法国脱欧夫人”（Madame Frexit），将在6个月内就法国是否继续保持欧盟成员身份的问题进行国民投票。在荷兰，自由党领导人基尔特·威尔德斯说，他们将把荷兰脱欧公投作为在明年议会选举中竞选首相的一个中心主题。在奥地利，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在5月份的总统选举中差一点点就要取得胜利，脱欧是他们的一贯主张。在意大利，刚刚在地方选举中一举拿下罗马、都灵两大重镇的“五星运动”党称，他们将提议对是否继续使用欧元货币进行公投。在匈牙利，已经执政的“为了更好的匈牙利”党（Jobbik）早就认为：“我们是斯拉夫和日耳曼海洋中的马扎尔岛，我们不要北约，也不要欧盟。”

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怀疑论者不曾缺席，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具有威胁。右翼政客的论调不再仅仅是虚张声势。今年3月25日至4月8日，民调机构益普索在比利时、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波兰、西班牙和瑞典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45%的受访者希望能像英国那样就是否留在欧盟亲自进行公投，而1/3的受访者表示如果获得这样的机会，将选择脱离欧盟。

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或许都可以用于解释今天欧洲一体化的倒退，但欧洲梦的支离破碎还蕴藏着一种更深层次的失败。1952年，欧洲一体化先驱、法国政治家让·莫内（Jean Monnet）曾说：“我们不是在创造一个国家的联盟，我们是在团结人民。”但很显然，在过去60多年的实践里，尽管欧洲各国创造了统一的货币、打破了国家的边界，但他们依然没有完成一种身份认同的转化，没能创造出真正的“欧洲人”。欧洲晴雨表民意调查显示，90%的欧洲人坚持自己的民族身份，或是将民族身份坚定地置于欧洲身份之前。仅有2%的人将自己看作完全的欧洲人。

一个共同体必须要能够“同甘共苦”。在一体化带来利益的时候，公民个人和成员国可以同舟共济。而一旦一体化受到挫折，何以保证需要公民个人和成员国能够做出忘我牺牲，确保一体化的成就不会付之东流呢？欧洲认同的缺失意味着欧盟正处于这样的境

地：它好比一座根基浅薄的建筑物，在政治和经济地震之中摇摇欲坠。人们试图逃离它，而非协力支撑住它。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民族主义和种族教授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曾对统一的欧洲这样发问：“谁会为欧洲而死呢（如同为了民族那样）？”

人造欧洲

欧盟委员会前任主席雅克·德洛尔说，欧洲建设的积极分子总是忘记在理解欧洲认同困惑时必须谨记的一点：欧洲不是自发建成的，而是出自历史的挑战。

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有两栋“玻璃建筑”。其中一栋以意大利政治家阿尔蒂诺·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 1907 ~ 1986年）的名字命名。1940年，被墨索里尼政府关押在监狱中的斯皮内利发表了一份宣言。这份宣言以《通向自由和统一的欧洲》之名在各国抵抗运动中广为流传。斯皮内利说，如果欧洲各国未来仍旧因循旧例自由结盟，那么打败法西斯只是枉费心思。旧的体制只会通向未来的另一场战争，它必须被一种民主的欧洲联邦所取代。通过这种方式，欧洲国家会被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战争便不再有可能爆发。

斯皮内利的思想代表了一种普遍思潮：自民族国家在欧洲诞生以来，欧洲大陆就被“民族”的边界割裂。国民经济、社会功能、生存安全和文化遗产在民族的界限之内实现了高度的均质化，而在民族界限之外则是异质和竞争。“二战”之前，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已经进行了几百年的战争。在欧洲的有识之士们看来，民族认同的极端发展在20世纪将人类的命运推到了毁灭的边缘。超越民族主义成了当时多种社会潮流的共同吁求。“一战”后，奥地利的康德霍夫·卡利吉就倡导了泛欧运动；1929年，法国总理白里安向国际联盟大会提出《关于建立欧洲联邦同盟的备忘录》，目标是建立一个“欧洲联邦同盟”。而“二战”的特异之处在于，它的破坏性使得每一个欧洲参战国都成为事实上的失败者。它把关于战争、内战、占领和失败的共同记忆留给了欧洲次大陆。民族主义在欧洲已经是一堵危墙，它的合法性受到普遍的质疑。

欧洲一体化从发端起就包含着超越民族主义的深切政治理想和期望，但塑造欧洲认同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进入设计者的视野。在包括“欧洲之父”让·莫内在内的许多政治家看来，当务之急是以经济一体化的形式打破各个民族国家的利益界限。



欧洲一体化从发端起就包含着超越民族主义的深切政治理想和期望，但塑造欧洲认同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进入设计者的视野。

从1951年4月18日，法、意、联邦德国、荷、比、卢六国签订了为期50年的《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开始，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并没有因“欧洲认同”问题受到阻力。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各国的经济形态具有互补型的特征，这为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最原始的驱动力。两个最关键的欧洲大国在合作中也各取所需：廉价和丰富的德国原材料是法国工业重组计划的关键基础。德国也需要它，只有通过这样的超国界共同体，新生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才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中等的一员。

欧洲认同缺陷没有在欧洲一体化早期显现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的政治体和公民个人之间并没有建立直接的纽带关系。一体化的重大决策与举措都是由知识精英或政治精英提出、设计并付诸实施的。莫内与时任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作为一体化的设计师，促成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法国总统戴高乐与德国总理阿登纳作为法德轴心的领军人物确保了一体化顺利发展。作为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的雅克·德洛尔在其长达10年的任期内（1985～1995），积极推动出台了《单一欧洲法令》，据此建立了欧洲统一大市场。担任欧盟制宪委员会主席的前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则率领一帮精英人士起草了第一部《欧盟宪法条约》。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范勇鹏在研究中指出，在欧洲一体化整个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知识精英所热情鼓动的欧洲复兴与政治精英、技术官僚所推动的欧洲联合相互呼应，成为一体化进程的一股重要推动力。

在战后和平与复兴的目标下，欧共体的“精英政治”本质并没有受到普遍质疑，大多数公民只是一体化过程的旁观者。而一旦一体化进入政治合作领域并不断深化，当欧盟的法律超越国家法而直接作用于个人的生活，当政治、外交、社会、司法、警务和文化等政策领域都纳入到一体化进程，欧洲大众就与欧盟机构发生了直接的关系，身份认同才开始成为一个显性的问题，并直接阻碍了欧洲一体化的深入。

2004年10月29日，欧盟25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在罗马签署了《欧盟宪法条约》。条约必须在欧盟全部成员国根据本国法律规定，通过全民公决或议会投票方式批准后方能生效。根据欧洲各国领导人的预期，条约在获得所有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批准，应于2006年11月1日正式生效。但事实并非如此。

2005年5月29日，法国右翼以法兰西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欧盟宪法条约》，在公投中以反对票占多数否决了该条约。同年6月1日，荷兰63%

的选民对《欧盟宪法条约》投了反对票，支持率仅为37%。荷兰民众反对该条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荷兰民族主义分子担心欧盟中欠发达的成员国向荷兰等富国输出劳动力和移民，抢夺荷兰人的饭碗。

这引发了欧洲一体化在21世纪的一场重大危机。经过长达两年的反复谈判，欧盟最终决定修改宪法条约名称。“简化版”的《里斯本条约》取代《欧盟宪法条约》。《里斯本条约》缩小的一体化的步子，删除了《欧盟宪法条约》中带有宪法含义的敏感内容，以及欧盟盟歌、盟徽等提法。这实际上是欧洲认同对民族主义的一次屈服。

为确保《里斯本条约》顺利通过，欧盟的27个成员国中仅有爱尔兰一国决定采用全民公投的方式来决定。其他国家都以议会审批的方式通过了《里斯本条约》。果不其然，2008年6月12日在爱尔兰进行的全民公决中，爱尔兰民众以53.4%的反对票否决了《里斯本条约》，又一次打乱了欧盟改革的全盘计划，欧盟制宪进程再次陷入困境。爱尔兰民众主要害怕新条约生效后，欧盟将按照国家人口分配权力，人口仅约400万的爱尔兰民族会湮没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之中。最终挽救《里斯本条约》的是利益而非认同。2008年，爱尔兰经济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欧盟批准爱尔兰35亿欧元银行援助计划，还联手推出1万多亿欧元的救市措施。在此背景下，爱尔兰民族主义暂时屈服于国家利益，在2009年10月2日进行的第二次投票中，爱尔兰公投以67.1%的支持率通过了《里斯本条约》。

模糊的欧洲

本世纪初，时任法国财长洛朗·法比尤斯曾这样称赞欧元的使用：“多亏了欧元，这下，我们的荷包很快就会装满欧洲身份的切实证据了。”然而这些由奥地利纸币设计家罗伯特·卡利纳设计的纸币与世界上的其他货币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它的纹样缺乏任何真正承载意义的形象。它回避了欧洲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人物。一位央行官员说，政治家们不想引发令人不快的民族主义争论。欧元的正面是用来象征着合作和坦诚精神的门和窗，背面是用来象征合作的桥梁。当然，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建筑元素和遍布欧洲的那些伟大建筑也没有任何对应的关系。这恰好是欧洲身份致命缺点的隐喻。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言：“对现代欧洲大陆的居民而言，似乎不存在有意义、有效力的，能够将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同的欧洲神话与象征符号。”



左图：欧共体委员会前主席、法国官员雅克·德洛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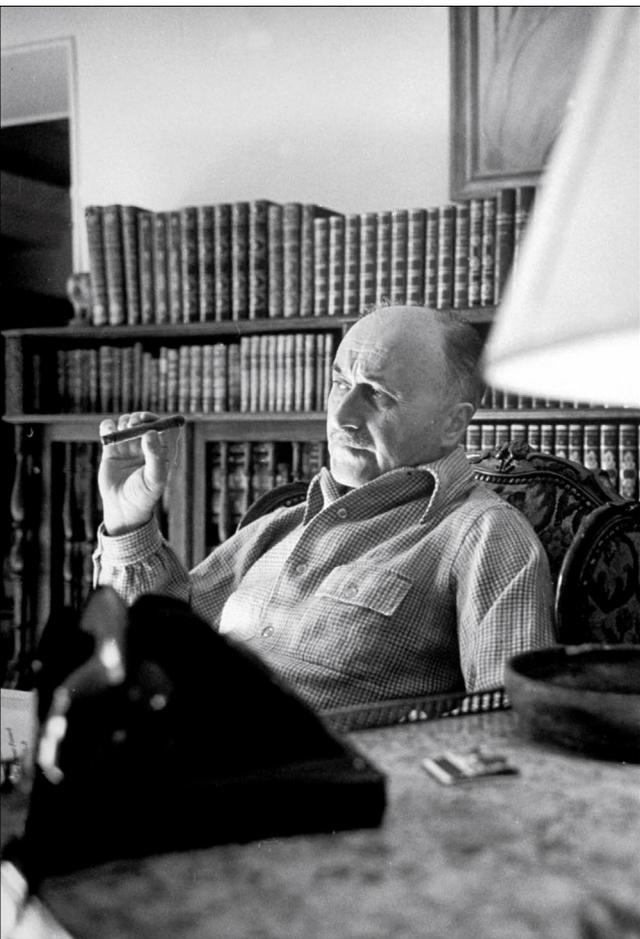
右图：被誉为“欧洲联盟之父”的法国政治家让·莫内（1888-1979）

1972年的巴黎峰会开启了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议程。为了应对政治一体化带来的认同问题。1973年欧共体哥本哈根外长会议公布了《关于欧洲认同的宣言》。这份宣言把共同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作为欧洲认同定义的重要部分。在后来的《欧盟宪法条约》草案中，欧盟也都把“强调共同文化遗产”“维持和保护欧洲意义的文化遗产”等要求列入其条目。但事实上，政治精英们从未解决基本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欧洲？欧洲认同到底应该包含什么？

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历史学终身教授鲁道夫·宾尼指出，那些老生常谈的属于欧洲的共同文化和遗产往往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并不存在真正的欧洲统一的原型。罗马帝国被认为是欧洲一统的原型，但罗马帝国其实称不上一个欧洲国家，它统治的核心地区是地中海，它在欧洲的领土并不比在非洲或亚洲的多，其范围也要远远小于今天欧洲的面积。今天欧洲文明的

许多特性恰恰是作为罗马帝国的对立面而发展起来的，比如日耳曼人抗击罗马统治的精神、法国民族精神中深刻的高卢情结。800年左右，法兰克人征服者查理曼大帝建立的加洛林帝国全部在今日欧洲的地理范围之内，但是它的领土甚至比罗马帝国的欧洲领土还要小。查理曼曾一度称自己的帝国为欧洲，但他的帝国是以个人忠诚维系的，并没有产生对领土或皇权的忠诚。

也并不存在遍及整个欧洲大陆、贯穿欧洲文明发展全过程的实实在在的基本要素。一些人认为：“独一无二的欧洲文明的基础，首先便是共同语言（拉丁语）和罗马法。接下来是基督教、封建主义以及环绕城堡、市场、教堂和墓地周围的、外表类似的村庄。然后，在此基础上，12、13世纪出现了一个新欧洲秩序。这一新秩序的特征是骑士制度和贵族阶层的宫廷礼仪；自治的公社；行会、集市和银行；市民阶级，



家庭财产长子继承的等级社会；教会法、宫廷和陪都；罗马式以及哥特式艺术；经院哲学浸染中的大学；以精致的俗语吟诵，后来又被记录下来的英雄史诗和骑士传奇。”但事实上，这些欧洲特性论所涉及的历史现象却“主要甚至只是西欧的现象。”

从历史上去寻找欧洲认同存在两种危险。法兰西学院院士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说：“有着过去的共同荣光，当前的共同理念，一起成就过伟大的事业，并且还希望做更多，这些是一个群体之为群体的必要条件。”然而，没有人曾为“欧洲”献身，没有一块为“统一的欧洲”而立的纪念碑；相反，欧洲历史上的大多数文化标记，都在强调欧洲人内部的敌对，而非他们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可能才是那个对“欧洲认同”最具威胁的事物。

这个危险在欧洲东扩的过程中集中体现了出来。1989年东欧剧变后，欧洲一体化的扩大转向中东欧转

型国家。2004年，波兰、捷克、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和马耳他10国正式加入欧盟。2007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正式加入欧盟。这场东扩至今仍在向格鲁吉亚这样远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延伸。

东扩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含义。曾负责扩大事务的欧盟理事会前轮值主席、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长费尔霍伊根说：“欧盟东扩意味着一个新的、具有强大渗透力的大市场的开发，它有利于欧盟的创新、就业岗位的增加。”在政治上，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指出：“我们启动了统一进程。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使发生战争、紧张局势和悲剧的可能性离我们更远，这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在安全层面上，这不仅扩大了欧盟的疆域，也使欧盟拥有了一个和平安全带。”

但与此同时，历史使得东扩加剧了欧洲认同的模糊。19世纪，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把通向维也纳东门外的公路视作亚洲的开始。更早一些，曾在1669年游历过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英国人爱德华·布朗（Edward Brown）表示，刚一踏入匈牙利，“我们就好像离开了自己的世界……在抵达布达（Buda）前，我们仿佛踏入了世界的另一个部分，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事实上，从10世纪起，对于一个西欧人来说，加洛林王朝、洛林王国、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边界就是欧洲的边界。而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对立加深了这条古老的裂痕。

当那些欧洲的“边缘”国家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改造自己，挤进欧洲一体化的列车时，他们彼此之间也并未因此发展出谅解和友谊。20世纪研究欧洲问题的权威学者托尼·朱特指出，现代东欧国家是从俄国、土耳其、奥地利和德国等帝国的崩溃中降生的，这个过程至今仍未完成。这些民族不久前还曾为相同的领土主张大打出手。他们之间不仅没有互补的经济，而且文化纽带也十分脆弱。社会主义政权刚刚垮台后举行的一系列调查显示，在波兰人看来，乌克兰人、德国人都十分不可信；在捷克人看来，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都不可信。这种观念并没有因为一体化而削弱。甚至，在苏联解体后的国家重建过程中，新政权还在通过强调过去的苦难加强民族主义意识。直到今天，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有关匈牙利族人的双重国籍问题，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语言之争，以及克罗地亚同斯洛文尼亚的海上边界之争都还没有解决。

他们应该完全信任主导一体化的西欧国家吗？一则捷克的流行笑话说，这个国家在未来只面临着两种



危险：德国人大量投资，完全控制了本国经济，或者德国人不投资，导致本国经济停滞不前。托尼·朱特说，在东欧做一个“欧洲人”并不容易。民粹主义者会指责你缺乏地方和民族感情；在本该对你表示认同的西欧人眼中，你最多不过是个值得赞美的“例外”。在西欧的语境里，欧盟的东扩一直拥有两种不同的声音。精英阶层强调文化的纽带、开拓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而大众始终怀疑“施舍”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意义，尤其担忧被那些东欧人抢走了饭碗。

从历史上去寻找欧洲认同的另一种危险更为可怕。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民族的神话》一书的作者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 Geary）指出，15世纪，教皇庇护二世（Enea Silvio de Piccolomini, 1405～1464）启用“欧洲人”这个词时，把它用在了与伊斯兰相关的语境下，用来描述欧洲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立。在他那封写给穆罕默德二世的著名信件里，他告诉这位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只要您继续坚持您的宗派，您不可能从基督徒，尤其是从欧洲人和西罗马帝国的子民这里，获得您所期望的荣光与权祉。”像庇护二世所尝试的那样，在与另一个可见群体的对立之下构建欧洲认同，在穆斯林正逐渐成

为欧洲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要塑造一个适应时代的积极的欧洲认同，欧洲的政治家们必须审慎地选择它所应当具备的元素。欧盟官方常常挂在嘴边的是，欧洲（欧盟）是“多元统一”的，它是“建立在当代标准和原则上，如基本人权和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统一体”。但在一体化的实践过程中，这种现代性的欧洲认同标准又无法摆脱历史的羁绊。土耳其1987年申请加入欧盟，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入盟谈判。以欧盟精英的眼光看，同意谈判出于许多战略考量。土耳其可以构筑欧盟东南部周边的“防火墙”，抑制来自土耳其境内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土耳其这座桥梁，欧洲可以链接中东和中亚；土耳其的欧洲化也是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强烈“信号”：欧盟不是“基督教联盟”，而是亲伊斯兰国家的“多元政治联盟”，以此缓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但2005年7月的民意调查表明，即使加上新入盟的10个成员国，仍然只有35%的欧洲民众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而反对者高达52%。由于历史上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冲突，伊斯兰被看作恐怖、毁灭、邪恶、乌合的野蛮人，是欧洲的“他者”，伊斯兰这种僵化的形象在欧洲人中间以无数的方式得到了强化。在近现



1.1953年9月28日，一名女工正在制作蓝底12星的欧洲委员会会旗，即今日欧盟盟旗的前身

2.1971年3月25日，布鲁塞尔发生比利时历史上最严重的暴乱，来自欧共体国家的8万名农民举行集会抗议农产品价格过低

3.1989年，罗马尼亚剧变中的抗议者与军队对峙

代，随着欧洲文明建立起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巨大优势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土耳其进一步被欧洲人他者化。民众对接纳土耳其缺乏必要的心理基础，可见欧洲的价值统一体的身份并没有成为共识。

疏离

英国脱欧公投结束后，谷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结果正式公布后的6小时内，英国人搜索的最热门问题排序如下：1. 退出欧盟意味着什么？2. 欧盟是什么？3. 有哪些国家在欧盟里？4. 我们离开欧盟会发生什么？5. 欧盟有多少个国家？与此相对应，欧洲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差异很大。在一次有关加入欧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欧洲舆论调查中，有高达91%的高层决策者承认本国受益于加入欧洲联盟，而只有48%的普通民众认为欧盟是件好事情。

对大众智识的批判显然不能成为解释这些现象的充分理由。1973年，《欧洲认同宣言》将欧洲公民权赋予成员国的公民，试图用政治参与的方式来强化欧洲身份。但显然直到今天，欧盟机构对于绝大多数欧

盟人来说依然是一个黑箱式的存在。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的英国历史学家大卫·莫奎德批评说，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布鲁塞尔一直在“政治赤子”中运转。

以精英政治起步的欧盟在过去60多年里始终未能在自己和欧洲和普通民众之间建立真正的政治勾连。民众远离决策层，根本无法参与到欧盟事务中来。

曾经拒绝签署《罗马条约》的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Mendès-France)就曾提到：“有两种方式放弃民主，实行内部独裁：所有的权力归一个人，或者所有权力都交给一个外部机构，后者以技术的名誉，实际上执行政治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欧洲一直处于这个预言中。以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发展需要专业化的管理为名义，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欧洲法院等欧洲机构陷于技术官僚统治。技术和法律专家们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小圈子，即可做出深刻影响整个欧盟区域民众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重大决策。这摆脱了代议机构和人民约束的基本欧洲政治逻辑。在竞争政策等市场规制领域，欧盟委员会不用通过欧洲议会或欧盟理事会，自己就能直接出台政策法规，施行于

欧盟地区。2014年卢森堡前总理让·克洛德·容克被任命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从民主选举的角度看，容克正处在一个不可能当选的时机。2013年7月，容克因为为卢森堡国家情报局的不道德行为进行掩饰而被迫辞职。该国情报机构为了商业利益泄露机密情报，存在系统性腐败。尽管如此，没有人对容克的当选提出异议。批评人士说，这是因为他得到了默克尔的支持，默克尔的话可以等同于欧洲法律。在容克组建的新欧洲委员会中，担任各职位的人都是像德国财政部长那样强硬支持财政紧缩的人物，尽管严苛的财政紧缩并不是欧洲各国的共识。

欧盟的决策也缺乏透明度。欧洲理事会的决定都是各成员国政府在幕后进行讨价还价，举行关门会议做出的。除了最后的成文决议和新闻稿外，外界无从得知其决策过程。一位英国欧洲议员曾说：“现在，如果英国首相在布鲁塞尔闭门磋商进行决策，那么作为议员的我根本无法让他做什么解释，因为我只知道结果，不了解过程……他可以随便告诉我什么。”

此外，欧盟决策过于复杂。基辛格曾经调侃：“当我想找欧洲的时候，我应该打电话给谁？”这对于欧洲人来说同样是个问题。欧盟不像民族国家有一个权力中心，该权力中心对政策结果负责，有明确的责任人。它的决策过程以网络的形式相互连锁。决策责任人、决策时间和政策范围都不清晰。

欧洲议会在布鲁塞尔占据100多万平方米的办公面积，除拥有751名议员外，还雇用了约1万名官员、助理和翻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试图以提升欧洲议会的权能来扩大民众对欧洲事务的参与。但这种改革并不彻底。《里斯本条约》通过后，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共同决策（co-decision）将成为欧盟决策的标准程序。同实行代议制民主的成员国议会比起来，欧洲议会的权力还是小得多，它没有立法提案权，也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立法权，它只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力。虽然欧洲委员会和理事会必须向欧洲议会提交工作报告，但欧洲议会对委员会只有不信任投票和拒绝批准预算案两种反对方式。在影响欧盟宪政全局发展和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上，除了接纳新成员国等部分问题之外，欧洲议会也没有多大影响力。而进行制度改革、界定超国家和国家职权的权力都还掌握在各成员国政府的手中。这解释了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1979年欧洲议会第一次直选投票率达到63%。1984年是61%，1989年是59%，1994年是57%，1999年跌至49%，2004年是45%。2009年欧洲议会耗资1800万欧元在电视、互联网上投放广告，试图激起公

众参选热情，但最后投票率却只有43%，2014年，投票率再次创下42.54%的新低。

民众对欧盟的政治疏离感在近些年的欧债危机中日趋强化。危机最为深重的国家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基本上都处于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这些缺乏民主合法性的机构的管理之下。至少10个欧盟成员国政府在没有与工会谈判的情况下就搁置了集体协议，在公共部门实施减薪。在去年欧元区领导人与希腊所进行的援助协议谈判中，两种声音占据了欧洲的公共舆论：一种声音认为，本国政府无权不顾民意支持贪婪、懒惰的希腊人；另一种声音则对默克尔政府对希腊的步步紧逼忍无可忍，指责欧盟已经被德国绑架，在粗暴干预希腊的内政。无论哪一种声音，都在怀疑欧盟决策的合法性，对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欧洲认同予以重击。

欧盟委员会前任主席雅克·德洛尔描述欧洲的困境：“你可以凭借个人的欧洲建设计划而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积极分子。但是每当面临新挑战时，你就会说：这不是我的欧洲观，我拒绝接受。或反之：欧洲应该以顺应历史挑战的方式来建设。”于是人们各执一词，分道扬镳。

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的英国历史学家大卫·莫奎德曾说，布鲁塞尔一直有一种这样的期望：“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于是，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技术官僚们忙于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即使《里斯本条约》得到了通过，但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从未进行过泛欧范围内的深入的公共辩论。当代欧洲领袖们刻意回避了那些棘手而又基本的问题：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于是，“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参考资料：《论欧洲》，托尼·朱特著；《欧洲认同的形成：功利选择与制度建构》，范勇鹏著）



一起寻找生活的可能



公众号：槽边往事 ID: Bitsea

作者：和菜头

签名：我所说的每一话，都是错的

帝国·超国·碎片：欧洲联盟的内在悖论

文 / 刘怡

在设计之初，它是一个与美苏三分天下的帝国；在东扩之后，它是一个界限含混不清的超国家存在；在全球化的表征之外，它又带有突出的碎片化特征。三个角色之间的疏离，构成了欧盟的内在悖论。

科耶夫的“拉丁帝国”

俄国革命后的第三年，亚历山大·科热夫尼科夫（Aleksandr Kozevnikov）从莫斯科逃了出来，到海德堡跟雅斯贝尔斯读博士。24岁之后，他移居巴黎，一边在兼职的图书馆大读从德语、梵文到藏语的各路语言学著作，一边在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PHE）给雷蒙·阿隆、拉康、梅洛-庞蒂们开设黑格尔讲座课。“二战”爆发时，这个俄国流亡者已经把姓氏改成了法国味更浓的“科耶夫”（Kojève），并且对巴黎流俗的市井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刻薄气实在忍不下去了。他加入了抵抗运动，托庇于过去的学生马若兰，在战后的法国对外经济关系总司谋得了高级顾问一职。后来当上总理的雷蒙·巴尔那时只是一个小科员，这位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由衷赞叹，前半生一直在和哲学打交道的科耶夫“乃是法国（在外贸方面）最杰出的谈判代表”。而一生以喜剧演员自居的科耶夫不仅参与了从“马歇尔计划”到缔造欧洲经济共同体（EC）、关贸总协定（GATT）的一切重大谈判，还曾经作为戴高乐的信使密访中国，直到1967年突然病逝在欧共体的布鲁塞尔会议上。

作为20世纪最富影响力也是最神秘的思想家，科耶夫在观念领域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他第一次系统阐发了“历史终结”的必然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均质国家”状态。当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结束之际提出他关于“历史终结”的学说时，其所有的理论渊源和叙述逻辑都是从科耶夫而来。但仿佛是为了呼应“喜剧演员”的自嘲，这位流亡的天才、杰出的谈判代表在政治领域的遗产却是与“历史终结论”颇有冲突的，这就是撰写于1944年秋天并在不久之

后呈递给戴高乐的《法国国是纲要》。

今天的政治学研究者将《法国国是纲要》公认为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最初设想，但它的最初立足点却是现实而冷酷的。在科耶夫看来，由于技术环境尤其是经济规模的变化，单一民族国家意图保全其政治存在或整体地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已经不可能了，正如希特勒不可能建成那由单一民族统治的“大德意志帝国”。但在政治状态消解或者说“历史终结”到来之前，会有一个中间阶段；在这一阶段，民族国家已经“不够大”，不足以维持其政治和经济独立，只有那些由若干加盟民族国家构成的“新帝国”才有可能继续生存下去。而在苏联和美国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帝国（苏东集团和英美联盟）之后，法国要保持政治独立性，也需要建立一个基于自身政治一军事能力、经济规模和文化传统的帝国，这就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拉丁帝国”：它包含西班牙、意大利这两个拉丁伙伴以及地中海对岸的西北非法属殖民地，拥有统一的武装、一体化的经济 and 相近的观念以及生活方式；即使在规模上不足以和美苏两个帝国相对抗，至少可以保持中立，不至于沦为附庸。

当然，就像凯恩斯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预见德国复苏的必然性一样，科耶夫也把德国问题视为法国的肘腋之患。他的方案是把德国变成一个完全经济性的存在，变成拉丁帝国的附属品：德国除本土开采的铁矿石外，禁止买卖铁矿石，也不准炼钢；德国每年向法国出口煤炭以换取建设所需的成品钢材，煤钢交换须按照固定比例，除偿付德国对法国的“二战”赔款外，还要保证德国不具备军事再武装的能力。这就是后来欧洲煤钢联营（ECSC）的雏形。同样是出于安全考虑，德国也不准大规模生产硫酸，农业所需的化肥同样要以煤炭自法国交换。这样一来，德国实际上就沦为了法兰西“拉丁帝国”的煤矿。而一个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适度强大的拉丁帝国将打消英美集团重新武装德国或使德国经济重新繁荣的必要性：按照科耶夫的理论，这意味着德国无法成为英美帝国的一部分，它又无法独立存在，只能对法国妥协。

作为帝国构想的（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大支柱，科耶夫花了相当笔墨来描述他所谓“拉丁民族共有精



德国汉诺威地区一家煤矿的工人正在进行人工压块作业（摄于1923年）

神”——基于天主教传统和对“美”的喜好的生活方式。这种天主教传统当然是形式大过实质的，科耶夫想要汲取的是其中区别于英美新教资本主义精神的那些部分，那些更加倾向于“美和悠闲”的部分。它们不仅构成拉丁帝国的精神内核，甚至也是历史终结之后“普遍均质国家”的公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对应着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闲暇者的沉思生活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的人性化（科耶夫本人是个公开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远比福山笔下庸俗堕落的“末人”来得可爱可亲。也只有基于这种理念组织起来的分配方式，才有可能在帝国内部的市场正义和跨民族的身份平等之间达成平衡，避免它滑向积弊重重的英美自由资本主义或均平野蛮的苏联国家主义中的任何一种歧途。

柏林的“新欧洲”

如果说今日的欧洲联盟与科耶夫在理念上构想的“拉丁帝国”、在实践中参与创建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有何差别的话，那么“法德双核”便是最突出的一项。在拉丁帝国的蓝图中，法国是灵魂，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西北非的地中海沿岸国家是伙伴，英国是值得警惕的假想敌，而德国只是个无灵魂的煤矿。某种程度上，德国也确实是无灵魂的——“二战”后的新德国是秩序自由主义的产物，任何一种带有显著民族主义或者特殊地域感情的符号在这里都被禁止了，剩下的只有哈贝马斯所说的“马克民族主义”。

诚如布热津斯基所言：“法国寻求欧洲的转世再生，德国则希望通过欧洲而获得救赎。”这种“救赎”

在“二战”结束之际意味着积极参与重建并承担安全和经济义务，以便恢复其道德和政治上的信誉。而在“冷战”结束、欧洲一体化进程进入新阶段之际，德国需要在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的欧洲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与科耶夫生活的时代不同，20世纪最后10年的德国在经济上已经把法国抛在后头，与美国和“北约”的特殊关系也使得它不必仰赖法国的军事保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在欧盟东扩的过程中找到了塑造共同体内部政治秩序的新动力——如果说旧欧洲的“心脏”在西侧，在科耶夫所说的“我们的海”（地中海）周边的话，那么德国就是在剧变后的中东欧建立起了新的势力范围。对法国而言，这些国家进入欧洲完全在其意料之外，拉丁帝国也好，旧的欧洲共同体也好，都是以欧洲东西分裂作为前提的，法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是其获得共同体领导权的保证。但在一个更大的、统一的欧洲中，这些保证变得不够了。越来越强大的德国正以赞助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尝试在中东欧建立共同市场，并在将其纳入欧盟的过程中提升自己在联盟内部的影响力。从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到乌克兰甚至白俄罗斯，东扩后“重归”欧洲的各国显然更易于接受德国的领导，于是德国令人惊讶地超越了“马克民族主义”，变成了一个更大、更统一的欧洲的倡导者。

但这幅“新欧洲”蓝图，本质上仍是去政治化的经济绩效作为许诺的。1991年两德统一之际，法国和英国曾经为柏林是否会第三次成为欧洲大战策源地表示了担忧。科尔总理的回应是给出了一个足够有经济吸引力的承诺——德国不仅不会追求在脱离“大欧洲”的情况下自行其是，而且愿意与法国的南欧伙伴以及随后加入进来的东欧各国分享经济繁荣。换言之，这是一种变相“贿赂”：德国以充当经济“奶牛”作为换取法国同意两德统一的先决条件；由于不能脱离欧洲单独行事，柏林本身也更愿意描绘经济前景的美好，以抵消不能作为民族国家单独行事的缺憾。

类似希腊这样的不合格成员国，正是在德国的纵容下钻进了欧元区：1998年，对一体化前景信心十足的柏林力排众议，吸纳贸易和货币状况并不理想的希腊加入欧洲汇率机制（ERM）；3年后，德国又“保送”希腊成为欧元区正式成员国。在那之后的8年里，柏林主导的欧洲货币联盟（EMU）始终让希腊享受极为低廉的借贷成本，使该国能够以远低于正常水平的利率从外国借债。德意志银行（DB）前首席经济学家托

马斯·迈尔在2009年抱怨说：“德国好像在欧元区张罗了一桌大宴席，他们出售食物并提供贷款，结果客人们喝醉了、吃多了，德国人手里攥着一大堆账单不知该找谁买单。”

但除此之外，德国人又能有何种出路呢？他们不能谈“帝国”，不能谈“民族”，甚至不能谈过去100多年的欧洲政治史。在类似科索沃战争和乌克兰危机这样的局部冲突中，德国人只能吆喝一个抽象的概念“人道主义危机”，却不敢像普通国家那样提及“民族冲突”“种族对立”。这不仅是因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一次大屠杀就是由德国人所酿成，更是因为任何涉及民族的议题都会招来“德国人是否希望逐步凸显其主体性”的议论。为了避嫌，柏林只能用一种超国家的梦幻言辞对他们的真实政治意图进行包装，甚至以“去政治化”的经济愿景来达到伸张政治目标的企图。已经发酵的难民危机便是一个例子：世上或许没有第二个国家像德国那样担心背上“见死不救”的恶名，柏林几乎是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背上了这副吃力不讨好的重担。从这个意义上说，过于关注国际舆论和外界反应的德国，也可算是某种程度上的“不完全大国”。

全球化与碎片化

作为最近1/4个世纪里新一波全球化的经典样板，欧盟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成功有时会让我们忽略另一项事实：尽管传播手段的变化使全球各地的人们关注的问题更琐碎、更平面、更相通，但碎片化的情形也在发生和延续。公投脱欧的英国本身面临着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独立浪潮，法国有科西嘉问题，西班牙有加泰罗尼亚问题，比利时同样存在分裂的可能。在科索沃、东帝汶和南苏丹相继获得独立之后，没有人再觉得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地区会因为太小而无法作为独立的国家维持下去。与异质文明的频繁接触，甚至还会促使我们去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进而产生类似“远距离民族主义者”这样的奇特现象。

在很大程度上，碎片化是全球化的衍生物和附带结果。面对伴随全球化大潮而来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那些无法为其所说服，或者因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转型而承受了政治和经济创伤的个人和群体，会更倾向于维护乃至弘扬本文明、本民族、本地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那些涌入欧洲的中东难民每每成为恐怖主义宣传的俘虏，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其不能，或拒绝与本地社会相融合。而近年来在西欧涌



与异质文明的频繁接触，甚至会促使我们去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进而产生类似“远距离民族主义者”这样的奇特现象。

现出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刚好构成其镜像——在法国，由让-马里厄·勒庞创建的右翼组织“国民阵线”近年来在多次选举中表现活跃，该组织所标榜的政治信条便是反全球主义，反美国式的经济文化帝国主义。2000年左右，“国民阵线”的发言人在接受《经济学家》杂志采访时曾经表示：一种由美国人首创的“毁灭性文化帝国主义”，一种行为方式、消费方式、思想习惯和经济哲学方面的“全球标准化”，正在使欧洲各民族逐渐丧失自我意识；法国右翼正是在捍卫“我们的民族自我意识，保护多样性免遭标准化的毒手，反对毁坏家庭和民族的全球主义”。卡斯特罗式的左翼民族主义思想在拉丁美洲昌盛一时，同样是全球化的对立面。

不仅如此，劳动力流通的全球化 and 跨国公司势力的扩张，同样会激起以全球化本身为攻击对象的激愤情绪，这一点在英国的脱欧公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大企业及其传媒喉舌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留欧一方，原因是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带来的利润足以满足其逐利动机；而中小企业、蓝领工人和老年人往往是脱欧的拥护者，也是“全球化会毁了我们的饭碗”这类激进观点的拥护者。勒庞的“国民阵线”以及唐纳德·特朗普的白人失业流浪无产者拥趸们和他们站

在一起。拿《时代》周刊的话来说：“这个时代存在着对世界一家观念的极端恐慌者和政治上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拒绝接受要以一定程度上的动荡和紊乱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物质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升。100年前他们试图捣毁机器，如今则想阻止劳动力的全球再分配。”

作为全球化的助推者，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也提供了组织反全球化力量并宣传其信念的利器 and 捷径。甚至可以说，网络社群已经变成了大多数反全球化主义者维持其沟通和存在的必需工具。国际关系史家盖伦施塔特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威尔士语以及挪威北部方言等小语种传播和推广的情况要明显好过此前100年，原因是电视台、无线电台和互联网的普及使这些语言的使用和推广者自发组织到了一起。许多分散的、难以用实体组织加以团结的个人或小群体，已经有可能建构那种此前只有政党、社团或工会之类大规模组织才能拥有的广泛社交网络，并形成足以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的虚拟社群。相对于“他们是谁”，这些人或许更关心“我是谁”——这便足以解释为何在难民大潮的冲击过后，“向右转”的幽灵开始在欧洲上空徘徊。☑

《读书》2016年第六期目录

盛洪 通古今之变

范勇鹏 这个世界会好吗？

詹福瑞 学者的魅力

孙郁 “多”通于“一”

王汎森 袁一丹 满眼都是“现在”

短长书

重读荒芜的打油诗（邵燕祥）·“吹捧

李何林的反革命骨气”（白维国）·置

身事内的艺术批评（符鹏）

李零 说“解构永恒中国”

刘永华 乡土中国，有多“乡土”？

聂锦芳 “到马克思的故乡去！”

刘文瑾 现代性与犹太人的反思

闻一 没有国界限制的战争

黄乔生 周邦信札与“黄学”研究

杨新宇 影史留名《王老五》 喜剧

悲心蔡楚生

品书录

人类的可能与不可能（冯庆）·赋予

信仰以自由（陈斌）·何谓公职的傲慢？（李石）

程虹 风，在海上漫步

张宗子 梦中的忽必烈汗

杨渝东 韩国的政治化宗族

刘天骄 全球史与国际法视野中的

《独立宣言》

朱也旷 列维坦的伟大不在于，而在于

杨鹏 愿力与艺术同在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恐慌的时尚产业

文 / 杨聃

对于脱欧造成的种种不利，整个时尚业弥漫着恐惧的气氛。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一出，时尚产业再也无法沉默了，他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对这一结果的感受——彻头彻尾地失望。《Love》杂志主编、英国设计师凯蒂·格兰德(Katie Grand)表示：“我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对自己身为英国人感到如此的不光彩。”

早在6月初的伦敦男装周上，一系列表态的声音就在间歇性地发出。设计师丹尼尔·弗莱彻(Daniel W. Fletcher)在官方场地外举办了一场不在日程上的秀，模特们并没有像在T台上那样全副武装，而是身穿印着“Stay”字样的休闲服围坐在街边，手上拉着欧盟的旗帜和横幅。

弗莱彻并不是唯一的发声者。Sibling走后，品牌创始人麦克里瑞(Cozette McCreery)和布莱恩(Sid Bryan)也穿着胸前印着“In”的简洁白色T恤，出现在最后的谢幕仪式上。从事时尚的人约定俗成地认



左图：模特们身穿印着“Stay”字样的休闲服围坐在伦敦街边

右图：麦克里瑞和布莱恩穿着胸前印着“in”的简洁白色T恤，出现在伦敦男装周最后的谢幕仪式上

为：我所穿的衣服就是我最真实的态度。

更早前，“西太后”维维安·韦斯特伍德 (Vivienne Westwood) 在 Instagram 上放了一张自己穿着印有信息的白T恤照片。T恤上的信息呼应每一个人都应该注册并投票，“不要让年老的一代决定你的未来”。Burberry 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贝利 (Christopher Bailey) 与 100 多位商业精英联名签署了在《Times》公开发表的意见信，声称：“留在欧盟的英国会更强大，更安全和富足。”

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大尺度的表态了，很多时尚品牌心里虽然有自己的小算盘，却不能对脱欧这件事情做出明确的表示，就像对 2014 年的苏格兰公投一样。毕竟，冒犯客人就不好了。那年，英国时尚产业对本国贡献约 260 亿英镑。

公投之前，英国时装理事会于 500 名会员举行了

一次内部投票。得到的 290 位回应中 90% 支持留下，只有 4.3% 的支持离开，其他表示还未决定或者不做投票。除此之外，英国创意产业联盟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Federation) 96% 的成员，包括在伦敦艺术大学等机构也都支持“留在欧盟”，然而最终公投的结果却事与愿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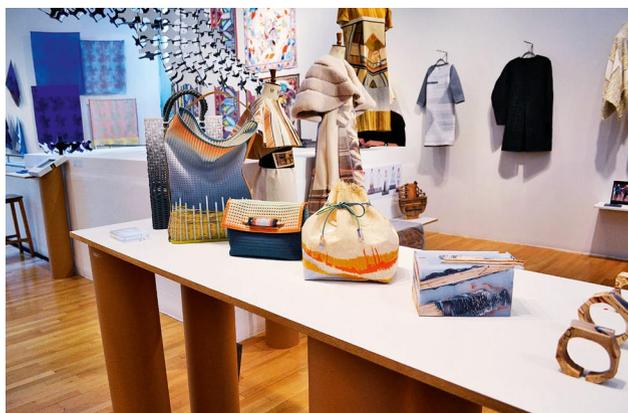
“我们的设计师内部对于英国留在欧盟有着压倒性的支持率，毫无疑问，他们对今天的结果会非常沮丧，这更会激发我们与在欧盟的朋友、合作伙伴与商界同仁建立联系。”英国时装理事会的首席执行官卡罗琳·拉什 (Caroline Rush) 对 Elle 网说，“如今我们又多了一个新角色：在英国即将离开欧盟的几年里，我们要不断更新信息，保证让政府了解我们产业的优先事项，让设计师群体了解任何可能影响他们商业的因素。”



1



2



3

1. 英国时装设计师维维安·韦斯特伍德呼吁每个人都应该注册并投票

2. “伦敦风”的男士着装风格

3.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毕业作品展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英国时尚业为何对脱欧产生如此低迷的情绪，显得合情合理了。6月24日，英镑对美元汇率一度暴跌至1985年来最低水平。欧元兑美元汇率同样下跌至该货币启用后单日最大跌幅3.3%。Burberry、Mulberry、Jimmy Choo等公司股票早盘重挫，蒸发市值1220亿英镑。

事实上，受损的不只是英国的时尚产业。引用时尚头条统计的数据，截至6月24日下午，LVMH股价跌近6%，德国运动品牌阿迪达斯跌近5%，Dior最惨重下滑超过7%，法国欧莱雅集团跌4.6%，瑞士钟表珠宝集团历峰跌近7%，在香港地区上市的意大利品牌Prada下跌近4%，创今年4月以来的新低。

虽然这一状态必将会慢慢有所好转，但桑福德·伯恩斯坦（Sanford Bernstein）高级研究分析师马里

奥（Mario Ortelli）表示：“‘脱欧’最大的影响是增加了市场波动性，而市场本身就已经很不稳定了。这意味着消费者信心将进一步下降，从奢侈品公司的股票交易表现来看的话，‘脱欧’将继续推动市场持续下跌，奢侈品公司估值或将在短期内、在这片不确定中摇摆。”

的确，英镑的贬值首先对时尚业以及其他所有行业的市值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其次，对其盈利底线也会造成危害。英国品牌与零售商的大量生产造就已经外包给诸如中国等使用美元进行付款的国家。金融服务公司UBS瑞银集团的数据显示，英国服装和家居零售商约3/4的采购来自亚洲，英镑疲软将使得这类交易成本提高。

以Burberry为例，品牌产品大部分都在意大利

生产制造。据 Sanford C. Bernstein 的数据显示，Burberry 65% 的销售成本是以欧元结算的。为了保持其“Made in Italy”的品质，英镑贬值将造成 Burberry 的原材料采购和生产成本大幅上升。“诸如此类的英国企业要么自负成本，要么将其损失转移给消费者。”桑福德·伯恩斯坦高级分析师布鲁诺（Bruno Monteyne）对《金融时报》说。

然后英国消费者受到英镑贬值和物价飞涨的影响，也将减少对自拥财富的信心。欧睿国际（Euromonitor）奢侈品分析师罗伯茨（Fflur Roberts）认为，这或将限制英国人在海内外的开销，尤其是在美元强势的地区进行消费，挫伤英国与同质类国际时尚品牌。

“我认为产业必须准备好面对更大的需求紧缩，”巴黎银行证券部（Exane BNP）奢侈品负责人索拉卡（Luca Solca）表示，“如今动荡的局势将在接下来的资产市场调整后不断加深。时尚产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努力减少成本与资本支出。”

脱欧带来的贸易规则的改变，也将对成千上万在英国境内开设的时装公司产生影响。据英国贸易与工业部数据显示，2015 年英国纺织品与服装对欧盟出口总额高达 58 亿英镑。这一体量在增加了关税的背景下，会变成怎样？

然而，脱欧支持者争辩道，英国将因此能对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就像非欧盟成员国挪威那样。如此一来，在全球市场交易中依然可享受有利的贸易条件。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Roberto Azevêdo）对这种想法给予警告：“几乎所有的英国对外贸易都或多或少地要以某种方式进行谈判。”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任何重新谈判都可能是“打持久战”。同时，马里奥暗示，“任何额外义务、任何对贸易的可能障碍，对奢侈品行业来说都是件坏事”。

“对我们来说，一切并没有结束。”Walpole 的首席执行官米歇尔·爱默生（Michelle Emmerson）说道，“现在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刻，但有质量的产品一直会有市场，英镑的下跌让我们短期内或许能看到一些出口上的好处。但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会留在欧洲市场，并敦促政府在重新谈判时把奢侈品行业放在心上。”该公司代理众多英国奢侈品牌。

英国之所以成为时尚的中心之一，因为这里聚集了各地的人才。那些在时装周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尤其在女装领域，都不是英国本土人。英国时装理事会

2015 年新晋最具成就设计师奖得主玛丽·卡特兰佐（Mary Katrantzou）是希腊人。Felder Felder 的达妮埃拉和安妮特·费尔（Annette Felder）是德国人。洛克山达·埃琳西克（Roksanda Ilincic）是塞尔维亚人，最近剑桥公爵夫人穿着她设计的色块拼接连衣裙，出席了伊丽莎白女王 90 岁生日的街头聚会。

同时，欧盟开放的边界让 Celine 这样总部设在巴黎的品牌可以在英吉利海峡两端正常运作。然而，英国退出欧盟，品牌们就要掂量一下在何处建立总部或创意部门了。虽然脱欧不会导致“所有持英国签证入境的欧盟人士返回”，但它必将影响其与欧盟其他地区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

常驻伦敦的设计师克里斯托弗·凯恩对《纽约时报》说：“公司所有技艺高超的裁缝均来自意大利和欧洲各地，我们共同合作五年了……如果要付签证费用的话，那得是多少钱啊？”不仅如此，像时装周这样往来英国的商业活动是否会有新的阻碍，要取决于未来几年的协议。不过，英国时装理事会对 Elle 网确认今年秋季的伦敦时装周将照原计划进行。

不得不说的是，脱欧对伦敦全球著名的时装教育体系来说也没什么帮助。伦敦著名时装院校吸引了来自欧盟各国才华的学生，这些欧盟学生支付的学费要比来自其他地区的国际学生要少。欧盟拨出科研经费、诸多计划支持创新并为时装设计师、制造商和技术合作伙伴牵线搭桥，这都使英国时尚教育获益不少。

目前，皇家艺术学院有来自超过 65 个国家的学生。“这体现了学校的国际影响力，我们的伙伴关系和合作项目，使我们成为世界头号的艺术与设计学府。”布罗茨女士表示，“如果英国退出欧洲，我敢打赌学校的排名一定会下跌。我们的学生需要的是减少障碍，而不是增多。”

通常毕业的学生会选择留在英国建立自己的时装品牌。如果这里的生活和工作成本增加了，很可能他们会转向巴黎或米兰。《华尔街日报》写道，这可能为法国和意大利的时尚品牌创造了机会，即使它们已经占了全球奢侈品市场的一半了，还是可以期待获得更进一步的市场份额。最后，如无某种特殊协议，英国设计师和品牌还将不享受欧盟单一专利的权利。■

（本文参考了《纽约时报》《Racked》《时装商业评论》的相关报道）

英国，精英主义与实用精神的结合

文 / 苗千



由牛津大学男生组成的“布林顿俱乐部”

英国人谈到“精英主义”(Elitism)，通常会把它与私立学校(Private Schools)与牛津剑桥(Oxbridge)联系在一起。一个典型的英国精英，应该是出身于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从小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大学只能是毕业于牛津或是剑桥其中的一所，随后在伦敦做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样的形象在社会阶层固化严重的英国当然容易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感，在媒体中出现“精英主义”这样的词语，通常都是与贫富分化、教育和财富不平等负面社会议题联系在一起。2014年在一份由英国政府主导发布的社会研究报告中也指出，英国是一个“精英主义”深重的国家。

刚刚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对此曾评价说：“你只要看一下议会中的高层人员、大法官、军队、媒体从业者的背景，(就看得出背景)并不具

有多样性，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它所需要的流动性。”这位英国政治精英在直言不讳的同时，并没有提到他自己正是英国精英阶层的代表，他的经历也正是英国上层阶级的典型经历。从英国最著名的私立男校伊顿公学毕业，然后进入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专业(也就是牛津鼎鼎大名的PPE专业)学习，为自己日后在保守党和英国政坛的发展铺路。也是在牛津大学上学时，卡梅伦加入了大名鼎鼎乃至臭名昭著的“布林顿俱乐部”(Bullingdon Club)，这家俱乐部是由家境最为优越、非富即贵的牛津学生组成。而进入政坛之后，卡梅伦也曾对人坦言，自己是“含着两把银勺子出生的”(意为自己的出身极为优越)。这样的精英面孔，自然难以获得普通大众的善意。据统计，英国22%的音乐人和13%入选了国家级足球队的球员接受的都是私人教育。

“精英主义”在英国正成为一个愈发敏感的词语，英国媒体对于精英主义通常持批判态度，这无疑是一种最为稳妥和政治正确的态度。英国的社会评论家们认为如果社会中的顶级工作实际上只对国内很狭窄的一部分“精英”开放，对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绝非好事。但英国人对于精英主义的态度远非一味反感这样如此简单，精英主义精神也绝非只在传统意义上的英国的“精英分子”之间存在。可以说，长久以来精英主义精神已经成为英国国民精神的一部分，精英主义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弥漫在整个国家、可以取悦社会上所有阶层的情绪，使整个国家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精英主义气质。原因之一就在于英国的精英教育和精英主义精神源远流长，精英主义甚至被认为是“英国最好的出口产品之一”。

即使是在流行的影视作品中，英国演员通常也很容易给人留下受过良好教育、出身高贵、举止优雅的深刻印象，就连英国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所扮演的杀人狂都具有一种深刻体察人内心的独特魅力，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光是凭借一口英国腔就俘获了全球大批的“粉丝”，更不用说《007》和《王牌特工》这类英国气息浓厚的商业大片中，为国效力的职业杀手都要出身牛津，执行任务时也要穿着

私人定制的礼服。

根据 2014 年的社会调查，实际上英国社会中只有 38% 的国民接受了大学教育，只有 1% 的人从牛津或剑桥毕业。相比于普通民众，英国的精英阶层代表英国形象的机会固然更多些，另一方面，“精英”也几乎就是所有英国国民对于自己在全世界中的角色定位，这也正是精英主义在英国根深蒂固的深层原因。

英国的精英主义精神中，勇于献身和实用主义乃是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英国的精英分子绝非人们想象中一贯养尊处优不谙世事的贵族老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相比于英国士兵平均 12.5% 的死亡率，习惯在战场上冲锋在前的英国贵族死亡率高达 20%。另一方面，英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对外也通常表现为极端灵活的实用主义，在 1949 年，因为担心当时占据的香港会被新中国以武力收复，作为西方阵营重要一部分的英国甚至比苏联更早承认新中国。英国的外交政策，用 19 世纪的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 (Lord Palmerston) 的话来概括，就是：“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我们没有永远的敌人，我们只有永远的利益。”

英国的精英主义精神对外可能表现为自命不凡和趾高气扬，也可能表现为更为微妙的自我嘲讽。对于英国的独特性，例如英国天气、文化，英国人的性格，乃至英国的政治制度毫不留情面的自我嘲讽，实际正是英国人自认为是世界“精英分子”的一种强烈自信。对于英国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政治制度，调侃得最为彻底的，莫过于英国的政治喜剧《是，大臣》(Yes, Minister) 和其续集《是，首相》(Yes, Prime Minister)，这其实也正反映出英国人对于自身政治制度的珍视。剧中主角，内阁秘书汉弗莱·阿普比爵士 (Sir Humphrey Appleby)，其实正是英国人心目中正在运转这个国家，也是最合适运转这个国家的精英人士。

阿普比爵士毕业于牛津大学，学习古典 (Classics) 并取得了一等学位，希腊文和拉丁文张口就来，擅长玩弄政治手腕，经常用超长的拗口长句来故意绕晕首相，最终实现自己的目的，实际上这些让听众大笑的长句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它反映出英国精英阶层对于英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认识，在英国一人一票投票决定退出欧洲的当下读来反而更有一番味道。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阿普比爵士作为内阁秘书已经工作了 25 年，服务于两党中轮番依靠竞选

上台的各位首相 (剧中的首相则是毕业于略逊牛津一筹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拿的是三等学位，但阿普比爵士认为这样的学位对于一个首相来说已经足够了)。

阿普比爵士在剧中对于英国民主制度和欧洲共同体精英主义腔调的嬉笑怒骂在当下听来仍不显得过时：“自从 1832 年以来英国的公务员制度就开始逐渐把选民排除在政府决策之外。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地让他们每 5 年才投票一次，决定哪一伙小丑来干预我们的政策 (政党经常轮换，但公务员制度相对稳定)。”

“首相，在过去的 500 年里英国始终有统一的政策目标，就是制造一个分裂的欧洲，因此我们才和荷兰人一起与西班牙人作战，联合德国人对抗法国人，与法国和意大利人共同对付德国人，然后又与法国人共同对抗德国和意大利人，再分而治之。你看，既然这个政策这么有效，为什么要改变它呢？(欧洲共同体) 就如同联合国，有越多的国家加入，就会导致越多的争执，它也就变得越来越无能。”

剧中阿普比爵士的言论，正是反映了英国的精英阶层与欧洲大陆若即若离、更愿意保持英国自身独特性的微妙心理。在英国反乌托邦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名著《1984》中勾画了三个假想中永远在作战的超级国家，这三个国家的疆土划分却是在世界地图的基础上勾画的。书中故事的发生地伦敦，已经成为“大洋国”与“欧亚国”对战的最前线——把这张地图套用在真实的世界地图上，则是英国已经与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和加拿大合为一体，对抗不断向西吞噬了整个欧洲大陆的俄国。这本书大概可以看作在“冷战”背景下 20 世纪 40 年代英国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世界未来走向的悲观预测，或许也可以看作对于欧洲大陆的一种不信任态度。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英国的国民性：英国的国民精神具有某种二重性，越是在国民心目中坚定的、引以为傲的东西，越是令他们感到警惕和随时反省。正是这种二重性使英国人一方面以精英主义为荣，偶尔甚至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傲慢姿态，同时又使他们毫不留情面地自我解嘲。他们一方面以英国传统悠久的民主制度自豪，另一方面又时刻警惕着这种制度可能造成的民粹主义恶果。他们的爱国情怀一方面表现为始终坚持自身的独特性和独立，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极其灵活、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独特的二重性造就了这个岛国国民的独特性格，维持了这个国家在全世界的“精英”地位。■



脚踏缝纫机的裁缝在北京胡同里发出“嗒嗒嗒”的声音。这种为居民提供便利的缝纫服务已经不多见了

城市声音

被忽略的听觉风景

记者 / 丘濂

我们通常会看，
而不是去听所生活的城市。
于是那些内容丰富的声音细节得不到关注，
声音环境不断恶化也得不到重视。

打开耳朵

声音艺术家殷漪曾经在一次展览上放置过一个叫“交通信号灯”的作品。观众可以听到20个城市中与红绿灯相伴的提示音。它们的音效、频率、音高、响度都不一样：东京是一种“啾啾啾”的高亢鸟叫，香港是“嗒嗒嗒”平稳的机械音，同样是在中国内地，有的地方是“嘟嘟嘟”，有的城市是“叮叮叮”，还有的干脆就是一种呆滞刻板的人声：“现在是红灯，请不要闯红灯。”

8年之前，殷漪开始做实地录音，这是他从海量声音素材中找寻到的一个有趣现象。“为什么世界范围内，信号灯的样子都相对统一，声音却各不相同？正是因为我们以一种视觉中心主义来建构周遭，对声音不够敏感，也缺乏标准，这反而让我们的声音环境有了无比丰富的可能。”

描述视觉景观的词汇不胜枚举，关于听觉内容的形容词却乏善可陈。视觉具有优先地位有着合理的生理学构造解释——视觉到大脑的神经通路长约5厘米，听觉神经在9厘米左右。视觉神经通路短，是五官感知中最为直接迅速的，可以帮助人们立刻判断情况，做出决定。

在某些地方，视觉信息并不是人们行动的首要依据。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声音研究者王婧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里，由于植物遮天蔽日，能见度不高，居于其中的卡鲁利人完全通过听觉来形成认知系统。在那里进行考察的美国人类学家史蒂夫·菲尔德发现，当地人会模





(Pan.J.C. 摄)

声音艺术家殷漪在上海做实地录音

仿不同鸟鸣来表达情绪，不同鸟类声音具有不同隐喻。但毕竟这是一个极特殊的环境，我们生活的社会完全以视觉为导向来建造无可厚非。“人类有种求得安全的本能。视觉有保护性，不想看闭上眼睛即可；听觉则是脆弱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们，躲避不掉。”

“视觉虽然列于五感速度之首，但就品味而言，听觉却在视觉之前。”清华大学声学实验室主任燕翔这样补充说。燕翔平时爱好诗歌，实验室的墙壁上挂着清华园的景色图片，下面配有他题写的古诗。“你想想看，在古代成语中，大多文辞听觉在前，视觉在后，听觉的境界更高一筹。如声色俱厉、声色犬马、绘声绘色……事物一旦具象，品味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无论怎样辩驳听觉的重要，都改变不了听觉受到漠视的事实。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声学研究所所长李国棋曾组织学生做过北京市民的声音意识调查，结果显示年龄越大的受访者能够回忆出每天听到的声音越多，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反而听到的声音较少。这实际上是一种“鸡尾酒会效应”的表

现——如同在一场嘈杂的鸡尾酒会上，人们彼此依然能够谈笑风生，因为听力具有强大的选择能力，总是在听想要听到的声音，而忽略掉其他声音。“这样的后果就是人们毫无顾忌地向周围倾泻着各式各样的噪声，却对不断恶化的声音环境浑然不觉。”

李国棋开了一门很受欢迎的全校公选课程“音响教育”，不是为了培养专业的音响师，而是能够提高大家对声音环境的关注度。“我们拥有耳朵，它也一直在听在用，但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李国棋说。他会给学生们布置若干练习来培养一种“具有批判力的听力”。从最简单的将所听到的声音列表在纸上来训练一种听取习惯，到回忆住处一些令人不快的干扰声，看看怎样才能将它们去除，再到如何运用各种音响的搭配，设计一个声音美妙的公园。

王婧时常会带着学生去做“声音行走”，一边走一边聆听和录音。一次行走过程，学生最大的收获是学会如何聆听。王婧告诉我，最开始学生总会寻找一

些“奇异景观”的声音，比如浙大里有一片湖面，湖上有黑天鹅，有的同学就会去录鹅的叫声。“这还是视觉逻辑下的倾听。图像是具有表意性质的，声音经常是弥散的、激发式的，没有明确的指向意义。并且看就是几秒钟就能获得信息，听则需要花费时间。”另一位学生去录了食堂里炒菜师傅摆弄炉灶的声音，从点火、调大、拧小再到关火的全过程，这在王婧眼中，因为具有聆听的耐心而十分难得。

一声一城

如果聆听方式得当，不难发现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独特音轨。就是在全球化和同质化日益严重的今天，从声音的角度去观察城市，也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与西方相比，中国是个“大声之国”——人们毫不介意在公共场合肆意发出巨大声响。这固然是人们素质的体现，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不存在“私人空间”的概念，“公”与“私”之间的界限模糊。“一方面它嘈杂不堪，另一方面那些声音细节也充满了活力。对比起来，你会觉得有的欧洲城市死气沉沉，甚至有点寂寞。”秦思源说。

2005年，在担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策划部主任期间，秦思源发起了“都市发声”的项目，邀请英国的若干位声音艺术家来到北京、上海、重庆和广州四座城市，采集当地声音进行创作。他陪着足迹遍布世界的音乐人彼得·科萨克去北京南城的红桥市场和天坛公园一带做实地录音，目睹了他的兴奋和激动。在回忆文章中，科萨克写道：“这是一个充满循环声音的城市。随处可见大音量扩音器里炸出广告口号，与隔壁播出的音乐先同步继而异步。戴着竹哨的鸽子在上空飞翔时发出怪异的和声，公共汽车刹车时发出刺耳的尖叫，出租车的里程表对着你说话，炒菜的锅噼噼作响。公园里有上百名老人组成的合唱团唱着革命歌曲，其他则赛着笼子的鸟叫，跳着交谊舞或耍太极。而在最吵闹的地带，仍然可以找到全然的宁静——风吹树叶声都能听见的那种。”

秦思源在北京生活多年。他认为北京声音背景的丰富性是和北京人“玩儿”的传统相关的。全世界的人都养鸽子，可为什么唯独北京人在意的是鸽哨？在秦思源看来，北京是六朝古都，最后一任清朝政府为八旗子弟供给钱粮，让他们饱食安居，有大量闲暇时间殚精竭智钻研各种娱乐玩好，玩鸟、玩虫子、玩獾狗、玩大鹰……各种玩法不一而足，极尽讲究之能事，

这都在当代北京人中得到了继承。“养鸟儿，听的就是叫声。北京人专养‘净口百灵’，所谓‘净口’，就是规定百灵要依次发出一套13种叫声，学麻雀、伯劳、山喜鹊，还有猫叫，鹰叫……不能改变顺序，要叫完一套再叫一套。”

与纽约尖锐的警笛声、开罗清真寺传出的礼拜声、伊斯坦布尔小巷中飘荡的萨斯琴声、河内满街摩托车的轰鸣声不同，中国的城市很难被某一种声音主导。“都市发声”项目同时向北京市民征集“心目中的北京声音”。除了鸽哨声外，排名前几位的还有平房院子里大枣儿的落地声、公共汽车售票员的报站声、磨刀人手中“哗啦哗啦”的铁片声、非正规的旅游拉客点往复播放的“天坛——长城——十三陵”的叫喊声。一位叫赵雅琪的北京市民这样解释为什么对售票员报站情有独钟：“因为可以听到北京许多奇怪的胡同名和小街道名。”并且那种包含喜怒哀乐情绪的噪音大大区别于地铁的广播报站——“一种报八宝山和天安门都是一样调调的声音。”

在去年，上海一家报纸也发起一项“寻找上海



清华大学教授燕翔在全中国最安静的地方——零分贝实验室

都市新声”的线上活动。上海市民认为最能代表上海声音的分别是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和海鸥飞鸣、上海阿姨“噶讪胡”（闲聊天）和24小时便利店推门进入时的音乐门铃。有意思的是，无论上海还是北京，人们都提到了钟声——上海海关大楼与北京电报大楼无差别的《东方红》报时音乐。海关大楼建造之初采用的威斯敏斯特钟声音乐，1966年改为《东方红》，改革开放后钟声还原成威斯敏斯特钟声音乐，2003年再次变更为《东方红》。如今这种声音虽然是全国统一的，而不具有地方性，但却规定了城市的时间与相对应的行为，容易唤起一种集体生活的城市记忆。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殷漪大量实地录音收集的并非人们印象中典型性的上海声音，而是完全日常化和私人化的声音片段。从中能够听到花鸟鱼虫市场聒噪的背景音中，两个久违的老伙计在相互问候，这是殷漪意外邂逅的温情；虹口公园里的人们跑来跑去打着羽毛球——这恰恰是白天上班时间录制的，是一个冰冷写字楼之外鲜活的城市；上海火车站的地下通道里，一位中年妇女用机械干涩的嗓音不停地重复“发票、发票”，一天要喊一万多遍，这仿佛是光鲜外表下见不得人的一道伤疤；隔壁邻居家在为过世的老人来做法事超度，诵经声中依稀辨出两个人的对话：一个说，花了15块钱买了个东西不太合算；另一个说，这么重要的日子，就不要考虑这些了……这些声音碎片中捕获的生老病死与夹杂其中的精明算计，它们才是殷漪感受到的真实上海。

“声音里携带了关于城市的隐秘信息。”殷漪说。通常他的录音活动没有明确的目的，然后他会在浩如烟海的声音库中寻找素材之间的联系。在做完交通系统的录音后，他发现上海地铁的广播里只有普通话和英文两种语言，一些公交线路则会加入沪语方言。“这侧面说明上海老人乘坐公交车的较多。尤其是这个月开始，退休老人乘坐交通工具不再免费，交通补助会打到账户上。从省钱的角度讲，老人选择公共汽车出行会更多，沪语公交线路也许会越来越多。你要从视觉上证实这个趋势比较困难，必须具有大量的样本。但从听觉入手，只需要提供一个声音。”

营造声景

人们对声音会有好恶的感触。李国棋所做的声音意识调查里，总共1178种声音，人们对其中378种表示出了喜爱之情，这包括了大部分如水流、鸟鸣、

波涛之类的自然声。“可以说是这占总数32%的好声音支撑了我们的生活。”李国棋说。2004年，李国棋在博士论文中首次将声景研究和设计的概念介绍到国内。人类可以听到的一切构成声觉景观。对于声音环境，除了“被动”聆听，也应该“主动”设计，营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听觉氛围。

在西方国家，水声因为能够让人联想到田野自然，同时具有一种“掩蔽效应”而经常在城市中使用。英国“钢都”谢菲尔德的火车站外嘈杂无序，设计者用一道不锈钢墙将噪声区和火车站隔离，并在广场上建造一处喷泉，这一下成为进出谢菲尔德市的人们难以忘怀的视听风景；美国曼哈顿寸土寸金，街心公园旁边就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与往来不息的车流，通过人造瀑布的搭建，走进公园的人顿时置身于一个与外隔绝的小环境。

“遗憾的是，在中国，水基本只作为视觉元素来运用，设计者缺乏声景的观念。偶尔效果不错，却是无心为之的结果。”燕翔说。事实上，在中国古典园林的营建体系里，声景一直是门重要的学问。常见的自然声景观就有“雨打芭蕉”“风过松林”“坐观瀑布”“植柳邀蝉”；活动声景观更加多元：苏州拙政园中有卅六鸳鸯馆可听昆曲，网师园中有琴室能闻琴声，藕园中有“听橹楼”专为感受桨声阵阵。“不知何时起，这样的‘声景’传统便失落掉了。”

一次难能可贵的声景营造尝试是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个专为北京奥运会召开而建设的最大型的市内公园，在设计之初有着一套详尽的声景规划方案。那么应用结果如何呢？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声学研究所的孟子厚教授当年曾经参与方案讨论。他告诉我，声景设计有个原则叫“巧妙利用自然声，适当添置人为声”，要以“道法自然”为主。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则是本末倒置了。“一进门就是一个瀑布，发出与之不相匹配的巨大轰鸣，原来是安置了发出瀑布声响的音箱。更不用说那些透过扬声器发出的呆板蛙鸣和鸟叫。”

在北京的许多公园，声景都依靠喇叭放音乐的形式来建立，音画不对位是常事。孟子厚记得有年秋天去游览圆明园，在大水法的废墟附近明明可以发思古之幽情，耳边却传来一曲欢快激昂的山东民歌《谁不说俺家乡好》。

从声景的角度看，物质文化遗产保存要扩展到更大的范围。颐和园管理处在上世纪90年代联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复建了苏州街上缺失的建筑。乾隆下

(黄宇 摄)



秦思源曾发起过“都市发声”项目，邀请英国的若干位声音艺术家来中国城市采集声音进行创作。后来建起一座胡同声音博物馆



现代城市的交通系统制造了持续不断的背景噪音

江南时，因留恋苏州热闹的街市铺面和物产风俗，命画师绘具图式，将其仿建在自己的皇家苑囿内，后来苏州街被英法联军的大火焚毁。如今看来，苏州街处于并不协调的声音环境内——墙外就是车水马龙的颐和园路，五环主路也近在咫尺，清代江南市井的繁华之声淹没在 21 世纪交通工具的噪音里。

寺院古刹的保护又是一例。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的张东旭博士专门研究过汉传佛教的寺院声景。他发现在寺院所有的人为声响里，敲钟声最受到青睐。他特地去观摩辽宁千山龙泉寺每日晨钟暮鼓的仪式，描述说：“一面敲，一面诵经，同时掌握节奏，颇能显现住持者的个人魅力；早晨是先钟后鼓，钟声未绝，鼓声就起，傍晚则相反。钟鼓交替，声响回荡，不绝如缕。”不过，能完整保留下钟声的寺庙已经越来越少。“像是位于市内的沈阳慈恩寺因为扰民缘故，取消了钟声；同样的原因，开封相国寺将钟鼓都挪到一层大

殿里来敲，声音只局限于寺庙周边。”

与之相反，另外一个位于北京郊区西山的龙泉寺，僧人们希望钟声能波及更远的信众，于是找到了燕翔，希望他能够从声学角度帮助完成一口新钟的设计。“我无能为力，”燕翔说，“寺庙前方一片度假中心的高楼挡住了钟声的传播。唯一的办法，就是造一口巨钟。这样成本庞大，敲钟者还可能被震晕。”

翻阅地方志，张东旭总结出中国古代至少有 26 个地区曾经以钟声作为地方特色景观，地域涵盖全国大江南北：龙华晚钟，雁塔晨钟，皇寺鸣钟，远梵宵钟……不远的未来，它们仅仅就是停留在纸上的文字了。

远离噪声

在燕翔位于清华大学主楼的办公室里，我们一度

停止了对话。“这是一个安静的环境吗？”燕翔问道。仔细倾听，室内的空调发出嗡嗡的响声，窗外的园丁正在用水管浇灌着草皮，机动车混杂着自行车不断从楼前的主干道经过。“这大概有45分贝左右的音量。”燕翔说。按照国内的《环境噪声标准》，以居住、文教为主的区域，白天噪声标准为55分贝，夜间为45分贝，我们属于正常值之内。而如果按照美国纽约《噪音防止法》的规定，在距离居民楼1米处进行测量，所有噪音超过45分贝的声源都被禁止使用，我们已经处于一种过度的噪声环境里——在“大声之国”，人们拥有对环境噪音更强的耐受性。

噪音具有一种主观性，最直接的定义就是“乐音以外的一切声音”都为噪音。现代城市的交通系统是我们生活里一种持续不断的背景噪音。北京犹如“摊煎饼”一样，从二环向六环不断扩张，每一圈环路上都有噪音形成的不同音景。“二环上基本都是小轿车，白天处于缓行和蠕动状态，车速不快又禁止鸣笛，因此是一种沉闷的声响；形成反差的是六环，大型和超大型货车喘着粗气前行，那种声音，像个永不停息的工地。”孟子厚这样形容。

人们普遍没有注意过夜晚的环路。根据音乐人颜峻测量，北四环的汽车会以90分贝的音量驶入夜色，当那些运载着钢筋和水泥的汽车快速轧过路面，40~50分贝的声音会撞击着居民楼的玻璃，如果离得再近，就是70分贝——大概是3米外一个吸尘器给你的声音强度。

在城市中栖息的动物因此会改变习性。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史蒂芬·康纳观察到，城市中的鸟类需要提高音量才能和同类交流，这样导致它们的鸣叫比正常要大。如果把它们放归到乡村，会面临生存难题，因为它们太过于吵闹。

人们于是对于安静有一种渴望，仿佛是田园牧歌般的乡愁，向往回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零分贝：寻找绝对安静》的作者乔治·福埃为了找寻安静，先后探访了巴黎的地下墓穴、乡间修道院，最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奥菲尔德实验室找到了一种并不舒适的宁静。那里的安静级别达到了负9分贝，人们进去之后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心跳声、肠胃咕噜声。“最终自己会成为噪音来源，唯一的寂静只有死亡了。”在这间屋子里，人们最高停留的时间是45分钟，“那种安静逐渐让人迷失方向”。

怀着对安静状态的好奇心，燕翔说服学校投资建设了零分贝实验室。他告诉我，零分贝是人类可以感

知到声音的最低限度，而这个实验室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有通风设施，也恒温恒湿，适宜人们在里面生活，从而进行实验观察。“奥菲尔德实验室让人觉得难受是因为憋屈，并不是安静本身会让人无法忍受。那完全是一个测试产品性能的空间。”

这个其貌不扬的砖红色六角形建筑，就是全中国最安静的地方。它采用了“房中房”的嵌套结构，底部六角装有减震弹簧，外层墙壁是厚重的钢筋混凝土砖墙，内层是轻质隔音墙体。在最脆弱的窗户部分，安装了一种德国工艺的16层玻璃。冷风从墙壁下方的隔扇里均匀送出，轻微得让人没有感觉。

燕翔在这里进行了“安静一日”的实验，邀请不同年龄的志愿者在里面工作和休息。“刚刚进入时，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耳鸣，年龄大的人要长一些，也有极个别别人耳鸣从头持续到尾，但大多数人在20分钟后开始享受寂静。”实验对象们纷纷表示，在里面工作的效率都提高了。他们会觉得时间飞速流逝。“‘怎么才进去就吃饭了？’这是因为注意力太过集中。”午睡的人在里面休息时，深度睡眠的时间达到了20~30分钟。“过去认为午睡时没有深度睡眠，是因为白天休息褪黑素分泌减少的缘故。其实还是白天不如夜晚安静。普通人夜晚8小时的睡眠里，有40分钟的深度睡眠就很不错了。”

燕翔从零分贝实验室得出的结果是安静对人百利而无一害，“只可惜除了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人们无法获得安静”。燕翔日常工作的重要一块是帮助人们解决噪音问题。“都是补救性质的。冲突到一定程度无法处理，然后请我来想办法治理。可是为什么不能提前预防呢？”曾经全国各地流行一阵来制作噪音地图，后来就没继续下去。“噪音地图相当于是一种对于噪音的预测，一个潜在的工程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噪音影响，在规划阶段就避免矛盾。”他提到的一个例子是首都机场第三条跑道飞机起降过程中，对于附近樱花园小区造成的噪声干扰。“3号航站楼是先规划的，之后才规划建设的小区。倘若一开始就考虑到噪音波及范围，就不会在附近建设居民区了。”“噪音地图”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是一个“刹车”，而不是“油门”，所以注定它成为一纸空谈。

至于自己从事这个和声音相关的小众而有趣的职业，燕翔只感叹生不逢时。“我本来应该是个艺术家来创造美好声音的，现在怎么成了个医生？”

（实习记者唐瑶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马蕙、张安定、张立明对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

倾听老北京

记者 丘濂



在北京地坛公园练习伴奏合唱的老人们是一种独特的声音景观

老北京消失了，但它长留在声音记忆中。

现代城市的声音环境和古代城镇截然不同。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声学研究所所长李国棋对《红楼梦》中涉及的声音做过检索研究。在这部以清代北京为背景的长篇章回体小说里，一共有 536 种声音，共出现 1.4651 万次。除了人的声音外，出现最多的是大自然的声音：雷声的音量高过一切，风声有微风、狂风和暴风的分别，流水声是一种经常性的背景音。“那个时代的人们生活在自然当中，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在荣国府内相当安静，居于其中的人听到最多的是脚步声、帘声、磕头声，咳嗽声有时是一种暗示，摔瓷器的声音是内心不快的表达。

小众的声音博物馆试图用声音保存下更加真实生动的历史。在北京史家胡同博物馆，就有一间五六平方米大的屋子，里面收集着北京胡同的声音。声音博物馆的创建人就是秦思源，一个中英混血儿。他的姥爷和姥姥是文学家陈西滢和凌叔华伉俪，他们曾经是博物馆所在院落的主人。1946 年，陈西滢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夫妇二人前往欧

洲，随后定居。他们的女儿陈小滢嫁给了汉学家、英国人秦乃瑞，秦思源便出生在英国。2012 年，北京的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在英国查尔斯王储基金会的资助下将院落改成一间讲述史家胡同历史的博物馆，他们向秦思源咨询布展事宜。秦思源的建议是专门辟出一个空间来展示胡同声音——有了 2005 年“都市发声”项目的经历，他意识到了中国声景的特别，声音在唤起情感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这间小屋里有一块电脑屏幕，墙壁上挂着 6 台立体声环绕音响。看似单调，但能让人津津有味地待上半天。屏幕上，有年代、时间段和天气的选择。比如你可以点击“50 年代前、夏、日、晴”的组合，那是一串叫卖金鱼的吆喝：“大——小——嗨小金鱼儿嘞——蛤蟆骨朵儿——大田螺蛳——”背景里还有持续的蝉鸣。如果将“夏”换成“秋”，则是秋海棠和柿子的叫卖声：“哎——没有虫的海棠哎，多给嘞”、“赛糖的柿子像喝了蜜呢”。旧时的北平城里，小贩们总是日分早晚、年按时令地叫卖物品，居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从叫声中感知四季变换。叫声中还流露出情绪。“酸梅汤——桂花味——喝到嘴里面冒凉气——又解渴——又带凉——不信您就弄碗尝——大碗的酸梅汤来——俩子儿一碗哎——”这样的叫声是欢快明亮的，里面透着清凉。而“硬面——饽饽！”是短促而厚实的，有点苍凉和无奈，因为卖硬面饽饽的人都是午夜时分出门，给夜间消遣玩乐的人提供这种形如烧饼，中有夹馅的夜宵。他们会在夜风中辛苦叫卖到凌晨三四点。

声音博物馆的 100 多种声音中，大部分是吆喝声与响器的声音。这是和过去京城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胡同格局密切相关的。为了方便住户生活、让商业信息家喻户晓，吆喝声非得伸长拉宽外加七拐八弯不可，好配合胡同的深度、宽度和弯度。走街串巷的小贩有的是边吆喝，边使用响器；还有所谓的“八不语”行当——就像卖鸡毛掸子的，若是吆喝“好大的掸（胆）子”，估计会把顾客吓跑，于是会通过使用响器，让听者产生固定的商品联想。敲梆子的不是卖豆腐，就是卖香油的来了；摇拨浪鼓的是卖日用百货、女红绒线的小贩，而敲小鼓的是收金银细软、古玩旧货的商

人；铃铛的种类最多，有串铃、扇铃、脚踏铃、手摇铃和冰盏。冰盏其实是黄铜制成外表磨光的碟形碗两只，敲打时夹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是一种露水滑落一般的“滴滴、嗒嗒”的声音，夏季时卖冰镇果子干、玫瑰枣、雪花酪的小贩都用它来吸引顾客。

传媒大学传播声学研究所的孟子厚教授告诉我，声音史料有一种独特的价值，会成为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印证。“像是北平沦陷后，叫卖声也发生了变化，‘擦皮鞋’的喊声中有了日文单词‘库兹’（鞋子）。”孟子厚曾经组织学生对今天人们于响器的感受来做调查。“其中很多响器，人们在听到声音后，会用烦躁、压抑等贬义词来描述，因为已然不知道功用。”比如剃头匠用的名叫“唤头”的响器——使用的时候，两根一尺二寸的铁条固定在手柄上由左手握住，右手握着一根钉子从铁条中间蹭着向上挑。这种尖锐的声音如今只能被形容为“铁棒摩擦发出的噪音”。

20世纪50年代，随着“公私合营”的进程，私营经济逐渐消失，千姿百态的吆喝声与响器声便暂时无处寻觅了。直到“改革开放”后，个体经济复苏，这种声音才再次出现。尽管旧城改造中胡同面积大幅度减少，人们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吆喝声与响器声已经简单多了，但还是会让初听者觉得新鲜有趣。2003年，美国记者何伟在东城区的菊儿胡同居住过一段时间，在文章《胡同情缘》中，他记录下每日听到的声音：“卖啤酒的女人嗓门最大，一遍又一遍高喊着：卖一啤一酒！早上8点就能听到。卖大米的贩子居于高音区，醋贩子则把持着低音部，磨刀匠提供的是打击乐……4月末的一天，我突然听到有人高声叫喊：长一头一发！长一头一发！那是一段全新的音乐。彼时天气转暖，到了理发的季节。小贩希望收齐100磅优质头发再回到河南，这些发制品则大都销往美国和日本。”

收集声音并非易事，秦思源都是找录音师来重新进行录制。那些叫卖声是由经常进行民俗表演的吆喝艺人来完成的。秦思源发现，由于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吆喝声大多是经过了艺术化处理，需要纠正。于是他将声音博物馆的起始年代设定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的老人依旧健在，能够回忆声音是否准确。”要录一条纯净的鸽哨有些困难，“因为鸽子早晨飞翔时，城市已经苏醒，总是有着嘈杂的车水马龙声，这就难以和一个民国时代的场景音相结合”。最后他是在北京郊区找到了一个世代玩鸽的人家。

秦思源最近刚刚辞职，打算一心一意来完善声音博物馆。他还希望发动社会力量，共同搭建一个声音博物馆网站，到时“时间跨度会一直到今天，分类也更加细致”。好比会加入北京不同城区的选项。“南城平民多，叫卖声五花八门；像史家胡同这片，过去都是达官贵人居住，直接有人送货到府上，就不太会有小贩出没。那么你点击南城和东城，声音环境是不一样的。并且过去人们的活动范围小，可能一辈子都在一个城区内待着，东南西北城的口音一听就能辨识。”不同年代的自然声差异更大，“雨水落在瓦片上，和落在钢筋混凝土的大楼上就有区别；还有新中国成立前后，城里的树种不一样。‘混槐树’的知了和‘混杨树’的知了绝不能混为一谈”。50年代之后，叫卖声日益削弱了，但其他声音变得强大起来。“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最高指示’都是通过遍布全城的喇叭来传达的；‘除四害’运动中，人们敲盆打桶让麻雀受到惊吓不能落地，最后精疲力竭坠落而亡。那种铁器敲击的声音是贯穿时代的背景音。”

声音串联起国家的变迁和个人的成长。许多声音是和秦思源的记忆相联系的。1992年，秦思源在北京组建过一支叫“穴位”的摇滚乐队。当时他住在民族文化宫附近的大沙果胡同，乐队排练在另外一条学院胡同。90年代初的北京，满街的自行车车铃声，公共汽车开起来颠得要散架的声音、国营商店售货员有气无力、爱理不理的应答声都让他印象深刻。民族文化宫距离电报大楼不远，因此他每天都沐浴在整点报时的《东方红》音乐中。“钟声透过一种质次的喇叭来传播，刺耳，震得耳膜发疼。”如今那片胡同已经不复存在了，变成了高楼林立的金融街。1994年，父亲秦乃瑞出差下榻在民族饭店。秦思源看望父亲时，正好从酒店的窗户目睹了铲车对大沙果胡同的拆除。秦思源现在定居在大山子“798”艺术区一片，很少进城。偶尔听到《东方红》的钟声时，他便感到恍惚，北京往事扑面而来。■

尽管旧城改造中胡同面积大幅度减少，人们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吆喝声与响器声已经简单多了，但还是会让初听者觉得新鲜有趣。



郑钧

郑钧：这热爱，挺美好

主笔 / 葛维樱



电影出来以前，谁也不知道郑钧在干吗。很多年里，郑钧是摇滚圈、音乐圈的异类。他埋头于自己的世界。除了音乐，他写过小说，出过漫画，现在用7年时间把漫画做成了电影。

都说郑钧爱好广泛，从少年得志到现在，他一直游离在明星生活以外，但也恰到好处地把握时代的变化。郑钧说音乐是他对自己的抒发，电影却是拍给观众看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电影里一只追逐摇滚梦想的小狗，映照出郑钧的真实人生。

郑钧不混圈子，却有真朋友。许巍说自己曾在严重抑郁症低潮期时，郑钧常给他打电话关心。对相识于微的故人，他直接问“有家了吗？孩子呢？”他大办婚礼，朋友廖一梅刻薄他“学小明星”，他也不急，说想学着从别人的角度思考。前两天在李亚鹏的照片里，大家发现他们夫妻参加了李嫣的生日小宴会。其实李亚鹏离婚后在丽江被拍到在酒吧唱歌，就是和郑钧在一起。而郑钧最早入行的缘由是：“‘黑豹’在找一个主唱，小窦走了。”

帮我联系采访的人犯难，“郑钧就没说过两小时以上的话”。郑钧说自己刚刚上了综艺节目，“显得特别……傻”。真人秀最火的时候请他，他和儿子都不爱说话。“这时代太神奇了，我跟儿子吃饭居然有人给我们钱。”郑钧用陕西人一贯的慢悠悠和抑扬顿挫说，“再多给点，上厕所也让拍。”他对上电视有一点疏离和旁观：“这时代就迎合大众取向，人人都没有隐私，你讲隐私有什么意义？”但跟我回忆他“当年也是在这么一个酒店的房间里，第一次见到老板”。那时他穿着“真穿破”的牛仔裤，“穿烂了”的球鞋，不能更落魄了。进了松鹤大酒店的套房，才看见屋子里已经乌压压站了一堆人，都期待得到香港老板陈健添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份合同，大家脸上都写着梦想，郑钧觉得自己是最蓬头垢面的人，“屋里还有蔡国庆”。

“老板”是郑钧命运的一个关键词，因此，从一开始，郑钧就不太被摇滚圈待见。他没去过混酒吧讨生活、看人脸色的苦日子；大学时乐队成员顺利分配工作，在他的环境里，除了他没人真把音乐当梦想。1992年的北京，崔健的《一块红布》《南泥湾》等名曲发行的时候，郑钧还有本科大学生的身份和一份赴美留学的签证。“我哥哥和嫂子当时在深圳，我把我写的歌给我哥听，他听了以后说给我两年时间，不行就让我去深圳开出租车，收入挺高，我说行。”

遇上贵人“四哥”郭传林，也不是传说中等签证排队的时候。1990年，郑钧已经在杭州工程电子学院上到“大四”，一夜之间，他受到了一个学生能受到的所有处分，“预备党员、学生会干部都没了”。他至今还能把这几个字说得清清楚楚，并不带有一丝玩世不恭。处分一直背着，郑钧没有拿到学位证和毕业证。去美国的手续整整办了两年，这样晃晃荡荡的时间里，郑钧已经写了七八首歌，包括《赤裸裸》。

“唱歌居然还能赚钱？！”“歌手”对郑钧来说本来就从没当成个“职业”，按照家里人“一家子都是工科生”的设定，大学毕业分配到工作就是理想。郑家是西安盐商，考入北京法政大学的祖父郑自毅，1926年经于右任介绍，进入黄埔军校，为第六期学员。后因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演说在深圳被捕。1947年当选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胡宗南临走时派身边部队来寻郑自毅，“只允许他带长子一起走。但爷爷要是走了，郑家百余口人就全完了”。郑自毅跟省政府和胡宗南两边打马虎眼，声称已经“给接走了”，实际留在了大女儿的婆家。曾在西安市钟楼附近长安学巷的四个院子组成的郑家老宅，是郑钧童年每周末都要去的地方。“进门先给祖先磕头上香的规矩，即使‘文革’中都没有中断。”因为家中收藏文物众多，“有唐伯虎的画”，郑自毅解放后在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用其所长，专门鉴定文物。郑家满门男丁，“过年时，请西安饭庄的厨师来做菜，过事、摆席，满院子里滚大桌子”。郑钧在男性权威的大家族里是排行最末的，“我就是辈分大，哥多”。他记得祖父每天早上起来打太极拳整整一个小时，再写书法一个小时，光头却一直留着飘逸的美髯。“我小时候最讨厌写字，现在居然也开始写了。”

郑钧是放养大的孩子，母亲第一次看到他的歌，纳闷儿他从来没有学过乐器，甚至不爱唱歌，怎么写歌了。郑钧7岁丧父，自打记事起他就只记得总有打不完的架，和母亲奔波求医的艰辛。虽然瘦弱，他也学了一身街头的本事，只是在学校不受老师的待见。“其实老师没错，他就是用他的教育方式，让我们逐步放弃勇气和个性。”郑钧的父亲是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业科技大学）教师，母亲是西安公路学院（现长安大学）教师。“父亲疑心自己是在考察防护林时误入了核试验基地而得了白血病，但那时候也说不清楚。他去世时我妈一个月挣58块，要还父亲看病借的国家的债，还要养活两个儿子。”欠债直到他考上大学那年才还完。哥哥郑明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在西安的音乐小学拉小提琴，初高中学业成绩优异，考上中国刑警学院也

是为了给家里减负，现在已经是一家有2万多员工的企业创始人。到他这儿，他说：“我从小没上什么好学校，大学也不好。只是我哥说了，要是我考不上本科，先人的脸都要丢光，我们家从爷爷奶奶到外公外婆，全是大学毕业！”他在哥哥面前一直唯唯诺诺，直到如今仍然对哥哥一心崇拜，小时候考80多分就会得到两个耳光，“那简直侮辱得叫一个狠”。

10年前郑钧出版漫画，有人被他吓一跳。“我从小就喜欢画，只是那时候我妈给我请的美院老师启蒙，一节课要10块钱，有时候她不得不去借钱让我学画。”他说自己心疼钱。父亲生病已经造成了家庭困难，美术教育太奢侈。“我表姐有些画画的朋友，当时是最时髦的西安文艺青年。”郑钧自幼看过不少好画，感觉对文艺青年们创作的东西“没产生共鸣”，“比要饭的还穷，还自以为特前卫”。他坚决说服了母亲和哥哥放弃自己走专业美术的路。“当一不靠谱的画家？我妈太可怜！”

那应该培养成什么样呢？初中毕业时他“良心发现”向母亲开口要求：“送我去一个好高中吧！”也谈不上放弃美术梦，他只是觉得哥哥上大学了，自己对母亲有责任。“我考大学完全是为了我妈。”那时大学包分配工作，郑钧不知道如果自己没有出路母亲该怎么办。“我妈去求一位校长叔叔，我爸的发小。我那时学习基础一塌糊涂，也没有任何门路，学校离家非常远，叔叔让我住在他校长办公室午睡的床上，每天他下班走了我就去，早上很早起来，等他来之前收拾妥当。”到现在郑钧依然感念人的善良。1987年他以高于重点线的成绩被杭州电子工程学院外贸班录取。“就想逃离西安，走得远远的。”

与祖父一家的尚武之风传统不同，外公温君伟从日本留学归来，是化工工程师，在家里接通了西安市第一根民用电线，家里还买了国产的手摇黑胶唱机。“我妈那时候太忙了，没顾上我。平时我在外婆家，周末去祖父家。”虽然日子艰难，外公家却保持着浪漫的生活习惯。“满院子紫藤花开的季节，外婆把花瓣摘下来，和面粉调和，做陕西最有季节性的饮食麦饭。”

解放前青年路是西安市非富即贵的所在。唐代政治中枢太极殿就在此处，到明代成郡王府，后为庙宇“十方院”。民国初年地方政府将官产卖给地方军阀，军阀又转卖给了温君伟。“地被杨虎城看上，提出要买。外公很有头脑，将院子送给了杨虎城，杨加上另外十几亩土地，就建成今天西安的止园，杨虎城也回赠了一些谢金。”止园是张学良与杨虎城秘密碰头并策划



动画电影《摇滚藏獒》剧照。郑钧为编剧之一

“西安事变”之地，离郑钧外公家几步之遥。院子一解放就住进来不少老百姓，所以郑钧儿时的记忆中，已经是大杂院。“小姨在电影院工作，就把放映机搬回来，给我们在自家院子里放电影。”一到夏天挂块白布，满院子都是看电影的人。“自家甜水井的水里泡个西瓜，那日子甭提多美了。”外婆一家笃信基督教，“外婆第一个月工资就买了一架风琴，现在这琴还在”。

这也难怪，即使郑钧在绝望中写歌，他的曲调依然有温和婉转之处。传闻早先他出道时找吉他手，一

个标准是要不吸毒。曾有人觉得作为摇滚歌手，他的形象被包装得过于英俊，往木村拓哉的方向去了。除了女人缘，他更像个西北汉子，把粗糙当成得意。“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再是碗面就更好了。”他当着我，呼噜噜吃了两碗面。即使如此，对于摇滚圈，他还是显得有些“乖”和另类。

郑钧的大学生活就是他的音乐启蒙时段。李健曾经对我说，他觉得郑钧的西安口音正是他迷人的一部分。那种懒洋洋的调子，歌词又不是小情小爱，很多



5月9日，“中国乐势力——摇滚30年巡回演唱会”于北京工人体育馆圆满落幕。图为郑钧（左一）登台献唱

歌曲的第一个字第一句话，就像是西安话的念白。这一点同为陕西人的许巍也有。我以为郑钧是在西安摸索出了自己的音乐风格，没想到他的启蒙还是在杭州。“我们班是电子工业部第一次在大学里的实验班，班里都是学霸，入学英语平均分九十几分。有一个学生英语入学时就已经达到毕业水平，另一个背过最厚的那本《英汉大词典》。”在每学期末都要淘汰人去其他专业的压力下，郑钧被老师约谈过两次。

“好在我脸皮比较厚。”他的音乐历程一点也不愤怒批判，而是像个校园歌手，后来也跟高晓松玩在一起。刚一进学校就和学姐主持了迎新晚会，“火了”。“耍起来了”，几千人的场面，他有舞台缘，不害怕，随随便便就开始拉着同学组乐队唱歌，也有女孩来敲宿舍门，班干部也当选了。外教们来自欧洲和美国，有一节美国文化课，就是放摇滚音乐。那是郑钧第一次听到西方摇滚。尤其是一位美国老师，将自己的唱片全都借给了郑钧，两人此后成了多年好友，一直姐弟相称。郑钧在学校受到了处分，他感慨：“全世界都在看我笑话，本来喜欢我的女孩露出了虚假关心的笑。”只有这位美国老师伸出援手，开始帮郑钧申请赴美留学。没有乐谱，没有老师，郑钧把新华书店里

所有关于作曲、吉他的书都买了，从《如何识简谱》开始的。“我第一本吉他谱，是秦起翻译日本的，其实我连最简单的都不会，结果启蒙是‘重金属’，生抠。”当他后来看见吉他手秦起本人时，“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跑校园唱歌，在对方学校学生会干部的邀请下，演出完在食堂吃个饭，就又回来了。郑钧从来没把音乐和前途挂上钩，更别提挣钱了。他乐队里的乐器都是他一点点赚钱买的，野马音箱、仿的吉普森吉他——“我去帮杭州美院的学生卖画！”

郑钧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以音乐为生。他在杭州的那些年，歌厅里流行的是香港音乐，特别是粤语歌。“啪”，他手势很潇洒有力地往下一指：“玩范儿的，我也弄不了。”休学在西安的两年里，他曾经跟着一个草台班子在陕西省一个县一个镇地演出过一个月。和他有一样经历的黄渤后来告诉我，遭了不少罪以后，黄渤把这些都变成了自己的养分。郑钧倒没有这么一个消化升华的过程，他挺兴奋：“像个真正的吉卜赛人，坐着大篷车流浪。”他一点不觉得自卑和痛苦，睡在舞台上，像个流浪汉，要把卡车上的道具组装完才能演出，演完还要拆舞台道具，装好车才能吃饭。但底层的生活虽然只有一个来月，却让他骨子里感到“兴

致盎然”，正因为他自己生长的环境与真正的底层相距甚远，才使他后来对于“落魄”还能充满兴味、高潮迭起地讲述。

先认识“四哥”郭传林的，是郑钧在“二外”念书的表弟。“那阵子我来北京办签证，表弟也在玩乐队，跟我说，‘黑豹’正找主唱呢。他把我的样带——就是抱个吉他对着录音机录的——给了四哥。”四哥没有让郑钧当主唱，但是对郑钧说，让他等几天，“要给我介绍一个大老板”。这个大老板，就是已经发掘过Beyond、王菲和“黑豹”的陈健添。

这是第一次有人以音乐为名向郑钧抛出了橄榄枝。“四哥是我在这个圈子认识的第一个人。”但郑钧连想都没想，就把自己奔波两年的赴美之路给断了。“当时联系得挺好的，正好赶上姐姐参加一个非政府组织，准备安顿好我以后就去非洲，我觉得没准这是天意。”他此前到北京身上一共只带了800元，先到表弟那儿买了100元菜票，保证不饿死，然后就在北京几乎流落了三个月。他借宿过不知名的人家，被要求两小时搬走；住过表弟的宿舍，爬墙时生怕被校卫队看见；最后到了四哥家在西单的钉子户小房子里。周围都拆了，有天醒来发现门被人从外头砌死了。不过他欢天喜地地发现屋里还有一部电话。蚊子太多，“四哥给我两盘蚊香，我把门关上出去，回来一看床单是黑色的，全是蚊子尸体”。800元第一个月就所剩无几，那边“老板”却成了遥远未知的希望。

“有天四哥说庾澄庆来开演唱会了，给你两张票吧。”那是他第一次看演唱会，“演唱会就是这样啊！”看完演出虽然兴奋，然而到“二外”的公交车却没有了，他在公主坟附近的一个凳子上睡着，醒来一看周围都是乞丐。“摸摸索索的，吓得我们使劲跑。”多年以后，他与庾澄庆各自为《流星花园》唱了主题曲，两首歌使他们的受众面普及到了更广大更年轻的人群。

“圈里就这文化，都没钱！”他在“二外”演出，也有小姑娘欢呼；去看窦唯，演一半警察来了，“自己觉得挺开心”。他当时熬了几个月，跟谁也不熟，骑着一辆警察兼早期歌迷送他的自行车。“车胎爆了，咬咬牙打一‘面的’，刚一上车‘面的’的车胎爆了。”他跟讲段子似的哈哈笑，一点没觉得惨。快三个月时，女友想带他回老家，四哥说“再等三天”。

和老板签完约那天晚上，在四哥的善意提示下，“哥们儿实在穷得没辙了”，陈健添拿出了3000港币，预付给郑钧工资。老板请郑钧在中国大饭店最豪华的餐厅吃饭，然后走到楼上的爵士酒吧，忽明忽暗之中，他看到“唐朝乐队”几位成员都在那喝酒。有了郑钧，

陈健添创立了“红星”，田震、韩红等歌手加入都是后话。郑钧在六本合约上签了字。“老板在那讲合约是关于什么的，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没有一跃龙门的激动和喜悦，他脑子一片空白。拿着3000块钱，“先找到自己的自行车，再快速奔回西单那个钉子户房”。一进门放下合同，郑钧再也绷不住了。“我女朋友一直在那等着我，我俩哗哗痛哭。”

此后四哥和老板谈崩，带黑豹乐队出走，但让郑钧留下，“他有实力”。1994年《赤裸裸》发行，郑钧把自己对爱情和人生的希望和失落都唱进了这张专辑。《回到拉萨》甚至掀起了很长时间的拉萨热，而他本人创作时还根本没去过拉萨，也是在前途未卜之际的创作。这股势头保持到了他发行《第三只眼》，他成了第一个登上Billboard音乐排行榜的中国歌手。

大概有10年时间，郑钧每天下午两三点起床就有朋友在家守着，夜晚在酒吧过，把三里屯从不繁华喝繁华了，喝到脑袋垂到地上，不知怎么回的家。《菜刀温暖》是他自己写的带自传性质的小说，里面的生活看得出来并不快乐。前妻带着女儿远赴美国。郑钧曾经为妻子刘芸写过一篇文章《刘芸不是小三是天使》，澄清了骂名。他在博客里一向有什么说什么，说选秀选出来的女选手像男的，男选手像女的，跟韩寒对着骂，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形象或者名声的包袱。“博客时代我还比较矫情。”

“博客、朋友圈是个误会。一开始吸引你的是把它当一日记，你老年痴呆了还能看，结果大家全来看了。”演出、写歌、录音变成了重复的生活，郑钧却没有原地踏步。我们聊起从唱片到数字音乐的老话题，彩铃曾经带来的繁荣。“当时互联网还在PC端，不是移动端。”郑钧很早就有了商人的眼光，他跟人谈起要做音乐创作的“共享平台”，让演唱者、创作者资源共享分配收益。“2009年我谈这个东西，大家都像看‘天方夜谭’一样看我。”今年初他已经带着自己的APP出任“太合”的首席架构官。他为自己的漫画作品成立了改编团队，早在2009到2012年的动漫大会上，郑钧已经以创作者和投资人的眼光去寻找机会了。他到美国去找迪士尼的电影手册来仔细研究，研究怎么把形象变成故事。他去掉了原来漫画中安乐死、暂住证一类批判现实的灰色内容。“自我创作与自我实现，和以大众取向为目的，这完全是两回事。”主题曲的任务布置下来，他已经很久没写歌了，写《热爱》倒是一蹴而就。

“一直走，到欢声驱散愁容，到心中郁郁葱葱，你会以自己为荣，没有虚度一生。”



荣昌折扇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夏布折扇发明人陈子福

陈子福：用夏布做折扇

记者 艾江涛 摄影 张雷

作为荣昌夏布与折扇两件“非遗”的融合，夏布扇的定位不是大宗日用品，而是追求精益求精的工艺品。

70岁的陈子福走路很快，害怕我们找不到地方，摺下电话，他在烈日下跑了个来回，一路把我们带到他的工作室——荣昌松竹轩扇庄。这套位于中学职工楼上两室一厅的房子，是他曾经的家，去年搬入新居后，他终于拥有了自己梦想中的工作室。走进房间，客厅两侧的陈列架以及中间隔断的架子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扇子，两间卧室用以堆积材料和制作折扇，甚至阳台上，也堆满了用来做扇骨的竹片，这里的每个角落，似乎都在表明主人与扇子的密切关系。

去年，像重庆下属的好几个县一样，荣昌改县为区，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很容易让人忘记市区到县上100多公里的距离。陶瓷、夏布、折扇向称“荣昌三宝”，早在道光十二年（1832），荣昌制作折扇批子（一道工序）的工种已成立行会“颖风会”，流风所及，当地折扇制作至今绵延不绝。荣昌折扇历来是分工明确的家庭手工业，每户人家一般做两三个工段，做完后再交由下一工段的匠人完成，一把折扇的制作计有16个工段145道工序，需要各家各户以流水线的方式合作完成。

父母以制扇为生，主要负责最后的打磨与捆扎，记忆里，陈子福从小便在扇渣与竹屑中长大。1961年7月，小学毕业后，没条件继续读书的陈子福，成为荣昌折扇合作社的一名学徒工。当时的学徒期为3年，陈子福用两年时间，学成做白扇面的技艺，随后他又学习了梳练环节（将扇面做光滑），几年下来，已经熟悉制扇的主要工段。然而，命运的转折随即到来。1966年，陈子福被送往手工业干部学校学了5个月财务，随后被分配到荣昌星火农业机械厂，从库管员一直干到工会主席。

没有想到的是，1996年2月，迫于经济压力，50岁的陈子福重操旧业。至今，他依然记得重新做扇子的那天，那是一种悲哀的感觉：“没想到30年后，还得靠儿时的手艺养活自己。”然而，经历了最初的艰难，在折扇市场日渐萎缩的今天，做扇子对陈子福来说，

却成为一种自在的生活方式，一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尤其是1997年，在一个夏布商人的启发下，陈子福首次采用夏布制作折扇，将两件在当地绵延数百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在一起，找到了创新的激情：“荣昌夏布有几百年的历史，荣昌折扇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为什么前面的老师傅没想到用夏布做折扇？我想这是老祖宗给我留了个空间，给我一碗饭吃。”

与之相随的是一种冥冥中的责任。2010年之后，陈子福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扇文化研究中，他希望梳理清楚荣昌折扇的发展历史，并在工作室的基础上建立一座微型的扇文化博物馆，过程虽然艰难，但却无可逃避：“这件事情我如果不做，没人再做了。”

最好的综合艺术

在工作室的展厅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陈子福创作于1999年的由51把折扇组成的大套作品。这些扇子的半径从49厘米一直排到99厘米，共分为五组，几乎融合了中国扇子的变迁过程与中国文化发展史。在最后一组叙述中国文化的作品中，扇子的扇骨依次采用了陶瓷镶嵌，并刻以新石器时代的水浪波纹、青铜器的铭文、汉砖上面的瓦当、敦煌飞天、大足石刻观音图案、川剧脸谱、清代钱币、甲骨文、龙凤呈祥主题，以表征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与传统制扇业的明确分工不同，从设计、制作，到绘画、雕刻，陈子福一人几乎包揽了所有制扇环节，整个行业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某种程度上，陈子福在艺术方面的综合素养，与折扇的艺术要求颇为契合。在他看来，“折扇是最好的综合艺术。木雕就是木雕，象牙雕就是象牙雕，但折扇不同，可以在扇骨上雕刻出各种形状，同时一张扇面又可以放下几十位画家书法家的字画。一把小小的折扇，雕刻、书法、绘画、诗词，无所不包”。

“单纯做扇子没意思，也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小学毕业的陈子福，将折扇体现的艺术修养，归功于幼时所受的文化熏陶。小时候，陈子福有个邻居叫肖轼尘，这位善画花鸟的画家是吴昌硕的高足，上世纪50年代回到荣昌老家后，在折扇合作社画扇面。由于肖轼尘的儿子只比自己大1岁，从5岁起，陈子福就经常出入于这位邻居家中，听他大摆龙门阵。上年纪



荣昌折扇制作工艺及原料：

1. 扇骨制作原料：楠竹与棕竹
2. 削扇胚
3. 经过“削纸口”这道工序，最薄的扇骨，厚度与一张 A4 纸相似
4. 糊扇面

的人，总喜欢讲年轻时的得意往事。据说，电影明星胡蝶曾是他的入室弟子，在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上，胡蝶就站在他身后。此外，他在抗战时期与冯玉祥也有交往，两人的合影上，还有冯玉祥的亲笔签名与印章。去的次数多了，陈子福偶尔也会看到肖弢尘画画，高兴的时候，老人会告诉他如何用笔，记忆中，老人的得意之笔是画月季花。“月季花杆上的刺画得特别好，再一笔下去，花瓣上的色彩便晕染开来。”

尽管才华出众，可在陈子福看来，肖弢尘因为生性落拓不羁，生活落魄，后来更逐渐失去在艺术上的追求。晚年由于寂寞，老人经常召唤陈子福前去聊天，直到1973年溘然离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位荣昌画家，徐悲鸿的学生屈义林。由于是中央政大的学生，之前做过三青团干事，屈义林在“文革”期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从东北被遣返荣昌原籍，两口子被罚扫厕所。但即使在那样窝囊的环境下，屈义林并没有沉沦，回家后偷偷画画，“文革”结束后，很快在画坛崛起。

尽管到现在为止，陈子福仍不敢称自己在绘画方面有什么成绩，但正是受到当年那些画家的熏陶，让他有了后来在制扇方面的创新。

随着年纪增大，陈子福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扇面创作上，而制作折扇的重要环节——扇骨，则更多由徒弟李开林完成。李开林本就出生于制扇世家，精于制扇，后来又在陈子福的带领下，学习夏布折扇的制作。

李开林的制扇作坊，采用典型的前店后厂模式。在一个简陋的单元楼中，两口子还有一名专门负责折扇的工人，正在忙碌地制作着市面上更易销售的丝绸折扇。荣昌虽产黄竹，但由于其密度韧性不佳，扇骨原料多采用产自贵州的楠竹。另外一种产于当地的棕竹，由于拥有天然黑色纹理，韧性也好，是比较名贵的制作原料。拿到李开林手上的，是已经捆扎好的竹片。扇骨的制作，需要经过“削扇胚”“削扇头”“削纸口”三道工序。不同的扇面材质决定不同数量的扇骨，一般而言，纸制扇面的扇骨在20~22根，丝绸扇面的扇骨则在24~40根，夏布扇面则不超过20根。对于扇骨数量最多的丝绸扇面而言，“削纸口”这道工序尤为重要。李开林拿起一把40根扇骨的已经削好纸口的扇子说：“我们最薄的扇骨，和A4纸厚度差不多。”由于害怕麻烦，技术要求高，整个荣昌只有他一个人在做。对于一把好扇子来说，要做到“有收爪”（能够闭合紧），削纸口至关重要。

在另外一个房间，其他两人正在粘扇面和折扇。经过这两道工序，捆扎定型的扇子可以拿到日光下晾晒，一把扇子基本制作完成。成败还取决于最后一道工序：撇火。所谓撇火，就是把成品扇子最外面两根



陈子福制作的折扇集雕刻、书法、绘画、诗词于一身，堪称最好的综合艺术品

主扇骨拆下来，放到火上炙烤后，然后逐节掰弯。尽管所有制扇的人都知道这道工序，但很多人只掰中间的扇腰部分，而不处理打孔的扇头部分，这正是扇子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不能闭合的重要原因之一。对疏漏的原因，李开军解释道：“每次掰扇头的时候，损耗率大概在5%左右，他们怕麻烦，而且换一片主扇骨算上工时费要一两元钱，无疑会提升成本。”

发明夏布折扇

1996年，当陈子福在30年后，再度开始做折扇时，困难重重。在最初一个月里，他没有卖出一把扇子。一天，他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关于扇子的节目，可惜没看几分钟，节目结束，好在他抄下了字幕中的栏目名称。他马上写信给栏目组，试图联系到节目中讲制扇的嘉宾。至今让他很感激的是，栏目组负责人很快回信告知，嘉宾为山东华翰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庆泉。

在与王庆泉的通信交流中，他意外收到一封在北京举办的首届扇子艺术大展的邀请函。当时陈子福家中仅有3000元存款，儿子马上又要上大学，妻子不同意他去北京冒险。陈子福考虑了两天，告诉妻子：“我这一生想赌一次，如果输了就改做别的事情。”妻子看他异常坚定，只好同意。就这样，陈子福带着20把扇子来京参展。

正是在那次展会上，陈子福结识了当时的中国扇子艺术学会会长郝盛琦。由于对陈子福做的折扇十分欣赏，郝盛琦吸收他为中国扇子艺术学会会员，鼓励他坚持在西南做折扇。从北京回来后，受到鼓舞的陈子福，觉得自己赌赢了。他开始考虑扇子的创新空间，以纸和丝绸为材料的折扇首推苏杭，有无可另辟蹊径，采用其他材料制作折扇？

1997年，正好有位夏布商人找到陈子福，问他能否用自己的夏布做扇面。“当时一听，茅塞顿开。”荣昌夏布以苧麻为原料，采用古老的编织技法制成，堪称“纺织品中的活化石”。陈子福对这种盛产当地的夏布感情很深，小时候路过之处经常能听到夏布织机所发出的“咯吱咯吱”的机杼之声。印象最深的是，一群小伙伴在濑溪河边洗澡时，常能看到桥边漂房的伙计，将20多米长的布抛晒出去的场景，“下面是绿色的草坪，上面是白色的布练，那个画面太美了”。

就这样，陈子福花了几个月时间，终于制作出6把扇子。当他把这些扇子带给那位夏布商人时，很快被到访的几位韩国人一抢而空。尽管获得了最初的成功，但陈子福清楚，用夏布制作扇子，并非那么简单，不少问题依然有待完善。

粘接问题是制作夏布扇首选要解决的难题。因为夏布属于生纤维，编织间隙与收缩系数很大，难以在扇骨上直接粘接。尝试了丝绸等材料之后，陈子福最终选用宣纸和皮纸作为粘接材料，最外面一层是夏布，中间两层为皮纸，背面则是宣纸。传统的荣昌折扇，用米浆和面粉调出来的糨糊，陈子福在里面加入了中药成分白芨。启发来源于，小时候他曾用白芨蘸着口水将笛膜粘在笛子上，结果发现非常牢靠。由于夏布与纸的收缩系数不同，做好的扇面需要在室内放置一个月左右，反复吸潮反复干燥，最终才能实现二者的同步收缩，做出的扇面才会板实平整。

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夏布上绘画。夏布质地粗糙，陈子福开始在上面作画时，总感觉笔很生涩，一次吃不透。反复琢磨后，他找到了几条解决的途径。首先要对夏布脱浆。用棕毛刷子将夏布制作过程中的浆刷掉，然后在清水中浸泡，完成第一次脱浆。之后在制作扇面的过程中，还要用湿毛巾将夏布上的浆抹掉，是为第二次脱浆。脱浆之后的夏布，质地变软，适用作画写字。此外，在作画之前，陈子福会将夏布早晚放在阳台，经过自然吸潮后，夏布变润，笔墨更易透进去。磨扇面同样非常关键，说话间，陈子福拿出一块鹅卵石，在压平的夏布扇面上反复磨起来。这道工序对他来说是童子功，记得当学徒的前三个月，师傅便让他天天用鹅卵石磨扇面，不同的是，那时的扇面是宣纸。随着经验的积累，夏布扇制作技艺逐渐成熟。2002年，在南京市旅游产品设计大赛上，夏布扇和夏布画获银奖，首次走出重庆，为更多人所知。属于陈子福的个人荣誉也随之而来，2005年，陈子福获得重庆市工艺美术大师称号，4年之后，他又当选荣昌折扇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在陈子福看来，夏布扇是荣昌折扇继麻纸折扇、丝绸折扇之后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在他的带领下，当地虽然有一批人也加入夏布扇制作的领域。只是，多数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夏布扇的制作细节，另一方面，夏布扇又被吹捧到过高的位置。拿到手中的夏布扇显得多少有些笨重呆滞，事实上，它的定位也从来不是大宗日用品，而是工艺品，正缘于此，工艺上的精益求精尤为关键。

面对现状，陈子福不无担忧：“夏布扇的发展空间很有限，毕竟不是大宗产品。如果像外面这样粗制滥造，不注意内在东西，我估计10年之后就会被淘汰。”

转向扇文化

1997年之后的几年里，陈子福似乎找到了荣昌折扇新的发展方向，充满创作激情。除了夏布画，另外一件

让他引以为傲的发明，则是并不起眼的竹子扇盒。

一次，他在朋友那看到用竹筒装的笛子，忽然受到启发，为何不能用竹筒制作扇桶呢？圆形设计过于直陋，他将一劈两半的竹子去掉一截，合起来则成为更有美感的椭圆形。只是，如何连接呢？从合页出发，他一步步最后想到用竹签在两端连接的设计。虽然只是一个小物件，但陈子福对此颇为自得：“夏布扇包装盒的设计，体现了重庆人的一种精神：粗朴直率，不失内涵。”

2010年左右，夏布扇的创新越来越难，创作的激情在逐渐减弱。另外，折扇市场并没真正打开，陈子福一度陷入彷徨与迷茫之中。某种程度上，这也与他的性格与观念有关。

刚开始做折扇时，陈子福去一个单位推销扇子。对方问他荣昌扇子那么多，你的扇子为啥卖这么贵？陈子福说不妨拿别的扇子一比即知，没想到对方对比之后仍说差不多。陈子福一气之下，撂下一句“既然差不多，你买别人的”，转身就走。此后，他在心里立下志向，坚持自己的方向，让自己引领市场，而不是随市场随波逐流。

在迷茫之中，陈子福前去拜访郝盛琦。得知他的苦恼后，郝盛琦笑着说：“你的使命不是卖扇子，而是扇文化研究。”自此，陈子福开始有意无意地关注扇文化。

研究荣昌折扇文化，首先需要弄清楚它的发展历史。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明确记载：“聚头扇自吴制外，惟川扇称佳。其精雅则宜士人，其华灿则宜艳女……”一些学者据此推论，“查蜀产折扇，首推荣昌，别无二地”，因此把荣昌折扇的历史推至明嘉靖三十年（1551）。陈子福对此并不认同，川扇是否等同于荣昌折扇，仍然是个疑问。为此，他很长一段时间泡在国图查找资料，终于在《清史稿·艺文志》找到一条记录：谢鸣篁著《川船记》《川扇记》。虽然一本书还未找到，但根据《川船记》的详尽记录，陈子福判断，只要找到《川扇记》，荣昌折扇的历史问题便可清楚。

折扇博物馆是陈子福的另一个梦想。几年前，在荣昌折扇有限公司破产时，弟弟从即将被作为垃圾运走的一堆东西中，抢救出几块当年做扇子的木板。看到这些木板，陈子福激动万分，那两块板子正是51年前师傅和自己所用的木板，其中一块还记录着师父当年的一个发明创新——不用加空心条，就可以做出扇面上隔浆的插空。弟弟走后，陈子福流泪了。这些包含着第一代制扇者青春记忆的物件，无疑是未来博物馆最有分量的藏品。

转入扇文化研究后，陈子福依然坚持自己的品质要求，每年只做几十把扇子，只是，没有更多商业上的困扰，他显得更为自得其乐。在我们采访期间，两位买扇者慕名而来。对着他们最后选中的两把3000元左右的大幅夏布扇，陈子福说：“你们只能选一把，我自己还得存一把。”



陈子福制作的各种形制的折扇。荣昌折扇先后经历黑纸折扇、丝绸折扇、夏布折扇几个发展阶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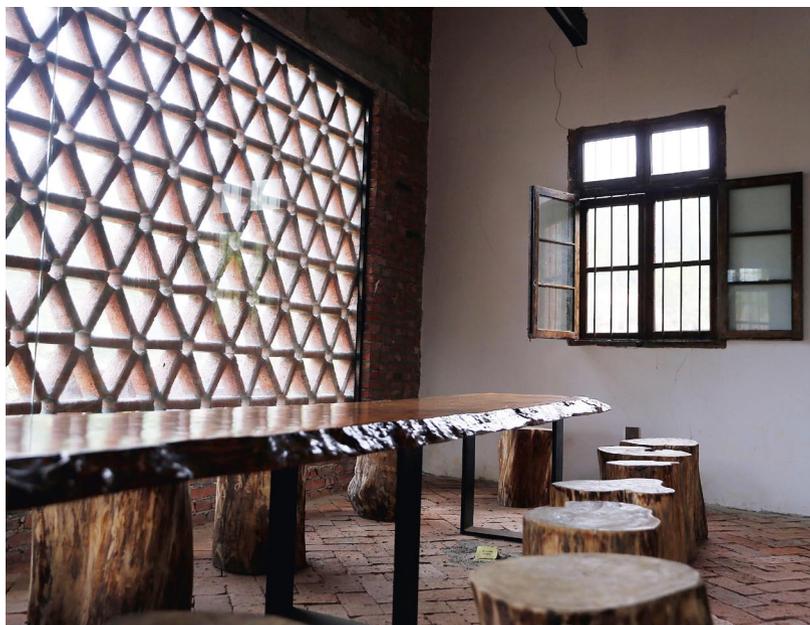
到西河去：乡愁与愁乡

主笔 / 贾冬婷 摄影 / 于楚众

田园牧歌只是一种浪漫化的想象，真实的中国乡村是整体凋敝的现实。在轰轰烈烈的乡建大潮中，外来的改造者们如何面对“乡愁”与“愁乡”之间的巨大鸿沟？他们在乡村点的火能否继续燃烧下去？



2



3

1. 河南信阳新县的西河村至今还保留着传统的手工压榨茶油技艺

2. 西河村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旧粮库，被改造成村民的活动空间

3. 西河村工匠张思奇在村民活动中心餐厅砌出一面花砖墙

点一把火

“从威尼斯回来啦？”最近几天，村里人和张思奇打招呼，语气里都是羡慕和好奇。“没什么，就是去那儿砌了一堵墙。”张思奇显出一种见过大世面的矜持。上月底，这个来自河南省信阳市新县西河村的瓦匠，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确切地说，他是作为展品的一部分。受邀参展的是西河粮油博物馆和村民活

动中心项目，张思奇在现场复制了村民活动中心餐厅的一面花砖墙。项目的设计者是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何晟，在他看来，将张思奇带到威尼斯，本身也是对农民和工匠的尊重。“在后工业时代，如何看待大工业生产和手工技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国际化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人跟我说这个花墙的做法很‘斯卡帕’，因为意大利建筑师斯卡帕一直是探索手工艺和现代主义关系的代表，我说张思奇是‘农民斯卡



上图：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何崴设计了西河粮油博物馆

下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选择了务实的古村落保护策略



帕’。一个农民工匠在威尼斯砌的这堵墙虽然不大，但它就像全球化语境下地域文化的‘耳语’，引发人们思考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这只是西河改造激起的又一个小火花。何崴开玩笑说自己是“风口上的猪”，最近的乡村建设热潮让他几年前在西河做的设计不断成为焦点。回想起来，他2013年8月第一次来到西河时，乡建还没那么铺天盖地，当时是大学同学罗德胤在微信群里吆喝了一声，说有一个去河南农村做规划设计的公益项目，对乡土建筑和文化当代性感兴趣的何崴表示了兴趣。那次是新县和公益组织“绿十字”联合组织的，有几十个设计师参与，计划在全县找出24个项目，为期一年完成。在何崴眼里，位于大别山腹地、鄂豫两省交界处这一地带的资源优势并不突出。新县是革命老区，国家级贫困县，之前只有“红色”旅游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但放在全国范围来看，也不是特别鲜明，南北交界地带的风貌毕竟无法和徽州文化、江南文化相比。但也是因为贫困，这里的村庄保持了比较完整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在新县的24个项目中，西河入选也是因为县城和更有特色的毛铺村之间相隔太远，要在中间安置一个落脚点。但当何崴和罗德胤进入这个深山里的小村子，却一眼选中了它。“西河有典型的河道景观，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沿河有古树，有祠堂，还有明清时代的古民居群，与城市生活有沟通。”罗德胤说，他们要做的就是城市和乡村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让乡村成为城市人的“第三空间”，这是目前一个巨大的需求。他认为，乡村只有在后工业社会里找到与现代生活的联系，先存活下来，才能回头去寻找农业文明的精神价值。

罗德胤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从事了十几年传统聚落与乡土建筑的理论和测绘，这些年却发现，最急迫的已经不是理论问题了。这十几年，乡村开始迅速地破坏和消失。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村里的年轻人都进城打工，田都撂荒没人种，村子越发地“空心化”，整体的凋敝触目惊心，谁还会在乎古村落和老房子呢？“我们这些年的任务是能留一个是一个。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能留下来的，就是下一代人能看到的。”他选择了更务实的做法：“老房子面临两重问题，首先是修，然后是用。怎么让村民心甘情愿地修自己家的房子，并且愿意住在里面，这是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修一个老房子的钱，可以拿来盖一栋小洋楼，面积变成三层，舒适性更好，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选择小洋楼，所以不能怪村民



河南新县县委书记吕旅

不修老房子而去盖小洋楼。要想让村民把资金流向修老房子，只有一个方法——让古村和老房子能挣更多的钱。”罗德胤形容为“先给利益，再转观念”，这也是他和何崴改造西河的出发点。

“我们一开始不是想把这个房子改造成什么样子，而是考虑这个乡村的需求是什么。”何崴将乡村建设形容为一种“弱设计”，“建筑师其实是在乡村和村民一起盖房子。设计之外，建筑师要干很多专业范畴之外的事，不时要变身为产业策划人员、形象推广人员，随之而来的是思维模式的转变。”罗德胤负责整个西河村的古村落保护发展规划，他瞄准了河道景观带来的旅游产业潜力，开始整治河道景观，修复沿岸古民居。何崴则一眼看上了河对岸一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粮油交易所，里面早就已经没有屯粮了，只把一小部分租给了一个山东农民堆放西瓜。废弃粮库的巨大体量和完好木结构，在建筑师眼里就是一个理想的乡村公共空间。因为西河入选了国家“传统村落”和省里的“美丽乡村”，县里有一笔1000万元的资金拨下来，但是这笔钱都是用在基础设施、修路、景观、老民居的修缮上的，这个粮库在规划红线之外，怎么能让县里再拿出一笔钱呢？何崴说服了时任县长的吕旅。“很简单，就三条：一是好用；二是不贵；三是一定能赚钱。”何崴说，他最开始做的是产业规划，就是告诉村民，可以拿什么去赚钱。他找到了“茶油”。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茶油既能够反映当地的特色，又能为村庄带来经济收入。建筑设计也

随之变得明确，他要做的的是一个能结合当地山水环境和农业文化的空间。

他先把一个粮仓改成了茶油博物馆。“好多人说，你在村里做一个小博物馆，有意义吗？农民也有意见，‘我们还吃不饱饭呢，你为啥弄个博物馆？’”其实博物馆是一个噱头。何崴告诉村民，“如果说这里有好的茶油，让武汉人开车过来买茶油，他绝对不来；但你跟他说，这里有全国第一个茶油博物馆，他可能就来了。”他让村民收来一个300多年的油榨，找到还会榨油的老油工，在里面现场演示手工榨油工艺。“你看，让游客来博物馆参观，参观完了，他可以自己榨一下油，完了贴上标签，是谁哪年榨的，这个油的价格就可以比市场售价高好几倍。”村民们同意了。当地已经30年没有榨过油，他们还特地挑选了一个良辰吉日，重新开始榨油。何崴希望这个博物馆能真正把产业带起来，他的一个研究生陈龙为茶油设计了品牌名称和商标——“西河良油”，把“粮”字换成了“良”，西河良心油，完全是手工的、有机的。但是产业的事被搁置下来。村民们觉得，做茶油产业时间比较长，不是今天榨完了，明天就能卖的。

粮库的旁边有一幢当年的管理员住的旧房子，何崴做成了一家餐厅。他觉得这是这个项目能开工的契机。“农民其实是特别精明也特别短视的群体。跟农民打交道，谈传统、保护，他会觉得这事跟他没关系。必须说，干这个事能赚钱，而且马上能赚钱。打个比方，跟农民说：‘你今天出100块钱，一个月后能挣1000块钱，他不干；但跟农民说，你今天上午出200块钱，下午就能挣400块钱，他就干了。’”餐厅就是这么一个能马上赚钱的项目。果然，整个项目还没有完工，这个餐厅就已经营业，为村里赚钱了。

在餐厅改造过程中，何崴也一直在告诉农民这其实不用花太多钱。他采用的方式是，用当地的材料、当地的工艺、当地的劳动力。比如这座红砖房子中间塌了一部分，他把南北侧的砖墙掏空了，想按当地人码花砖的方式做一面花墙。因为这面墙朝西，夕阳西下时室内会有很好的光影效果，室外又有一个可以让大家留影的背景。传统花墙的做法是等腰三角形，他改成等边三角形，中间有一个六角形的空洞。但是这结构能稳定吗？何崴告诉我，他也觉得没谱，觉得实在不行，就插一个竹筒来加固，再不行拿混凝土给填上。结果给了工匠们图纸之后，两周没去，竟然建出来了。这个工匠就是张思奇，他对何崴说：“一看就是建筑师在为难我啊！我想了半个小时，就把它搞定

了。”我见到刚从威尼斯回村不久的张思奇，他几十年前就学了瓦工，后来去外地打工给人做工程监理。他也说不出门道，只凭老师傅上手琢磨，靠手上的劲，从底下一点点往上垒，一层层找平衡。

河对岸最大的粮库，何崴想留给村民作为活动空间。他将面河的墙面部分打开，又在外墙加了当地的毛竹做掩映，让视线可以看到河岸景观，又不受强光困扰。外墙五六十年代“防盗防霉”的大字标语还在，给人强烈的时代感。这房子在2014年下半年刚一改好，当地最富裕的一个老板就决定“十一”在这儿嫁闺女，把县里的房子退了。大多数时候，这里村民用得并不多，很多时候是给周边县里的人用了。一个40多米长、12米宽的大房子，离县城大概半个小时车程，风景也不错，好多人都跑到这儿来开会、学习，也给村里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经济收益。

西河粮油博物馆在2014年8月份完工，当时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将西河推到台前。罗德胤形容为“大事件”，“在乡村工作，事件要优先于房子”。“这里面有个关键的时间点，2013年8月1日启动了全县域的乡村文化工艺行，在将近一年期的时候，县里面就着急了，说一年了，专家们都要来，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这时候别的村子都太慢了，就西河村还有一点指望。西河的各个项目里面，河道景观整理出来了，房子因为产权原因进展缓慢，修好了两三个。博物馆却有可能赶得上，它产权清晰，一谈就成，就把钱先花在博物馆上了。8月1日当天来了两三百号人，西河村有一个比较全方位的展示，一下子火起来了。”

不过，外来者只能点一把火，做个引子，今后是否能烧起来还是要转化成乡村的内驱力。何崴深有体会，在今天的中国农村，经济是最能改善民生的。因此，在农村，并不是简单的盖房子，而是通过盖房子重塑农村经济和重建社区信任。他形容自己是个“代孕的”，“千万别把这房子看成是你的孩子，它终究属于农村。怎么用、给谁用，农民说了算”。原本要用作活动空间的粮库后来还是超出了何崴的预计。“我到现场一看都疯了，这里面放满了桌椅，摆上了收银台，变成了一个超级农家乐。看了两分钟释然了，毕竟它被使用了。”

到西河去

从北京去西河，要先坐一班南下的火车。火车大

部分时间都穿行在中原地带，窗外是辽阔且单调的大平原，一排排土灰色的平顶房连绵不绝。越接近信阳，地势越起伏，眼前也跳跃起更多绿色。高铁开了四个半小时到达信阳，再往下走就要搭乘汽车，到西河最快也要开两个多小时。从城市到乡村，道路逐渐变窄，两侧的绿色植被也越发繁盛，让人禁不住深吸一口气，恍惚觉得到了南方。司机说，新县严格来说就是南方，已经过了淮河分界线。这里历史上曾经归属湖北省，当地人说话河南人听不懂，生活习惯也和南方更接近，比如习惯吃米而不是吃面。

从城市去乡村，我会下意识地过滤掉一些景观。那是路边时不时会出现的火柴盒状“小洋楼”，两三层高，贴着白色瓷砖，蓝色玻璃，讲究的还做了黄色或蓝色屋顶，全然不管以前是皇家或陵墓专用的。小洋楼集聚处，肯定是到了一个乡或镇，而县城也像是放大增高版的乡镇。惊喜出现在旅途的末端，汽车开进大别山深处，一些村庄在山林里若隐若现。西河就是这些小村里的一个，大山、河道、古树、老房子，都是城市里的稀缺品，让外来者眼前一亮。

“按3个小时以内的自驾游来算，西河辐射了13个城市。”被村民推选为西河农耕园农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张思恩肯定地告诉我。他说，信阳本地人来得最多，其次是武汉人，因为武汉来一趟也是两个多小时车程。郑州虽然远，但是郑州人来得也挺多，因为郑州周边是整个大平原，没什么景观。所以要么往北，往太行山跑；要么就向南，往大别山跑。

“离开城市密密麻麻的环境，乡村显然是更贴近自然、更贴近人文、更贴近情感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对‘第三空间’的需求。当然乡村度假对距离的要求特别强，大城市出发三个小时以内是刚需，但中国大城市很多，在每个大城市周边都画一个三小时半径，就基本上把整个中国都包括进去了，所以这个市场是很大的。谁能够认识到这种市场需求，将乡村打造成第三空间，谁就能抢先一步。”罗德胤认为，目前首先要面对的是大多数乡村只能远看，一进去会很失望，更别说住下来，巨大的城乡差距是现实。

罗德胤三年前第一次来到西河村，看到的也是这样一个凋敝的现状。“进村的路都被杂草埋得只剩两米宽，车开过去都被刮得沙沙响，手机也没信号。河道里看不到水，全是枯枝和垃圾，河两岸都是倒塌的老房子、牛栏、猪圈、旱厕。”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整治环境。当时他们去北京找到已经成功开了两家装饰公司的村民张思恩来帮忙做修缮工程，这事就落到了

他头上。张思恩告诉我，他一开始先把村里仅剩的几个年轻人组织在一起，他们不愿意，说“为什么帮你干？”他说：“我会付工钱。但这是本村的事，你们也是受益者，所以外面一天80元，在村里干一天60元。”他们将信将疑地开始干了。外面拖欠工钱是常事，而且政府的钱当时还没到位，但张思恩要树立威信，决定自己先垫钱兑现工资。闯荡多年的他有和工人打交道的经验，干完一半的活先付一半钱，让村民看到，剩下的活就都抢着来干了。据负责西河改造工程的周河乡副乡长张一谋说，当时总共拆除了违章的牛栏、猪圈、旱厕170多间，1700多平方米，河道总算显露出来了。因为西河夏天的山洪很厉害，“半个小时，河里的水就从山上翻滚下来，来不及跑回屋的村民得在树上走”，索性减少了很多人工座椅和景观，看上去反而很天然，卵石堤岸，亲水土坡，两岸十几株古枫杨的树冠几乎连在一起。

要想留住人，还得修房子。78户里有39户是新建的“小洋楼”，风貌并不协调，怎么办呢？第一拆，第二改。罗德胤告诉我，他们只拆了一栋，因为拆房子会产生很大的对立。那栋房子不得不拆，因为它就挡在祠堂前面，盖在河里搭出的一个水泥平台上。拆房子借用了传统的风水作武器。“西河村的风水很讲究，祠堂背靠着狮子山，祠堂左前方有一块大石头从山上一直伸到水里，就像狮子的爪子一样，祠堂前的这个房子正好把狮爪压住了，彻底破坏了村里的风水。这种观念一放出去，这个户主就面临很大压力，他觉得这承担着全村人的命运，同意置换到村庄外围。”集中修缮的是河北岸的那排老房子，里面绝大部分已经空了，都在外围盖了小洋楼，或者在县城买了房子，这也是罗德胤着急修的原因。县里正好有一笔资金准备用在老房子修缮上，每栋房子平均花三四万元，也就能将外观风貌整理出来了。但是罗德胤并不满意，因为大多数修好了就搁在那里，并没有利用起来。“这始终是个矛盾，空着不修不用，过几年就塌了。修了，短时间产生不了效益，又得背负很重的资金压力。”

“离开城市密密麻麻的环境，乡村显然是更贴近自然、更贴近人文、更贴近情感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对‘第三空间’的需求。”

1. 西河村典型的河道景观，呼应了城市对“第三空间”的需求
2. 返乡者张思恩被村民推举为合作社理事长
- 3~6. 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年轻人都进城打工，村子越发“空心化”。农村经济组织的弱化是乡村凋敝的主要原因





4



5



6

如今跟着村里的老人沿河岸走一走，是可以看得见村庄历史的。明末清初建的祠堂还在，虽然里面空空荡荡，但是门楣上还有隐约的石雕“焕公祠”，上方刻着“福禄寿喜”四星。张一谋说，这是修缮时把外层的白石灰、黄泥巴清洗掉才露出来的。当年“文革”时为了保护这些石雕，村民们临时抹上了泥巴，又刷上“毛主席万岁”，才没人敢动了。本来还有188件木雕，都被虫蛀掉了。村里辈分较长的张孝猛告诉我，“福禄寿喜”代表着他们的源头，附近的张姓本来是四大支，在西河定居的这一支是“禄”支，距今也有700多年了。张姓在西河又分出六大支，原本对应着沿河北岸六大门楼，村民都是从这里面分出来的。如今宗祠修好，一些宗族活动就从县城酒店移了回来，比如春节的宗族聚会，红白喜事。祠堂旁边的一溜老房子都是按照豫南民居的做法修缮的。张一谋指点：“你看砖缝都像头发丝一样，以前还要加火灰、米浆、鸡蛋清进去。再看封檐，就是房檐上多层累加的装饰，有一封檐、三封檐、五封檐……根据官职来定。另外，豫南农村建房的一个特点是房屋的‘子午向’，不是正南正北建的，都略微斜一点。”不过我们推门进去，都没什么人住，在家的都是老人或者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甚至连孩子都见不到几个。偶然碰到一户年轻夫妻，在家门口摆摊卖水果，也是因为看好端午节的潜在客流，从县城临时回来几天。他们家一看就是很久没人住的样子，农具、竹筐满屋堆放着，家具也有年代了，很古朴。媳妇快言快语地跟我说：“你看这些旧家具，还是我婆婆的嫁妆，我当年进门的时候她让我睡这个高架床，我半夜吓得呜呜哭呢。正准备一把火烧了换新的。”

这些老房子要想用起来，第一个关卡就是产权。罗德胤说，这些房子是村民的，每一幢里都有好几家人。这就是一个投资的瓶颈。“唯一一套改成青年旅社的套房，是因为产权人信得过，是现在合作社总经理张思举，他平时在县城住，空着也是空着，还不如拿出来改造。青年旅社面对的是来西河玩的背包客和学生，一人几十块钱住一天，只需简单做下室内装修，但这套房子改造也花了十几万元。要是真正做成一个城里人非常喜欢的房子，连带修缮和装修，平均一间客房就要投资15万元左右，现在乡村度假的普遍标准就是这样。”罗德胤告诉我，现在修一套房子很便宜，换换瓦，换换外墙，看上去就和整体风貌协调了，几万块钱就能解决。但是要把它用好，至少得花三倍于维修的钱，至少得十几

万元，合作社就不敢投了。这么一来，这个产品只能做到50分，游客不喜欢住，其实修缮的钱等于白投。“现在我们回过头去想，应该集中精力花二三十万好好做一套，哪怕只有两个客房，就让那两个客房成为村里最受欢迎的地方。但是当时还是想办法要降低造价，觉得如果投资太高，村民学不了，没有可复制性。后来发现，最关键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观念的问题。每平方米投资一两千块钱可以改好，用也凑合能用，但城里人不喜欢住，他也不会帮你宣传。如果做到三四千块钱一平方米，他可能就会跟朋友说西河村里有一个地方不错，就会产生一个扩散的效果。有人来了，村民们看到效果，才会效仿，才会转变观念。”

罗德胤说，西河就是利用了乡村“第三空间”需求的势头，抢先一步，比别的村子更早地进入到供应方的市场里头，但是后续发酵还有很多问题。比如住宿，用他的话说，这是乡村旅游的“标配”。现在西河的住宿集中在他设计的酒店里，外面用了青砖与老房子呼应，内部则是北欧风格，让游客有一种新鲜感。酒店就在临河的村中心，粮油博物馆旁边，是原来的村支部所在地。但是这里就十几间客房，一到端午节和“五一”“十一”假期这种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只能靠农家乐和山上散落的帐篷酒店、集装箱酒店，后者的出现也是因为其快速和低价。现任新县县委书记吕旅告诉我，今年“五一”西河来了6万多人，他当时就很着急。“一是消化不了，二是长期这样肯定就把牌子给砸了，游客要找的不是一个旅游景区景点人挤人的感觉。但是平衡很难把握，人来了游客的体验感会大打折扣；人要是来不了，经济带不起来，农民又不受益。”罗德胤认为，乡村消费必须往高了走。因为乡村整个改造的成本高昂，而且乡村面对的是城市中产阶级。另外乡村的吸纳能力有限，不能人满为患，要收回成本，必须提高单价。这一经济模型也决定了它不能往低端走，变成农家乐。

分散后的经济联合

张思恩告诉我，最近合作社正在筹备开一个村民大会。“主要是目前西河做出了些名堂，很多人和资本都要涌进来，有人想在村里租房子开客栈，或者承包一片油茶林。谁可以进入、进入多少、如何进入？如何在下一步实现差异化、关联消费和统一管理？这些都要和村民一起商量，制定一些村规民约。”

严格地说，张思恩是一个返乡者。他已经离开家乡20多年了，身上考究的白衬衫、锃亮的皮鞋也和村民明显区隔开来。他20多岁的时候，老区还有“优先招工”政策，被分到中电一局。后来在北京扎根下来，自己做了两家装饰公司。3年前，作为志愿者回来，后来干脆留在了村里。尽管他的年龄和辈分在西河都不算靠前，但是之前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在北京跟他打工，再加上环境整治时建立的威信，他还是被村民推举为合作社理事长。他对张思恩说：“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回来，再过10年，西河就消失了。”

村庄的消失绝不是杞人忧天。张思恩回来一看，西河的几个中心自然村有400多人，留在家里的只有四五十人，青壮年劳动力全出去了。而且新县因为早年有人去了韩国、日本打工，不断地传帮带，县里还开设了专门的培训学校，更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输出渠道。吕旅1994年大学毕业分到乡里工作，抓计划生育、农田水利。“那个时候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现在根本组织不起来了。”他说，在新县这样的深山县，农村留守的问题特别突出，这也是城市、农村长期的二元结构造成的。只有在城市里面和工业生产中才有就业岗位，农业的比较效益又比较低。按照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要在家里面干一年，才能抵上在城里面一个月的收入。所以现在是“‘70后不想种地，80后不愿种地，90后不会种地’，一代人都离开了”。

现在的村支书张孝翱已经在任15年，明显感觉到村委会权力的逐渐丧失。“上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比较红火，我在任支书之前在乡办凉席厂干了8年厂长。到了1998年‘天然林计划’，竹子不让砍了，凉席厂也办不下去了。那个年代农民负担也比较重，摊派、修路，没有劳动力就‘以资代劳’，再加上‘三提五统’，一家人平均每年要出两三千元，农村工作就做不下去了。比如管理几十亩田的道堰是集体资产，夏天一发大水给冲了，也没资金维修。村里也尝试过办工厂，比如挂毯厂、砖厂、运输队，都亏损了。到了2005年，各种农业税费全免了，但是村里已经欠了60多万元的外债。”

“为什么近百年来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最后都偃旗息鼓了呢，我觉得一个原因是之前把重点都放在社会治理方面了，实际上经济才是乡村最关心的，村民经济得利了，乡建才可持续。”新县县委书记吕旅认为，农村经济组织的弱化是乡村凋敝的关键问题，“俗话说，手里没有米就叫不来鸡”。“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

所谓的‘乡贤文化’，其实乡贤就是一个家族的族长，或者是一方土地的地主，手里边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些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越发显现出来，如果村里有一个经济组织，就像西河这样有一个合作社，它能把村里的家家户户组织起来，给他们提供一些就业岗位，提供一些增收的渠道，农民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外出。”吕旅还记得最早见到张思恩的时候，“他靠在门边，不敢进来，也不怎么说话”。现在，他作为西河经济联合体的带头人，视野和底气明显不一样了。村支书干不了的事、拆不了的房子，他可以。这也说明了村民对经济联合的渴盼。

吕旅说，现在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也有了结构性变化，从原来的“撒胡椒面”，一家一户补个几十块钱这样的普惠政策，向着支持龙头企业、支持合作社、支持新型的农民经营主体的方向转变了，“从输血改为造血”。“农业的发展要提升要转型，必须要龙头企业来带，靠一家一户很难。以前一个农户补4000块钱，让他发展一个致富项目，只能养两头猪、养几只鸡。一旦市场有问题了，可能连这部分国家补贴的钱都打水漂了。现在把涉农资金整合起来，贫困户成立合作社或者和龙头企业建立一个利益联结机制，可以集中做成很多项目，比如西河的改造。”

乡村经济组织的衰落和消失是乡村衰落的原因，但是要重建经济中心也不是靠一个合作社就能包打天下的。吕旅说，农业是一个长效投资，见效很慢，流转资金从哪里来？“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平台，包括其他的一些社会资本的合作。”他认为，目前西河发展乡村旅游是用城里的需求来解决农民眼前的需求，之后乡村还要再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是在这里吃一顿饭、住一夜就行了，乡村旅游要能够实现很多渠道的畅通，包括销售、消费、加工的问题，最终要带动产业的发展，才能转化成内生动力。”

“我们这里就是空气好、环境好，这在将来能赚钱，但是现在赚不到钱。”张孝猛告诉我，西河是“七山一水一分田，还有一分是空闲”，比如他就分得了20亩荒山，其中有10亩板栗和10亩茶油，田地只有3亩。他如今65岁，在他30岁之前，这里以种田为主要收入；30岁到50岁，山林的收益占了大部分，包括板栗、杉树、茶叶；最近十几年则是以打工收入为主。他8年前看准了这里的山林资源，投资150万元，承包了150亩荒山，4块钱一棵，种了3万棵杉树。“等到树长到15年到20年，一棵就能卖到100块钱。”这也相当于个人搞土地流转，但张孝猛说，西河村像他这

样利用经济林的不到5户。

张思恩也明白，西河的主要资源都来自山里，目前以实物入股进入合作社的有200亩板栗、600亩葛根、800亩油茶，还有4800亩耕地。“以前外出打工，可能耕地和山林都撂荒了，但放入集体里，乡里乡亲的联合在一起，为了面子也不能不管不顾。另外合作社也期望集中资金和资源把产业做大。”

最有希望做大的产业还是茶油。张思举告诉我：“以前家家户户吃茶油，因为山上都是野生的油茶树，所谓的‘飞籽成林’。但那时候觉得茶油太寡淡，我们都说‘吃得寡人’，干活都没力气。后来改吃茶籽油，因为茶油价格升高了，土榨的30块钱一斤，现在超市里80块钱一斤，有的甚至卖到几百块钱。西河的茶油有优势，因为这是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成熟期比较长，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吕旅说：“茶油面对大中城市的高消费人群，但是市场潜力很大。像新县最大的一家做茶油的企业，每年可以把全县的茶油全部转化掉。价格也能整体拉动，前两年很夸张，一瓶茶油相当于一瓶茅台酒的价格。”

十几岁就会榨油的张孝猛在茶油博物馆给我们演示了“古法榨油”的过程。“茶油10月结果，先要在太阳下摊晒一星期，用手一捻，冒油了，才可以拿来用石磨碾碎，然后放在锅里蒸熟，做成饼，十几个饼码在一起就可以压榨了。”他说，挤压油饼要靠几块看似不规则的木头，每一个都一头大一头小，大的一头当地人叫“龙头”，它必须朝着水源的方向，而榨油的方向必须和水流相逆，榨油的关键就在“龙头”的抽取。榨油一般要三个壮劳力配合，铆足了劲去撞击，他一个人显然很吃力。茶油博物馆如今很冷清，手工榨油还是只能作为一种表演形式存在，并没有像最初设计的那样迅速转化成产业。吕旅认为，古法制油，实际上和现在的安全标准还是有差距的，目前只能作为旅游体验和纪念品。他们打算让县里最大的那家油茶生产企业和村合作社联合，毕竟企业从种植环节开始，之后到采摘，再到加工，都有一套成熟标准。“不是一个萝卜从田间拔出来，在水里洗一洗，就能作为商品卖出去了。”不过张思恩前几天听一些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人说，工业脱脂制油虽然目前售价高，但它是以损失营养成为代价的，传统手工制油还是有其道理。或许这种冲突，正反映了乡村里的产业和它依附的生态和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实习记者唐瑶对本文亦有贡献）

... 英国银器珍藏展展品 ...



▲ 1743~1744年 咖啡壶或热水壶



▲ 1670年 香炉



▲ 乾隆时期 咖啡壶 (中国)



▲ 1585年 海螺杯

▶ 1553~1554年 香水瓶



美丽银器

记者 李晶晶

香港两依藏博物馆邀请到全球最大的装饰及设计艺术博物馆——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携手呈献“英国银器珍藏展”。展览中的46件银器，其中7件古银器属罗莎林德和阿瑟·吉尔伯特收藏系列，39件当代银器属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的永久收藏。它们将展示：15世纪至现代银器发展演变的一个概况。

在古代金银匠的档案记载中，“重铸”这个术语屡屡出现：任何一件银器，无论怎样巧妙设计，都存在着被回炉重铸的风险。虽然世代更迭，那些最杰出的英国银器仍被收藏和保存至今。银器专为王室和贵族，以及宗教机构而制作，其中亦包括许多著名的学术机构；小件银器如汤匙，通常被用作纪念特殊场合的礼物。一位于1584年到访过伦敦的德国人曾说：“他绝对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因为他没有任何镀银盐瓶、银杯和汤匙。”反映出银器是财富的象征。

时至今日，因各种缘由，这些耀眼的杰作依然让收藏者沉迷，它们中的一部分作为家族的传家之宝而流传，而不仅仅是艺术品。尽管随着替代品的出现，如19世纪镀银制品的盛行导致对银器需求的减少，但英国银器因其出处和丰富的历史传承仍吸引着收藏者。

英国银器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质量保证的，那是凭借法定要求，确保银器的制造需依照质量标准并完备制造者的标记。纯银标准和质量保证在14世纪时被引入英国伦敦，并一直由1327年获得皇家特许状的金匠公司控制。

“我只爱美丽的东西！”这简短的话语是阿瑟·吉尔伯特爵士（Sir Arthur Gilbert, 1913～2001，于2000年封爵）的收藏宣言。2000年时，他收藏的古代银器精品与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的当代银器佳作首次联袂展出，吉尔伯特爵士在展览中与记者们分享他的收藏准则。

阿瑟·吉尔伯特爵士1913年生于英国伦敦，1949年，他与第一任妻子罗莎林德（1913～1995）及小儿子科林（1947年出生）移居美国洛杉矶。其后，

阿瑟·吉尔伯特爵士成为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商人。在20世纪下半叶，他以雄厚的财力慢慢成就出一个非凡的欧洲装饰艺术风格收藏系列。除银器外，阿瑟·吉尔伯特爵士的藏品亦包括19世纪古罗马艺术风格的珐琅彩绘艺术品、鼻烟壶和微型马赛克拼图。他成为20世纪第一位拥有完整英国银器收藏序列的收藏家。为了和社会公众一起分享这些珍宝的价值，吉尔伯特家族将藏品借给博物馆做学术研究、出版著作，并举办导赏和展览，后两者更令普通人，而不仅仅是有经验的收藏家受益。

作为一名企业家，阿瑟·吉尔伯特爵士将十分现代的建筑形式和材料应用到房地产建设中，与他们夫妻俩精心挑选的大部分为1900年前制造的艺术品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审美落差：他们的收藏通常是大型的，甚至是不朽的作品，大部分有着最出色的细节装饰。如一个底部以龙装饰的18世纪咖啡或热水壶，在欧洲，龙的寓意并未如中国文化里有着吉祥的象征，但其积极正面的寓意使它成为纹章的流行装饰主题。这银壶在英国都铎王朝时由一名英国贵妇拥有，以龙的尾部作为链条的提手，亦反映出当时中国风在伦敦盛行。

吉尔伯特家族于“二战”期间在伦敦经营时装生意，特别注重丰富的视觉效果和可爱的细节。一张战时订单上写着“空袭期间未能保证送货”，可见他们的高标准。当时阿瑟·吉尔伯特在业务上奔波，妻子罗莎林德则负责设计服装，灵感来自巴黎时尚界的天才人物艾尔莎·夏帕瑞丽（Elsa Schiaparelli）。罗莎林德·吉尔伯特的时装公司提供度身定制服务，亦可提供不同的布料。客户可以在伦敦最高级的百货公司选择他们喜爱的布料以定制服装，这些百货公司至今依然家喻户晓。罗莎林德的工作室有一段时期设于牛津街的北边，贴近伦敦主要购物区。标志这对夫妇达至成功顶峰的事件是他们参加了1946年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举办的“英国制造”（Britain Can Make It）展览，当时的伦敦因为“二战”时德国纳粹的狂轰乱炸而遭受重创。

三年后，阿瑟·吉尔伯特爵士一家离开伦敦，移民至美国。即使在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英国的美学和文化价值体系仍深深影响着阿瑟·吉尔伯特爵士

的自我认同感及世界观，以及他对于艺术和设计的执著。英国银器成为阿瑟·吉尔伯特爵士最早收藏的艺术品，一些古代银器的特质，与他的时装事业不谋而合：当产品的设计核心理念一旦建立，就会在制作过程中不断重复，但根据各种订单，会注入不同客户的要求和细节，就像家族标志一样，每件产品都独一无二。这种情形被伦敦金银匠界的两位重要人物保罗·德·拉米热（Paul de Lamerie, 1688 ~ 1751）和保罗·斯托尔（Paul Storr, 1771 ~ 1844）发挥得淋漓尽致。

17世纪晚期，拉米热家族以宗教难民的身份移居伦敦，他们聚居的街区居民超过60万，已成为伦敦一个大街区。他的父母信奉胡格诺派，教徒中包括许多技术精湛的工匠。他们的法式风格和无与伦比的工艺改变了英国的银器工艺，使得伦敦成为18世纪银器工艺最具创新精神的中心之一。保罗·德·拉米热为一法国籍工匠的学徒，他于1713年注册第一个商标后，立即成为伦敦最受欢迎的工匠之一。1738年，拉米热在苏豪区莱斯特广场北面的爵禄街设立工作坊，标示着1743 ~ 1744年份的咖啡壶或热水壶，为他工作室最具创新性的产物。这件作品体现了设计形式上的创新，在简单的形状上以漩涡形装饰贝壳、花朵和丘比特，塑造成一件洛可可风格的作品。

同时期，保罗·斯托尔亦领导着当时最成功的银器工厂之一。他优雅作品的灵感来自古代艺术。如本次展览中标示1806 ~ 1807年份的带盖双耳汤锅，四件套之一，为坎伯兰一世公爵和汉诺威国王（1771 ~ 1851）所制，是19世纪用于晚宴的器具套装中的一件，其提手上的蛇和狮子设计汲取了古埃及和古希腊的文化因素。

经过前期的准备工作，阿瑟·吉尔伯特爵士收获了第一批藏品，并寻求专家的建议，有系统地建立起一个综合性的收藏系列。他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一些稀有而精致的作品，如娇小的伊丽莎白时代玫瑰香水镀金银瓶，这件银瓶是后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如此奢华的饰品在16世纪是被王室推崇的礼物，他们一般用作喷洒玫瑰香水于双手和身体，在当时非常时尚且极为少见。相似的香水瓶至今只发现四只，这件是同品类中仅存的一个，瓶上标示年代为1553 ~ 1554年。阿瑟·吉尔伯特爵士收藏系列从14世纪后期的杰作开始，它们是时尚风潮变迁的见证，亦揭示了不同时期社会精英的奢华生活。

海螺杯以海蛇和神话人物作支架装饰，海龟作底。

因其稀有的工艺，很可能是出自王室的收藏。当时社会着迷于异国物料的产物，物料来自当时欧洲新兴的航海贸易。杯上无标记，可能是16世纪晚期英国或法兰德斯（中世纪西欧的一个国家，今为欧洲西北部的一个地区）出产。

香炉用来消除食物的异味，展出的这件香炉有两个容室，下层用于燃烧火炭，使盛于上层的香精挥发。这类大型银器是17世纪贵族身份的重要象征，一般会伴随其他银器如吊灯和储酒器一并陈列。丰富的装饰受17世纪晚期法国路易十四宫廷风格所启发，由三个独立元素组成，专为一个宏大的空间订制。其中带翼天使和面孔的装饰元素暗示着该件物品可能为基督崇拜而制作，但此类题材亦为当时银器的流行装饰。与此同时，亚洲瓷器亦为几个世纪以来备受追捧的奢侈品，当时的著名收藏家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 1760 ~ 1844）委托伦敦金匠詹姆斯·奥德里奇（James Aldridge）制作的一对乾隆时期（约1736年）瓷咖啡壶的镀金和银底座是最好的见证。

罗莎林德1995年去世后，阿瑟·吉尔伯特爵士决定把他的收藏迁移到家乡伦敦，他的珍藏先在一所博物馆展出，直至2008年迁入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如今，吉尔伯特收藏系列由伦敦吉尔伯特艺术信托基金和洛杉矶吉尔伯特公共艺术基金共同持有。此收藏不断发展，并超越了阿瑟·吉尔伯特爵士的生命周期，每次收藏的准则，会秉持阿瑟·吉尔伯特爵士的宣言——“不只为我们，而是为所有人。”他希望借助博物馆的展览，吸引更多的观众。至今整个收藏规模已达1200件（套），而银器占近40%，其中包括最近添置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于1731年赠送给他的教女Emilia Lennox of Goodwood的洗礼杯。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阿瑟·吉尔伯特爵士为他的珍藏找到了新的方向，随之而来的是大批的藏品收购。当然，他从未失去对银器的初心，这件仿真的银天鹅是他于1987年，为他家的饭厅而配置。它显示了银器工艺的传承，2000至2008年在萨默塞特府展出时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件展品，当时的萨默塞特府是独立的吉尔伯特博物馆之所在。中世纪时，银制动物模型已经开始生产，到了18、19世纪非常盛行。作为一件高度仿真的当代艺术品，它为这次展览的开篇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银器制作这项传统工艺，一直在伦敦的工作坊中延续并传承着。银匠工艺师们，不论何时，都致力于探索银器的美和工艺，并以不同的方式寻求新的突破！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 《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有关品质》
《生命八卦》

限时 **8.5折**

典藏特惠

慢享20年的文字与时光

扫码直接购买



微信



淘宝

淘宝店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lifewee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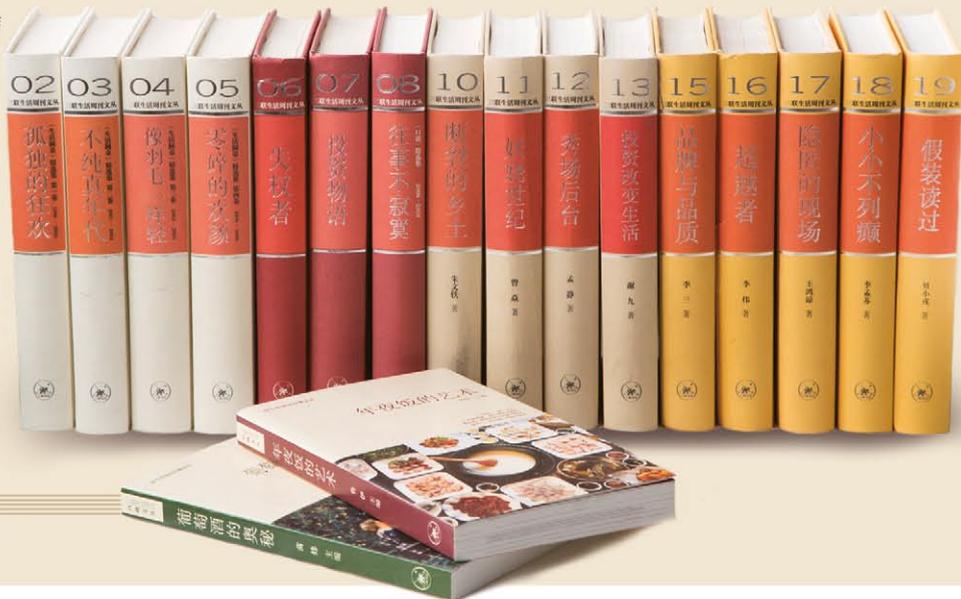
微信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进入微店

1995-2015年，
三联生活周刊20年的成长历程，
我们先后四辑出版这套精选文从，
包括经典栏目作品集及主创个人作品集。

《三联生活周刊》精选文从
与《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单本 **6.5折**

2本及以上 **4.5折**



十年	孤独的狂欢	不纯真年代	像羽毛一样轻	零碎的欢颜	失权者	投资物语	往事不寂寞	有关品质	断裂的乡土	妖娆世纪	秀场后台	投资改变生活	生命八卦	品牌与品质	超越者	隐匿的现场	小小不列颠	假装读过	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10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如需购买整套文从产品，欢迎致电读者服务中心：010-84050451/84050425，或登录官网商城：<http://shop.lifeweek.com.cn/>

为什么美国精英初中离中国孩子越来越远？

——专家深度解析中美教育不同标准所导致的系统误差



美国精英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未来能够影响世界并推动人类进步的社会卓越贡献者。此话多数中国人以为很虚，但这却是美国精英家庭孩子从小耳濡目染的价值追求。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会塑造出孩子完全不同的人生角色：一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另一种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卓越贡献者。

中国富裕家庭最早看到了两种命运的不同，抢占先机到美国找“名师”变“高徒”，从世界至高点俯视全球。美国的多元文化，能够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多样性，寻找到更丰富的生命意义。精英圈子的“发小”情谊，也是人生的宝贵财富。而这些价值，也正是吸引高净值家庭送孩子低龄留学美国的根源。

当出国留学变成潮流时，竞争态势自然水涨船高，录取条件也日益严苛。为了避开申高（8申9、9申9）的惨烈竞争，也为了让孩子尽早适应美国校园文化，达到良好融入的目的，在小学毕业后就送孩子赴美留学（6申6、6申7）的现象已蔚然成风。

硬币都有正反两面：年龄小、可塑性强固然是优势，但随着中国小留学生问题层出不穷，“硬币的反面”逐步被美国精英学校和中国家长群体体认。美国学校要挑选的人，是能够在异域文化中保持心理健康、在教师指导下善于自省并完善人格、在学术上与美国教育体系能够接轨的孩子。但是，由于中美两国的不同教育标准，导致中国孩子若无充分的准备和持久的训练，普遍不可能达到美国小学毕业生的认知能力和语言水平，更会导致美国精英中学离他们渐行渐远。

中美教育标准有哪些显著不同？

1. “传授知识” VS “启发智慧”

中国人认为孩子天生就是一张白纸，只有在老师的教授下才能获得知识并掌握技能；而美国人认为，每个孩子天生就具备卓越的才华，老师的作用只是通过启发将孩子的智慧引导出来。因此，中国的教育关注学生具体“学到”什么，学习的内容重在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而对自我认知和人际世界的认知，基本空白；而美国的教育更在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否真的“会学”。除了认识“外部世界”，更要求孩子借由认识外部世界去更好地认知人际世界和自我内心世界。这种教育本源认知上的不同，造成了中美在教育标准、教育方法、教育策略乃至教育结果上的根本不同。而且，习惯于外部驱动的中国学生和习惯于内部驱动的美国学生相比，缺乏美国精英学校极为重视的遵纪并自律、好奇心、创新能力、积极主动和独立精神。

2. “知识记忆” VS “批判思维”

中国的教育以知识记忆为主，而美国的教育更关注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孩子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进而去进行研究型学习：即要求学生整合阅读能力、分析能力、合作能力于一体去完成项目制学习研究。美国学校因此对小学阶段思考力和研究力近乎空白的中国留学生有着巨大的挑战！

侧重知识记忆的中国教育的重点——记忆、理解和应用与侧重思维培养的美国教育标准——分析、综合、评价相比，在思考能力、思维模式上有很大的劣势。长期在“死记硬背”教育环境中的孩子，又独自在异域文化的环境下，想要短期内完成思维模式的转变跃升，可以想象到是多么艰难，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

中美教育，不仅是教育理念的不同，更是在具体标准上有巨大差异。与美国的同龄人相比，中国的小学生存在哪些“先天性”差距，导致美国学校远离中国学生？

一、阅读能力

1. 阅读的广度和深度差距巨大，无论是质的要求还是量的要求，都是数量级的差别

按 CCSS 全美教学标准要求，美国小学毕业生至少需要阅读 1404 本课外读物，阅读量占到全部 K12 年级阅读量的 77.6%，且涉及故事、诗歌、戏剧、信息类等 13 种文体。在阅读深度上，美国要求小学毕业生不仅能够对文章细节与主旨进行精准理解，还要求对文章结构与内在逻辑进行严密分析！反观中国小学 5~6 年级的语文教学大纲，不仅对课外阅读量要求低（五年制阅读总量不少于 100 万字即可），

而且在阅读深度上只要求做到“初步理解”句、段、篇之间的联系和分析概括文章主旨即可。中国对孩子阅读基本功的教育可谓具有“先天缺陷”！

2. 阅读技能、阅读策略及落实手法也差距极大

中国小学阶段对阅读能力的要求是记忆、理解和应用，而美国小学生在毕业时已经能够对阅读材料进行一定的分析综合与评价。例如通过讨论式阅读，来增强对人际世界的认知和社交能力；通过阅读进行反思，提高自我认知能力等。因此，进入初中后，以分析、综合、评价为主的阅读作为最基本的能力，老师默认大家都会，没人会专门再去教。中国的低龄留学生，如果不事先将阅读“童子功”补足，不仅难以进入美国精英初中，即便侥幸进入也难以在美国教育体系中成为佼佼者。

阅读作为两个输入项之一，中美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写作方面的差距也是惊人：

二、写作能力

1. 写作题材的数量和写作难度存在量级差距

与美国小学生要写出观点鲜明、逻辑严谨、结构清晰的全文(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才算达标的写作要求相比，中国小学生的写作要求是写出有中心思想、有条理、有真情实感的简单记叙文！从小学开始，美国的孩子就已经学会了“老师布置课题—学生分组分解课题—分头研究子课题—自行阅读延展材料和参考教材—小组开会总结提炼观点—修正原始课题和观点—补充材料—撰写报告—修正报告—提交作业”的研究性写作。而中国的小学生从小极度缺乏这种运用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去进行研究性写作的机会，还只停留在对观察的事物进行描述的浅层思维写作上！这样的孩子如果没有接受系统性训练，几乎不可能在美国初中拔得头筹！

2. 写作时长与耐力的差距

美国小学生既能快速完成短时间基础性写作，也会根据特定写作任务进行长时间（一周或一月）大论文写作。而中国的小学生只具备基本写作能力，根本不被要求长时间写作和研究性写作！这种要求上的差别导致学生的思维方式、写作能力和写作耐力存在巨大差距。而大项目写作，是美国初高中越来越要求的教学重点，中国的孩子若没有在这个方面打下坚实基础，去了美国面对要求用流畅、正规甚至严谨又优美的语句去完成 Essay 作业，不啻一场噩梦！为什么在美国一些地方出现“代写作业”的荒唐服务，与中国学生低下的写作能力也有一定的关系！

三、听说能力

中国小学生的听说能力只局限在“信息接收——关键信息复述”的单点思维上，无法对所听到的内容进行概括总结并在逻辑思辨后用自己的观点进行“输出”。这恰恰是美国初中所要求的重点能力！试想，这样的中国孩子在美国以讨

论与观点表述为主的课堂学习中，怎能不成为“沉默的隐形人”（silent student）呢？

总之，中美教育标准的巨大差异，导致同为小学毕业生的中国孩子和美国同龄人在学术与社交能力上存在较大的差距！来自基础教育的盲点，是造成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学习和发展过程中持续发生系统性误差的根源！而且出去留学的时间越晚，差距越大！这也是为什么聪明勤奋肯吃苦的中国孩子来到美国后，不仅在世界一流大学很少有人能够出类拔萃，而且在国际高科技领域中也罕有卓越成就的原因之一。

如何在有限的留学准备期，从根本上帮助孩子补齐“教育盲点”与“能力短板”？

答：沿着正确的方向并采用科学的手段进行持久性训练！

孩子不受道理驱动，但会被习惯驱使！盖特唯的留学准备工作，做的就是踏踏实实修炼学生的品性，让他们通过对自我的认识完成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化，真正享受学习的过程和成长的乐趣与挑战！盖特唯深悉中美教育标准的差异，从培养孩子的分析性阅读和研究性写作入手，从根源上对学生进行内部驱动力、快速学习力、深度理解力、逻辑思维力、三观再造力等方面的系统重塑；通过持续性训练补足孩子的教育盲点和能力短板，用好习惯驱逐坏习惯！自成立以来，盖特唯两届学员 100% 进入美国精英名校，被业界称为“奇迹”！但是我们知道这并非奇迹，而是源于教育者真的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真的知道精英的塑造之道，真的深刻理解美国教育的精髓和关键，也真的在努力践行自己的教育理想！

盖特唯对教育不懈追求的动力，来自我们对教育发自肺腑的热爱——帮助更多中国精英家庭的孩子获得美国名校入场券，培养他们成为未来社会卓越贡献者的能力和素质，帮助他们收获成功与幸福的人生！我们的更高使命，不仅是为中国“说多做少、理论多实践少”的教育培训行业树立一个“唯求实效”的行业新风，更让每一位踏踏实实做教育的人，凭借实实在在的教育成效享受富足而备受尊敬的生活！

关于盖特唯留学教育（GA-prep）

青少年精英留学特训、家庭教育诊疗，家族继承人培养，专注新生代留学成才教育，为精英家庭提供个性化低龄留学全案服务，助力孩子的留美之路走得更好，立得住，飞得高！2015～2016 全员获得美国精英名校 offer，美初申请更有着全员斩获 Top10 名校的骄人业绩！更多家庭教育及留学类“干货”分享，请关注官方微信“盖特唯留学教育”或“gtwk12”。咨询热线：010-59718876，官方网站：<http://www.gtwk12.com>



乔尔乔内与威尼斯画派

文 / 谢斯曼

如果说谁最能代表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精神内核，除了乔尔乔内，我想不到第二个人。

对于大多数艺术爱好者来说，“威尼斯画派”应该不算是个陌生的概念。提香、丁托列托、委罗内塞是最常被提到的威尼斯画家，但人们对于这些绘画大师所活跃的那个时代，却始终抱有朦胧的理解。16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艺坛风云际会，北有上述的威尼斯画派“三杰”，南有佛罗伦萨画派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有趣的是，这后三位又被称为文艺复兴“画坛三杰”，在后世的知名度也约莫是高过威尼斯画家的。造成如此现象的原因自然很复杂，但抛开主观因素，威尼斯画派在技术上真的低佛罗伦萨一等吗？

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s）的展览《在乔尔乔内的时代》（*In the Age of Giorgione*）似乎可以为以乔尔乔内为首的威尼斯画家正名——至少让人们更加系统地对16世纪的威尼斯画坛有所感知和了解。

如果说威尼斯画派在艺术史学界的研究中本来就被有所冷落，那么乔尔乔内则是这批艺术家中尤其被忽略的一位。我的艺术史硕士学位专攻威尼斯古典艺术，然而，当年跟随教授穿梭于威尼托大区（Veneto）的各个大师杰作间的日日夜夜，竟没有一个是奉献给乔尔乔内的。虽然如今我们说威尼斯画派以乔尔乔内为开端，这位神秘的画家其实更像是一味药引，将威尼斯画坛导向了全新的风格，而他自己，却似乎没有留下特别多可供钻研的作品。

直至今日，人们对乔尔乔内其人都知之甚少，大多数的信息来源于意大利艺术史学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的著作《艺苑名人传》（*Le vite de' più eccellenti pittori, scultori e architettori*）。据瓦萨里介绍，乔尔乔内于147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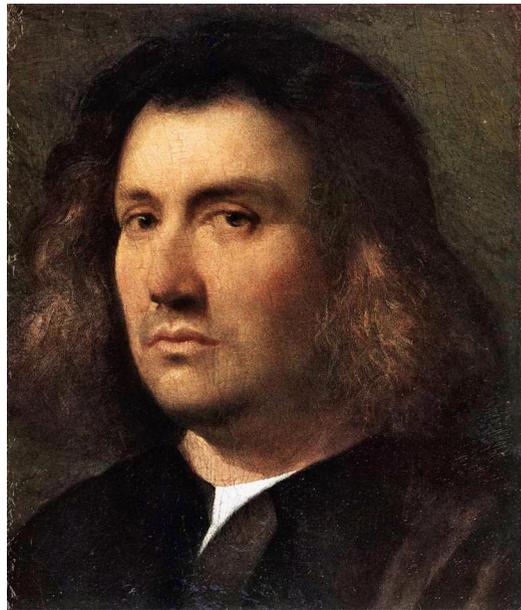
生于威尼斯共和国大陆地区的一个小镇卡斯泰尔弗兰科（Castelfranco）。他在威尼斯长大，并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绘画。按我们现在的话说，乔尔乔内是个放浪形骸的才子，通音律，善歌赋，常常活跃于威尼斯贵族圈的各种聚会中，日夜皆是觥筹交错，胜友如云。如此驹驰不羈自然是天生情种，据说他常常吹着长笛在姑娘的阳台下求爱，直至34岁那年被一位情人传染上鼠疫，病死在威尼斯。

瓦萨里认为，乔尔乔内在艺术造诣上超过了他的前辈乔万尼·贝里尼（Giovanni Bellini），并且为后世留下了两名非常优秀的学徒——塞巴斯蒂亚诺·德·皮翁博（Sebastiano del Piombo）和提香，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与一些托斯卡纳的画家（即指佛罗伦萨画派）实力相当。如此评价听起来并不算很高，但实际上，这是作为托斯卡纳人的瓦萨里，在那个年代能够给予威尼斯画家的相当大的赞誉了。

彼时的意大利充满了人文主义的思潮，文人们对于“艺术”的概念及“绘画”的评判标准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人们为了评判艺术家水平的优劣、地位的高低争执不休。在来自托斯卡纳的瓦萨里眼里，佛罗伦萨是让艺术重生的至高无上的地方，而他所处的时代，是艺术发展达到顶峰且维持在顶峰的时期。他认为，威尼斯画家的水平普遍低于佛罗伦萨画家。比如，提香之所以注重色彩的运用，只是为了掩盖他在素描上的功底缺陷，而他画中灿烂壮丽的裸体人像也被瓦萨里讽刺为一块块“活肉”（carne viva），意为批评他笔下的人物只有躯壳没有灵魂。这种充满偏见的文化中心主义论调自然会遭到其他一些文人的攻击。来自威尼斯的艺术理论家卢多维科·杜切（Ludovico Dolce）反对瓦萨里对米开朗琪罗的盲目吹捧和崇拜，

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展览“在乔尔乔内的时代”展出画作：

1. 提香，《基督与淫行妇人》，约1511年
2. 乔万尼·贝里尼，《圣母子、圣彼得、圣马可及信徒》，1505年
3. 乔尔乔内，《暴风雨》（此次并未展出），约1506~1508年



左图：乔尔乔内，《日落》，约1502-1505年

右图：乔尔乔内，《男子肖像》，1506年

并表示拉斐尔从各个领域，尤其是叙事画（*Istoria*，在当时被认为是最高级别的绘画，因此最考验绘画者的能力）方面完胜米开朗琪罗。杜切同时认为，提香在叙事画方面的能力媲美拉斐尔，但提香别的方面的能力又优于拉斐尔，那么显而易见，提香的水平大大高于米开朗琪罗，因此威尼斯画派的能力是高于佛罗伦萨画派的。

不论如何，许多名声高过乔尔乔内的威尼斯画家，在瓦萨里的理论中都逊色于托斯卡纳画家；倒是乔尔乔内还能够在他心中一比佛罗伦萨画派，并且在《艺苑名人传》中，乔尔乔内紧跟着达·芬奇的传记出现，足见瓦萨里对他的肯定了。那么，名气并不很大的乔尔乔内，凭什么会受到艺术史学家的青睐呢？他在威尼斯画家中之又是怎样的角色？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此次的展览便颇好地展现了他对威尼斯画派的影响。目前学界普遍认定出自乔尔乔内之手的画不超过10幅，不过，由展览标题所示，比起一个人，这个展更是关乎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一群人。因此，展览中不仅有乔尔乔内的作品，也有比如贝里尼、提香、皮翁博等大师之作，以及名气稍小些的、被誉为乔尔乔内主义者的乔万尼·卡里亚尼（Giovanni Cariani）等人的画作。通过不同作者间的横向对比，自然能看出乔尔乔内的不同之处。

展览第一部分以肖像画为主题。各种画作中的人物几乎清一色蓬松的齐肩淡发，着黑色软帽和深素色长袍，是典型的16世纪威尼斯普通贵族的装扮。贝里尼所作的一幅半身像尤为显眼。画中的主人公、威尼斯人文主义学者皮埃特罗·本博（Pietro Bembo）被放置在室外背景中，身后的碉堡和雉堞桥栏蜿蜒指向远处的城池，风烟俱净，天山共色。风仪严峻的本博和他远望的神情在贝里尼干净、清晰的绘画线条下显得愈发庄严静美，如此古典、如此澄澈是贝里尼作品一贯的气质。

乔尔乔内的画风则和贝里尼截然不同。他的作品《男子肖像》（*Portrait of a Man*）的笔触极度柔和，这样的风格在当时是相当前卫的。男子的肖像几乎占据了整个画布，光线柔和地打在他的身上，在脖颈处留下了淡淡的阴影。他灰黑的头发陷入模糊的深绿色背景中，颧骨也温柔地和薄纱般的发辘融合在一起。乔尔乔内几乎是最先在绘画上使用明暗对照法（*Chiaroscuro*）的画家，他熟练掌握并运用达·芬奇彼时刚刚开创的晕涂法（*Sfumato*，即运用在名画《蒙娜丽莎》上的著名技法）——在此之前的1499年，达·芬奇恰好到访过威尼斯，乔尔乔内也许就是趁那时毫不费力地学会这个技法的。最关键的是，乔尔乔内肖像画中的人情绪丰满，眼睛自然地与观者对视，有的甚



图里奥·隆巴杜的大理石雕塑作品：《酒神巴克斯与阿里阿德涅》，约1510年

至姿态动感。这些在当时皆是与肖像画传统相悖的，在艺术进程发展相对较缓的威尼斯甚至在整个西方画坛中，都可以说是先锋画法。

如果说贝里尼笔下的主人公富有距离美，那么乔尔乔内笔下的人物则充满了人性美，使得观者与作品的交流更加私密化。“人性”，是乔尔乔内作品的核心。他绘画从不作草图，笔触既率性又温柔。摒除犀利的轮廓，观者能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以及这个人或喜悦或忧伤的情感。瓦萨里曾说，乔尔乔内的笔触拥有无与伦比的“肉体性”，他比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画家都明白该如何表现肉体的世俗美。当然，“肉体性”也是瓦萨里一贯诟病威尼斯画派的一点，不过究竟好还是不好，全然是见仁见智。不论如何，这一绘画特点以乔尔乔内为开端，渐渐成为象征威尼斯画派的独

特风格。

展览的第二部分以风景画为主题。“风景画”作为一个绘画类别在16世纪的西方画坛是不存在的。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德国画家丢勒是欧洲现代风景画的开创者之一，除去他本人艺术经历深受威尼斯画家的影响的事实外，以乔尔乔内为首的若干威尼斯画家实际上业已在风景描绘上颇有建树。展览以乔尔乔内的名画《日落》（*Il Tramonto*）为例，向观者展示了威尼斯画派语境下的“风景画”。《日落》这部作品在成为英国国家画廊藏品之前，一直被16世纪的威尼斯艺术鉴赏家马坎托尼奥·米希尔（Marcantonio Michiel）的家族所收藏，人们在他的收藏品目录上发现了对该作品的描述：“一幅内含两个小人儿的描绘风景的画。”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评论说，米希尔

在乔尔乔为数不多的传世之作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最终成就威尼斯画派的可贵元素。

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意识地运用“风景画”(landscape)这个术语来描述类似绘画主题的人。乔尔乔内的不少作品都被他归类为“风景画”主题，除了上述的《日落》，还有著名的《暴风雨》(*La Tempesta*)。

从《日落》的构图来说，米希尔的这番描述是无道理的。画面中只在前景有的两个小人(背景中圣乔治杀恶龙的场景是由后来的修复者所添加，目的之一是掩盖画布损坏的部分)，而且没有明确的指向告诉我们这两个人物之间发生了什么。画布的其他部分通通被田园风光所占据，近处的山石草木、中间的房屋流水和远处的陆地天空层层递进，次序分明。细心的人可发现画面的景深是使用不同色温来体现的，昏暗的近景和湛蓝的远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乔尔乔内在描绘风景时一向偏爱的技巧。贝里尼也擅用界限分明的色彩分区来描画风景，但仅限于表现背景角落中的阿尔卑斯山脉与云彩。须要注意的是，这种颜色分区的技巧是尼德兰画家发明的，他们喜爱用绿色表现近景，用灰白色表现远景，这个方法在传入北意大利后被威尼斯的画家进一步改善发扬，盖因这个商贸之都给画家们提供了种类充沛的颜料，使得他们能够自由地在画布上描绘威尼斯的真实风光。提香、皮翁博和卡里亚尼的风景画技巧皆拜乔尔乔内所赐，譬如展览中皮翁博所作《阿多尼斯之死》的柔和笔触和色温对比便明显能看出乔尔乔内风格的痕迹。

宗教画是威尼斯画派作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展览的第三部分即以此为主题。贝里尼与提香的宗教画毫无疑问成为全场的焦点。一位是乔尔乔内的前辈，一位是继承他风范的晚辈，这两人作品的鲜明对比从侧面反映出16世纪威尼斯绘画风格的走向。

贝里尼的名作《圣母子、圣彼得、圣马可及信徒》(*Virgin and Child with Saint Peter and Saint Mark and a Donor*)中，圣母所坐的王座与大理石砖纹将前景与背景隔离开来，营造出戏剧般的氛围。人物位置关系均衡协调，极富古典美与和谐美。这种将

不同纪元的圣人放置在同一空间对话或与观者交流的绘画主题被19世纪以来的艺术史学者称为“神圣对话”(sacra conversazione)，用以表明信徒的虔诚态度。“神圣对话”是贝里尼的伟大发明，结合鲜亮的着色，成就了他在威尼斯绘画发展中耀眼的历史地位。

提香的《基督与淫行妇人》(*Christ and the Adulteress*)则采用了开放式构图，画面记录了人物相互交涉及拉扯的瞬间，故意破坏了构图的协调性，增添了戏剧性与即时感。画布上不逊于贝里尼的辉煌用色、杰出的笔法技巧、精彩的明暗对照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则完全继承于乔尔乔内，使得艺术史学者们多年来都误认为这是乔尔乔内本人的作品。提香所代表的风格融合了乔尔乔内与贝里尼之长，渐渐成为新的主流，并带领威尼斯画派走向文艺复兴全盛时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范。

最后一个展厅以寓言画为主题，在众多绘画作品之中，图里奥·隆巴杜(Tullio Lombardo)的大理石雕塑作品《酒神巴克斯与阿里阿德涅》(*Bacchus and Ariadne*)格外显眼。站在隆巴杜的作品前，一个人便能深切体会到深沉隽永、如诗如梦的意境。两尊浮雕胸像拥有媲美古希腊雕塑的柔和美感，而他们疏离的、上移的目光仿佛道出心中对某些不可触及之物的无尽渴望。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严的冥想，抑或是难掩的忧愁，都在这一刻悠然心会了。隆巴杜作品所散发出的难以言状的异世的梦幻感即是他自乔尔乔内作品中所学，只不过是雕塑的手法进行“绘画”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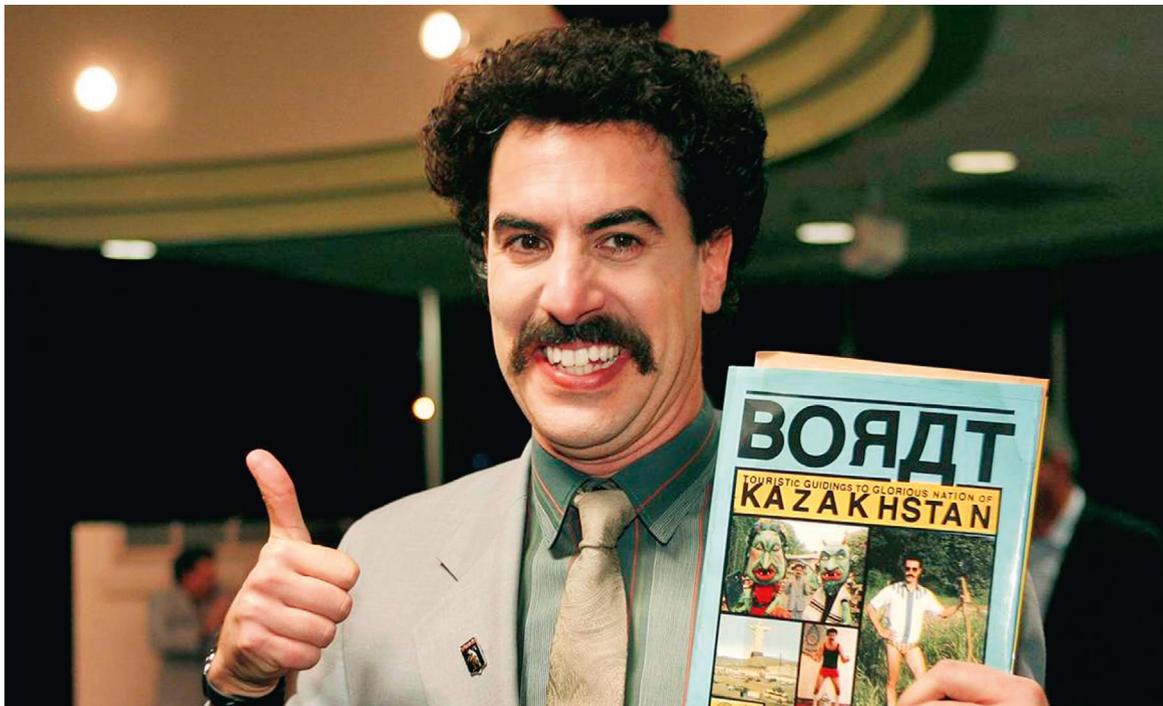
展览始于肖像，亦结于肖像。学界对于《老妇人》(*La Vecchia*)的作者是谁依旧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它带有强烈的乔尔乔内印记。画中老妇侧身而坐，瘪嘴微微张着，浑浊的双眼坚定地瞥向观者，意欲说些什么。她手持纸条指向自己，纸条上书：与时间一起(col tempo)。如果说《蒙娜丽莎》体现了理想中的永恒美，那么《老妇人》则恰恰是它的对立面，告诉我们人类真实的脆弱。不过，乔尔乔内总能够用最温柔的笔触描绘人性之美、用最悲悯的心态面对人性之弱。在他为数不多的传世之作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最终成就威尼斯画派的可贵元素。他所带来的影响在威尼斯艺术家群体中萦回环绕，而他自己的人生也如同时代的威尼斯一样，诗意、率性、浪漫、享乐但又始终带着几许神秘的忧愁。■

(图片均由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提供)

英国演员萨莎·拜伦·科恩

——从伪纪录片到“政治正确”的污电影

记者 / 黑麦



萨莎·拜伦·科恩

挑衅，是演员萨莎·拜伦·科恩一贯的银幕语言。

从英国4频道的电视节目“da Ali G Show”，再到之后的电影“波拉特”“布鲁诺”，作为主创及主演的萨莎·拜伦·科恩（Sacha Baron Cohen）似乎从未停止对于各种文化、政治甚至异域生活方式的攻击。在他2016年的电影《王牌贱谍》中，动作片“惊天魔盗团”的导演路易斯·莱特里尔（Louis Leterrier）替代了与科恩合作多年的年迈导演拉里·查尔斯（Larry Charles），放弃了此前的纪录片套路，为科恩找到了另一种喜剧方式。

20世纪90年代初，科恩从剑桥大学毕业，他和哥哥在一个酒馆里创建了一个喜剧俱乐部，之后进入了温莎有线电视台做起了主持，1995年，当时的4频

道在物色一档节目主持人的时候，萨莎寄去了一盘自导自演的“伪纪录片”风格的录影带，他在片中扮演一个来自阿尔巴尼亚名叫克里斯多的节目主持人，这个节目放大了英国人的傲慢与歧视，用一种极其夸张的手法讽刺社会的伪善，当然，真正引起制作人注意的是他特有的幽默感。自此，由科恩所扮演的那个名为Ali G的人物便出现在了英国电视上。

Ali G的人物设定是一个混血嘻哈歌手，他操着奇怪的东欧或是西亚口音，用“Da”替代“The”；用“Me”替代“My”，他的口头禅是“Wickid”（酷，俚语），他总是戴着Tommy Hifger牌的针织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并不协调的黄色镜片眼镜，他喜欢穿着艳色的衣服，使之看起来更像是来自小城市的嘻哈青年，他在一家酒吧做常驻DJ，但他还领取失业救济金。科恩甚至通过化妆刻意地改变了肤色，使自己看起来像是来自东欧与中东裔的混血，懂得他恶搞方式的人也从未反对过这种略带种族意味或是对异域文化残酷猎

奇的幽默感，因为他更愿意和政客打岔，用不同文化身份对抗种种社会组织和不同群组。

当然，科恩也经常在节目中与娱乐名人“打交道”，他以疯癫的方式戏耍名流，用近乎俗鄙的调侃方式迎合着深夜还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他在采访贝克汉姆夫妇时，以性、收入甚至孩子的名字激怒明星；他在Pulp乐队主唱贾维斯·考科尔（Jarvis Cocker）和Supergrass主唱Gaz演奏时，加入随性的且不搭调的说唱，或是干脆把音乐改成过时的电子舞曲。他也采访过很多政客，2003年，他在采访特朗普（Donald Trump）时就邀请他来投资自己突发奇想的“冰淇淋手套”项目，而惹怒了此人，一个月前科恩在接受采访时说，早知道他会成为政客，因为他对经商毫无兴趣。

无论如何，Ali G就像美国的“Jackass”（蠢蛋搞怪秀）里的约翰尼·纳什维尔，都成了亚文化的符号，他在“11点秀”这种面向青少年的时政节目中形成一套独有的语言和思想体系。一年后，“第四频道”给了Ali G一个专门的节目“Da Ali G Show”，Ali G因此得了“英国学院奖”的“最佳喜剧奖”和“最佳喜剧演员奖”。同年，科恩也进入了流行音乐界，开始出唱片，与英国歌手合作，他也曾被麦当娜邀请出演MTV，又担任2001年MTV欧洲音乐大奖颁奖典礼的主持人。

不久，Ali G的虚构故事被拍成电影“in Da house”，据说这是为了满足电视观众而拍摄的。电影讲述了一个荒唐的故事：西斯泰恩斯镇上的约翰·耐克休闲中心要被拆掉，Ali G号召大家一起拯救休闲中心。地方议会的一个政客借机利用Ali G和此事，妄图在选举中整垮对手，Ali G深受年轻人的欢迎，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一个席位，最终进入议会，当上了议员。整个电影的拍摄手法如同美国B级动画片《瘪四和大头蛋》，科恩所扮演的Ali G竟使英国观众开始相信Ali G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科恩的无厘头动机常被人怀疑成“种族主义”，事实上，他的父亲是威尔士人，母亲是以色列人，他的家境富裕，一直上的是私立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对他的评价是，聪明过人、成绩优异、性格随和幽默。受家庭影响，科恩具有左翼思想，他经常去以色列，在上大学之前，还曾经在以色列北部的一个集体农庄生活了一年。他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上的历史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黑人和犹太人联合的问题，在文中他呼吁这两个种族应该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还专程去密西西比河拜访美国民权运动中的传奇人物鲍勃·穆西斯。

在电视节目“Da Ali G show”中，有这样一个环节，电视制作人以伪纪录片的方式拍摄了一个具有乡土气的哈萨克斯坦主持人的种种奇遇，这个名为波拉特的主持人也是由科恩所扮演。到了2006年，这个角色也被搬上了大银幕，拍摄成为同名电影《波拉特》（*Borat: Cultural Learnings of America for Make Benefit Glorious Nation of Kazakhstan*）。作为主创，科恩与编剧安东尼·海恩斯设定了这样一个故事：波拉特是哈萨克斯坦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尽管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排名第六的播音员，波拉特对新闻事业还是有着更广大的追求，于是，在国家情报局的推动下，波拉特和胖胖的电视制作人阿扎马特·巴格托夫一起踏上了探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文化学习之路。扛台摄像机、提个麦克风，简单打理了些行装，波拉特就奔向了神秘的西半球。虽然看起来就像个找不着北的乡巴佬，见人就老凑张香肠嘴要亲面颊，还总爱街头采访些吓死人的问题，波拉特还是决心拍出具有震撼性意义的“纪录片”回去报效父老。他此行还有一个“隐秘”的任务——娶梦中情人好莱坞艳星帕米拉·安德森做自己的妻子。然而，他所做的一切，最终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已回到了家乡。

科恩利用他特有的古怪幽默感，赋予波拉特各种蹩脚的性格，特别是针对反犹主义、男权主义和种族主义做出尖锐的讽刺。虽然影片还没制作的时候，科恩和制片人杰·罗奇就商量着制作另类喜剧，然而他们并没有料到这种伪纪录片式的镜头感能将一个虚构的人物如此真实化，他们常常使用类似“偷拍”的方式来设置拍摄现场，使路人和演员都能自然地出现在社会环境中。《波拉特》中有很多“厕所笑话”，然而它的好评率仍达到了九成以上，影片用一种语言暴力嘲讽了美国文化的偏见、保守和伪善。

科恩曾透露波拉特的角色原型是一位喋喋不休的俄国医生，不过他的以色列血统让他最终决定以一位阿拉伯裔的视角来观察美国。影片原计划由《宿醉》导演托德·菲利普斯（Todd Phillips）执导，但是在拍摄上科恩与他存在分歧，导致菲利普斯放弃了这个计划。这部电影在北美上映一周后以2640万美元登顶票房冠军，并获得了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金球奖的喜剧类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影片。那一年，科恩趁着电影的热潮，以波拉特的名义出版了一本旅行指南。

在科恩大学毕业之后，他一度成为一名平面模特，偶尔在各种时尚杂志上露面。这短暂的经历也让他对时尚业有了些想法，于是他在2009年拍摄了一部名

为《布鲁诺》(*Bruno: Delicious Journeys Through America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Heterosexual Males Visibly Uncomfortable in the Presence of a Gay Foreigner in a Mesh T-Shirt*) 的电影, 影片中戏弄了欧洲的时尚人士。这部影片始于一个名叫布鲁诺的同性恋模特, 他自称为时尚代言人, 引领的是奥地利年轻一代的着装标准, 与此同时, 布鲁诺还身兼一档午夜时分的时尚节目的主持人, 拿着麦克风奔波于欧洲的各大时装周, 不过, 由于他的奇特着装, 无意中毁掉了一场知名设计师的时装秀。整部影片的重心并非时尚, 布鲁诺最终选择来到美国的好莱坞, 企图在那里得到事业的发展。这部电影如同波拉特的翻版, 在布鲁诺追名逐利的过程中, 却不断地引发了一个又一个波及很广的难堪境地, 他将每一个人的教养礼节的价值观, 全部推向了混乱的边缘。

由于布鲁诺的设定来自奥地利, 为此, 科恩专门学习了一口德国口音的英语。在接受GQ杂志采访时, 这一口德国英语被编辑们认为是“几乎听不懂”。这部影片中大量涉及性的内容, 美国电影协会(MPAA)把影片定为NC-17级, 后来科恩重新剪辑了影片, 协会最终网开一面, 给了一个R级。影片上映前, 环球影业以4250万美元拿下了《布鲁诺》的改编权争夺战, 其中科恩将获得1300万美元的预付报酬, 他还将从影片最终的票房里拿走15%的提成。

科恩的喜剧总是在低俗之余表达着很强的政治意识形态, 2016年的影片《王牌贱谍, 格林斯比兄弟》也被称作“喜剧框架的政治电影”。影片中, 马克·斯特朗饰演一位军情六处的特工, 与失散多年的足球流氓哥哥诺比(科恩饰)偶遇, 最终上演了充满肮脏情节的拯救的搞笑故事。

科恩此前电影一直采用的纪录片方式被彻底放弃, “惊天魔盗团”的导演路易斯·莱特里尔用一种熟悉的喜剧风格将这部电影塞入主流之列, 特别是在开篇和结尾两处枪战戏中, 视角运用了游戏“孤岛危机”和“使命召唤”的镜头感, 为科恩的影迷第一次提供了精细的场景设置。整个影片以动作电影为基调, 全场只有科恩出现时, 才带出笑料。

电影拿哈利·波特、特朗普等人开涮, 科恩也调侃起英国人特有的兄弟情谊, 二人如同Libertines乐队的皮特和卡尔形影不离, 却也充满“基情”; 此外, 英国摇滚乐也被其列为标靶, 特别是绿洲乐队的主唱利亚姆·加拉格尔(Liam Gallagher), 几乎成了诺比的人设, 他留着长发和鬓角, 穿着如同蓝领阶级的球衣和拖鞋, 满口曼彻斯特口音, 不时喊出几句脏话,

他承认自己足球流氓的身份, 嗜酒却也关爱家人。

男主角诺比穿着黑白间条队服大闹格林斯比俱乐部, 让人不禁想起刚刚结束的赛季中, 格林斯比城队成功杀回英乙联赛的场景。诺比穿着白色英格兰复古球衣, 犹如英格兰1993~1995年的主场战袍, 而那个19号, 如不出意外的话就是在致敬保罗·加斯科因, 这位曾经拯救英格兰国家队的灵魂人物, 却因为场外的种种“不良嗜好”一次次成为娱乐八卦话题, 他在2003年加盟甘肃天马, 经历过短暂的数次上场后便回国退役, 加斯科因的落魄也恰好隐喻了诺比的人物性格。弟弟光头特工穿的是9号球衣, 他可能来自90年代英格兰头号传奇射手阿兰·希勒, 他所效力的纽卡斯尔的球衣与格林斯比城球衣均为黑白条相见, 足见科恩在塑造人物形象及其映射时的细心。

科恩也不忘拿英格兰足球打岔, 历史上他们只在1966年本土举办的世界杯上赢得冠军, 而欧洲杯的最好成绩也只是1968年的季军, 因此诺比在胸前文身时写出英格兰将在2016年取得世界杯冠军, 在电影中, 特工弟弟提到最大犯罪组织的时候, 哥哥很快回答道: FIFA。

当然, 电影中也涉及政治包袱。科恩影射了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和唐纳德·特朗普的风流生活作态, 也利用“中东和平大使”嘲讽了美国对中东局势的作态、歧视与刻薄, 结尾处和平代表竟因谋杀军情六处特工而被处死并登上新闻版面, 并高呼“我痛恨和平”, 这一荒诞之至的情节安排像是在戏谑打趣, 另一个方面也成为影片唯一可圈可点的黑色幽默情节。此外, 他对于拯救世界、治愈地球等伪善的明星慈善也充满诋毁。《王牌贱谍》是科恩的一种尝试, 但它仍沿袭了科恩一贯的挑衅语言, 它利用污的元素来掩饰他明目张胆的极“左”主张, 也用无厘头的幽默元素调侃自己的观点。在《独裁者》中, 他用一种“当代卓别林”式的表演讽刺集权, 而在《王》中, 他尝试着用一种底层的方式来强调影片内容的“政治正确”, 或许, 这也是科恩的讽刺。

顺便说一下, 作为演员的科恩一直在其他电影中精挑细选着适合自己的角色, 比如《马达加斯加》中的狐猴国王朱利安、《悲惨世界》中的德纳迪埃、《爱丽丝漫游仙境2》中的Time等。他有着诡异的特质, 又具有不同于多数英国演员的视角, 他善于侧目时间, 用他所见的荒谬嫁接出一个个令人惊讶的角色。█

(本文参考了《Ali G, 千万别把他当真》及《三狮军团, 英格兰队永世情操》等文章。实习生糊糊对本文亦有贡献)



秦昊

秦昊：快乐拍电影

文 / 宋彦

与伊能静的恋情,让他由一个“艺术工作者”,变成一个八卦版的明星。

混出的演技

秦昊拎着水杯从远处走来。他穿一件随意的T恤,踩在人字拖上的身体松松散散的,没拿杯子的那条胳膊在身边甩来甩去,一脸事不关己的表情。

当初,娄烨就是看上了秦昊这走路的样子,“说话时,他也经常在你面前走来走去,走到你晕”。他让秦昊演《春风沉醉的夜晚》里的江城,电影里有很多走路的镜头,秦昊从白天走到夜晚,从昏暗的走廊走到破败的街区,他与爱人在行走中相遇,也在行走中告别。事后,娄烨这样评价秦昊在电影中的表演:“《春风沉醉的夜晚》里,秦昊的行走确实非常动人,他提升了‘江城’的质感,使这个人物轻松地进入到精神层面。”

对娄烨来说,演员秦昊的珍贵之处不在于“演”,而在于“混”：“他是一个混生活的人,所以,他的表演有浓厚的生活感,这对于演员来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气质。”

几位把秦昊带上表演路的前辈和朋友最先看中的都不是他的演技,而是他与生俱来的气质。秦昊读中戏时的班主任常莉老师说,招生时,章子怡、秦海璐、袁泉等人的才艺都让人印象深刻,刘烨的命题表演她至今历历在目,而秦昊在专业考试上没给她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她只记得,这孩子有见识,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整个人非常放松。

在常莉的记忆里,秦昊顽皮,但脑子灵,没吃过什么亏。迟到、作弊、惹乱子,每样事他都参与了,但他总能把自己隐藏得很好,不冒头,也不认怂,打起太极来游刃有余。他轻易不说话,偶尔抖个机灵,就能把同学和老师逗得嘻嘻哈哈。

今年初,秦昊主演的电影《长江图》拿到了柏林电影节“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秦昊的电影节红毯履历上又多了浓重的一笔。当初,导演杨超找秦昊演

电影中的落魄船长高淳,也是看中了他身上忧郁的诗人气质。“导演可能觉得,我不演就有他想要的感觉了吧。”秦昊笑着猜测。

王小帅和娄烨一样,看上的也是秦昊混来混去的游离感。两人刚认识时,秦昊没有戏拍,整天有大把时间用来荒废。王小帅总在朋友聚会上见到他,“背个很潮的包,大家就都叫他小背包”。

“小背包”对自己出手阔绰,在商店里转一圈就能置办件几千块的行头。大家只听说他是演员,是章子怡和刘烨的同学,至于演过什么,没人知道。为《青红》选演员时,副导演对王小帅说:“你看秦昊怎么样?”王小帅回:“谁是秦昊?”副导演赶紧提醒:“就是那个小背包啊。”王小帅想了想,这小子来无影去无踪,神神道道的,还特时尚,倒真有点大城市游手好闲的小青年的样子。“挺合适,让他来吧。”连试镜都没有,王小帅就决定让秦昊来演《青红》里的叛逆青年李军了。

电影里,李军有一段在歌厅跳舞的戏,秦昊自编自演,以风骚、浮夸的舞步构建了人物性格,也暗示了李军未来命运的走向。这段表演让他在专业领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现在回头看,表演是有些过了的。多亏这个角色帮了我,要是以这种舞台式的表演去演《青红》之后遇到的角色,那我就死定了。”《青红》和王小帅对秦昊意义非凡,在恰当的时机遇到一个可以驾驭的角色,这个角色就像电影中那段牵手女生的歌厅热舞一样,决定了秦昊未来的表演之路。

三年等待

接受采访时,秦昊刚刚杀青《地狱恋人》在广州的戏份。这已经是他与娄烨的第四次合作,过去十几年,秦昊演了三部王小帅的电影,做了三次娄烨的男主角,这六部电影先后把他带上戛纳、柏林、威尼斯等欧洲电影节的红地毯,让他成为国内入围欧洲电影节次数最多的男演员。

拍完《青红》不到半年,秦昊就接到了电影入围戛纳的消息。站在戛纳的红毯上,他第一次体会到王

小帅口中“穿新衣，感受尊重”的感觉。影院里、酒店里、咖啡馆里，各路电影大腕在身边擦肩而过，被影迷认出来，就伸手打个招呼。没人簇拥偶像，也没人举着牌子喊“×××我爱你”。刚崭露头角，没有太多采访和拍摄的邀约，因而得以完全沉浸在电影的世界里。“世界上竟还有一个地方这么尊重电影。”回忆第一次戛纳之行，秦昊说，他对这种被尊重的感觉着了迷。

随《青红》出席戛纳后，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秦昊没有接戏。旁观者王小帅觉得，当时的秦昊心里较着劲，他希望再去电影节。“有人在乎成名、赚钱，他不在乎，也不缺那个。他就想体会电影至高的荣誉和尊重，电影节很多人都去过，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意识和觉悟。”

秦昊常说，王小帅是自己电影的启蒙者。《青红》的表演经历固然重要，但对于他此后的演员事业来说，《青红》本身远没有戛纳之行重要。

在那之前，秦昊对法国电影等欧洲的电影没有概念，所有表演用的都是校园里学来的话剧表演的方法论。戛纳之行为他打开一扇窗，他按图索骥地了解了法国电影、德国电影，熟读了新浪潮、欧洲电影史和世界电影史。在无所事事的那三年，他读了很多书，看了数不清的盗版DVD。

如果说《青红》之前的无所事事是被动的，那《青红》之后的等待就是纯粹的任性和坚持。曾有很多公司和电影找到秦昊，希望合作，他打量一番，都拒绝掉了。“不是王小帅、娄烨，也得是陈凯歌、张艺谋啊，电视剧是不会再接的。”

其间，王小帅也劝过他：“毕竟和导演不一样，演员是被动的，现在看，他算运气好，碰上了我和娄烨，运气不好的话，就只能干等着，不一定有合适的角色。当时，我劝他该演什么就演什么，电视剧也演演，让大众多知道你。他偏不，就是较劲。”

秦昊现在的经纪人周嗣伟觉得，当初秦昊能挺那么久，和他的家庭环境有关。“不缺钱，不需要养家。在这个行业那么多年，艺人受家庭的影响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差别太大了。”

三年之后，秦昊等来了娄烨的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他在电影中饰演同性恋江城。刚接到这个角色时，秦昊犹豫了一下。“郝蕾演的《颐和园》被禁了，我演这么个电影，不能公映，再因为它被禁了，演不了戏，那不是得不偿失？”但这样的纠结并没有持续

多久，“就算被禁，起码有这么个形象留在大家心里了，算一算也值了”。

如秦昊所愿，尽管电影受到争议，但它还是带秦昊再走了一次戛纳的红地毯。“《春风沉醉的夜晚》里的表演比《青红》松弛多了，越来越好。”王小帅评价秦昊。

《春风沉醉的夜晚》之后，正赶上中国电影、电视剧市场开始走俏，秦昊也在娄烨的推荐下，签约了王京花的经纪公司。他原本苦苦坚守的原则和节奏被打破了，“一年六部戏，每部都是遗憾和亏欠”。

秦昊解释突然转变的原因：“和钱没有关系。有些角色我想演，我那么用心做电影，他们不用我，却用因为电视剧而红起来的演员，你懂我意思吗？那行，我也能演啊。”

但事实证明，秦昊不能演。一部戏接着一部戏，每部都不能细细琢磨，多拍一部就多不安一分。“钱赚了不少，但因为不开心，挥霍得也快。每天呼朋唤友，出去玩，去买东西，去泡妞，因为空虚。”

“什么时候我知道必须要停止了？来找我的戏越来越烂，竟有人来找我演省委书记。”秦昊说，他终于决定，与公司解约。“该给的钱一分不少，但不能再继续了。”

“戏商”

与王小帅一样，娄烨看着秦昊一路成长。他评价秦昊的表演：“他的演技在不断进步，技术在成熟。比如，《推拿》里的沙复明，这个角色是2009年《春风沉醉的夜晚》时的秦昊无法完成的，但四年之后，他可以完成得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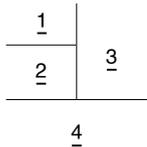
在娄烨眼中，秦昊的表演源于他的生活，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他的演技自然在成长。而秦昊则认为，自己的表演源于一种无法量化的感觉，“就像情商、智商，演员大概也有‘戏商’吧”。

为解释清楚“戏商”，他举了一个例子。拍《推拿》时，电影需要一个演员来演警察。组里另一位演员郭晓冬的表弟就是警察，秦昊见过，觉得那哥们很逗，看起来特不像警察。回去之后，秦昊和娄烨提起这位表弟，说：“警察可以让他来演。”娄烨问：“像吗？”秦昊说：“不像，特别不像，特牛。”郭晓冬说：“怎么不像？可像了，像警察。”娄烨一听，就说：“像警察……那算了，他不适合这个人物。”



秦昊参演的电影：

- 1. 《青红》剧照
- 2. 《火锅英雄》剧照
- 3. 《浮城谜事》剧照
- 4. 《长江图》剧照



“我喜欢罗伯特·德尼罗那种，进片场前和出租车司机打哈哈，和化妆师聊天，只要一开机，给出的表演就是最好的。”

秦昊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力，可以把导演的意图揣摩得准确，而且，喜欢和导演一起创作，“迷恋那种创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与娄烨合作的每部电影都有他即兴创作的部分。《推拿》里，盲人按摩师沙复明偷听朋友讲话，不小心撞到了风铃，风铃“叮铃”一声，沙复明赶紧把手指放在嘴上——“嘘”。这个幽默又暗藏心酸的桥段就是秦昊灵光乍现的一笔。“每次有这样的表演都特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特别厉害。”秦昊每次提起这些细节都一脸得意。

娄烨对秦昊印象最深的一个瞬间是在《浮城谜事》的片场。摄像机在转着，镜头里男主角（秦昊饰演的乔永照）的妻子和小三正在摊牌。这场戏没有秦昊什么事，他正坐在远处吃面，娄烨突然跑过去，对他说：“一会儿你听我指令，进屋。”秦昊二话没说，擦擦嘴，接过道具人员匆忙递来的背包就站在门口待命了。娄烨一声令下，秦昊开门进屋，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接完了这场戏。“不是所有演员都有这样的勇气和即兴表演的能力，秦昊给了我惊喜。”娄烨说。

常莉老师也认为，秦昊的表演张力不在于站在镜头和舞台的中央充当主角，他的表演和他的人一样，总会在平淡中有神来之笔，而那一个小动作就足以让你记住他。

“有次我们做表演练习，主题是‘看电影’。秦昊和章子怡演一对情侣，电影院放恐怖片，放到特别惊悚的地方，秦昊突然紧张地扑到章子怡怀里，这一下，把学生和老师都逗笑了。”常莉老师说，这段表演现在看来没什么，但在十五六年前是非常创新的。

“我不是那样的演员，”秦昊试着分析自己的表演，“不是达斯丁·霍夫曼那种去图书馆翻资料，做好所有的准备，构建完整的人物体系，再打碎了表演出来的努力型演员。我喜欢罗伯特·德尼罗那种，进片场前和出租车司机打哈哈，和化妆师聊天，只要一开机，给出的表演就是最好的。我追求这种灵光乍现的感觉，

这需要表演之外绝对地放松。”

积累了一定的表演经验，秦昊才发现，自己越是在放松的状态下，给出的表演就越好，越有惊喜。所以，生活中他尽量放松，“别把自己当个什么似的”。

紧张或情绪不好时，他的表演就不尽如人意，至少，无法让自己满意。《长江图》获奖后，业内外对这部电影的褒奖一波接着一波，但在秦昊心里，这部电影没达到预期，“剧本的好没能完全呈现”。

《长江图》是秦昊与导演杨超的第一次合作。杨超的导演风格与王小帅、娄烨完全不同，他的偶像是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喜欢以景叙事和抒情。电影拍摄过程中，秦昊和导演有很多争执。比如，台词应该更生活化，一出场就读诗，太做作了；比如，角色是不是应该为景色服务，演员的用武之地在哪里。“如果都是为景色服务，为什么找我来演呢？不需要啊！”

除了风格上的不适应，电影拍摄期间，秦昊也吃尽了苦头。“就这么大的地方。”秦昊比画出一个小空间，“吃喝睡都在这床上，连着三个月在长江上漂着，整个人都抑郁了。”

每次抱怨完拍摄的艰辛，秦昊都会找补一下：“但再没达到预期，我们的片子也好过大多数国内电影，毕竟有一个底线标准在那里。导演为一个片子坚持了这么多年，最后能拿奖，我们都为他高兴。”

《长江图》获奖后，秦昊与杨超在柏林重聚，他们讨论起那段艰苦的日子。秦昊觉得，有些电影人有误区，无论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拍电影都应该是件快乐的事。接受采访时，他说：“不管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一定是大家吃饱了撑的才来做的事，我永远不相信电影要苦才能拍得好。这跟生女儿要富养是一个道理。”

绯闻与商业

如今，在各种公共场合，秦昊总会一脸陶醉地提起即将出生的女儿。电影杀青，秦昊还没来得及回家，就打算直飞美国，去陪伴待产的妻子伊能静。

与伊能静这段引人关注的恋情把秦昊的知名度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便之前主演过那么多获奖影片，走过那么多次国际A类电影节的红地毯，也从未能达到的高度。2014年，秦昊主演的《推拿》入围戛纳电影节，他在红地毯上牵手伊能静，公开了这段年龄相差10岁的姐弟恋。“我去了那么多次戛纳，你

们不给我采访，我搞了一个对象就给我上头条了，玩儿什么呢？是我红了的意思吗？”接受采访时，秦昊曾这样调侃记者。

这段恋情的确让秦昊红了，他从一个边缘的“文艺工作者”摇身变成了娱乐八卦版面的常客。和秦昊不同，伊能静更像是一个合格的艺人，她喜欢在微博和各种社交网络上晒生活、秀恩爱，喜欢与网友和“粉丝”保持一种亲密的互动关系。和伊能静在一起后，秦昊的曝光率明显提升，他也被爱人影响，偶尔在微博上秀自己的生活，与伊能静互动，为自己的电影助威。

和一个“著名女人”谈恋爱，公众对他的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争议从来都不是坏事。”秦昊现在的经纪人周嗣伟说。2015年，“红了”的秦昊签约了现在的经纪公司，公司股东是陈国富和周嗣伟，前者是华语电影圈口碑很好的导演和监制，后者出身华谊，曾一手捧红黄晓明和冯绍峰。

签约新经纪公司后，秦昊也开始向商业市场转型。周嗣伟不愿意称之为转型，他更愿意把这种调整称为“在保证他艺术价值的前提下，增加商业价值”。“秦昊的艺术价值毋庸置疑，但他以前没什么商业价值，他在文艺圈和爱好电影的小众群体中有非常高的认知度，但对大众来说，他的知名度并不高。”周嗣伟觉得，单从商业角度来说，秦昊还有很大的上升潜力。

出演杨庆导演的《火锅英雄》为秦昊带来了第一次商业上的成功。这部由陈坤、白百何、喻恩泰和秦昊主演的犯罪题材电影收获了3.7亿元票房，同时，也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能加盟《火锅英雄》，秦昊本人、经纪公司和电影投资方都经历了一个彼此说服的过程。“一开始，秦昊对这个电影没那么感兴趣，投资方也希望找一个在票房号召力上和男一号陈坤实力相当的演员。”周嗣伟充当了两面游说的角色，“后来，我们让秦昊和导演接触，他的感觉还不错，再加上陈国富监制，他就接受了这个角色。对于投资人来说，秦昊的商业价值可能低一些，但他能提升电影的艺术价值，事实证明，他的确做到了。”

《火锅英雄》之后，商业电影的邀约越来越多，但秦昊依然首选了娄烨的新电影来拍。“我们依然要保护他所谓的‘文艺男神’的气质，有他喜欢的文艺片就像以前一样去拍，我们只是给他多一些商业上的选择性。”周嗣伟说。

提升商业价值也需要适当的形象管理。“你看，他有做商业片男一号的形象，大长腿，长得也挺帅，就是对自己太不上心。”周嗣伟偶尔会提醒秦昊注意形象，“别穿着拖鞋、大背心就出街了。”

不久前，秦昊还加盟了东方卫视的真人秀“欢乐喜剧人”，在节目中表演了两出喜剧。周嗣伟解释这次尝试：“公司当然希望他参与，电视毕竟是更大众的平台。当时《火锅英雄》也快上映了，秦昊以这样的方式为宣传做贡献，没有什么不好。何况，他也希望尝试喜剧。”

“王小帅知道我参加这节目，他觉得我疯了。”秦昊说，尽管好友不理解，而且在节目中他的表现也没能赢得太多电视观众的认可，但现在的他愿意尝试更多的东西，包括喜剧，也包括综艺节目。

“我看了那个节目，那不是秦昊的优势，不是他的风格。”老师常莉也不认可秦昊的这次尝试，“他的幽默是冷幽默，是冷不丁地来一下让你记住，而不是站在那带着大家一起闹腾。”

作为好朋友，王小帅感受到了这几年秦昊的变化：“演戏没有变，还是很放松，就是助理变多了。”没签约新经纪公司之前，秦昊的经纪事务由伊能静的经纪人帮忙打理。王小帅察觉到，拍摄《闯入者》和随《闯入者》去威尼斯电影节期间，秦昊有了明星的派头，“阵仗变大了”。

“我性子直，当面提醒过他，你这样不太好，挺帅的一个老爷们儿，就好好演戏，生活中别让这么多人围着你。”说着，王小帅反问记者：“他现在不是这样了吧？”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王小帅放心了，“都有这么一个过程，他本质没变，肯定能想明白”。

常莉老师也觉得，秦昊对自己的认知早就很清晰了，眼前可能有些不一样的尝试，也可能走些弯路，但他会调整，“眼前的路可能不清晰，但他知道终点在哪里”。

采访中，秦昊提到，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参加一次没有采访、没有拍照的电影节。上次去戛纳，他碰到了自己表演上的偶像罗伯特·德尼罗——《教父》修复版上映，德尼罗来戛纳走红地毯。

那次偶遇让秦昊感慨：“他就站在我身边，搂着两个大姐，嘴里叼着雪茄，聊两句就进电梯了。后面有人喊拍照，他说，拍照，行。转身拍了个照片，回过头，就走了。就是这么随意，这么放松，那才是电影节该有的样子啊，你说是不是？”

《独立日2：卷土重来》： 艾默里奇的“灾难”魔咒

文 / 葛维樱

“‘人类’这个字眼，对于我们有了新的含义。”比尔·普尔曼《独立日》演讲曾经是中学生英语朗诵的必备节目。作为一代人的燃点，1996年，《独立日》第一次带领人类击退了外星人攻击，第一次创造了史上最高票房8亿美元，第一次定义了一个新类型片“灾难片”，直到两年后《泰坦尼克号》才超越了它。20年后的今天，当埃菲尔铁塔、大本钟和新加坡金沙酒店都在天空中打起了滚，地球上的防御和反击不再有国家之别，当电影不再是一枚席卷全球的重磅炸弹，我却有点怀念那个影碟机里，威尔·史密斯扮演的，骂骂咧咧暴打外星人的大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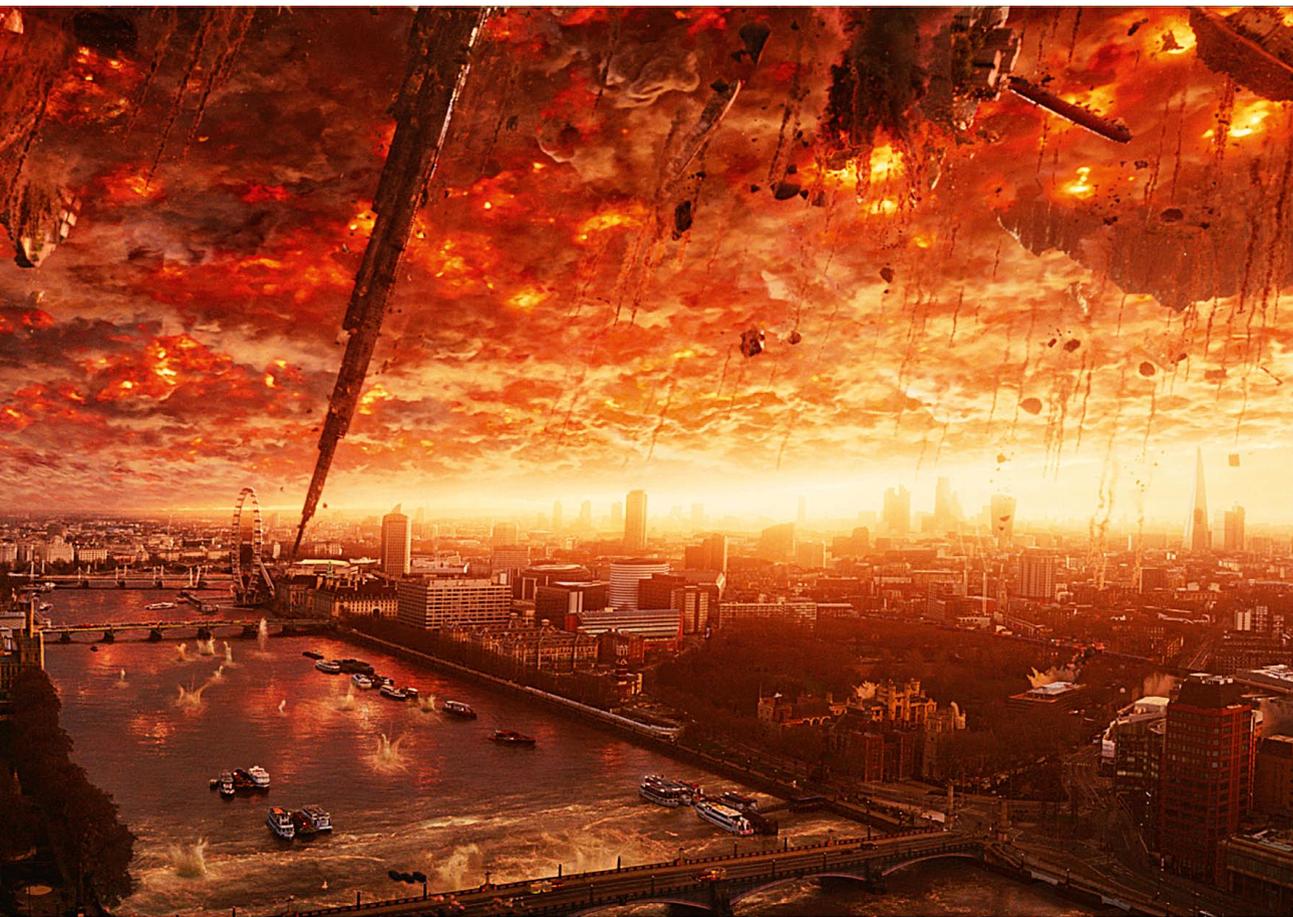
“第一部《独立日》，你如果仔细审视，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灾难片。”导演罗兰·艾默里奇对我说，“里面有15分钟到20分钟大灾难的场景，但更多的是空战。”当年电影在白宫试映，他因为不安，将克林顿总统身边的位置安排给了比尔·普尔曼。20年前，人类和外星人的大战在此开篇，此后成为全球大银幕上的重要主题，名字等同于大投入高票房的艾默里奇，却并不想在同一道路上安全前进。时隔几年后，他导演了《后天》《2012》这样真正的灾难电影。“我出身长大在德国，我们没有超级英雄，而且我也不太情愿用一本特别有名的书或话题，来拍摄电影，比如《哈利·波特》和《饥饿游戏》。”艾默里奇的理想是“我希望创造自己的题材和类型”。他所导演的绝大部分成功之作都由他亲自编剧。多年来一直自称不拍续集的艾默里奇重新拿起了《独立日》的招牌，这次他选择了一个全世界联合起来的“太空防卫署”机构。全球资源统一调配，各种肤色人种协同作战。

“如今的世界是分崩离析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不和是主旋律。如果我们要进入太空，依然各自为政，可是在太空里的生存守则是什么？作为人类，为人性而战，哪怕是愚蠢和笨拙的。”艾默里奇并不觉得“同一个世界”过于正确了。1996年美国独立



日这天，因为电影的上映，成了爱国主义加外星题材的首次共鸣。在80年代初出茅庐时，他被德国媒体讽刺为“斯图加特的斯皮尔伯格”，当时德国电影界是文德斯和法斯宾德的鼎盛时期，自打少年起看了《第三类接触》的艾默里奇，却开启了另一扇电影之门。和在他家乡斯图加特大学受教育的19世纪科学家居维叶一样，艾默里奇也是“灾变论”的拥趸。居维叶是法国最有名的地质和古生物学家，认为地球经历了4次大灾难，而《圣经·旧约》中关于大洪水的故事正是佐证。

作为好莱坞最会拍摄“政治阴谋论”和“超自然现象”的导演，艾默里奇从来都是“方舟”迷。从他以德国史上最高成本的毕业作品《诺亚方舟准则》开始，直到《2012》，“灾难”在艾默里奇手中几乎已经到达了顶峰。“艾式生存法”甚至成了电影以外的套路，比如“留意广播中的怪异电台”、“没事不要待在海上”。



电影《独立日2：卷土重来》剧照

“我在《2012》里已经把所有能用的灾难手法全部用尽了。”艾默里奇说。《独立日》里最好看的永远是各色人等在灾难面前的反应，大场面之王当然有许多烧钱的镜头，比如把迪拜塔倒扔到伦敦眼上去。“这就好像中东和亚洲掉在了欧洲上，这就是我的一个概念和想法。”

他也是第一个嘲笑了并狠狠鞭答了人类对“外星”热爱幻想的导演。那些向天空举起“我爱外星人”横幅的嬉皮少年、一字排开表示友谊的飞行礼宾队，是艾默里奇没法抑制的残酷幽默。“我们最大的恐惧和虚无感，不是来自面对自然的不可知，也不是关于地震海啸的想象。事实上，对我们产生威胁的是那种面对人类内心邪恶和黑暗的恐惧，以及我们面对人类社会异化、政治国家时空所产生的荒诞感。有时我们毫无理性肆意妄为地对自然界毁灭，也是恐惧感的结果。这种恐惧感根植在现代人心目中，灾难片是最好的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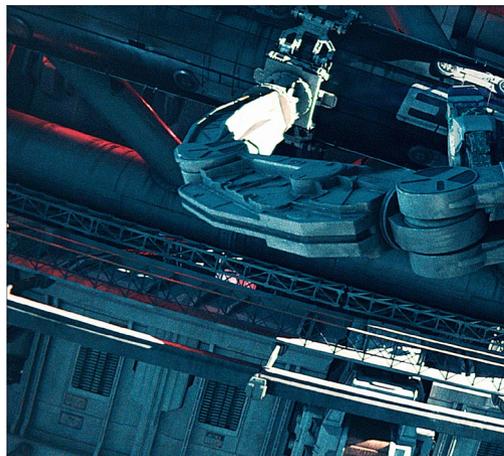
放。现代精神分析，把直面恐惧当成最好的精神脱敏疗法，至少对我自己是这样。但我觉得电影也要承担一定责任，不造成困惑的前提下，应该呈现层次分明的现实和创作者的思考。”

如今在超能力者合纵连横的银幕上，《独立日2》让一个寻金船上正为世界末日买醉赴死的冒险者们，为了1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同样也为人类最后一点希望，坚持在海上。艾默里奇这么解释这个最有喜剧效果的情节：“如今关于超人他们都要一群超人一起行动才行，要去解决某些特别大的问题，我们要重新创造超人的形象，要告诉人们，那些真正解决问题的都是普通人。”影片中人类以英雄主义、美式幽默对抗世界末日，并且没有借助任何超能力的帮助。“我希望去描绘的是社会的某些层面，人的某些层面。而且我向来都会仔细地观察我的朋友，在写故事的时候会考虑用某些真实的人作为原形，使这个角色让大家觉



1. 导演罗兰·艾默里奇

2-3. 电影《独立日2：卷土重来》剧照



得有共鸣之处。”

“场面还能不能更大？”是影评人给艾默里奇幻想的口头禅。艾默里奇的履历表简直是好莱坞的模范生。和“卖拷贝”迈克尔·贝一样，艾默里奇的海报从来不用明星。他不仅擅用英语拍片，更迅速创立了自己的大成本难以超越的特效和票房的“新好莱坞”时代。他自知不受评论人待见，善于自我调侃和不断挑战，以更高的票房和更令世人震撼的视觉冲击，来赢取“艾默里奇式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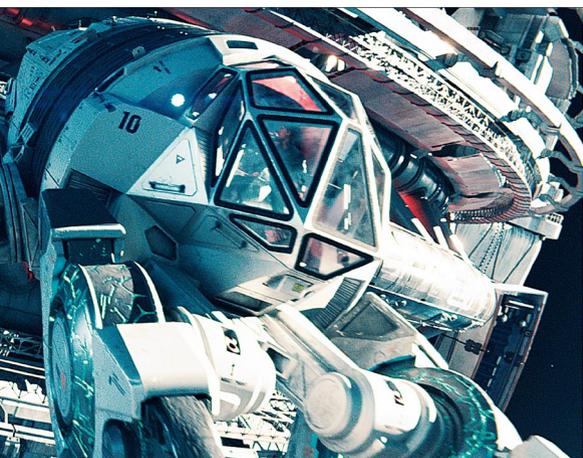
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曾经的《后天》还会引发全球变暖的真实讨论，乃至推动了全世界对于气候的关注。《后天》以逼真炫目的视觉特效，描述了因无

法遏制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异变、全球陷入第二次冰河纪的故事。现实中美国政府一直否决《京都议定书》，直到2004年《后天》的上映引起的舆论压力，迫使布什政府宣布支持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灾难片的影响导致生态意识的唤醒，艾默里奇让图书馆里取暖的人，把书籍扔进燃烧的壁炉。那些人类引以为豪的物质文明、生活方式，成了灾难的摧毁对象。冻成了冰柱的自由女神，把人类文明逼入了穷途末路。《后天》一直是气候和环境学者最喜欢引用的极端气候想象模版。

5年后，艾默里奇终于把自己脑海里的末日《2012》成功搬上大银幕。艾默里奇对于灾难片的执着堪比奥



2



3

林匹克精神的“更高更快更强”，在“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上，一家人和各国精英们还有一场关于“平等”的讨论。“每个人都难免开始自问，自己究竟是在做什么，是不是做了正确的选择？因为显然，另一种观点就是：‘是的，你在拯救人类，但是，有什么是值得拯救的？’我希望在观众看那些普通人奋力逃生的过程里，能看到这部电影里有这样一种无声的、智慧的讨论，真正让我们恐惧的是什么，这也是我要向观众倾诉的恐惧。灾难电影总需要一些灾难以外的东西。”《2012》上映后引起更广泛更长时间的影响。2009年11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网站公开声明，《2012》所声称的末日并不存在。《2012》

一直出现在生态学乃至审美范畴的讨论里，因为这部影片，艾默里奇被推崇为“灾难主义”大师，灾难和自省互相伴随，进行“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最伟大的永远是那些在危急情况下敢于挺身而出的凡人。其实我更关注男主角如何从一个坏爸爸坏丈夫转变成一个凡人英雄。”

艾默里奇用一贯的灾难语言，让《独立日2》卷土重来，但外星题材早被众多影视剧不断演化成了另一个平行宇宙。作为观者的人类，对于内化的矛盾和人类处境更加关注。电影里，外星人的形象已经从丑陋黏答答的多须怪物，进化到了银河护卫队“树精”那样的充满了多面的人性了，人类甚至敢于孤身犯险，在火星笨拙又孤独地种土豆。“80后”观众是被饮食全球化浪潮里迅速统一了口味的一代。在中国，《独立日》被香港译作《天煞：地球反击战》，当年统领了录像带世界，是“80后”集体的共同回忆。越是现在精彩的特效，从新加坡到伦敦不过几笔而已，似乎灾难浮光掠影般就可以使人类灭亡，越让人想起第一部《独立日》中，那些驾车堵在公路上的绝望的面孔，和尘土硝烟弥漫的隧道里，母亲紧紧抱住儿子之后又抱住了狗的镜头。

“我在好莱坞起步的时候，特效盛行用模型。数码可以随意修改，但如果用模型的话，‘啪’的一声，胜败在此一举。”在没有CG特效的当年，以20：1的比例复制洛杉矶街道，并把模型投入巨大的注水池来营造浪花的特效监制沃克·恩格尔，赢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特效奖，此后的若干大片都由这对金牌搭档完成，这一部《独立日2》依然如此。在大环境里，人作为自然体的困境从来没改变过。“对我而言，灾难片本身反而像是厚实的糖衣，灾难片常常意味着科幻，某种意义的不切实际，但至今这是让我感觉最自由和实在的表达方式。”

我对艾默里奇说，最喜爱《独立日1》中总统的演讲：“也许这就是命运，今天正是独立日。你们要在此为自由而战，不是为了反抗保证或迫害，而是为了避免被消灭，为了活命的权利，为了生存。如果能够胜利。”他对我感叹地说：“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个场景吗？当白头发的欧肯博士醒过来，他第一句话是：‘我们赢了吗？’”20年过去了，当年中学生的我还为了看到一场真正的好莱坞大片激动不已，后来看到同样出自他手的《爱国者》至今仍觉得热血曾沸腾过。“每个人都是因为珍惜而想做点什么。很幸运的是我每部电影都表达了这个意思。”



1



13



2



4



出生于埃及、定居纽约的工业设计师卡里姆·拉希德

数字时代的 粉红设计师

文 / 钟和晏 图片提供 / Karim Rashid

在拉希德的设计中，新媒体和新技术所孕育的活力可能会反过来作用于产品和空间，传达出一种积极的、骄傲的时代精神。



拉希德设计作品：

1. 为西班牙品牌 Vondom 设计的 Voxel 室外椅
2. 一个典型的拉希德式室内空间是柔和的、曲线的和感性的
3. 柏林 Nhow 酒店的酒廊以粉红色与其他亮或暗的色彩配对
4. 汉堡 Prizeotel 酒店的酒吧采用了清晰的配色方案

设计师卡里姆·拉希德 (Karim Rashid) 几乎是粉红色调的同义词，过去 20 多年，他不断地把鲜亮的粉红用于各种产品和室内装饰：粉红 Ultra 模块沙发、粉红 Sturn 浴缸、粉红华硕电脑、粉红 Alessi 手表或者粉红主调的设计酒店。他所采用的粉红色独占光谱的某个特定位置，比火烈鸟的粉红深一些，比樱桃红又淡一些。

在公共场合，如果不是从头到脚一身白色，他就穿粉色，他一直试图把芭比粉转化成男子汉的色彩。他说过白色代表天使和自由，而“粉红色是灿烂的、充满活力的，能够明确传达瘾、能量和非常乐观的想法”。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借助传媒力量和互



左图：拉希德在墨西哥坎昆“诱惑度假村”中的 Spa 设计

右图：拉希德为土耳其品牌 GAIA & GINO 设计的玻璃烛台

联网的兴起，催生了一批明星设计师。他们不仅在名人文化潮流下获得国际知名度，而且让自己发展成品牌，今年 55 岁的拉希德深谙这一点。他是设计场合无处不在的偶像设计师，他似乎为此而陶醉。

设计网站 Architonic 被搜索次数最多的设计师排名中，拉希德最近排名第 13 位，输给了第一位的汤姆·迪克森，但是排在隆·阿拉德和坎帕纳兄弟前面，他自己转发了这一推文。当他没有在《Wallpaper》杂志“设计师权力名单”榜上有名时，他狠狠地在 Facebook 上表达了自己的怀疑。

唯我的强烈个性也许会招人侧目，但另一方面，拉希德似乎有足够的资本这样做。他是世界上最多产、最高效的设计师之一，总共超过 3000 个投入生产的设计和超过 300 个奖项，遍及世界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设计内容同样令人惊讶地多元化，从数百种家具、照明、餐桌用品、产品包装、平面设计延伸到酒店整体设计、公寓建筑等等，他还出版了 9 本书。

出于这种提供多样性的能力，他经常是五六十个项目的概念草图同时进行。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项目，从一种类型学到另一种类型学，交叉的想法、材料、审美以及语言相互激发。

一个典型的拉希德式室内空间是柔和的、曲线的和感性的，充满不同寻常的造型、丰富的色彩和鲜明的视觉效果，以及所有那些满足固有需求的功能配备。他一直着重于创新性，无论是新概念、新材料，还是人们的新行为、新的生产方法或者全新的市场。

追求新奇可以说是棘手的设计问题：为了新奇而新奇，它可能会变成一种无关紧要的姿态，如果完全忽略它，设计师又可能退步到不断自我重复。在怀旧的世风下，近些年设计师似乎越来越多地转向 20 世纪中叶甚至更陈旧的风格。但是，拉希德仍然坚持“在作品中表现出基本的时代精神”的理想，与当下的工业状况、生产方式甚至社会行为产生关联。

作为对新材料的尝试，他最近完成了一把“糖塑料”椅子，采用从糖和玉米中提取的聚合物材料。他对一种能够感知太阳光的新型液晶玻璃充满兴趣，这种玻璃不仅能够根据自然光线调节房间的明暗，而且附带产生电力的太阳能电池板。

在曼哈顿哈德逊高地，他为 HAP 投资公司设计了名为 Lilak 的公寓楼，预计今年夏天完工。紫色调的立面色彩取自纽约州的欧丁香，被重新诠释成像素化的图像。轻量方形面板的外墙内嵌类似俄罗斯方块形

状的窗户，据说部分窗户造型接近希伯来语中的单词“爱”与“生命”。

事实上，Lilak 公寓楼是整个曼哈顿第二座使用模块化预制建造技术的建筑。总共 8 层、47 套住宅的楼房由 97 个相同的模块构成，在宾夕法尼亚的工厂生产之后，运输到曼哈顿现场组装。对投资公司来说，使用预制的方法比传统的建造过程更节省时间和成本，打地基与工厂制作模块可以同时进行。

如今近乎病毒性的媒体和即时社交平台兴盛的年代，可以说设计师一夜成名变得容易，Kickstarter 产品众筹、推特等平台可以帮助无名产品在几分钟内成为潮品。当年，拉希德通向成功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他 1960 年出生于开罗，年轻时移居到加拿大成为工业设计师，33 岁搬到纽约着手建立自己的事务所。那时他一无所有，租办公室的首付款是从父母那里借来的钱。他在接触了可口可乐、吉列等大概 100 家公司之后，只得到了一项委托，为新墨西哥圣达菲的客户设计一套餐桌用品。不过，这一系列在第一年获得了 300 万美元的销售额。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高潮时期，受德里达、德勒兹等法国哲学家的理论启发，他试图从当代现实的复杂性和变化本质中找到一种视觉相似物，从哲学层面审视设计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新媒体和新技术所孕育的活力，可能会反过来作用于产品和空间，为设计注入一种积极的、骄傲的时代精神，也许更加符合 21 世纪初期人们的生活需求。

在数字时代，虚拟体验变得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人们每天有大量时间沉浸在虚拟世界中，相比之下，真实世界似乎显得有点乏味过时。设计的角色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拉希德尤其关注数字时代如何影响人们对物理世界的感知和反应，如何使产品或建筑与数字时代产生直接的相关性。

他为西班牙连锁酒店品牌设计的柏林 Nhow 酒店，也许可以说是体现这种相关性的典型案例之一。后工业风格的酒店建筑是底层被抬高的米色立方体，一个沥青灰色的观景平台稍有突兀感地置于其上，俯瞰着曾经是东西柏林旧分隔线的施普雷河。

拉希德负责酒店所有的家具和室内设计，他把酒店定义为“特别注重音乐的生活方式酒店”，借由色彩和音乐带给人欣快的幸福感。他在设计阐述中说：“设计围绕着我们，寻求我们各个层面的参与。我常常在想，现实世界是否像数字世界一样，提供诱人的、相互连接的、鼓舞人心的体验，灵活地满足我们的各

种需求。在这里我想创造一个空间，让我的审美与数据驱动的数字世界和谐共存。”

酒店内饰充满强烈的色彩、明亮的对比和圆润的形式，无论是公共区域还是客房里面，到处是标志性的粉红色，与其他或亮或暗的色彩配对。一座内嵌灯光的鲜粉色流线型玻璃纤维雕塑充当前台，背后白墙上标明全球地点的单向镜和数字世界时钟在闪闪发光，印花陶瓷地砖上的波纹图案代表数据的数字化封存。

如雕塑前台一样，酒店里的许多装置都既有实用功能又是艺术装饰品。玻璃纤维流线型自助早餐台同时是多姿多彩的雕塑，酒吧空间上方的艺术雕塑中隐藏了照明系统，客房里有醒目的数字波普艺术品作为床头靠板和定制窗帘。

柏林 Nhow 酒店关于色彩与音乐，它是欧洲唯一一家能够为客人提供两个专业录音工作室的酒店。作为客房服务，你可以像点一杯杜松子酒一样，让服务员把一把原声吉他或电吉他送到你的房间。

虽然已经设计了超过 3000 个作品，拉希德还想设计汽车、飞机、服装、机器人，他的最终梦想是“塑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对于未来的乐观预想中，他这样描述：“我们将创建一个超消费的、永远充满活力的、不断改变的生存环境，一切将是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的、可生物降解和浑然一体的。这就是乌托邦，这就是自由。”





1



胶片里的世界 会比显示屏里的更好么

文 / 杨聃

胶片所能提供的信息不太多，但饱含情感。

前一段时间掀起热议的 MyCalvins 系列的最新广告又让评论家们把性别歧视、物化等指控搬上了台面，此起彼伏的声音差点让人忽略了摄影师哈利·维尔 (Harley Weir) 的这幅作品是用胶片拍摄的。所以呢，拍摄的胶片复兴确实比性别歧视听起来新颖了许多。

其实用胶片拍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摄影师逢小威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坚持用胶片拍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感受。所以每次展览时，我都要强调照片不能裁，哪怕是一个小边也不行，那样就破坏了整个画面的比例。”他最近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了“萨克森：德国精湛工艺的家乡”主题影展。这个与朗格公司合作完成的文化项目，内容包含了萨克森地区的自然、历史、人文、工商传统与人物。

1. 美国肖像和时尚摄影师欧文·佩恩作品《Cafe in Lima》

2. 美国摄影大师理查德·阿维顿作品《Dovima with Elephants》

3. 逢小威作品《德累斯顿》



摄影师杰米·豪克斯沃斯作品（左、右图）



一幅幅黑白的摄影作品也是在最后的暗房成像后才经过筛选编入展览目录。在此之前，逢小威只能凭借多年的经验来预测成果。要说会不会有些小出入，或者小惊喜，肯定是有，但胶片摄影就是让摄影师对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充满坚定。

展览中有一组麦田的照片，虽是同一片麦穗，同样塞满了画面没有一丝空隙，但每幅的意境都不一样。

无风时，沉甸甸的麦子低垂着头，自然的纹理由近及远井然有序；当微风拂过，将镜头拉远，摇曳的麦穗成了印象画派，以光影的层次凸显了无序的、野蛮生长的自然法则。“摄影是发现后的感动，感动后的记录，记录后的传播。”逢小威说，这些胶片的成像就是他当时最想表达出来的感受。

然而，在智能手机普及率如此高的背景下，现



成的滤镜和使用方便的照片编辑 APP 把所有人都变成了业余摄影师，Instagram、微博、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让大家轻而易举地传播照片。市场研究公司 InfoTrends 表示 75% 的照片用 iPhone 拍摄。的确，iPhone6S 当时铺天盖地的广告也是这么传达的。

随着创作与分享的速度越来越“快”，对过程中“慢”的追求也会有着某种叛逆期的强烈吸引

他们早就习惯了拍完立刻就能看到成品的规律，得知我是用胶片拍摄的时候，他们看起来更有兴趣也更加投入了。他们对自己，甚至对作为摄影师的我都表现出了更多的信心。

力。胶片拍摄让影像制作的节奏更具人情味了。正如《Purple》杂志主编奥维尔·扎姆 (Ovilier Zahm) 所说的那样，“通过人而非机器的眼睛去看世界”。

“数码摄影虽然更清晰更利落，同时捕捉到大量的信息，却让人觉得冰冷。相比之下，胶片所能提供的信息不太多，但却饱含情感。”扎姆在《Purple》5 月刊的卷首语中以此为题，“时装界正在重新探索胶片摄影的可能性，这和音乐界一样，黑胶碟也在卷土重来。我们更在意的是信息，还是情感？当然是情感！”

《Purple》2016 春季刊中过半数的照片都采用了胶片拍摄，扎姆要逼着自己与摄影师尽可能地拥抱这个用介质记录的光影世界。“胶片是感性的。想象一下看胶卷的印样都能看哭，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时装季里，极简主义已让位给 Gucci 的复古潮流和 Vetements 这种更具个性的 DIY (自己动手) 风格。难道是那些色彩丰富、内容跳跃的画面需要对数码拍摄或者胶片拍摄做出最优选择么？《拍摄：当下的摄影》(Shoot: Photography of the Moment) 的编辑肯·米勒 (Ken Miller) 认为：“我们正处于数码科技无所不能的年代，你能使照片看起来和电影画面没什么两样，所以推动这种转变的，并不一定是美感。”

英国版《Vogue》创意总监杰米·珀尔曼 (Jaime Perlman) 认为这种转变“是所处文化里的‘反弹’，我们对数字科技太麻木了，胶片的纯粹令人耳目一新”。《Vogue》也在对胶片摄影敞开怀抱，5 月刊中由科林·道奇森 (Colin Dodgson) 掌镜的《月球时代的白日梦》就是一组胶片拍摄的大片。

对年轻的专业摄影师来说，这个选择似乎更加重要。“现在智能手机和软件自带的相机已经近于完美，如果作为专业摄影师却用数码相机进行拍摄，你可能会开始质疑自己在做什么。”米勒对《时装商业评论》说。不只是他，摄影师杰米·豪克斯沃斯 (Jamie Hawkesworth)、科林·道奇森和佐伊·加特纳 (Zoe Ghertner) 都表示，他们是通过胶片习得摄影技艺的。



欧文·佩恩作品《Face Wash》

数码摄影同样需要系统的专业知识，但胶片摄影能使人更好地了解技术与照明之间的关系，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能在豪克斯沃斯他们的作品中感受到光线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亲自冲洗胶片能引发对这种艺术形式更深刻的感受。“看到科林和杰米在那儿一坐就是几小时，努力地做好这些手工冲印照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向工艺回归。”珀尔曼感慨道。

回到欧文·佩恩（Irving Penn）和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的年代，是摄影师们引领时尚的年代。如今这个角色被时装编辑扮演了，摄影师已经沦为表达编辑观点的工具。“在现场，用胶片拍摄意味着要信任摄影师。我刚开始摄影的时候，这一点很重要，现在仍然如此。”加特纳认为用胶片拍摄要求摄影师对自己的双眼充满信心，注意力需聚焦在那个时刻、聚焦在被拍摄对象身上而不是数字屏幕上。“为了不断追求完美而去刻意重现逝去的时刻是没有必要的。”

事实上，这种转变不仅仅发生在时装界。在用数码设备拍摄了8年之后，旅行摄影师迈克尔·特拉克（Michael Turek）也开始转为胶片摄影。“我注意到了拍摄对象们的反应开始发生变化。他们早就习惯了拍完立刻就能看到成品的规律，得知我是用胶片拍摄的时候，他们看起来更有兴趣也更加投入了。他们

对自己，甚至对作为摄影师的我都表现出了更多的信心。”他对《Traveller》杂志说。

在特拉克看来，讨论哪种摄影方式的成像效果更好既无聊又没意义。从他的不修边幅的外形就看得出来他也不是一个浪漫派或传统的人。选择胶片的理由很简单——用胶片摄影让他更加专注。

“摄影的本质是我们对事物表达做出的迅速反应。用胶片摄影让我能更快找到创作性的解决方案。这听起来有悖常理，但我意识到数码设备耗费了我太多操作上的精力、反复确认液晶屏上拍摄效果的精力。点击、审查、重复成了拍摄的标准流程。我的眼睛一直在向下看，甚至看得审美疲劳。这些时间原本可以用来发现身边更美的景物的，不是么？而胶片摄影省去了以上的大部分工作，我只要专注在创作上就可以了。”

当然，胶片摄影也有很多“致命伤”，比如在旅途中一些操作容易曝光，胶卷的容量远不及记忆卡耐用，成像需要花费一点时间才能看到等等。但相对地，数码摄影也存在它自己的问题，大容量意味着一旦存储卡出现问题，损失的就不是二十几张图片了。目前还没有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适用于数码资料的储存和读取，所以不能保证几十年后，是否能够简便易行地读取数据。

但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胶片复苏是好事。“这些用胶片的年轻人以为自己在改造月球，但实际上并没有。”广告设计公司Baron&Baron的创始人法比安·巴伦（Fabien Baron）说，“这不过是在重复一些别人做过的事。他们的成长环境里没什么人用胶片，所以他们认为用胶片拍摄非常惊人，而实际上他们只不过在复制90年代，复制马里奥·索兰提、大卫·西姆斯和科琳·戴。我现在一看，就知道他们的摄影作品的灵感是从哪来的。”

巴伦认为用现代技术创造全新影像才是真正的创新之举：“我更感兴趣的是有摄影师对我说：‘我所有的照片都是用iPhone拍的。’这才是我们所在的时代。”

然而，少数被巴伦肯定的、拥有自己观点的年轻摄影师也是有的，只是他们刚好都采用了胶片拍摄的方式，豪克斯沃斯就是其中之一。“我不认为年轻摄影师用胶片拍摄就能在数码世界中脱颖而出。”豪克斯沃斯说，“这也从来不是我的动机。想要成为优秀的摄影师，对技术、感性与角度的运用才能使其脱颖而出……这些特质绝不应该受到载体形式的禁锢。”

（本文参考了《时装商业评论》的相关报道）

脱离舍

文 / 张斌



英国退出欧盟，欧盟人才自由流动的政策消失，万众瞩目的英超联赛有可能遭受重创

“脱”字用得不好，让“脱欧”陡然间有了动感和利索。在英国，有一派鼓噪时用的关键词是“离”（leave），这语意间仿佛夹杂着些纷乱。劝人决断，总要加加减减，特别的实际，“得”与“舍”之间当下不易评估，英国脱欧从法理上尚需两年时间，快感和痛点慢慢体会。至于体育嘛，我想同样甘苦自知吧。

脱欧公投前夜，英超联盟主席斯库德摩尔一定辗转难眠，他深知一旦大英帝国孤悬海外，号称世界最佳职业联赛的英超一向引以为傲的开放性必然受损。努力到了最后时刻，斯库德摩尔苦口婆心向握有选票的公众喊话：“孤立主义与英超状态极不协调，与欧洲机器打交道时，也曾沮丧和失落，但英国与欧洲必须长久保持沟通。”

英超20家俱乐部的拥有者齐刷刷站立在斯库德摩尔身后，秉持“留下”的立场。英超早就不仅仅是一个赛季380场赛事的联赛而已，以开放姿态，凭资本推动，未来三年英超全球的媒体版权价值可达154亿美元，号称“光荣独立”大英帝国最具全球影响力的文化出口产品。

《足球经济学》中曾有论断，西欧之所以号称世界足球中心，关键原因之一便是劳动力的自然流动，足球发展生态的一体化。身在欧盟，英超、英冠和苏

超联赛可以敞开大门让欧盟球员几乎没有阻拦地加盟，非英伦本土球员占比已达近七成。一旦脱欧，上述三个联赛中大约有330名欧盟球员将无法达到英足总原本劳工证的需求。简而言之，要想在英国人的联赛中求得一份合同，非欧盟球员必须在近两年中为自己的国家队出战不少的场次，这意味着你基本上要是铁打的主力、杰出的精英。未来，这项约束将进一步升级，国际足联排名50名开外的国脚们基本上都会被婉拒来英超闯荡。脱欧后会挺恐怖的，帕耶、坎特以及马夏尔，甚至包括德赫亚等名将过往24个月法国和西班牙国脚45%出场的劳工证硬杠杠。

实质性脱欧需要两年后才到来，如今手中握有合同的球员还能暂且安心，但如果合同中约定的是以英镑来结算薪酬的话，那就会连带着蒙受英镑因脱欧贬值的损失，俱乐部则要做好引援和薪酬成本激增的准备。都说花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大事，如今就有一件大事会让英超球队神伤的。英超有规矩，每支球队一线25名球员中必须有8人是“本土血统”，以往在欧盟的日子里，欧盟小球员只要在21岁以前的三个赛季或者整三年在英伦本土参与注册，也就可以被视为所谓的“本土血统”球员，法布雷加斯便是其中最好的例证之一。可是，一旦退出欧盟，英超就必须遵从国际足联的硬性规定，只有球员到了18岁才能签订正式的职业合同，而欧盟内部则享有一项特殊的政策，十六七岁即可签下心仪的小球员，这意味着未来在争夺未来之星的过程中，英超球队将丧失优先签约的优势，眼看着才俊流入欧盟豪门。为此，英超会竭尽全力与欧盟沟通希望继续保有这份特权，结果嘛，那就要视欧盟的心情而定了吧？

以上种种大体是站在英超等顶级联赛的立场上去分析得失，开放性和国际化两大核心优势受限之后，其全球竞争力和商业价值会隐隐受损。但凡事皆有利弊，英足总或许将是脱欧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呢，主席戴克预测说，三年五载后，英超等顶级联赛中，英国本土球员的比例将从不足三成增至四成，“三狮军团”羸弱的怪现象有望彻底解决。道理虽如此，但真可以如此乐观吗？未来几年够英国人忙活的，我们的心也跟着操碎了。☑

朝鲜想用导弹试射让时间“倒流”？

文 / 宋晓军

6月23日朝中社报道称，朝鲜日前成功进行了地对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火星-10”的试验发射。“火星-10”在模拟最大射程的环境下，按计划飞行轨道上升到最大高度1413.6公里后，准确落在400公里以外目标水域。同时报道还称，朝鲜最高领导人对试射结果表示满意，并表示朝鲜已经从现实上具备了全面攻击美军在太平洋军事基地的能力。如果把这则消息与当天的另一则新闻联系起来看，就不能不让人产生一个联想：朝鲜想用导弹试射让时间“倒流”？

要说清楚这一联想，首先还要从技术上分析一下朝中社发布的这一则消息。简单说，在研制中远程弹道导弹的过程中，会进行弹头飞行试验。但由于发射空间和携带遥测设备的限制，在无法实现正常弹道全程飞行试验的情况下，通常会采用改变导弹主动段飞程序的方法，进行“高弹道”和“低弹道”飞行试验。一般而言，“高弹道”飞行试验是对弹头的姿态控制系统与突防系统功能的验证，而“低弹道”飞行试验是对弹头的总体方案、防热方案、引爆方案、结构方案和核装置方案的验证。根据朝中社报道的数据看，6月22日“火星-10”成功地完成了一次“高弹道”飞行试验。据此，朝鲜最高领导人才得出

了“具备了全面攻击美军在太平洋军事基地的能力”这一结论。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韩方的监测，在此之前约2小时还有一次飞行高度较低且飞行距离仅150公里“失败”的飞行试验。而在朝中社的文稿里，并没有提及这次“失败”的试验。假设把这次飞行试验视为一次不成功的“低弹道”试验，那就说明朝鲜正在向具备了“全面攻击美军在太平洋军事基地核能力”的目标努力。因为“低轨道”飞行试验可以用较小的射程模拟正常射程的弹道导弹的再入速度和再入弹道倾角，而这对于研制可搭载核弹头的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而言，可以说是关键的一步。可能因为试验“失败”了，在这次朝中社的新闻稿中，只是强调具备了全面“攻击能力”，而没有强调具备了全面“核攻击能力”。

接下来，就要说到6月23日的另一则新闻了。这则新闻的大致内容是：正在北京参加东北亚合作对话闭门会议的朝鲜外务省美大局副局长、前“六方会谈”代表崔善姬当天表示：在美国放弃敌对政策之前，朝鲜不会放弃核开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崔善姬这番话是为“火星-10”试验成功的消息而提前准备好的。其所表达的立场和开出的“价码”，与2009年1月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时是一致的——除非美国彻底取消对朝的敌对政策与核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当年开出这个“价码”时，刚好是奥巴马宣誓就职的前几天。接着，在奥巴马刚刚上任3个多月后，朝鲜就进行了远程运载火箭的试射和第二次核试验。但奥巴马政府却一直坚持对朝的所谓“战略耐心”政策，在接下来的7年多时间里任由朝鲜接二连三地进行核试验和各型运载火箭及导弹的试射。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奥巴马总统即将卸任之际，朝鲜无疑是想利用导弹试射和前“六方会谈”代表在北京开出的“价码”，让时间“倒流”到7年多前的某一刻。这不仅在于朝鲜很快就会宣布其具备了全面的“核打击能力”，更在于作为“六方会谈”一方的中国，在今年2月17日提出了一个恢复“六方会谈”的新思路：中方愿与各方探讨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停战机制向和平机制转换并行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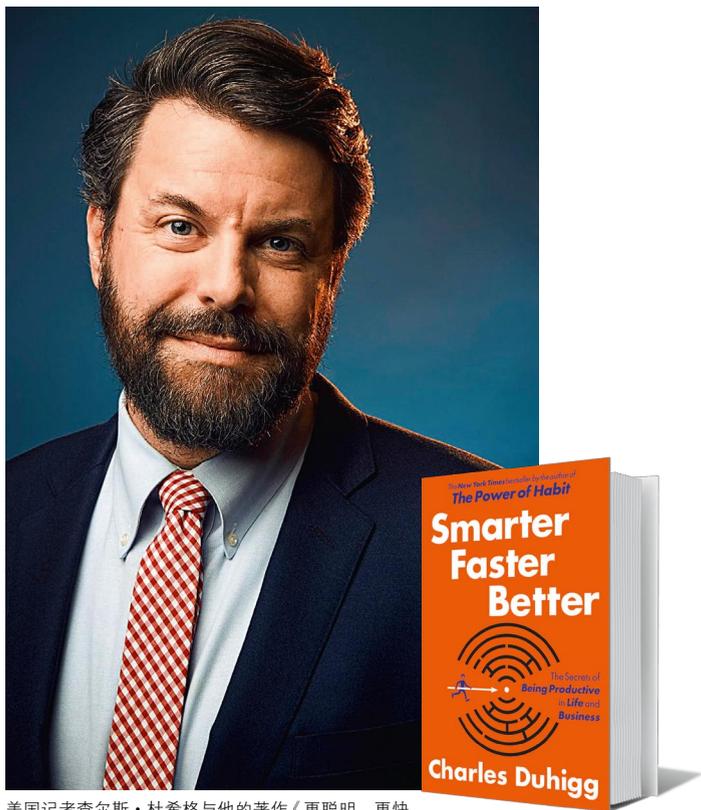


6月23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指导发射地对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火星10号”

如何变得更聪明？

主笔 / 薛巍

继《习惯的力量》之后，美国记者查尔斯·杜希格出版了新书《更聪明、更快、更好：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的秘诀》，阐述了有助于提高效率的八个观念：动机、团队、聚焦、目标设定、操控他人、做决定、创新、吸收数据。



美国记者查尔斯·杜希格与他的著作《更聪明、更快、更好：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的秘诀》

概率思维

杜希格说，如今各种电子设备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快捷，但也让我们变得更忙碌。他说，要想提高工作效率，重要的不是延长工作时间、干得更卖力，而是要采用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比如学会概率思

维，学会激励自己。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好多要根据预测来解答的问题，比如一场会议会持续多久，走哪条路不那么堵，是去海边玩还是去迪士尼乐园玩更好。麻省理工的特伦鲍姆设计了一项实验，问学生一部电影的票房能有多少？普通人的寿命有多长？美国议员的职业生涯有多久？一块蛋糕要烤多久？

他之所以选择了这样几个问题，是因为它们服从不同的分布规律。票房服从一个基本的定律：每年只有少数非常卖座的影片，大部分影片甚至收不回成本。在数学上，这叫幂律分布。一个人死亡的概率在出生时稍高，因为一些婴儿出生不久会夭折，但如果一个婴儿活了好几年，他就有可能再活几十年。接着从大约40岁起，死亡的概率开始加速增长。总体上看，人的寿命遵循高斯分布曲线。一位议员的职业生涯遵循的是爱尔朗分布，蛋糕要烤多久没有明显的模式。

你发现一部电影的票房收入已经达6000万美元，它一共能卖多少？你遇到了一个39岁的人，他或她能活多久？一只蛋糕已经烤了14分钟，它还要烤多久？你遇到一位已经任职15年的美国议员，他还能当多久？只给学生提供这些信息，他们的预测结果居然十分准确。他们知道，一部票房收入达6000万美元的电影是很卖座的片子，还能再卖3000万美元。如果你遇到了一个30多岁的人，他大概还能活50年。他们猜测一个人当了15年议员，他可能还能再干7年。

普通人能够通过直觉达到固定的模式，这种能力被称为“贝叶斯认知”，因为电脑要做这类预测的话，它必须使用贝叶斯规则，贝叶斯规则的核心是一个定律：即使我们只有非常少的数据，我们也能通过做出假定、根据我们的观察对假定加以调整来预测未来。比如，假如你弟弟说他在跟一个朋友吃饭。你能预测出，他要见的是一个男性的概率是60%，因为他大部分朋友都是男性。如果你弟弟说他在跟同事一起吃，你可能会改变你的预测，因为你知道他大部分同事都是女的。

杜希格说，要想做出正确的假定，就需要接触

各种经验，不能只关注或记住成功的事例而忘记失败的事例。“我们要坐在拥挤的或空荡荡的电影院里，才能知道一部影片的表现；我们要花时间跟婴儿以及老人待在一起，才能准确地猜测人的寿命；我们需要跟成功的和失败的同事聊天才能养成优秀的商业本能。”

201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心理学家、统计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发起了一个“优秀判断计划”，看能不能把普通人训练成预测师。两年后，他们得出结论：只要对普通人做短期研究和统计学技巧的培训，教他们思考未来的各种方法，他们预测未来的准确率就会大大提升。

关于如何思考概率的培训能让普通人对未来的预测的准确度提高50%。这种培训指导参与者把未来当作一系列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将要发生的事情，把明天想象为一系列潜在的结果，它们都有着不同的成真的概率。专家说，大部分人在思考未来时非常草率，他们说：“我们今年可能会去夏威夷度假。”但这种可能是有51%的确定性，还是有90%的确定性？如果买的票不能退，概率有多大就很重要了。

该项目培训的目的是把人们关于概率的直觉变成统计学意义上的估计。比如有一项练习让参与者分析法国总统萨科齐再次当选的可能性。在分析时，至少要有三个变量应该加以考虑：首先，萨科齐是在职总统，以前的数据显示在职总统平均能获得67%的选票，因此萨科齐留任的可能性是67%；其次，民意调查显示，萨科齐再次当选的概率只有25%；最后，经济学家猜测，萨科齐只能获得45%的选票。因此关于萨科齐的未来有三种可能，分别是获得67%、25%和45%的选票，也就是说他有可能轻易获胜、失败或者命悬一线。如何综合这些相互矛盾的结果？最简单的办法是取三种可能的平均值：三者相加除以3，结果大约是46%。这个预测跟实际的结果很接近：9个月后，萨科齐获得了48.4%的选票，被奥朗德取代。

概率思维让人们持有多种相互冲突的结果，然后估计它们相对的可能性。如果没接受过训练，我们是不习惯思考多重未来的，因为我们只活在一种现实中，所以当我们强迫自己把未来当作多种可能性时，一些人会感到不安。

职场品质的普遍化

杜希格说，近十年来，经济发生了转变，以前是

大公司许诺会终身聘用员工，现在大多数人是自由职业者和流动职业，在这种背景下，搞清楚动力变得日益重要。在1980年，90%以上的人向老板汇报工作；今天，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自由职业者、承包商或流动岗位。在这种新经济中取得成功的人是那些知道如何为自己做决定、如何安排时间和分配精力的人。“研究发现，知道如何激励自己的人比他们的同辈挣得更多、过得更幸福，对他们的家人、工作和生活觉得更满意。”

让人有动力干活的第一步是让他们有机会做出选择，让他们感到自己是独立自主的。实验发现，把干活当作决定而不是命令交给人们，他们就会更有动力去完成困难的工作。所以有线电视公司在你注册他们的服务时，会问你很多问题。问你是不是更喜欢无纸发票，是喜欢超级大礼包还是白金内容，是喜欢HBO频道还是“娱乐时间”频道，你就更有动力每个月付账单。只要我们感觉自己有控制力，我们就愿意配合。当高速公路上堵车时，你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出口，你就会下高速，哪怕这样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到家。这是因为自己主导的可能性会让我们的的大脑感到兴奋。下高速并不会让你更快到家，但能自己做主让你感觉更好。对于任何希望鼓动自己或他人的人来说，要知道这个简便方法：找到一个选择，让你能够行使控制权。如果你要回复许多乏味的电子邮件，你决定从中间挑一个回复即可。

哈佛大学教授路易斯·梅南德在《纽约客》上评论说：“杜希格的新书采用了当今非虚构类图书常见的形式：在案例故事中插入一些社会和认知科学。故事的目的是给出娱乐性的、人性化的叙事；科学的目的是帮助作者挑选叙事中读者可以模仿的可复制的特征。”

令梅南德感到不满的是，商业类励志书都把职场上的成功之道泛化为普遍的人生教训。商业类励志书教人们如何更好地适应每个时代的经济模式的要求，比如十几年前的同类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它的教导是：那些没有为变化做好准备的人将会被丢在后面。灵活性、创新之类的价值反映了21世纪职场的特点，新成立的公司每天都在繁荣或倒闭。我们不会有意识地采纳当代职场中的价值观，但我们已经把这些价值观内化到了各种领域。我们佩服那些适应新经济的人，认为他们更有可能过上更充实的人生。大学老师也推崇灵活性和创新，鼓励学生跳出传统的思维框架、接受失败，强调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李陀：文学的地平线（2）

文 / 朱伟

1981年，我所在的《中国青年》文艺部举办“五四”青年文学奖”短篇小说征文，请了丁玲、冯牧、韦君宜、王蒙为首，成立了一个评委会，邀请各方朋友参与，以提高征文的质量。夏天，我与何志云张罗在《中国青年》的宿舍楼里腾出房间，专把李陀与陈建功拉来关门写稿。按说李陀当时已经不能算“青年”了，但从心态上，我们觉得与他没距离。李陀家那时已经从北京的小西天搬到了东大桥，《中国青年》在三里屯，坐公共汽车仅两站的距离。把他圈进编辑部，是想给他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但事实证明：让他关注自己，安静地一气写完一篇小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太易被各种新鲜事儿牵制了。或者，从好处说，他的写作是会被自己的不满足而不断颠覆的：写了一半又扔下、丢弃，从头开始。那是绿荫遍野的盛夏，陈建功中午与我们一起用调羹敲着饭盒到食堂买饭，很快写成了《雨，泼打着霓虹灯》；我们邀的韩少功也很快寄来了悲怆的《飞过蓝天》，李陀却迟迟难交稿。当初我们并不理解，他的拖稿其实很可能是心理压力所致，他希望能找到更好的结构，更出众的表达方法，但写小说其实是不能踌躇的。

李陀一直拖延到第二年初才发表的稿子，完成度其实也未必好。它名为《星星后面的月亮》，想表达“人们瞄准的是爱情这颗金色的星星，其实追求的是星星后面那个洁白的月亮”。星星是被月亮照亮的，他想

表达表象的错位——小说中恋爱分手的原因是，在女主角“她”想做一个称职的妻子的表象背后，其实是在掩盖她骨子里想追求的不平庸，于是所有都反其道行之。也许是“星星”与“月亮”的诗意吸引了他。李陀本质上是感性的、细腻的，但他却要显示其理性能力，因为感性若不能提升出理性，就难具张力，而“星星”“月亮”之关系本又难有出人意料的理性结论，他的写作就在这样的纠结中被延迟。

1982年，李陀努力写了好几篇小说，似乎想追赶：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七奶奶》、《上海文学》上的《余光》，最后是《人民文学》上的《自由落体》。《七奶奶》许是也想走“京味儿”的尝试，但李陀绝不会像陈建功那样，兴致投向性格化人物或小人物的命运。他写一个眼睛、耳朵、手脚都不灵了的老太太，只凭嗅觉，所有努力都为辨别煤烟味，为证实媳妇是否又骗了她，没用煤炉而用煤气做了饭。他大约认为，在这样的小尺度卑微空间里，表现出的人生渺小、执著的荒谬才会精彩。最后，老太太“总觉得要出点事儿”，什么事呢？结尾是：“她就一个心思——死了也得把厨房那边的情形看个明白。”他要突出荒谬，既然荒谬，结果就无所谓了。

《余光》写“老金头”跟踪谈恋爱的女儿与小伙子，不厌其烦地写他从王府井一直跟到北海公园。“余光”指老头跟踪女儿，剩余目光被街上女人暴露的胸、腿和依偎的情人吸引，还有拥挤、喧闹，是对“什么也不听、不看、不想的安静”的骚扰。最后，老头在安静的北海公园被“余光”混淆了距离，在黑暗中跟丢了，又回到不必“余光”的独自安静享受。李陀是不屑线性情节推进的，他的兴趣是一个空间里的氛围刻画。即使这么简单的小说，他也写得特别密——没有对话，长段长段的叙述。写昔日王府井儿童商店门前四股人流如何挤成一团，写盛锡福鞋店、精工钟表维修店的橱窗，熟悉那个年代王府井的人，一定觉得他的叙述精细准确。他描写他注意到依偎在一起的人，走路身子一定是倾斜的。这篇小说里有一个深深留在我记忆中的细节：公共汽车上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姑娘两手扶着小伙子的肩，头贴着小伙子的胸。车上的灯熄了，只有路灯光亮一明一暗投进车窗，姑娘鲜红的拉毛围巾上，有雪花在晶莹地闪光。李陀是很追求浪漫的，我还记得那时他很炫耀他家早茶，



1



3



2

1. 李陀与冯骥才合作，1983年编的第一个小说选本，由严文井写序，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印了1.79万册。这个选本对之后的小说创作走向影响颇大
2. 1982年第12期《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李陀的《自由落体》。这是他1982年写得最好的小说
3. 电影《青春祭》剧照。《青春祭》改编自张曼菱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编剧张暖忻、张曼菱，李陀没有署名



(张桂玉摄/新华社供图)

1984年12月29日到1985年1月5日，中青年作家（自左至右）李存葆、苏叔阳、冯骥才、李陀在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专邀我去过一两次。红茶配奶，椒盐消化饼，他强调，饼干一定是要又薄又大又脆的那种。那时在他家里，我最注意书柜里立着好多本各大博物院的藏品画册。他是跑在前头的，那时他已经兴趣于中国传统艺术了。

《自由落体》是三篇中写得最好的。它写一个有恐高症的工人，在高跨天车，全车间的最高处，站在减速箱上，要举起几十斤重的铁链，往吊钩上挂，通过那个不断强调飘落而下无助的烟盒，来写恐惧感。其实没能力在这样的高空作业，但他还是要举、要挂，不断想吸烟是恐惧的暗示。第一次失败了，那吊链像在嘲笑他。第二次，一个他并不爱的姑娘站到了他身下，于是他一定要挂上这个不易挂上的吊钩。结局，掉下去还是没掉下去？李陀又省略了——只是叙述“他想做的事，他一定能做到”。掉不掉下去，又不重要了。李陀的小说其实都不好读，当然，好读的未必是好小说。他营造空间，一定是极有耐心繁密地写细节。比如站在减速箱上，小心翼翼的每一个动作，腿怎么站，身体怎么用力，没有这经历绝对写不出这细致。问题是，一般人其实没耐心读得这么细，没耐心的人就会觉得他写得累赘。

李陀的遗憾是太易丢弃。似乎刚找到挺好的角度与表现方法，1983年，他又把小说放下了。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小说创作不能调度起他的激情与快感，或是任何一种叙述方式他都觉得累赘，抑或是他渐渐消散

了以小说来证明自己的竞争心。1983年，他与冯骥才合编了一本《当代短篇小说43篇》，开始告诉他人，他认为什么才是“好小说”了。这个选本由严文井写了一个诗意盎然的序，所选篇目从1979年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到1983年张承志的《春天》，现在回头看，还是漏选或照顾了不少人事。但在当年，包容了各种表现方法，组成这么齐整的队伍，它对80年代的文学走向还是起了导航作用。为什么是“43”？一本的篇幅一定是在50篇之内，不能是45，也不能是42或44，43就具备了意义。

然后，他又开始帮助张暖忻筹备她的第二部电影，将张曼菱写云南插队生活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为《青春祭》。片名是他与张暖忻在讨论中蹦出来的——视下乡、“文革”为“青春祭”，这确实超越了张曼菱小说及当初所有的“伤痕文学”。“祭”有了一种仪式感，特别牛。

于是，李陀也就彻底离开了写小说。也许，1983年他就认识到了，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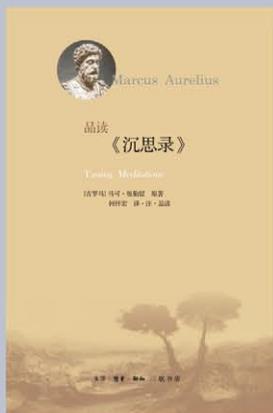
记得李陀写过一篇他在1984年经历的短文，写1984年的夏天，他一次次从东大桥赶到北太平庄的北影洗印厂，张暖忻从云南一次次地寄回样片，洗印出来他一次次去看片段的情景，其中省略了他对这部电影的付出，编剧也不再有他的名字了。他只是说，通过“一个个镜头，一个个画面”，他“目睹了一部电影的诞生”。❏（待续）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品读《沉思录》

[古罗马] 马可·奥勒留 原著 何怀宏 译\注\品读 定价：45.00元

《沉思录》是哲学家何怀宏在1980年代末完成的重要译著，译文忠实简练，素雅凝神，二十多年来在无数读者中默默流传。现在，他以逐段对照的方式与我们慷慨分享他的权威解读，同时感念这部不朽著作在动荡不安的时刻曾给予他的巨大安慰。

败在海上：中国古代海战图解读

梁二平 著 定价：100.00元

元日海战、清英海战、清法海战、清日海战、日俄海战……作者通过二百幅从元到清的海战图，讲解了发生在中国沿海的海战以及近代中国的海防，反思中国为何在海战中连连失利，任由列强肆意入侵，“败在海上”。



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

许宏 著 定价：48.00元

从二里头国家（夏或商王朝）诞生到汉代的绝大部分都城是没有外城的，这一千多年是不设防的时代。如何观察古代都城在先秦时期的时代变迁，如何理解“大都无城”现象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文化内涵，跟随考古学家一起寻找答案。

好诗共欣赏：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讲录

叶嘉莹 著 定价：32.00元

撷取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位诗人的诗作，从物象、心境、结构等角度切入，带领读者贴近作家的生命历程，体会诗作的美感特质。书中三位诗人的诗作特点不同，带有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丰美的感发作用，但都同样具有感动人心的效果，都是“真正的好诗”。



树荫的温柔：亘古人类激情之源

[法] 阿兰·科尔班 著 苜蓿 译 定价：39.00元

他们被树的存在震慑了。对于这植物界的王者，他们既欣赏，又恐惧。他们几乎都在守候和倾听树的话语。有些人希望好好利用这些信息，使树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更有少数人尝试与树结合，对它表明自己的爱。

中国茶密码

罗军 著 定价：49.00元

茶香是怎么来的？茶香与发酵程度有什么样的关系？六大茶类可以如何简单地理解？茶叶是如何发明的？茶叶的消费方式经历了什么样的改变？人类历史上为了茶叶而发生过的哪些战争？为什么说茶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饮料？应该如何喝茶才能对人体有益？



回忆母亲

文 / 王震彩(连云港) 图 / 陈曦



看到标题，有人误认为母亲不在了，其实不然。母亲85岁高龄，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失忆了，连我也认不出来。所以，交流也就无从谈起，经常回忆往日的母亲也就顺理成章。

其实，母亲身体一直很健康，唯一缠手的病是老年便秘十分顽固，到医院看过无数次不用说，就连报刊网络和民间传说的治疗便秘的办法，能采用的都采用了，仍没根治。

子女与母亲的亲情与生俱来，我自认为比他人更深一层。别人的母亲对子女有养育之恩，母亲对我还多了救命之恩。在我很小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求遍医生无济于事，药石止不住我高烧不退，直至出现昏迷抽风症状，命悬一线。我们王家是个大家族，族中长老看到也无可奈何，认为别抱希望了，赶紧扔到乱坟岗闲事。母亲既心疼又无助，但没有绝望。她悄悄将奄奄一息的我安放在储存牛草的草庵子里，我竟大难不死，奇迹般地死亡线上回来了。

过去重男轻女不必赘述，我上面有一个姐姐，母亲对“死而复生”的我更加疼爱。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学习，母亲在大家族中着实不易，其地位与现在的长媳有天壤之别。但因为我的原因，母亲与家族中做事不公平的人能据理力争，爷爷、奶奶也常常为我们说话。母亲后来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让着他们，懒得计较。”如果冒犯到儿子，她才不怕呢！反正豁出去了，那些人也沒辦法。可见我在母亲心中的位置。

再后来，我父亲兄弟四个分家。母亲将建好新房的院落让出去，我们住在原来的两间旧草房中，母亲依然疼爱我。在全村小伙伴都穿布鞋的时候，他们羡慕我穿上塑料凉鞋。当我家姐妹多无人照顾的时候，母亲依然让我上学，聪明的姐姐辍学了，大姐毫无怨言地带弟弟妹妹、做家务，当时我还认为理所当然。母亲虽然不能直接辅导我学习，她却时常教导我多读

书、别偷懒，做一个勤快、有上进心的人，给家里和乡亲争光。

母亲无师自通，会剪裁老式的单衣、夹衣和棉衣，村民常找她帮忙。东家儿子结婚，西家女儿出嫁，也拿着红纸找她剪些并不十分完美的双喜字和放在嫁妆里的石榴、桃子、鸳鸯等剪纸；过去的新娘没有到店化妆那回事，出嫁前让母亲用长长的线把脸上的汗毛绞去，再敷上一点粉。她在种田忙家务之外，做了无数类似的“无用功”。可是，母亲也有不会的农活。自留地里收来的小麦、黄豆等，都需要在有风的时候扬场，母亲曾找到给他家裁剪过衣服的主人，请他帮忙扬场，他却推辞了。我听后气愤地说不知感恩、过河拆桥。母亲却说再想办法，莫斤斤计较，记住人家的好，忘掉人家的不好。

我考上了大学，进城后常看到清洁工在马路边烧树叶，每次都感到可惜。“文革”快结束那几年，农村生活依然艰难。当时资源匮乏，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煤，穷到铲麦茬、扫树叶烧火做饭的程度。我家劳力少，母亲除在生产队干活，还要做那些效率低、极为辛苦、而又推脱不了的事情，所以，她每天休息的时间少得可怜。

“农转非”后，母亲曾与我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段美好的时光使我特别有一种“家”的温暖。随着年事已高，母亲在外已有倦意。小妹唯恐别人照顾不周，主动辞了工作，把母亲接到县城，专门陪着母亲过有规律的生活，逢年过节，县城又成了我的“家”。每次回去，母亲都悄悄地给我买点熟肉，我说不用买，她总是说“某某家的名气大”。后来再回老家，母亲竟认不出我了，顿生孝敬母亲要及时的想法。

成天在忙，忙生计、忙工作，好在退休指日可待，那时的生活再不会离开母亲。✎